

了国际意第绪语的中心。纽约东部犹太聚居区发行好几种意第绪报纸和杂志，意第绪语文学、戏剧也在美国繁荣起来。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第二、第三代东欧犹太人逐渐开始放弃传统的犹太社团文化，相当大一部分开始从下层社会奋斗出来，步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在美国犹太人中引起了各种反应。在较早进入美国社会的德裔犹太人中，很多人不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主张犹太人与所在的社会融合。犹太社会主义者也不支持重建犹太人国家，认为犹太人应该参加所在国家的斗争，在争取社会变革的同时争取犹太自身的解放。而很多在东欧正统派犹太人则出于宗教原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他们相信犹太人要靠救世主的拯救，而不是人为的、世俗的努力。总之，犹太复国主义早期在美国犹太人中的支持者并不多。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欧洲犹太人大规模外逃，而美国等地也出现了反犹势力抬头的倾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犹太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到30年代法西斯和纳粹势力在欧洲上台后，这种看法在犹太人中更加普遍。越来越多的美国犹太人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由于德裔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实力、影响和地位，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大多出自他们当中。较著名的如第一个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犹太人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由于他的努力，美国威尔逊政府公开表示对英国《贝尔福宣言》的支持。布兰代斯任最高法院法官20多年，一直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还帮助救援了一些犹太知名人士逃离纳粹德国。

正是由于象布兰代斯这样一些人的努力和宣传，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犹太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人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这一情况影响到了美国政府对巴勒斯坦问题和以色列建国的态度。至今，美国犹太社团仍是以色列在国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赞助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中的反犹势力逐渐减弱。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纳粹德国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受到了普遍的谴责，激起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同情和支持，美国社会中的反犹种族主义势力越来越不得人心；另一方面，犹太人经过努力奋斗，开始在美国社会中扎下根来，影响越来越大，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一些美国政府领导人出于各种原因，也对犹太人采取了支持和拉拢的态度，如较早的威尔逊和后来的罗斯福、杜鲁门等几位总统，不仅在国际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在国内政治中也起用了一些犹太人担任重要职务。所以，战后以来，犹太人逐渐发展为美国社会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

在政界，犹太裔美国人中出过市长、州长、国会议员、最高法院法官、部长，甚至国务卿，如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是一名德裔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在政

治上的力量还表现在犹太人的选票和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力方面。虽然犹太人口还不到美国总人口的3%，可是犹太人的投票率很高，投票对象也比其他选民集团更集中。所以，竞选者们历来对犹太人的选票都很重视。犹太复国主义院外集团利用掌握的财力、舆论和选票，具有极大的活动能力。美国国会通过的很多支持以色列的决议都是犹太院外集团活动和影响的结果。

在经济收入方面，犹太裔家庭的平均收入高居于其它族裔之上，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中最富裕的种族集团。许多收入高的行业 and 部门几乎成了犹太人的传统领地，如法律、科技、教育、娱乐、文化等方面。美国律师中犹太人的比例高达30%，科技人员中一度高达60%，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中，有32%是犹太裔，把美国带进核时代的是犹太科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爱德华·特勒和冯·纽曼等人。在美国的电影业中，犹太人也有极大的影响，许多制片公司的创始人和著名导演也都是犹太人。

现在，美国犹太人仍分布在大城市里。纽约有200万犹太人，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城市，其他的城市依次是：洛杉矶有50万，费城30万，芝加哥26万，迈阿密23万，波士顿17万，华盛顿16万。在美国，犹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69个。据1987年《美国年鉴》，美国犹太人为592万。尽管总人数只占美国人口的2.8%，但其影响和能量远远超过了人口上所占的比例。正如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的，一百年的时间，已使美国的犹太人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民族变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现在，他们不仅仅是在影响美国政治，而且是在直接行使他们获得的权力。

在犹太人越来越紧密地与美国社会溶合的同时，他们自身的犹太特性也越来越淡薄，他们日益“美国化”了。尽管世界上有了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但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并不想到以色列去定居。他们都认为：“我们是犹太人，但我们首先是美国人，美国就是我们的国家。”

传统犹太社团中，宗教是维系整个社团的核心力量。但现在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今天的美国犹太人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中，一半左右的人公开宣称他们不信犹太教。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出生于犹太家庭，或是习惯性地保持着某些传统生活方式。绝大部分犹太儿童接受的是美国公共教育，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宗教学校教育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在年轻一代中，人们对犹太神学、法学、历史、文化知之甚少。

对美国犹太人的另一大冲击是与非犹太人的通婚。本世纪初，美国犹太人中98%是在教内通婚。但到80年代初，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的比例已高达35%以上。这种混合婚姻家庭的孩子既可认为是犹太人，也可认为不是犹太人。如果第二代、第三代再与非犹太人通婚后，他们的孩子从血缘上、心理上和文化上就几乎不再有什么

么犹太特征了。

还有一些犹太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犹太身份,甚至改名换姓,力求溶入美国社会的主流中去。

对此,一些犹太人忧心忡忡。他们说,现在美国社会没有迫害,没有大屠杀,对犹太人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同化成了对美国犹太社区的最大威胁。有人说,“美国犹太人正在自己消灭自己”。

美国犹太代表大会 美国中央犹太组织之一。1918年,建于费城的第一届美国犹太代表大会制定了犹太人民的战后纲领,任命了参加凡尔赛和会的代表团。1920年,第一届美国犹太代表大会听取了代表团的报告,随后就解散了。不过,在它解散的第二天,它的一些代表就聚集在主席斯蒂芬·S·怀斯的周围,创立了新的美国犹太代表大会,该组织一直存在到现在:1928年,美国犹太代表大会最终形成。30年代,该组织积极开展反对德国纳粹的斗争,也向纳粹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它以极大的努力,唤起社会舆论反对美国反犹太主义的表现。

从1945年起,美国犹太代表大会参加了争取进步的社会立法、争取美国民主的深化的运动,它反对宗教歧视和种族歧视,特别积极地捍卫黑人的利益。它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同情态度,并支持以色列。30年代中期,美国犹太代表大会领导了争取建立世界犹太代表大会的运动。在世界犹太代表大会建立以后,加入美国犹太代表大会的各个组织,联合成为世界犹太代表大会美国分部。而美国犹太代表大会成为个人的联合会,也是世界犹太代表大会的分部。1967年,美国犹太代表大会有300个基层组织。

美国犹太委员会 美国最早的犹太组织。其任务是捍卫美国和其他国家犹太人的权益。它由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于1906年建立,其背景是俄国出现了迫害犹太人的新浪潮。美国犹太委员会为犹太人自由移居美国而斗争。1911年,它促使有关国际会议通过决议,如果俄国不停止执行有损犹太人权利的政策的话,就废除俄美1832年的贸易和通航条约。

尽管美国犹太委员会对美国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运动持否定态度,它仍然参加了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这一组织,该组织向1919年的巴黎和会提出了提案。美国犹太委员会的成员J·麦克、L·马夏尔和S·埃德勒参加了巴黎和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的活动,和会赋予奥匈帝国瓦解后,以及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脱离俄国后形成的那些国家中的犹太人以少数民族的权利。美国犹太委员会积极地评价《贝尔福宣言》,但同时宣称,宣言的实施绝不应该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的权利。由于L·马夏尔和魏兹曼的谈判,1929年创立了扩大的犹太代办处,它

的成员既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又有非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纳粹嚣张时期,美国犹太委员会试图动员世界舆论,捍卫德国犹太人的权利,并促使德国犹太人移居国外。同时,它与美国逐渐增长的反犹太主义作斗争。它反对英国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的政策。1946年它得出结论说,犹太人到处飘泊的问题,只有通过建立犹太国家才能得到解决。1948年后,它促使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援助。在50—60年代,美国犹太委员会的活动基本上涉及的是苏联犹太人的问题。1969年,它拥有4.2万会员。它的月刊《评论》颇具知名度。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犹太复国主义党在美国的组织。它于1918年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建立,当时该组织的名誉主席是路易斯·布兰代斯,主席是J·麦克。1921年,由于与哈伊姆·魏兹曼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在巴勒斯坦和私人投资问题上发生分歧,布兰代斯及其支持者退出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路易斯·利普斯基成为该组织的主席,利普斯基支持魏兹曼的政治路线。在随后的年代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数和预算有了很大增长,它的政治影响也加强了。1924年,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各种目的而筹措经费的一些单独组织,合并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所创立的联合巴勒斯坦基金会。1946—1948年,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主要是阿巴·希勒尔·西尔弗和伊曼纽尔·纽曼作出了不少努力,以保证美国对犹太国的建立提供帮助。在以色列国成立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活动基本上是为以色列筹措经费,并保护以色列的利益。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出版定期刊物《新巴勒斯坦》,该刊物后来改名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1950年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共有16.5万成员。从1950年起,它的成员逐渐减少。

美国的希伯来文学 美国的希伯来文学的开端,尽管可追溯到1654年第一批犹太人抵达新阿姆斯特丹时代,但希伯来文学在美国真正作为一种少数民族的文学,还是在1870年以后。当时有相当一批原先活跃在欧洲,特别是东欧、俄国的希伯来语作家,随着东欧兴起的大规模移民的浪潮来到美国。这些作家主要在纽约集中居住。1918年至1940年期间,纽约市逐步发展成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第二中心,美国也就成了除巴勒斯坦地区外,世界上最重要的希伯来文学发源地和流行区。尽管这些移民希伯来文学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终未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培养出新一代希伯来语作家,老一代希伯来文学家始终是后继无人。1948年后,由于以色列国的成立,许多有才华的希伯来文学家都被吸引到巴勒斯坦,进一步造成美国大陆上希伯来语作家的匮乏,希伯来文学的阵地和影响也日渐缩小减弱。今天,只有很少上了年纪的

希伯来文学家还继续在美国生活、写作。

美国的希伯来文学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 零星出版与文学好奇时期(1654—1870) 犹太民族在北美洲定居的最初 200 年中,希伯来文学基本上没有重要作品和有影响的作家出现。当时犹太人数少而分散,大多数人未有机会专门学习希伯来语。但用希伯来语写作和出版零星希伯来书籍的事仍时有发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对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学的好奇心从未泯灭,一些未正式出版的希伯来词汇手册和希伯来语墓志铭时有出现。保存下来的这方面资料有曾在哈佛学院教授希伯来语的犹太·莫利斯编写的希伯来词汇手册,哀悼 1789 年去世、年仅 20 岁的瓦特·犹太的哀悼词,纽约犹太人塞缪尔·列维的墓志铭等。希伯来语和作品还由于《圣经》的不断出版和希伯来语法书籍的出版在美国存在。希伯来语法书既有犹太人撰写,也有非犹太人撰写的。由费城乔纳森·霍维茨开创的、后由托马斯·多布森继续的《圣经》出版业始于 1814 年。1845 年,艾萨克·利塞出版发行了希伯来—英语对照版的《摩西五经》。出版的希伯来语法书籍有约翰·史密斯的《希伯来语语法概要》(1803 年),摩西·斯图尔特的《希伯来语语法》(1835)和艾萨克·诺德海姆的《希伯来语语法评述》(1838)。

一些犹太教拉比十分注重犹太信徒对希伯来语的掌握,大力提倡希伯来语教学。早在 1731 年,纽约的西瑞斯以色列犹太会堂就坚持开办犹太学校。该会堂的章程(1805)规定:“那些固定不变的祈祷词必须永远用希伯来语诵读。”1830 年,出资建立一所地方学校的丹尼尔·佩克松托医生建议将希伯来语的教学包括在该校的教学之中。不过,所有这些都是个别事件,对美国的犹太文化环境影响甚微。由于希伯来语并不普及,到了 18 世纪末,新港地区的犹太人只能借助标有读音的书籍诵读《托拉》。1860 年出版的由约书亚·福尔克撰写的《约书亚石之书》是第一部的在美国出版的希伯来作品。

2. 现代文学发轫时期(1870—1918) 19 世纪最后 25 年,随着东欧犹太人大规模涌入美洲大陆,欧洲希伯来文学开始在美国出现,其影响也日益明显。一些希望传播希伯来文化的犹太人团体筹划组建希伯来出版社。在不到 30 年时间内,美国出现了 20 家希伯来刊物。但由于缺少读者群,大多数只办了一阵子就不得不宣告停刊。第一份独立的希伯来语期刊《犹太人的新国家》由伯恩斯坦编辑,1871—1872 年出版发行。该期刊在风格上与东欧同时代希伯来刊物极为相似。其他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希伯来语刊物有《西方之光》和《哈毕沙》。这些刊物文学水准较高,唤起了人们希望看到希伯来文艺复兴能够在美国出现的热望。《西方之光》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渴望希伯来学和希伯来文学获得大发展的诗歌,《哈毕沙》也是坚定不移地唤起人们对希伯来文化的兴趣,许多

著名作家都为它的文学专栏撰稿。

大多数来自东欧的希伯来作家对美国都表现出强烈的热爱,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新的祖国。犹太·大卫·爱森斯坦曾把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译成希伯来语。摩西·阿伦·施雷伯在美国革命一百周年时写下了长诗《犹太的献祭》,赞颂美国人民的历史功绩。

20 世纪初,美国的希伯来文学尚未出现任何有影响的戏剧或小说,但一些作家,如纳夫塔尼·赫茨·伊姆贝尔和格松·罗森茨维格的个人文学成就就已经相当突出。伊姆贝尔的名诗《希望》谱上乐曲后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颂歌和以色列的国歌。他的其他一些优美的抒情诗在当时的美国具有一定影响。

3. 现代希伯来文学繁荣时期(1918—1948)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机会。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作为希伯来文学中心的东欧犹太人社团遭到了很大破坏。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希伯来文学采取的政策使俄国的希伯来文学几乎完全消沉。随着德国纳粹法西斯的上台,德国一度出现的希伯来文学繁荣局面遭到扼杀。德国对波兰的占领,使那里的希伯来文学创作活动完全停止。在这一背景下,原先并不具影响的巴勒斯坦和美国的希伯来文学一下子成为现代希伯来文学最主要的阵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希伯来文学很少产生影响的英、美文学开始发挥其影响力。象西尔克纳、利西茨基、巴夫列、金兹伯格、哈金、里杰尔森、费因斯坦、弗雷德兰德、阿维诺姆、施瓦茨、斯特因这批美国希伯来语诗人不仅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环境直接影响,而且受到英、美诗歌的主题和创作风格的影响。上述作家除了写诗外,还把英美诗歌译成希伯来语。受到重视的英美诗人有莎士比亚、惠特曼、叶芝、雪莱、济慈、弗罗斯特等人。这一时期,美国希伯来语诗人的所作所为不仅使他们的欧洲同伴得以用批评的眼光欣赏英美文学,而且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

此外,美国少数民族的生活也对希伯来文学产生了影响。从美国土著民族生活中吸取创作主题的作品有西尔克纳根据印第安人民谣写成的《提姆拉帐篷对面》,埃福罗斯写的《寂静的棚屋》,描写的是一位白人男子与一位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女子的爱情故事,以及利西茨基根据印第安传说写成的《正在熄灭的营火》。不过,对美国希伯来语作家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文化莫过于美国黑人文化。黑人的精神、民歌、布道,以及节奏感和对音乐的鉴赏力,都极大地影响到美国的希伯来文学,出现了相当一批以黑人生活为主题的希伯来诗歌,利西茨基的《黑人帐篷》就是一例。

除了少数民族,美国主流民族的生活也对希伯来文学产生了影响。希勒尔·巴夫列的《伍德先生》(1937)就是一部典型以美国理想化乡村民俗为主题的作品。以色

列·埃夫罗的叙事长诗《黄金》刻划了一个以1849年淘金潮为背景的美国式人物。以犹太移民为中心人物的小说数量众多,主要作家有伯克维茨、萨克勒、弗雷德兰德、索伊尔、布兰克、特威斯基、哈金、华伦诺德等。其中伯克维茨所写的美国犹太人生活的故事几乎全是关于犹太移民的。萨克勒的长篇小说《天地之间》(1924)写了一个犹太家庭从计划移居美国到适应美国生活的全过程。他的历史小说着重反映犹太教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拉比犹太教徒与哈西德犹太教徒之间的冲突,以及早期美国犹太人在新环境中的挣扎情况。特威斯基尽管也以创作历史体裁小说见长,但侧重从犹太历史人物身上汲取创作素材,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著名的犹太人物拉希、德雷福斯、哈姆等人的影子。而哈金的作品则充满内省精神。他的两部以纽约犹太移民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耶胡达·哈哈格瑞》(1928)和《危机之起》(1945),主要描写的是生活在失去上帝社会中当代犹太人在信仰方面表现出的困惑。华伦诺德则有意摒弃传统主题,着意刻划第一代和第二代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丹尼尔·帕斯基多年来一直为《哈多阿》刊物的幽默栏撰文,促进了希伯来语言和文学在美国的传播。

这一时期,希伯来文学批评也开始活跃起来。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有爱泼斯坦、里巴诺和哈金。爱泼斯坦撰写的《论美国的希伯来语作家》一书至今仍被视为权威著作。里巴诺是位优秀新闻工作者,严肃的文学评论家,经常在希伯来文学刊物上发表对作品的评论。另外,希伯来语刊物《哈多阿》在文学评论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是一份主要刊登文学批评文章的期刊。

在这期间,美国希伯来语作家还成立了自己的组织。1940年,希伯来语笔会俱乐部在纽约聚会。1943年,又在纽约召开了第一届希伯来语作家大会。这些活动的成功举行,象征着美国希伯来文学的兴旺。

4. 衰退时期(1948—迄今) 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希伯来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希伯来语作为这个国家的正式语言受到人们的重视。大批移民的涌入扩大了希伯来文学的读者群。希伯来文学的地位也随着犹太人国家的建立而提高,成为以色列国的“国家文学”。大批有才华的希伯来作家纷纷向以色列聚集。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希伯来文学的存在和发展。美国希伯来文学由于未能产生新一代希伯来语作家以及已有的希伯来作家向以色列流失而大受影响,前一时期获得的活力和影响力一下子丧失。希伯来文学开始呈现出衰退趋势,变成少数人的文学。尽管如此,美国的希伯来文学并没有完全沉寂,文学活动仍在进行,新作品还在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受到美国意象派影响的现代希伯来抒情诗诗人嘉布瑞尔·普雷尔引人注目,他的诗歌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以色列受到欢迎。拉宾诺维奇在文学评论方面十分活跃,他对一部分以色列文学评

论家试图将新批评方法用于对希伯来文学评论上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批评,一时颇具影响。另一位文学评论家阿夫拉汉·班德撰写了评论阿格农的专著。1939年来到美国的阿伦·宰特林同时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写作。他的诗歌感染力强,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一些出生在东欧,后来又移居以色列的美国希伯来语作家,由于是在美国长大并接受教育的,他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还有一些在美国出生的希伯来语作家现活跃在以色列文坛。

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希伯来文坛,除了还活动着老一代作家的身影外,又出现了一些来自以色列作家的身影。一些人开始在美国定居。这一现象的出现为趋于消沉的美国希伯来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希伯来文学还不会完全沉寂,将继续作为一种少数民族的文学在美国存在。

洁净礼 犹太人的礼仪之一。此礼在《希伯来圣经》的律法书中可分为四类,有关内容主要见之于《利未记》和《民数记》中。

1. 用于患麻疯病者。受此礼者要在指定之日到营门见祭司,祭司若见此人的大痲疯病已痊愈,便可叫人拿来两只干净的活鸟、香柏木、朱红色线及牛膝草。祭司亲自杀死其中的一只活鸟,使其血流入一只盛有活水的瓦器之中,同时用牛膝草和朱红色线扎成一个以香柏木作柄的洒水器具。然后把洒水器具和那只活鸟浸入血水中,并将血水在那个长大痲疯求洁净的人身上洒七次。另一只活鸟放回田野。求洁净的人洗澡、洗衣、剃去头发,就算洁净,被允许进营,但必须在自己的帐棚外居住七天,再次洗澡、洗衣、剃尽全身的毛发。次日即第八天求洁净的人要带上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一岁的母羊羔,及调油的伊法十分之三细面、一罗革油到会幕门口,祭司取一只公羊羔作赎罪祭,并和那一罗革油一同作摇祭,公羊宰于圣地,祭司将该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者的右耳里、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然后祭司再从那一罗革油中取出一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用右手的手指蘸后,弹七次,再将剩下的油抹在求洁净者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其后将剩下的油抹在求洁净者的头上。最后献上羊羔,一为燔祭,一为赎罪祭,若财力不足,则可用一只羊羔和两只斑鸠(或两只鸽子)代替。

2. 用于患漏症等疾而污秽者。患者痊愈后第七天要洗衣洗澡。第八天,带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鸟到会幕门口,将鸟交给祭司,祭司将一只献为赎罪祭,另一只为燔祭。

3. 用于生产的妇女。妇女若生男婴,其不洁之日为七天,需在家居住33天。若生女婴不洁之日为14天,在家要居住66天。妇女在不洁期未滿的时候,不可摸圣物、

进入圣所。满了洁净的日子，她需带一岁的羊羔和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带到会幕门口，祭司为她将羊羔献为燔祭、雏鸽或斑鸠献为赎罪祭。若财力不足，则可用一只斑鸠或两只雏鸽来代替羊羔。

4. 用于因摸尸体而不洁者。方法是将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的纯红母牛宰杀于营外，对着圣所洒其血，之后将尸体与香柏木，牛膝草一同焚烧，烧后的骨灰放在营外。洁净的人分别在此后的第三日和第七日将骨灰和上活水，用牛膝草蘸而洒在求洁者的身上。此后不洁者洗衣、洗澡，便可得到礼仪上的洁净。

洛希尔 见“罗思柴尔德家族”。

诫律 犹太教的全部诫命、律例、律法和典章。在犹太教中，诫律的地位仅次于《托拉》，犹太教徒必须遵守。《塔木德》共列诫律 613 条，其中训诫 248 条，禁诫 365 条。诫律的种类繁多，有劝人行善的，也有劝人规箴；有涉及人和上帝关系的，也有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违反诫律即为罪愆。但所有诫律并非同等重要。其中一部分与神定律法同等重要，有的则不十分重要，如割礼是上帝所定，必须执行；而在公众场合戴圆顶帽的规定，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尽管诫律是必须遵守的，但犹太教认为遵守诫律不应看成是一种负担，而应看成是一种欢乐，因为遵守诫律的人与上帝更接近了。广义上讲，犹太人认为行善就是在执行诫律。

诵经坛 犹太会堂中设置的供诵读经文的讲台。诵经坛通常是一木制高台，上置供放《托拉》用的诵经案一张，主要供拉比诵读《托拉》、祈祷、布道、主持宗教仪式使用，是犹太会堂举行各项活动的中心场所。犹太新年时，羊角号也在诵经坛上吹响。早在公元前 5 世纪，诵经坛就开始出现。《密西拿》中有犹太人在第二圣殿时期使用这一讲台的记录。《塔木德》也提到了在亚历山大城大犹太会堂中央设置有一木制高台的情况。犹太教对诵经坛的形状和风格无统一规定，不同犹太社团往往会在犹太会堂中设置风格和样式迥异的诵经坛。由于诵经坛作用十分重要，其风格和样式往往是会堂设计者所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中世纪起，阿什肯纳兹犹太会堂的诵经坛大都设在会堂的中央，以确保诵经人的声音能被所有人听到。然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诵经坛则设在会堂的西侧，与约柜遥相呼应，借以保持会堂艺术上的平衡。19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会堂将诵经坛置于存放《托拉》的约柜前面，使会众的注意力集中一处。

费因曼 (Richard Phillips Feynman, 1918—)
美国犹太物理学家，196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生于纽约，青年时代进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39 年毕业于。随后进普林斯顿大学深造，1942 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参加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负责一个小组工作。1945 年，任康奈尔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开始研究电子、正电子和辐射相互作用的过程，提出了加速运动的粒子产生辐射到将来的推迟波，以协调的波动方式向外传播，而不产生辐射到过去的超前波的理论。他还首先使用简单的图解(即费因曼图解)对相互作用粒子系统所需的复杂数学式作了图形描述，使这一过程简单明了。1965 年，他由于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所做的基础理论工作对基本粒子物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J·S·施温格和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费因曼还对氦 II 进行过研究，奠定了液态氦 II 原子的理论基础。1958 年，与物理学家盖尔曼阐述了有关亚原子粒子衰变理论。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量子电动力学》(1961)、《基本程序理论》(1961)、《费因曼物理学讲演集》(3 卷本, 1963)、《量子力学和路径积分》(1965)、《光子强子的相互作用》(1972)，和《统计力学》(1972)，此外，还在《物理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文。

费伯 (Edna Ferber, 1887—1968) 美国犹太女作家。生于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市。父亲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移民。在威斯康星一犹太社区长大。从小立志当一名作家。17 岁时父双目失明，为支撑家庭生活，在当地报社当记者。一年后被密尔瓦克一刊物聘用，当了四年记者。父亲病故后，去芝加哥在《芝加哥时报》任职，业余时间从事小说创作。第一部小说写成后，自己感到不满意，没有投出。后手稿被其母发现，交一出版商，于 1911 年发表，竟大获成功。从此走上文学之路。

费伯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拥有上百万的读者。1924 年发表的小说《如此之大》获普利策奖。她笔下的人物与乡土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人物面对传统和新时代潮流产生的冲突，生动而准确地反映了 20、30 年代的美国生活，深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她还是位剧作家，在百老汇戏剧界享有盛誉。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忠实家庭》、《戏船》、《八点晚餐》、《戏剧之门》等。《特殊财富》是她的自传，书中表达了她对犹太家庭生活和美国社会的真诚热爱，以及对纳粹反犹主义的痛恨。

费伯多次因文学获奖，当选为全国艺术文学研究院委员，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荣誉头衔，并被评论界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作家。

费特洛维茨 (Jacques Faitlowitz, 1881—1955)
犹太人类学家。生于波兰，早年在巴黎学习埃塞俄比亚语和阿姆哈拉语，在其师阿列维影响下研究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1904 年，在罗斯柴尔男爵的赞助下前

往法拉沙人居住地,实地考察法拉沙人的种族渊源。经过18个月的共同生活和研究,他认定法拉沙人是犹太人后裔,而不是若干年前皈依犹太教的土著部落。随后,他不遗余力四处奔波,以讲学和著书立说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为争取世界犹太人组织承认法拉沙人的犹太身份努力,同时大力筹集资金,为法拉沙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移居巴勒斯坦,在特拉维夫定居,继续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以色列国成立后,他的上述观点终于被犹太代办处接受,法拉沙人的犹太身份得到正式确认,为日后法拉沙人合法移居以色列扫清了障碍。

除酵节 犹太民族古代节日。除酵节始于犹太历尼散月(公历4月前后)第十五天,共持续七天。除酵节正值大麦开镰收割的时节,被人们看作春季的一个重大节日。在这七天中,以色列人只吃新麦做的无酵饼,以示食物中没有一点上年收获的东西。七天的最初和最后一天不得工作,用来举行宗教集会。《出埃及记》第12章有一个关于除酵节的详细规定:“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各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作。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除酵节的祭品是当年收割的第一个禾捆。因此它最初可能是一个农业节,表示新的一年由此开始。也有学者认为该节日与原始人的某种法术有关,即希望通过吃无酵饼这件事产生一个丰年。另外,除酵节极有可能是一个迦南农业部落的节日,以色列人出旷野后,结束游牧生活,开始定居,进行农业生产,逐渐把这个农业节日接受下来,同时又赋予它特殊的解释。首先是这个节日的严格性,“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此以色列的无酵节乃是同上帝与以色列民的“约”密切相关的。其次,以色列人把无酵饼追溯到出埃及的历史传统,赋予它一个纯粹希伯来意义上的起源说:当法老终于同意摩西、亚伦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后,“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疏割去,除了妇人小孩,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耽延,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

食物。”这样除酵节便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由于该节日与逾越节紧连在一起,加上后来又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联系到了一起,现已合二而一。在一般情况下,只使用逾越节称之。

结庐节 见“住棚节”。

统一工人党 以色列左翼犹太复国主义社会党。该党对内主张实行计划经济,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反对犹太教正统派干预政治,倡导彻底的政教分立。对外,该党要求以色列奉行不结盟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在阿以关系方面,该党认为,以色列应当拥有公认的安全边界,享有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自由航行权;在阿以双方实行全面和平以前,以色列为了国家安全不应撤出它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色列应作出让步以便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放弃恐怖主义,承认以色列的前提下,以色列应同巴解组织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应当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最终撤出它所占领的大部分阿拉伯领土。

该党最初是由青年卫士运动、工人联合党和左翼锡安工人党在1848年1月合并成立的。1953—1955年,该党发生一系列分裂,原工人联合党多数成员和以摩西·斯奈为代表的党内左翼先后退党。原青年卫士运动的成员在分裂后成为统一工人党的主要成员。40年代末50年代初,统一工人党对哈加纳、帕尔马赫和以色列国防军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以色列三大基布兹组织中最大的组织“全国基布兹运动”一直处于该党的实际领导下。党的成员和支持者多为基布兹成员,80年代后期该党党员有45000人左右。该党的历任主要领导人有摩西·斯奈、梅厄·亚里、本托夫和维克托·谢姆托夫。该党的机关报是《每日卫报》,机关刊物是《卫士》月刊。1969年1月1984年9月,该党同以色列工党结成工党联盟。在1949年—1969年间的历届议会中,该党分别拥有8—19个议席,在1984年9月和1988年11月分别举行的第11和第12届议会选举中,该党分别获得6席和3席。1977年5月前,除1952—1955年、1962—1965年以外,该党参加了历届以工党为首的联合政府。1977年5月以来,该党一直是在野党。总的说来,随着以色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逐渐高涨,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影响呈现出日趋衰微的趋势。

十画

泰西亚 意为复兴或振兴,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政党。该党对内主张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对外主张以色列对全部巴勒斯坦和以军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戈兰高地、西奈半岛拥有排他性的主权,反对撤出这些地区,要求政府直接兼并这些地区并不受限制地在这些地区建立犹太定居点。基于上述立场,该党反对撤出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自治方案,反对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或地区会议的倡议。该党是由反对戴维营协议的原利库德集团的极右翼成员于1979年9月成立的。80年代,该党成员以世俗的修正派为主,也有部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81年6月、1984年9月和1988年11月举行的三次大选中,该党分别获得3、5、3个议会议席。1982年8月—1984年9月和1990年6月起,该党两次参加政府。泰西亚党是执政的利库德集团的极端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最强硬的支持者,1980年7月30日,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关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首都的法律就是由该党率先提出动议的。党的领导人是优瓦尔·尼曼和果拉·科亨。

素祭 古犹太教献祭形式之一。祭物为农产品,如当年成熟的禾穗和面粉等。据《利未记》第2章第1—2节记载,献素祭时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祭物必须是无酵的,还不可抹蜜。献祭后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及其子孙。但亚伦子孙奉献的素祭要“全烧给耶和华”,自己不可吃。

盐谷 古犹太地名。位于死海的最南端。由于其希伯来文原意为“小谷”,故有人据此认为是以东的某山峡。据《撒母耳记下》第8章第13节记载,大卫曾在此处击杀18000个亚兰人。分国时期,南国犹大王亚玛谢亦于此谷击杀10000个以东人,并夺取其都城西拉。

埃及的肉锅 《希伯来圣经》典故。喻指对过去物质不该有的怀恋。出自《出埃及记》第16章。据载,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离开埃及、走向上帝应许的“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为了彻底摆脱埃及人的追击,以色列民选择一条非常艰难的路线。他们经过书珥的旷野,越玛拉,过以琳,途中经常缺水缺粮。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在

到达以琳与西奈之间的汛的旷野时,有些意志薄弱者开始埋怨摩西等人,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在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后来,上帝降下鹌鹑和吗哪,给以色列人充当食物,这样才暂时避免了一场极可能发生的民族分裂事件。“埃及的肉锅”这一典故,正是喻指那种因为遇到困难,而对自己的事业发生动摇,甚至宁可过那种苟且偷生的日子的人的心态。有时也转喻“寻欢作乐的场所。”

埃及的惩罚 《希伯来圣经》典故。喻指作恶多端而执迷不悟,终将大祸临头,受到惩罚。出自《出埃及记》。据载,希伯来人迁居埃及数百年后,生养众多,日渐强盛。为此引起了埃及法老的恐惧,并开始对他们采取迫害和限制的政策。埃及人加重他们的劳役,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比东和兰塞。法老为了彻底消灭希伯来人的反抗力量,甚至对希伯来男婴施以早期扼杀的残酷手段。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死后,希伯来人的处境继续恶化。他们的哀声上达于上帝。上帝顾念与希伯来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于是兴起摩西和他的兄弟亚伦去把希伯来人带出为奴之地。摩西在法老面前行使了“杖变为蛇”的奇迹,借以显示上帝的意旨。但法老拒绝接受摩西的要求。为了惩罚埃及人,拯救他的选民,上帝借摩西亚伦之手,向埃及人施行了十个灾祸。埃及法老终于震慑于上帝的威力和惩罚,不得不答应了摩西、亚伦的要求,让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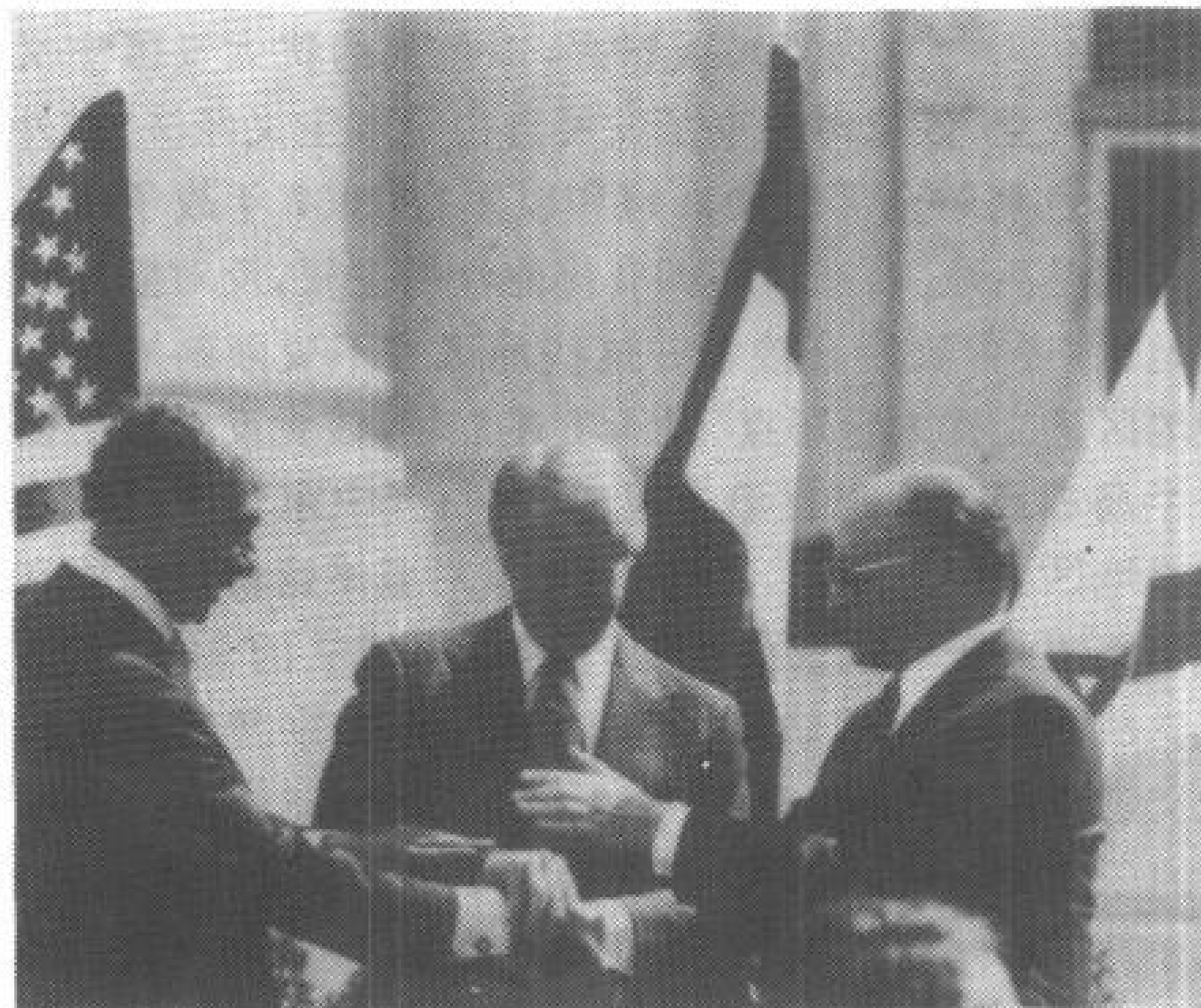
埃及的粮食 《希伯来圣经》典故。喻指物质的富饶丰盈。出自《创世记》第41章。据载,希伯来民族族长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其中第十一个儿子约瑟是他年老所生,雅各对他非常宠爱,因此引起哥哥们的嫉妒。后来他们设计诱骗,把他卖给商人以实玛利人,带到埃及。以实玛利商人把约瑟卖给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做他的仆人。约瑟办事精明,很快获得主人的信任与赏识。波提乏命约瑟掌管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因为约瑟生得秀雅俊美,所以深得女主人垂爱。女主人百般引诱他,遭到约瑟拒绝,使得她恼羞成怒,反向波提乏诬告约瑟企图戏弄她。波提乏听信谗言,把约瑟下到监狱里。此事以后,埃及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因触犯埃及王,也被关进约瑟的同一个监牢里。后来,酒政、膳长在夜里各做了一个梦,约瑟替他们解梦,预言其中一个将官复原职,另一个将会被处死。约瑟并请酒政在出去以后,替他在王面前为自己诉说冤情。到了第三天,这些预言果然实现了。只过了二年,法老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这7只母牛俊美肥壮,在芦荻中吃草。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这7只母牛又瘦又丑,结果后上来的7只瘦母牛把面前7只肥母牛吞吃了。法老又作

了第二个梦,梦见一棵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又大,随后又长出7个穗子,又细又弱,而且被东风吹焦了。这7个细弱的穗子吞了先前7个饱满的穗子。法老被这两个梦弄得很不安,就召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要他们解梦。当然这些人无法对王的梦做一个圆满的解释,这时酒政官想起了在狱中的约瑟,把他推荐给法老解梦。约瑟向法老说,法老前后两个梦实际上意思只是一个,就是上帝将所要作的事指示给法老了,7只肥壮的母牛和7个饱满的穗子意味着将有7个大丰年,而随后的7只瘦牛和7个细穗子则意味着随后将有7个大荒年。埃及将先有7个大丰年,随后又有7个大荒年,因那以后的饥荒很大,全埃及地都将忘了先前的丰年。约瑟不仅解释了梦的意思,而且向法老提出了一个避凶趋吉的办法,建议法老挑选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在7个丰年的时候,将粮食聚敛积蓄起来,收存在各个城里,以防备将来的7个荒年。于是,法老就派约瑟遍行埃及各地,聚敛丰年的所有粮食。后来,约瑟的预言应验,埃及7个丰年一过,紧接着是7个荒年。当时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等到埃及地也有了饥荒,约瑟便奉法老之命,打开各地的粮仓,卖给埃及人。这时,迦南地也遭受严重的饥荒。为了家族的生存,族长雅各命令约瑟的十个哥哥到埃及买粮。约瑟打算惩罚那些奸恶的哥哥,便威胁说他们是巴勒斯坦来的奸细,前来窥探埃及地的虚实,因为他们兄弟分手时间长,那些哥哥已认不出眼前的大官就是他们从前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把他们下到监里,随后从他们中挑出西缅作为人质,要他们下次把他们的小弟弟便雅悯也带到埃及来。因迦南地的饥荒特别严重,雅各只好命令诸子带小弟弟便雅悯再去买粮。临行前,他们向父亲保证,一定把便雅悯再带回来。当诸子买到粮食后要回迦南地去,临行时约瑟要留下便雅悯作他的奴仆。但最后约瑟还是看出兄长们仍存有兄弟之情,就原谅了他们,还同他们相认。约瑟说:“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法老听到这消息后,很为约瑟高兴,他命令约瑟迎父亲雅各及全家到埃及定居。后来,希伯来民族不仅度过了罕见的大荒年,而且在埃及继续发展,生养众多。

埃以和约 指1979年3月2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华盛顿签署的两国和约。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0月)结束后,埃及和以色列于1974年1月18日签订了第一个部队脱离接触的协议。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埃及可以开采西奈半岛的油田,埃、以在军事上仍处于对峙,停战状态也不稳定。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埃及经济的发展。

1975年9月埃以签署过渡性协议,规定在调节两国之间冲突的过程中停止一切军事行动。1977年卡特上台后把解决中东问题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之一,提出

了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新政策。同年5月,以色列成立了以M·贝京为首的政府,外交部长的职务由M·达扬担任。在达扬和埃及代表的秘密谈判中,达成签订埃以和约的协议,条件是以色列撤回英国托管时期划定的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边界内。



以色列、埃及、美国领导人在戴维营协议签字仪式上

以色列政府新首脑贝京在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在西奈半岛上作出某些让步。他在议会讲坛上向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发出呼吁,愿意与他们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地方进行个人会晤,以期结束令人厌恶的流血冲突。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开罗议会上宣布,他准备“去天涯海角,甚至去耶路撒冷议会,以期和以色列开始举行和谈”。1977年11月19日,萨达特应邀访问以色列,他同以色列总统、总理和各政党首领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在为欢迎他举行的议会专门会议上,萨达特发表了演说,阐述埃以之间的和平关系的实质。以色列政府发表了公报,表明“两国之间的对话将继续下去,它将开辟有成效的谈判途径,这种谈判会导致在日内瓦签署同以色列周围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和约”。

萨达特的以色列之行,被称之为“现代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震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因为1967年9月1日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决定:“阿拉伯的基本义务和信念是:不承认以色列,不同它和解,不同它举行谈判。”萨达特的行动违背上述决定,遭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

1978年9月5日,应美国总统邀请,分别由萨达特和贝京率领的埃及代表团和以色列代表团,同卡特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美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会晤。1978年9月17日,经过长达13天的艰苦而激烈的谈判,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两项文件(戴维营协议):《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埃及同以色列之间和平条约的纲

领》。前一项文件主要涉及巴勒斯坦问题,也就是解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归属问题。文件规定:(1)在五年过渡期内,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居民实行自治或者成立自治政府,以色列负责安全,约旦参加警察部队;(2)允许以色列在规定的地方保留驻军;(3)在五年内,由埃及、以色列、约旦同当地巴勒斯坦人民代表讨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归属问题。

后一项文件主要解决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争端问题。1979年3月26日,萨达特和贝京在华盛顿据此签订了埃以和约。和约规定:(1)双方结束战争状态,以色列将所有军队和文职人员从西奈半岛撤至巴勒斯坦国际边界线后面,埃及对西奈半岛行使全部主权;(2)双方尊重对方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在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不向对方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3)建立正常关系包括正式承认、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4)以色列船只有权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是向各国开放的国际水道。

1979年3月以色列议会批准了同埃及的和约,埃及议会则于4月批准了同以色列的和约。萨达特和贝京共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根据条约,以色列军队于1980年1月25日撤至穆罕默德一线以西地区,埃及收复西奈半岛约2/3的地区。同年2月,埃及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在开罗设立了大使馆,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埃以两国还签订了邮电、农业、贸易、文化、通讯(海、陆、空)等领域中的合作协议达43种。1980年以色列总统纳翁访问了埃及。许多以色列部长、议员和著名政治活动家也访问了埃及。在开罗建立了以色列信息中心。埃及吸引了许多以色列旅游者。然而埃以和约签署后,除了苏丹、索马里和阿曼三国以外,其余17个阿拉伯国家都与埃及断绝了外交关系,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处境空前孤立。

1980年6月30日以色列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它将永远不被分割”(还是在1967年,耶路撒冷合并后,以色列议会通过一系列法令,允许以色列政府把司法权扩展到东耶路撒冷)。此后,埃及中止了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行动。

萨达特被穆斯林极端分子刺死后,穆巴拉克担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正式宣布,埃及准备履行与1979年和约有关的一切义务。1982年4月25日,除塔巴地区外,以色列全部撤出了西奈半岛。埃以和约仍然得到履行,也就是说,两国之间关系完全正常化的道路是敞开的。不过,穆巴拉克的政治观点显然不同于萨达特。萨达特把埃以和约看作为埃以两国、而最终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相互理解的第一步。穆巴拉克的努力首先在于克服埃以和约签订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孤立状态,恢复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传统作用。埃及新领导把埃以和约解释为责成两国和平共处的政治协议,而不

要求两国之间保持友谊和密切合作。这样的解释较能为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所接受。于是,埃及在保留埃以和约的前提下,既与以色列维持冷淡的外交关系,又与阿拉伯国家改善了关系。穆巴拉克一再强调任何阿拉伯国家与埃及复交,都不意味着它承认戴维营协议。在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上,埃及与约旦有共同要求,而且两国都属阿拉伯温和国家,在两伊战争问题上都大力支持伊拉克。1984年9月25日,埃及与约旦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约旦是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后第一个与埃及复交的阿拉伯国家。接着,埃及于1985年与吉布提恢复了外交关系。

埃及国内有一种意见越来越有影响: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给埃及,所追求的唯一目的是企图兼并犹地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以色列某些领导人指责埃及破坏的不是戴维营协议的字句,而是它的精神。为了不越过“正常关系”和“友好关系”之间的准确界限,埃及没有恢复1981年中止的关于犹地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带阿拉伯人自治的谈判,开始把履行和约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1982年黎巴嫩战争一开始,埃及就召回了驻以色列的大使,从而把两国间的关系从政府级降低到代办水平。埃及提出重派大使的条件是以色列武装力量撤出黎巴嫩。不过,尽管埃及对以色列的关系冷淡,埃及仍然承担和约所规定的责任,两国保持着外交关系,两国间的边界是开放的,西奈的安全措施得到遵守。以佩雷斯为首的联合政府上台后,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以期改善同埃及的外交关系。埃以和约的签订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经济力量的减弱,为恢复以色列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开辟了道路。1982年5月以色列同扎伊尔、1983年8月同利比里亚、1986年2月同象牙海岸恢复了外交关系。

埃尔利希 (Paul Ehrlich, 1854—1915) 德国犹太医学家,血液学、免疫学奠基人之一,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生于德国西里西亚的斯特恩。父亲是一位犹太医生,从小立志当一名济世良医。青年时代,先后在德国一些大学医学院学习,受到当时细菌学创始人和著名病理学教授的指导。1878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随后,进入当时欧洲最大病理研究院工作。他首先提出用染色法鉴别有机体细胞和组织的观点。1882年,他观察并描述了嗜曙红白细胞吞噬红血球细胞的现象。1890年,他在科赫传染病研究所主持工作,同时从事免疫学研究,提出了侧链学说,对理论免疫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是最早用化学反应解释免疫过程的科学家,通过建立精确的免疫立量型式,发明了测定抗血清效力的方法。1896年,他任斯特古茨血清实验所所长,发现了重氮反应。1899年,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皇家实验治疗研究所所长,专门研究传染病及脓肿的治疗。1904年,完成白喉毒素的研究,发表了《免疫论文全集》和《论毒素与抗毒

素之间的关系及研究途径》两部权威性著作,并开始致力于化学治疗研究。1908年,他由于在免疫学方面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1910年,在助手日本医学家秦佑八郎协助下,经过反复实验,发现了抗梅毒化学药物“六〇六”(即新肿凡纳明)。该药对梅毒和雅司疗效极佳,使人类第一次战胜这些疾病,开创了化学治疗传染病的纪元。这一年,他的重要著作《螺旋病体化学治疗的尝试》发表,使他成为化学疗法的先驱。

埃廷杰 (Shlomo Ehinger, 1803—1856) 意第绪语作家。生于华沙,成长于波兰当时的一座文化中心扎莫希奇城。在妻子的支持下,去加利西亚的伦贝格学医。然而,学成回家后,却由于俄国实行的对职业犹太人的配额限制,无法领到开业执照,只能无证开业。在伦贝格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欧洲文学作品,对文学创作发生兴趣。尽管他既会希伯来语,也会德语,却坚持使用他出生地的大众语言——意第绪语从事创作,并在创作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埃廷杰是在犹太启蒙运动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但写作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启蒙,而是为了用文学形式表达个人的情感。作品的主题主要反映个人在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不是当时启蒙运动文学希望表达的问题。他的作品有民歌、诗歌、戏剧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戏剧。喜剧《塞克纳》是较成功的一部作品。作者在作品中刻划了一个追逐财富和权力的女子,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当地的生活习俗。他的代表作《碎布片》,讲述的是一则吹嘘各自光荣来历的碎布片在得知它们已毫无用处时,感到无限悲哀的寓言故事。作者以此暗示有数千年历史的犹太教的处境。其他作品还有《受到愚弄的世界》等。由于当时的检查制度,他生前作品获得发表机会甚少,大部分作品都是生后由其子——俄国著名出版商出版。

埃希曼审判案 以色列司法部门对纳粹战犯埃希曼的审判。埃希曼是纳粹德国中央保安局(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曾参与制订“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计划,并在1941—1945年直接负责执行该计划,从而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的被屠杀负有战争罪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希曼逃到阿根廷隐居。1960年5月,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摩萨德)在阿根廷抓获埃希曼,将他秘密押回以色列。随后,以色列司法部门对他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内部审讯。1961年4月11日,由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在耶路撒冷开庭公审埃希曼。公诉人、国家检察长吉迪恩·豪斯纳根据以色列1950年颁布的《惩治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法》起诉埃希曼。起诉书指控埃希曼共犯下了15条反对人类、反对犹太人民的战争罪行。经过114次开庭审讯,1961年2月11日,特别法庭判定埃希曼确已犯下起诉书所列举的全部罪行。同年12月

15日,法庭判处埃希曼死刑。埃希曼不服判决,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62年5月29日,上诉被驳回。埃希曼立即请求以色列总统本-茨维给予赦免。1962年5月31日,赦免请求被拒绝。当日午夜,战犯埃希曼被处以绞刑。其尸体被火化,骨灰撒入地中海。

埃希曼审判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整个审判自始至终向各国新闻界公开,审判中披露的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大量材料再度激起了世界人民的震惊和义愤。审判对以色列年轻一代犹太人的影响尤为深刻。

埃林 (David Yellin, 1864—1941) 犹太教育家、作家和学者,新伊休夫的领导人之一。曾在耶希瓦学习,也接受过多方面的高等教育。从耶路撒冷的世界犹太人联盟的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03年是以色列教师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并在若干年中任它的领导。1889年同本-耶胡达和皮奈斯一起创立了希伯来语委员会(即以后的希伯来语科学院),并于1912—1941年任它的主席。他促进了犹太民族和希伯来大学图书馆的建立。1912年他担任德国援助协会在耶路撒冷创办的师范学院院长。这所学院用德语教学,1914年他创办了用希伯来语教学的师范学院(他去世后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任院长直至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犹太援助伊休夫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也是第一批公开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伊休夫活动家之一,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工作。1917年被土耳其当局派往大马士革。1920—1925年是耶路撒冷城市委员会的委员,并任副市长。1920—1928年他领导民族委员会。1926年任希伯来大学西班牙时期犹太诗歌教授。埃林出版过许多著作,包括《犹太—西班牙诗歌理论》(1941)。在希伯来语语法、《圣经》注释、阿拉伯语和欧洲语言的翻译、伊休夫的历史等领域中,他也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他努力把巴勒斯坦的阿什肯纳兹社区和塞法迪社区整一化(他的母亲出生于巴格达一个犹太名门望族,属塞法迪社区)。

埃拉特 以色列最南端的港口城市。在内盖夫地区南端,临红海的亚喀巴湾。

埃拉特这一地名多次出现在《圣经》中,中文旧译“以禄”。如在《列王纪·上》第9章中提到所罗门王在“红海边靠近以禄的以旬迦别”造船,然后驶到俄斐运回一船金子。1940年考古学家格卢克证实,以旬迦别的废墟就在现代埃拉特东边的约旦境内。公元7世纪时,巴勒斯坦被阿拉伯人征服,一些犹太人逃避到埃拉特并在此居住。1116年这里被十字军攻占,称为“阿伊拉”。1167年又被萨拉丁率穆斯林夺回,以后逐渐衰败。到1948年5月英国结束其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时,埃拉特城旧址仅存一个被废弃的边防要塞。1949年初,以色列军队从内盖夫北部的比尔谢巴向南连续推进250公里,越过当时荒

无人迹的沙漠。1949年3月10日以军抵达红海之滨的埃拉特,这是1948—1949年阿以战争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现代埃拉特城开始建于1949年,1959年成为市。这里是以色列通往红海、印度洋、东非以及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埃拉特港口最初于1951年4月建成通航。1956年西奈战争打破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后,以色列对埃拉特港进行了大规模扩建。1967年5月埃及再次封锁蒂朗海峡,成为导致六·五战争的原因之一。1967年至1975年苏伊士运河关闭期间,埃拉特成为欧洲许多国家的商业通道。货物运到埃拉特后,再经陆路运到地中海港口,再由船运到欧洲。此期间,港口再次扩建。埃拉特与以色列内地主要靠公路连接,也有空中运输线。埃拉特有输油管道通向地中海边的阿克伦和海法,除了输送以色列购自伊朗的原油外,还为其他国家输送石油。由于埃拉特气候酷热(夏季可达40℃以上)和干旱少雨,以色列政府为鼓励犹太人前去定居,对愿去定居者给予各种物质刺激(如免税,给予补贴和提供住房等)。该城人口增长很快,1951年只有529人,70年代初为1.4万人,到80年代末已达2万人。居民中很多人在附近的提姆纳铜矿就业。由于埃拉特港湾的水域景色优美,有丰富的珊瑚和海洋生物,这里已被开发为以色列著名的旅游区之一,尤其是这里的潜水旅游独具特色,备受观光者欢迎。

埃洛希姆 (Elohim) 希伯来语“上帝”或“神”的译音。中文亦译“伊罗欣”,英文通译God。此词的希伯来语词根意为“敬拜”、“崇敬”、“恳求”。因此,“埃洛希姆”意即人所敬拜、崇敬、恳求的对象。“埃洛希姆”在《圣经》中经常作为主语出现,仅在《创世记》中的第1章就出现“埃洛希姆”31次。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达2500多次,是神的诸名称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埃洛希姆”此词语按希伯来文的文法结构是阳性复数式(-im为希伯来文阳性名词的复数词尾)。因此《创世记》第1章第26节译为:“埃洛希姆(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但在《希伯来圣经》中,“埃洛希姆”一般用作单数的神,即复数名词作为单数名词看待,通译为God,只在上下文明显指多神时,才译为“诸神”或“神明”,英译为gods。

埃班 (Abba Eban, 1915—) 以色列外交家、政治家、史学家。生于南非开普顿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原姓为所罗门。6个月时随父母来到英国伦敦。不久父亲过世,母亲改嫁,随继父姓埃班。埃班从小就显示出讲演和辩论天才,并在外祖父的指导下学习希伯来文化。18岁时,因成绩优良获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女王学院学习,主修古典文学和东方语言,以优异成绩毕业。1938年被聘为剑桥大学讲师,教授东方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进入英国情报部门工作。1941年起,先在开罗,后到耶路撒冷从事联络官工作。1943年升为英国少校,训练犹太志愿军。1946年,从英军退役,经魏兹曼介绍,进入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要负责与英国当局联系工作。1947年出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联络官,兼任犹太代办处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

以色列成立后,被任命为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同时兼任驻美大使,直至1959年。任职期间,他一方面在联合国为以色列辩护,争取美国支持,一方面与美国犹太人社团保持密切联系。1959年回国,被选为议会议员,在本一古里安内阁任教育文化部长和不管部长。1966年,在艾希科尔内阁中任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任职期间,改善并加强了以色列与美国,以色列与欧洲共同体的关系。在“六日战争”爆发前夕出访巴黎、伦敦和华盛顿,为以色列立场辩护和争取支持。战争爆发第二天飞往纽约,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为以色列军事行动辩解。

埃班一生酷爱学术研究,从政期间,他一直兼任魏兹曼研究院院长,并从事史学研究和写作。著有《以色列的呼声》(演说集,1957)、《民族主义潮流》(1959)、《我的人民》(1969)、《我的国家》(1972)、《遗产——文明与犹太人》(1984)等。

埃班因其外交和史学研究上的成就,被誉为“以色列的声音”。他的渊博知识和雄辩口才为以色列赢得了尊重和支持,使世人更多地了解以色列人民。

埃德 (Montague David Eder, 1865—1936)

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生于英国。青年时代学习心理学,专门研究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毕业后,成为英国第一位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1913年与欧内斯特·琼斯共同创办了心理分析学会。他与以色列·赞格威尔交往甚密。当赞格威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士退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他参加了犹太领土组织。

1918年,应魏兹曼邀请加入赴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并在魏兹曼返回伦敦后,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由于其英国公民身份,一直与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当局保持着良好关系。

1921年,他被选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执行委员会,开始在耶路撒冷工作。后在伦敦主持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21年,专程前往苏联,试图说服苏联政府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苏开展活动,但未获成功。1930—1932年,当选为英国和爱尔兰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主席。

埃德尔曼 (Gerald Maurice Edelman, 1929—)

美国犹太生物化学家,1972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生于纽约。1954年,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学位。1956年,进入纽约市洛克菲勒大学,在著名教授亨利·坎克尔实验室当研究员,开始抗体结构研究。

1960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继续从事抗体结构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了用浓尿素还原抗体分子二硫键的方法。通过还原实验,他对抗体结构有了更进一步了解。1961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首先建立了四肽链抗体分子模型。1962年,他与学生利用骨髓瘤蛋白和本周氏蛋白进行电泳实验,证明了抗体的不均一性是有限的。1965年,发现了多肽链轻链的性质和结构。随后,又解开了多肽链重链之谜。并通过实验方法测定了抗体各个肽链的氨基酸结构。1969年,他在美国实验生理学学会第五十三届年会上宣布:抗体分子最详尽的化学结构即其氨基酸顺序问题已解决。1972年,由于阐明抗体的化学结构,与英国生物化学家B·R·波特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除诺贝尔奖外,埃德尔曼还获1965年美国化学会伊利·莱里生物化学奖,1975年爱因斯坦纪念奖。他还在许多著名大学兼职,担任魏兹曼科学研究院董事会成员,多次访问以色列,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莱希 见“争取以色列自由战士”。

莱维塔 (Elijah Bahur Levita, 1469—1549)

犹太学者,希伯来语语法学家、作家。生于德国。早年去意大利,1504年在帕多瓦定居,从事希伯来语教学和研究。1508年完成的《希伯来语手册》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学生中受到普遍欢迎。1509年,帕多瓦遭康布雷联盟洗劫,他逃往威尼斯。1513年去罗马。1527年,罗马遭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军队洗劫,他的财产损失殆尽,重返威尼斯,为一印刷商校对希伯来语著作,同时从事希伯来语教学。

莱维塔主要作为一名希伯来语语法学家闻名于世。1518年,他的希伯来语语法论著《巴胡尔书》问世,该书被广泛采用并一版再版。同时发表的还有词形变化表和一部《圣经》有规则词详解词典。其《以利亚书》为语音学和希伯来语语法杂论,发表于1520年。在重返威尼斯期间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备忘之书》,这是一本希伯来语《圣经》词汇索引。该书受到教会、王公和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重视,授予教授职位,但他却予以谢绝。晚年完成的重要著作有阿拉米文《圣经》词典《译者之书》(1541)和解释晚期希伯来语的词典《提什比》(1942)。他在希伯来语法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使得希伯来语的研究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界得到进一步推广。

莱维塔对希伯来语的研究还为意第绪语的词源学和词典学奠定了基础。他把意第绪语称为“阿什肯纳兹语言”,并编纂了第一部意第绪—希伯来语词典。其中列出了985个来源于希伯来语的词汇。他翻译的意第绪语《诗篇》发表于1545年,为后来这方面的翻译树立了样式。

他还是位较有名气的作家,同时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写作。

莱温 (Shmarya Levin, 1867—1935) 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和犹太作家。出生于明斯克(白俄罗斯),从小接受宗教教育,同时毕业于明斯克的普通中学。青年时代与阿哈德·哈姆相接近,参加了锡安热爱运动,曾是摩西之子的成员。在柏林大学继续接受教育。返回俄国后成为拉比。

1901年莱温参加了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然后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务实派”。1903年,他参加了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是乌干达计划的主要反对者之一。1905年他参与创立争取俄国犹太民族平等联盟。1906年被维尔诺犹太人(在立陶宛人的支持下)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1908年他离开俄国,在柏林定居,定期去美国讲学。在柏林,莱温同德国犹太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是建立海法综合技术学院的倡导者之一。1911年在第十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管理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讲学和政论工作,曾一度同L·布兰代斯和L·利普斯基合作,但很快与他们分道扬镳。战后他返回柏林,在哈伊姆·魏兹曼同布兰代斯关于犹太代办处和基本基金会问题的冲突中,他坚决站在魏兹曼一边。1921年他陪同魏兹曼去美国。在20年代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性质的争论中,他接受所谓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特别重视对犹太人进行犹太复国主义教育。1924年莱温移居巴勒斯坦,不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只限于定期到各国访问,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筹集经费。晚年,他主要从事文化活动和文学活动。除了大量政论作品外,他还出版了诗集,三本回忆录(英语)。1966年,他的一卷本书信集出版。

莱温佐恩 (Isaak Bar Levinsohn, 1788—1860)

政论家,俄国第一位哈斯卡拉活动家。他被称作为“俄国犹太人的门德尔松”和“俄国哈斯卡拉之父”。主要用希伯来语写作。1813年他通过教师资格考试,1820年前在犹太学校中教希伯来语。1820—1823年在各地当家庭教师。1823年冬患重病,返回家乡,直到去世再没有离开家乡,在返乡后头12年中一直卧床不起。

莱温佐恩在当局的支持下,力图实现对犹太人的启蒙。1823年,他提出了建立犹太学校的方案。他在《以色列的密西拿》一书(维尔诺,1828)中,阐述了复兴犹太教育系统和犹太生活方式的计划。他尖锐地批评了传统的黑德尔(cheder,犹太人的小学堂),称之为“死屋”,因为这些学校仅局限于学习《塔木德》。他号召青年人不仅学习《塔木德》,而且学习希伯来语语法、外语和世俗科学;他号召所有犹太人从事生产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他赋予俄语以特殊的意义,试图用它代替意第绪语作为犹太人的口语。1829年他完成了《犹太之屋》(维尔诺,1839)。

该书运用 M·门德尔松的观点分析了犹太教的发展。莱温佐恩提出改造俄国犹太人生活的纲领：(1)建立小学，小学学习宗教课程和普通教育课程，但是主要学习手工艺；(2)设立总拉比的职务和最高宗教法庭，由总拉比任命传教士；(3)传教士必须教人民伦理规则，促使他们从事手工艺，阐明人对于上帝、自身、亲近的人、国家和每个居民的职责；(4)至少分给 1/3 犹太人土地，以便使他们从事农耕和畜牧业；(5)禁止犹太人炫耀奢侈品（特别是珠宝）。

莱温佐恩希望在俄国政府的帮助下实行这些改革，他在给人民部部长的呈文（《关于犹太人宗教生活改革的必要性和犹太学校的建立》，1831）和尼古拉三世的呈文（《关于调整犹太人的教育和分给他们土地的建议》）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同哈西德派作斗争，建议政府关闭所有的犹太印刷厂（有检查制度的两所除外）。1836 年这项建议成为印刷厂法的基础。

莱温佐恩一生穷困潦倒。只是到 1858 年，俄国政府发给他 3 千卢布，作为他的两本书再版的稿酬。由于他第一次提出的改造犹太生活问题的现实性，他对犹太伦理和宗教的自由解释，对犹太人参加生产劳动的必要性的预见，以及他的著作语言的明晰通俗，从而对几代犹太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

莱德伯格 (Joshua Lederberg, 1925 —)

美国犹太遗传学家，1958 年诺贝尔生物学及医学奖获得者。生于新泽西州蒙特克勒。19 岁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员死伤的报导使他转而学医。战后掀起的遗传学研究热把他卷入进去，从此一直在遗传学领域从事研究。1946 年，他去耶鲁大学拜著名的遗传学家塔特姆为师，研究遗传学，并共同从事遗传实验。实验很快获得了成功，他俩共同发表《大肠杆菌的基因重组》，宣布细菌接合作用的发现。他们指出细菌只备有性重组机制，有基因链组存在。这一理论标志着遗传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1947 年，他应聘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同时继续研究细菌的接合作用。1952 年，他和他的学生津德通过实验，发现了细菌基因的传导作用。他们在题为《沙门氏菌的遗传交换》的论文中指出某些病毒能将一个细菌的部分染色体传导给另一个细菌。1958 年，他由于发现细菌遗传物质的组织和重组机制，与恩师塔特姆，以及另一位遗传学家比德尔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时年 33 岁，是诺贝尔获奖人中一位最年轻的科学家。

除了获奖发现外，莱德伯格还在许多方面贡献卓著。他独创了细菌遗传学的技术，设计了用计算机和图论来鉴定和区分有机化学品的的方法，以及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来研究人类生物学的统计方法。他还是威斯康星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的创始人。1962 年起任

肯尼迪分子医学实验室主任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培养和造就了许多新一代研究人员。

莫沙夫 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合作居住点，是一个介于私有居住点和集体居民点之间的，以土地国有、家庭经营、合作互助、集体销售为其基本特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莫沙夫的思想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基布兹所实行的集体主义原则，同时注重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和独立经营的才能。第一个莫沙夫——纳哈拉莫沙夫，于 1921 年 9 月在巴勒斯坦北部的杰兹瑞尔山谷建成。12 月，凯法·耶胡兹克尔莫沙夫在东部地区出现。当时莫沙夫的大多数成员来自基布兹。在随后的 10 年中，又有 8 个莫沙夫建立。30 年代，莫沙夫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巴勒斯坦全境都有莫沙夫出现，莫沙夫运动也在 30 年代中期兴起，推动这一社会组织形态朝着健康方向发展。1948 年当以色列国建立时，全国已建有莫沙夫 58 个。随着建国后的移民新浪潮出现，越来越多的莫沙夫涌现，仅 1949—1956 年间就有 250 个莫沙夫建立。目前以色列约有莫沙夫 450 个，总人口为 16 万人，占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七。

作为农业定居点的一种合作社会组织形态的莫沙夫，同时也是一个基层行政单位，由莫沙夫管理委员会管理。管理委员会由一年一度的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下设管理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以及分管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活动的委员会。莫沙夫为其成员提供信誉服务，组织种子、化肥、饲料等购买，以及产品销售服务，负责农机具、车辆、工厂、仓库的管理，向成员提供教育、文化和医疗方面的服务。莫沙夫的经济来源于对其成员的征税和贷款投资。

目前莫沙夫有两种基本形式。最普通的形式是奥夫迪姆莫沙夫，总数为 400 个。在这样的莫沙夫中，农田由家庭独立自主经营，生活亦以家庭为基础，一切消费方面的事务都由个人自己决定，自行处理劳动所得，合作仅限于购买种子、肥料、销售产品、重型机器的使用等。它以混合经济为主，注重柑桔种植。

另一种形式为希土菲里莫沙夫。它结合了基布兹的经济结构和莫沙夫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将生产和消费分离的经营形式。生活以家庭为基础，生产以集体为基础。土地作为整体进行大片耕作，工业集体经营，所有成员按不同分工从事集体劳动。每个成员都处于某种股东地位，分配按照莫沙夫的收入状况，并根据每户人家的劳力情况分给各个家庭。

莫沙夫规模适中，一股由 60 至 90 个家庭组成。由于土地是租赁得到，不允许再分，因此只能由一个子女继承。

现在以色列有全国性莫沙夫组织 4 个，每个莫沙夫根据其不同政治倾向分别隶属其中之一。这 4 个组织又

组成一个泛莫沙夫委员会,负责新莫沙夫的建立,代表莫沙夫经济利益与其他相关机构打交道,并在莫沙夫之间开展种种有益于莫沙夫健康发展的文化事业以及教育、科研活动。

莫沙夫的出现对于开发土地、发展生产和吸收移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随着它的巩固和发展将会对以色列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莫顶 古犹太地名。位于非利士平原的边缘,玛喀比人的故乡,其祖先就住在这里。莫顶城以玛喀比起义的爆发地而闻名。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198年从托勒密王朝手中夺取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安条克三世死后,其子继位,称安条克四世。此王决心要以希腊宗教来取代犹太教,公然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并采取各种严厉的措施来消灭犹太教。安条克四世一系列亵渎、迫害犹太人信仰的措施,激起犹太人无比的愤怒和反抗。公元前168年,他竟然命令官员在莫顶城设希腊祭坛,强迫犹太人在祭坛前按异教徒礼仪献祭,城中老祭司马提亚和他儿子们以及犹太族人坚决不从。在官员利诱和恐吓下,有一懦弱的犹太人屈服了,他走出来怯生生地上去献祭了。马提亚祭司见状怒不可遏,当场上去把这个人杀死在祭坛上,同时杀了希腊官员,拆毁祭坛。事情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祭司马提亚号召全城居民说:“所有忠于上帝的圣约,服从上帝律法的人们,跟我来罢!”于是他举起义旗,率领犹太群众避入山林,进行抗击塞琉古军队的英勇斗争。玛喀比起义运动正式展开。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经过长达25年的斗争,终于在公元前143年建立了独立的哈斯蒙尼王朝。亦称玛喀比独立王朝。此王朝生存80年,到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培进占巴勒斯坦时,才宣告结束。

莫茨金 (Leo Motzkin, 1867—1933) 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生于乌克兰。由于从小表现出数学才能,被家人送到柏林深造。然而,在校学习过程中,深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决心放弃对学业的追求,投身犹太民族解放运动。1897年,作为杰出的俄国青年代表出席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会后,受赫茨尔派遣去巴勒斯坦调查了解那里犹太农业定居点的情况。后来,他参加由俄国犹太人代表发起成立的民主阵线,反对赫茨尔的“乌干达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驻哥本哈根办事处主任,以便能在一个中立国与各交战国的机构保持联系。大战结束后,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之后,他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执委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副主席、主席和行动委员会主席。

莫茨金一生还致力于推动希伯来语和犹太文化事

业。他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中少数能用希伯来语讲演的人之一。此外,他还是一名为欧洲犹太人争取少数民族权利的政治活动家。在巴黎和会上,为在各项条约中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05年起,他开始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发生在俄国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历史,并在1910年出版了两卷本的研究论著。他的遗体在死后第二年被运至巴勒斯坦,安葬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

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 历史上第一座得到国家资助的用意第绪语演出的剧院。1921年在犹太戏剧学校(创立于1916年6月30日)的基础上建立,犹太戏剧学校属彼得格勒教育人民委员会戏剧局,1920年迁往莫斯科。1925年前,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称作为莫斯科国立室内剧院。犹太戏剧学校和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的创立者、它们的艺术指导和1929年前所有演出的导演是A·格拉诺夫斯基(1890—1937)。自1929年起,米霍埃尔斯领导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

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在舞台上表现了犹太人民的悲惨命运,以及民族的哀伤和痛苦。该剧院经常巡回演出,尤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些犹太人口众多的城市中演出特别成功。剧院在国外的连续演出(1928年,在德国、奥地利等)也取得辉煌成绩。

30年代,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的最高创作成就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1935),该剧院的演出被许多戏剧理论家评价为对这出悲剧最深刻的阐释之一。1949年,在米霍埃尔斯被杀和现代犹太文化的许多活动家被捕后,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也随之关闭。它的一些演员在70年代移居到国外。

格什温 (George Gershwin, 1898—1937)

美国犹太作曲家。生于纽约布鲁克林,12岁开始学钢琴,在当地一音乐学院接受音乐训练。一生先后拜许多作曲家为师,其中包括H·考埃尔、W·里格、J·希林格等著名作曲大师。1914年,任杰罗姆·雷米克音乐出版公司歌谱推销员,开始其专业生涯。1916年,他的第一首歌曲《你要他们,就得不到他们》出版,引起人们注意,由歌星乔尔森演唱的《斯万尼》使他一举成名。1924年,他创作的大型歌舞音乐《夫人,再见吧!》在百老汇首演成功。1931年写的《我为你歌唱》是他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歌中对美国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而辛辣的讽刺,获得当年普利策奖。1935年完成的歌剧《波吉和贝丝》是一部反映美国黑人的作品,被认为是一部最成功的大型歌剧。该歌剧是一部全部由黑人演出的《卡门》式作品,所作旋律悦耳动听,颇有才气,与其弟艾拉提供的优美诗句相得益彰,辉映成趣,在世界享有盛誉。他谱写的严肃音乐作品有:爵士钢琴曲《布鲁斯狂想曲》(1924)、《F大调钢琴

协奏曲》(1925),音诗《一个美国人在巴黎》(1921),和管弦乐队曲《第二狂想曲》(1931)。



格什温

格尔绍姆·本·犹大 (Gershom ben Judan, 960—1028) 犹太学者,中世纪拉比犹太教权威。生于法国梅斯,后主要生活在德国的美因茨,并在那里创建自己的学院。他领导下的学院率先引进巴比伦和巴勒斯坦学院对犹太经典的研究成果,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西欧犹太教研究的开展。格尔绍姆的渊博学识和无与伦比的领导才能使他成为当时欧洲犹太社团一位权威人士。针对中世纪欧洲社会面临的问题,他曾提出和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人们的社会准则,对中世纪欧洲犹太社会准则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此,他被誉为“散居犹太人之光”。经他提出或由他参与成为法律的重要法规有:

1. 犹太地方法院有权对犹太事务作出裁决。这不仅包括当地犹太社团的成员,而且包括任何不属于本地犹太社团,而来到该地的犹太人。这项法律有效地防止了外来者在违反当地犹太习俗,然后声称他所属社团并无这一习俗的借口,扩大了犹太法律的实用性。

2. 原告有权中止在犹太会堂举行的祈祷,以使其有机会向会众陈述与自己有牵连的案子。这一规定有效地保证每一个受到指控的犹太人向整个犹太社区申诉的权利,以获公正处理。

3. 如犹太会堂的产权为某一个成员所有,财产拥有人无权以个人理由阻止他人参加在该犹太会堂举行的宗教仪式。对一个人关闭犹太会堂的大门则意味着对所有人关闭犹太会堂的大门。

4. 丢失物品的人有权要求所属教会将得到该物品

却秘而不宣的人革出教门,以此保证获得意外之财的人有义务报告其所得的法律得到遵守。

5. 在决定犹太社区事务时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保证犹太社区的团结。

格尔绍姆还为维护犹太家庭的稳定制定了禁止犹太人重婚和废除犹太男子任意休妻权的法规。此外,在他的影响下,欧洲犹太社区还作出了禁止私自拆看他人信件,禁止辱骂曾经被迫改宗但现在已重新恢复犹太教信仰的人,禁止犹太人租用曾无理驱逐犹太房客的人的住房等项规定。

格尔绍姆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校对整理出一部《塔木德》权威版本。在现代印刷技术普遍推广以前,《塔木德》文本十分珍贵稀少。人们只能以口头方式传授其内容。少数流传下来的文本经多次转抄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的错误,不同地区犹太人拥有文本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维护犹太经典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迫切需要推出一部权威本。格尔绍姆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担当这一校对工作。他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使命。由他亲手签署的一套全本《塔木德》,成为全世界犹太人接受的《塔木德》权威本。他还对《圣经》文本进行了校注。

作为一名《塔木德》学者,他生前对《塔木德》作了一系列评注,但这方面的著作大部分遗失,只有那些由著名犹太经典评注拉希引用的内容保存了下来。除此之外,犹太祈祷书中亦保存了他的部分作品。

格列茨 (Heinrich Graetz, 1817—1891) 德国历史学家,第一部犹太通史巨著的作者,《圣经》研究者。他是肉商之子。1831—1836年在耶希瓦学习《塔木德》和拉比著作,并自学世俗科学、拉丁语、法语和希腊语。1837年应S·R·希尔施之邀来到奥尔登堡,在他指导下继续学习至1840年。1842年,由于自己的博学,他没有毕业证书就获准进入布列斯拉弗尔大学学习东方语言和哲学。他逐渐从极端正统派转为温和的宗教自由主义。作为犹太人,他不可能在布列斯拉弗尔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45年在耶纳大学答辩了博士论文,论文次年出版,题为《诺斯替教派和犹太教》。通过教师任职考试后,1850年,他在摩拉维亚一所正统犹太教学学校里任教,1852—1853年冬应柏林犹太社区之邀,为拉比候选人讲授犹太史。自1854年到生命结束,他是布列斯拉弗尔拉比学院副教授。1869年他获得布列斯拉弗尔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他对世界犹太人联盟的活动感兴趣,同情复兴中的犹太民族运动。1872年他访问了巴勒斯坦,尖锐批评当年巴勒斯坦的社会条件和教育。1884年卡托维兹会议以后,他参加了锡安热爱运动,但藉口运动的政治性,他很快就退出了该组织。1886年他当选为马德里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名誉院士。

格列茨的主要著作是11卷的《犹太通史》(1853—

1875)。虽然以前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试图撰写犹太史，但是格列茨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犹太人的历史。最先出版的是第4卷，它包括从第二圣殿被毁到《巴比伦塔木德》完成(5世纪末期)时期的犹太史。作者按照传统犹太教的精神加工历史资料，例如，他否定了当时历史学中流传的关于《摩西五经》的不同起源的理论。不过，他对《圣经》其他著作的某种批评态度，引起正统派的不满。他把第二圣殿被毁以后的整个犹太史，看作为犹太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其中理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既否定一些神秘教派，如喀巴拉派和哈西德派，又反对当时出现的犹太教改革运动，认为这些都是异端。他高度评价犹太教，并分析了基督教会反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据此得出结论说，基督教作为宗教和伦理学说不能够成为健康社会的基础。普鲁士民族主义者、历史学家特雷切凯(1834—1896)指责格列茨是狭隘的犹太沙文主义，为德国犹太人融入德国文化生活设置障碍。

《犹太通史》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了撰写自己的著作，格列茨利用了各种语言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最新的通史著作。他把历史—语言学分析同科学直觉结合起来，阐明了犹太民族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格列茨死后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他关于迦南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的推测。

格列茨撰写的历史是犹太思想和民族苦难的历史。他对犹太历史的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甚至社区生活未予充分的注意。在《犹太通史》的最后几卷中，作者着重研究德国犹太人，在他看来，这是比较进步的犹太人。而对波兰、俄国和土耳其犹太人的历史未能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使得他的阐述有片断性。作者的文笔生动、有吸引力，往往脱离了阐述的严格的科学风格。格列茨的著作给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犹太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犹太通史》被译成希伯来语(1890—1899)、意第绪语、俄语(1904—1907)、英语、法语和其他语言。该书的缩写本《犹太简史》(1888—1891)以多种文字发行。

格林鲍姆 (Yizhak Gruebaum, 1879—1970)

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以色列新闻记者。生于华沙，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曾经学过医学，而从1904年起在华沙大学学习法律。1901年在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定期刊物上发表了第一批文章。为了防止同化，他主张关闭使用外语的犹太报纸。他是赫尔辛基第三届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积极参加了赫尔辛基纲领的制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彼得格勒，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出版了犹太复国主义报纸。1918年9月他返回波兰，组织了临时民族委员会，为战后波兰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斗争。1919—1930年他是波兰议会议员，1922年是少数民族联盟的组

织者之一，该联盟力图保障少数民族在议会中应得的代表权。格林鲍姆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派别的领导人，竭力反对犹太代办处为了吸引非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扩充自己的机构。他捍卫犹太生活的世俗化，这经常导致和宗教党派发生冲突。他促进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化在波兰犹太人中的发展。1932年他移居巴黎，1933年移居巴勒斯坦。在第十八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布拉格，1933)上，他当选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犹太代办处中他领导移民部(1933—1935)和劳动部(1935—1948)。他是1946年6月29日被英国政府逮捕的犹太代办处的领导人之一，在集中营中被关了130天，1946年11月5日获释。在以色列建国前夕，他是民族委员会成员。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后，他担任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1948—1949)。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1949年1月)。他曾担任犹太代办处的司库主任(1949—1950)和特派员(1950—1951)的职务。在生命结束前，他继续积极开展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从事新闻工作，往往发表极左的政治观点。一生的最后10年，他在基布兹中度过。

格拉泽 (Donald Arthur Glaser, 1926—)

美国犹太物理学家，196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父亲是来自俄国的犹太商人。他自幼勤奋好学，在物理学和数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46年大学毕业后，在母校凯斯理工学院任教，同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当研究生，1949年获博士学位。同年，他开始在密执安大学物理系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在研究中，他产生了用气泡室代替雾室的构想，并于1952年成功地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气泡室。这种气泡室是一种探测高能粒子运动径迹的重要仪器，对高能物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基本粒子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为此，他于1960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当时年仅34岁，是所有获得诺贝尔奖金中的最年轻的科学家之一。1959年，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物理学教授。60年代后，他开始从事分子生物研究，力图将物理方法应用到分子生物学领域，由于他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绩，他还先后荣获伦敦物理协会的查尔斯·弗农奖，美国物理学会奖等。

格拉茨 (Rebecca Gratz, 1781—1869) 美国

著名犹太女慈善家。生于费城一富有犹太人家。长相出众，被当作世界美人受到尊敬。一生虔信犹太教，然而爱情上却恋上一位异教徒。传统的教规不允许与之结婚，为此终身未嫁。

格拉茨一生扑在犹太人的慈善事业上，是美国著名社会慈善人士。19世纪初创办了美国第一所犹太孤儿院，收容、抚养犹太孤儿。1818年创办希伯来妇女慈善

会,为贫苦妇女提供经济上帮助。该举具有历史意义,开创了犹太慈善事业的新时代,因为该会是第一个在犹太会堂以外建立起来的慈善机构。它的建立不仅促使大量非犹太会堂主持的福利机构的出现,而且为日后出现的此类犹太福利机构树立了风范。1838年,她又率先在美国创办犹太主日学校,为犹太儿童提供学习犹太传统的场所。由她倡议成立的费城希伯来主日学校协会是美国犹太人的第一个教育机构。1864年前,该会会长一直由她亲自担任。

格拉茨还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与当时著名作家艺术家交往甚密。许多文艺界人士慕名前来费城,为的是一睹她的风采和与之进行交谈。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就是她的崇拜者之一。欧文在欧洲游历时,曾向英国著名作家司各特讲述了格拉茨的相貌、为人和业绩。司各特深受感动,为此创作了名著《艾凡赫》,女主人公即以格拉茨为原型。格拉茨死后出版的《利百加·格拉茨书信集》反映了她的文学才华。

格罗斯曼 (Meir Grossman, 1888—1964)

以色列记者,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生于俄罗斯捷姆留克。1905年开始在俄文报刊、1910年起在意第绪语刊物上发表文章。曾在彼得堡大学学习,1913年起在柏林学习,是柏林犹太复国主义大学生组织中央委员会委员,编辑该组织的俄语杂志《犹太大学生》和意第绪语幽默报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哥本哈根、然后在伦敦出版意第绪语双周刊,积极支持雅布庭斯基提出的建立犹太军团的主张。1917年初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来到基辅,当选为乌克兰犹太复国主义者执行委员会成员。1919年年底,与朗道(1892—1952)一起把犹太记者局改组为犹太电讯社。1925年在耶路撒冷创办了英文日报《巴勒斯坦电讯》(自1932年为《巴勒斯坦岗位》,自1950年为《耶路撒冷岗位》)。在雅布庭斯基于1925年建立了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后,他是雅布庭斯基的亲密助手,直至1933年由于在服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纪律的问题上的歧见而发生分裂。他认为必须继续留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进行斗争,于是联合自己的支持者组成了犹太国家党,在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脱离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后,犹太国家党仍然留在这个组织内。

1934年格罗斯曼移居巴勒斯坦,成为对犹太移民进行投资的银行经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美国,并积极参加犹太社会活动。1948年被选入犹太代办处领导机构,并领导它的经济部。1953年加入犹太复国主义党,并于1954—1961年代表该党进入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

格鲁吉亚犹太人 犹太人种语言学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上居住在格鲁吉亚。虽然在格鲁吉

亚的历史著作中,从11世纪起就用“格鲁吉亚犹太人”来指称格鲁吉亚的犹太人,但只是到19世纪初期格鲁吉亚并入俄国后,“格鲁吉亚犹太人”的术语才固定用来表示该犹太社区的成员。格鲁吉亚犹太人的口语是格鲁吉亚语,他们也用它作为书面语言。

根据1897年的统计资料,俄罗斯帝国中有6047名用格鲁吉亚语作母语的犹太人。根据1926年的统计,苏联有21471名格鲁吉亚犹太人。在苏联时期,格鲁吉亚境外的格鲁吉亚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区在巴库(427人)。96.6%格鲁吉亚犹太人称自己的母语是格鲁吉亚语。1931年,格鲁吉亚犹太人为31947名。根据1959年的统计,苏联有35673名犹太人用格鲁吉亚语作母语。1970年苏联有4.3万格鲁吉亚犹太人,其中70%在70年代末期前移居以色列。根据1979年的统计,格鲁吉亚境内视格鲁吉亚语为母语的犹太人有10020名。

按照格鲁吉亚的历史传统,第一批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占领(公元前586年)后来到格鲁吉亚南部,然后从南部移居到格鲁吉亚其他地区。格鲁吉亚的文献资料表明,犹太人在6世纪从拜占庭来到格鲁吉亚西部,然后,3000名犹太人从格鲁吉亚西部迁移到东部。显然,这些资料反映了犹太人从拜占庭统治下的格鲁吉亚西部向东部的规模逃亡。6世纪时,格鲁吉亚西部犹太人受到拜占庭的残酷迫害,而格鲁吉亚东部处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波斯人对犹太人比较宽容。7世纪下半叶,阿拉伯人占领了格鲁吉亚大部分领土,它成为阿拉伯哈利发的行省。

中世纪早期,格鲁吉亚犹太人主要同伊朗犹太人、并通过他们同东方犹太宗教中心保持联系。12世纪70年代,犹太旅行家图德拉的便雅悯写道,格鲁吉亚犹太人带着礼品去巴比伦拜会流放领袖,以便得到他的统治。

马可·波罗于1272年访问了处在蒙古人统治下的第比利斯,他仅发现了很少的犹太人。蒙古人统治的格鲁吉亚东部和南部的部分犹太人移居到仍然独立的格鲁吉亚西部,在那里建立了新的社区。在蒙古人统治结束以后的时期中,格鲁吉亚犹太人的苦难状况促使他们成为农奴。许多历史文献证明格鲁吉亚犹太人在500年左右时间中的农奴地位。在这期间,犹太人进行着自愿的或者被迫的移居。15—16世纪格鲁吉亚犹太人向克里米亚的移居是自愿的。17和18世纪期间向伊朗的移居则是被迫的。

作为农奴的格鲁吉亚犹太人生活在自己主人的领地中,彼此隔绝和统一的宗教文化中心的缺乏,导致格鲁吉亚犹太人宗教知识水平的下降。摆脱农奴地位的愿望有时使犹太人改信基督教。1864—1871年,格鲁吉亚废除农奴制后,农奴犹太人成为自由民,他们离开乡村,移居到已经居住着犹太人的城市,在那里他们主要从事商业。较少的犹太人从事手工业(1917年革命前不超过3—

5%)。

格鲁吉亚犹太人由农奴向自由民的转变,以及都市化过程,促使犹太社区结构的最终形成。来自同一个村落的解放了的农奴通常移居到同一个城市中,他们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犹太会堂,并定居在会堂周围。来自不同村落的犹太移民在城市中的居住地彼此毗邻,由此,每个城市中的犹太人都集中在城市的某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就成为该城市的犹太区。

格鲁吉亚犹太人迅速的都市化过程,以及大部分犹太人转而经商,是19世纪下半叶格鲁吉亚反犹太主义浪潮急剧高涨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格鲁吉亚非犹太人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反犹太主义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格鲁吉亚发生了6次血祭诽谤事件,这不仅是这段时期中在俄国、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同类事件的最高数。其中最大和最著名的一次是指控9名格鲁吉亚犹太人于1878年逾越节前夕为了祭祀目的杀死了一名基督教女孩。

19世纪格鲁吉亚犹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与俄罗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建立了联系,在格鲁吉亚归并俄国后,俄国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移居到格鲁吉亚。在10年期间内,格鲁吉亚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社区之间的关系紧张。格鲁吉亚犹太人认为前来定居的大部分阿什肯纳兹人是反宗教的或者在履行教规方面是不够诚恳的;而阿什肯纳兹人往往居高临下地对待格鲁吉亚犹太人。只是到19世纪末期,这两种社区之间的联系才比较密切,尽管它们之间的紧张性依然存在。1906年,格鲁吉亚创办了第一所塔木德—托拉学校,有400名学生就读。在格鲁吉亚犹太人历史上首次聘请了希伯来语女教师为女生授课。

19世纪末期在格鲁吉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小组。大卫·巴佐夫拉比作为格鲁吉亚犹太复国主义的创造人之一,参加了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巴塞爾,1903)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格鲁吉亚犹太人自1863年开始的向巴勒斯坦的移居。根据1916年巴勒斯坦人口统计,格鲁吉亚犹太社区有439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住在耶路撒冷。来到巴勒斯坦的大部分格鲁吉亚犹太人属于贫穷阶层,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耶路撒冷的卡车司机中格鲁吉亚犹太人特别多。只有不多的格鲁吉亚犹太人在商业领域中占据显要地位。1921年,巴勒斯坦的格鲁吉亚犹太人有1700名。1971—1981年,约3万格鲁吉亚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格鲁金贝格 (Oscar Osipovich Gruzenberg, 1866—1940) 俄国犹太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889年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由于要他接受基督教,他拒绝了留在教研室任教的建议,并移居彼得堡。他是俄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但是作为犹太人,在1905年以前他未能获

得“正式律师”的称号,在16年期间仅仅跻身于“助理律师”的行列中。他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经常为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辩护,其中有M·高尔基、V·卡罗连柯、K·丘科夫斯基、P·米留科夫、L·托洛茨基、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以及第一届国家杜马的169名议员,这些议员由于抗议提前解散国家杜马而遭到法庭审讯。在一些专门针对犹太人的审讯中,如,基什尼奥夫和明斯克的反犹迫害后的审理;P·达舍夫斯基案件;1900—1902年的D·勃龙代斯案件——维尔诺血祭诽谤的牺牲者等等,他作为一个辩护人,常常以精彩的发言,把这些审讯变成捍卫犹太民族的荣誉和尊严的讲坛。为此格鲁金贝格的名声大振,犹太人称他为“民族辩护人”。M·拜利斯案件(1913)是他的职业成就和荣誉的顶点,他把这起案件比作宗教裁判所时期的审判。

格鲁金贝格也积极参与了俄国政治活动。他一度是立宪民主党的成员,他作为该党候选人参加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竞选,但未能当选。自1907年起,他从政治和法律咨询方面帮助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犹太议员。1912年他进入协助第四届国家杜马犹太议员和领导其活动的政治局。1917年,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他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相接近,并作为无党派人士同统一犹太民族党的六名犹太复国主义候选人一起当选为全俄议会议员。1918—1919年国内战争期间,他领导犹太自卫委员会和救援反犹迫害受害者委员会。1920年他离开俄国。1921—1923年住在巴黎,1926—1932年住在里加。1929年他成为拉脱维亚犹太人在犹太代办处的代表,并当选为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委员。晚年他在法国度过,在法国他用俄语出版了回忆录《昨天》(巴黎,1938年)。他的言论和关于他的著述收入他死后出版的论文集《格鲁金贝格,论文和言论》(俄语,1944年)。

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骸于1950年移往以色列。

索尔德 (Henrietta Szold, 1860—1945) 美国妇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哈达萨”创始人,青年进入圣地组织领袖。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一个犹太拉比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犹太教教育。1877年中学毕业,开始在私立学校执教,大部分学生系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子女。1892年起从事编辑工作,在美国犹太出版协会任文学编辑,协助翻译和出版德国犹太历史学家格列茨的《犹太通史》和其他犹太人感兴趣的重要欧洲人著作。

她赞同赫茨尔提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思想,在教授来自俄国犹太移民的过程中坚定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信念。1909年,她随同母亲访问巴勒斯坦,对那里的低劣健康水准深为关切,希望能为改善犹太移民卫生状况作些贡献。

1921年,她与一群美国犹太女子成立了第一个美国妇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哈达萨的分支。在索尔德的

努力下,哈达萨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拥有50万成员和1300多个分支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组织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医疗队前往巴勒斯坦工作,该医疗队于1922年成为哈达萨医务卫生组织。1920年起,她开始在巴勒斯坦定居,成为巴勒斯坦伊休夫中一位受人敬重的人物。1927年,她被选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妇女委员,负责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工作。

30年代,希特勒开始在德国掌权后,她协助组织了青年进入圣地组织——青年阿利亚,并亲自指导它的工作。该组织主要任务是拯救来自法西斯德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犹太儿童和青年,帮助他们移居巴勒斯坦。在最初的12年中,该组织一共拯救了3万犹太儿童和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孤儿。这些儿童和青年被安置在儿童村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学习从事农业劳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她一直负责此项工作。

为纪念这位犹太历史上的杰出女子,以色列于1960年在索尔德100年诞辰时发行特种邮票一枚,上面印有她的头像和哈达萨组织的标志。

索科洛夫 (Nahum Sokolov, 1859—1936)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希伯来文作家。生于沙俄统治下的波兰,是波兰古老犹太拉比家族的后裔,年轻时就表现出非凡天资,自学了波兰语、俄语、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并经常为报刊撰稿。

24岁时担任华沙出版的希伯来语刊物《泽费拉报》专栏作家,开始享有声誉。后来,成为该刊拥有者和编辑。他的文章涉及面很广,包括政治、时事、科学、文学、诗歌等。最为学术界称道的是1919年在英国出版的两卷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1600—1918》。该书的前言由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亲自撰写。

在1897年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他深为赫茨尔的人格所吸引,开始积极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06年,当选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秘书长,并负责编辑其机关报《世界报》和一份希伯来文周刊。1911年,被选为执委会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前往伦敦,归化为英国公民,协助魏兹曼从事外交活动,为《贝尔福宣言》的成功发表作出了贡献。1917年5月,在梵蒂冈受教皇本笃十五世接见,教皇在接见中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表示同情。1919年,作为犹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参加巴黎和会,负责协调与十人委员会的关系。

战后,他当选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执委会主席,主持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同时去世界许多地方执行筹款使命。1931年,帕斯菲尔德白皮书的发表导致魏兹曼被迫辞职,他被选为犹太代办处主席,任职达四年之

久,直至魏兹曼再次当选。

魏兹曼重新担任犹太代办处主席后,他被授于犹太代办处名誉主席头衔,并担任教育文化部主任一职。此后不久,便与世长辞。1960年,他的遗骨被运往以色列,安葬在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上。

为了纪念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著名作家,位于特拉维夫市的以色列记者协会中心被命名为索科洛夫中心。

哥伦比亚犹太人 16世纪初期,马兰内与西班牙占领者一起来到哥伦比亚。可能最早发现哥伦比亚的罗德利格斯·德·巴斯迪达斯是位马兰内。哥伦比亚的占领者G·德·凯萨达(1500—1579)是马兰内,1538年他创建了波哥大(现哥伦比亚首都),人们称他为“哥伦比亚民族之父”,他的陵基建在波哥大市中心。

1610—1781年期间,卡塔黑纳市的宗教裁判所烧死了约800名被指控秘密信奉犹太教的人,哥伦比亚第一批犹太移民的后代接受了天主教。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在拉丁美洲废除了宗教裁判所(1819)后,犹太人开始公开移居哥伦比亚(波哥大、卡塔黑纳、巴兰基亚、麦德林等城市)。1853年,巴兰基亚的犹太人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块墓地。1867年在巴兰基亚开办了世界犹太人联盟的学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塞法迪犹太人从希腊、土耳其、北美和叙利亚移居到哥伦比亚,他们从事工业产品贸易。在巴兰基亚开办了两家纺丝厂。1921—1922年,由于美国限制移民,东欧犹太人开始来到哥伦比亚。1933年,纳粹德国的犹太移民也开始来到这里。1935年,哥伦比亚共有2045名犹太人。1938年当局限制移民,在1945—1950年间,只接受了350名犹太人。

大部分犹太移民从事小买卖、手工业和轻工业生产。他们中的某些人获得成功后,创办了大型纺织厂和家具厂,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30年代纳粹分子在哥伦比亚培植的反犹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得到迅速发展。1948年4月在波各大有130家犹太店铺被捣毁。在哥伦比亚,设有约言之子分部,国际妇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党的分部,以及玛喀比运动协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波哥大创立了犹太社区总联盟,属世界犹太代表大会分部。在波各大的犹太学校(建于1948年)中学习的犹太儿童约占全国犹太儿童的一半。学校用西班牙语授课,每周花一小时学习希伯来语,庆祝犹太传统节日,以及以色列独立日和华沙隔都起义纪念日。类似的学校在巴兰基亚和麦德林也有。在所有学校中,都有以色列教师授课。

塞法迪人、德国和东欧犹太人有各自的社区机构。波各大出版两种西班牙语的犹太报纸。犹太人几乎不参加哥伦比亚的政治生活。1962—1964年,有146名哥伦比

亚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六日战争以后,62名哥伦比亚犹太青年作为志愿兵来到以色列。1984年,哥伦比亚约有7000名犹太人。

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拉丁姓 Columbus, 意大利姓 Columbo, 西班牙姓 Colon, 1451—1506) 航海家。生于意大利热那亚。1492—1493年率领西班牙探险队寻找通往印度的最短海上航路;乘三艘轻快帆船:“圣玛丽亚号”、“平塔号”、“尼尼亚号”横渡大西洋,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圣萨尔瓦多岛(发现美洲的正式日期),尔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其他岛屿、古巴、海地。在后来几次探险(1493—1496,1498—1500,1502—1504)中发现了大安的列斯群岛及一部分小安的列斯群岛、南美洲和中美洲沿岸。

哥伦布的某些传记作者认为,他出身于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由西班牙逃亡到意大利的一个马兰内家庭。他们主要依据是,19世纪末期发现的材料表明,哥伦布的母亲出身于马兰内家庭。20世纪中期发现了新材料(其可靠性未能确定),哥伦布的家庭原籍可能在西班牙的马略卡岛,其家庭属于马兰内。哥伦布本人关于自己的出身说得不明确,但他倾向于把自己说成是大卫王家族的后裔。他的儿子费尔南多(由出身于马兰内家庭的妻子所生)在关于自己父亲的传记中写道,他的父亲是“耶路撒冷王室”的后裔。在描述1492—1493年自己的第一次航海时,哥伦布一开头就提到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的事(1492年7月31日完成驱逐)。他把启航日期从1492年8月2日改为3日,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在阿布月初九出发,那一年阿布月初九正好是8月2日。保存下来的哥伦布使用过的书籍残篇可以证明,他航海的钥匙是《圣经·诗篇》的一句诗:“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在马兰内看来,这句诗具有特殊的神秘救世涵义。哥伦布给一位儿子立遗嘱时难以辨认的签字,据某些学者的意见,可以被解释为希伯来语字体。尽管有上述证据,然而,哥伦布的民族归属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研究者们强调了哥伦布对犹太社会和马兰内社会的向往。在新基督教徒L·德桑塔奈尔(死于1498年,阿拉贡大臣,他贷给哥伦布第一次航海的经费)和国务大臣G·桑切斯(死于1505年)的支持下,哥伦布获得王室的庇护。一些作家和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利用了有关哥伦布犹太出身的说法。

夏扎尔 (Shneur Zalman Shazar, 1899—1974)

以色列第三任总统。生于白俄罗斯。原名鲁巴肖夫,后改用希伯来名夏扎尔。青年时代分别去彼得堡和德国学习,精通东欧犹太史和沙贝撒主义(犹太教中神秘派)。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他协助成立了犹太人自卫组织,积极参加当时在俄国的马克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

织的各项活动,兼为该组织编印报刊。在两次前往巴勒斯坦访问后,于1924年正式移居巴勒斯坦,以记者和政治家身份投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犹太工人总工会和巴勒斯坦工人党关系密切。1924年起开始担任犹太工人总工会机关报《话报》编辑。1944年后成为该报主编,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1947年作为犹太代办处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联合国总部,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奔走呼号。

夏扎尔在以色列国成立后任历届议会议员。1949—1951年任文化部长,1952—1963年任犹太代办处执委会成员。1963年当选为以色列第三任总统,1968年当选连任。

夏扎尔是以色列国第一代领导人中一位受到过正规教育的政治人物。他喜爱写诗和学术文章,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领导人。

夏甲 (Hagar) 古希伯来人名亚伯拉罕之妾。她原是一个埃及女子,亚伯拉罕旅居埃及时收纳了她,让她做妻子撒拉的女仆。撒拉因自己不能生育,便将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妾,以得后嗣。夏甲怀孕后,对主母撒拉不甚敬重,被撒拉虐待而逃出家门,到旷野里去。上帝的使者在书珥与巴列之间的井旁遇见她,命她仍旧回家。夏甲回家后不久,便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以实玛利。以实玛利14岁时,撒拉才生了以撒。撒拉不愿以实玛利和以撒共同继承亚伯拉罕的家产,再度把夏甲母子逐出家门。夏甲出走时仅带有一些饼和一皮袋水。夏甲带着儿子以实玛利走到别是巴旷野时迷途水尽,极度疲乏。这时上帝的使者出现,指示她找到井水,并应许以实玛利的后裔将成为大族。以实玛利在旷野长成人,夏甲为他从埃及娶了妻子。以实玛利的后裔据说就是阿拉伯的游牧民族。今日阿拉伯人也称自己是以实玛利的子孙。

夏加尔 (Marc Chagall, 1887—1985) 著名犹太画家。生于俄国西部小城维捷布斯克。其父是个普通工人,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一名拉比。16岁以前一直在犹太经学院学习犹太经典。其母并不满足犹太传统教育,总是设法让儿子学一些世俗知识。夏加尔天生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喜欢用笔画下所看到的一切。对绘画的迷恋终于使其母同意送他学画。学画不足3月,他发现其师的画技还不如自己的好,遂去圣彼得堡学画。学成后,回到家乡,用画反映犹太人的精神面貌和悲欢离合。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死人》和《我的戴黑手套的未婚妻》。1910年去巴黎,在对艺术的观摩中和与各种流派艺术家的交往中确定了自己的画风。1914年,在柏林举行首次个人画展,确立了自己在画坛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家乡作画,内容转以风景和老人为主。《在祈祷的犹太人》和《穿绿衣服的犹太人》是较有代表性的两幅。十月革命时

期,一度支持布尔什维克,任家乡艺术人民委员,为了普及艺术,制定出创办美术学院和博物馆的计划,但由于政治和美学上的分歧,计划终被放弃。他本人前往莫斯科,在艺术上转向布景和服装制作,以及为剧院作壁画。1922年离开苏联,去柏林学习版画技法。1923年定居巴黎,主要从事插图设计,先后为果戈理的《死魂灵》、拉封丹的《寓言》,以及《圣经》作图。1933年在瑞士举行大型作品展,1939年获卡内基奖金。1941年在德军占领法国时逃往美国避居。1948年再度返回巴黎。60年代,他已逾80高龄,仍作画不止,先后为巴黎歌剧院作天顶画,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新馆作大型壁画《音乐的源泉》和《音乐的胜利》。此后,还不断有新作出现。

夏里特 (Moshe Sharett, 1894—1965)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以色列第二任总理,政治家。出生于乌克兰克松布。原姓谢托克,1948年担任外交部长时改姓夏里特,该词在希伯来语中含义为“奉献”,以表现献身于犹太人事业的决心。其父是比卢运动成员,1880年初,便作为拓荒者来到巴勒斯坦,后又返回俄国。1906年,夏里特12岁时,他率领全家移居巴勒斯坦。全家首先在耶路撒冷与哈拉斯之间的一个阿拉伯村中落户,小夏里特因此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并熟悉了阿拉伯村的生活。两年后,全家搬至雅法,在后来成为特拉维夫市新犹太人居住区住下,夏里特成为当地中学第一批学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君士坦丁堡学习法律。他应征入伍,加入土耳其军队,后成为一名军官,担任驻土耳其德军指挥官翻译。战争结束后,他到英国继续其学业。在左翼人士影响下,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党成员。从伦敦回到巴勒斯坦后,担任党报编辑。

1931年,他开始在犹太代办处工作,担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处理与阿拉伯温和派人士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中最善于与阿拉伯人打交道的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直致力于为英军在巴勒斯坦征召犹太志愿兵的工作,同时领导犹太武装在犹太人旗帜下进行战斗的任务。由于他的不懈的努力,1944年,英国当局终于允许成立犹太军团。

大战结束后,由于英国托管当局实行有损于犹太人事业的政策,导致巴勒斯坦政局动荡。1946年,英美委员会来巴勒斯坦实地考察,夏里特作为犹太代办处发言人参加考察,后与其他一些犹太代办处执委会成员被英国托管当局逮捕和关押。直至1947年,英国当局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才得以释放。出狱后,他前往美国纽约,负责领导争取联大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的外交游说工作,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为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铺平了外交道路。1948年5月,英国托管当局撤出巴勒斯坦前夕,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邀请他前来

华盛顿,并以严酷的口吻告诫他如果宣布成立犹太国,美国将不会派军队去抵挡阿拉伯人的进攻。马歇尔国务卿提议用总统座机将其立刻送回巴勒斯坦,向本—古里安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传达这一紧急口信。夏里特对此予以谢绝,然后设法自行回国,不仅帮助起草了《独立宣言》,还于5月14日在上面签名作证。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外交部长。

他在负责掌管外交事务期间,正值以色列国处境最为艰难时刻,外交工作需要四个方面同时展开:世界上的大国、阿拉伯人、发展中国家和海外犹太社团。他的经历、才华、知识和个人气质使他成功地开展了多方位外交活动,争取到了支持,为新建立的国家在世界大家庭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1954年1月,本—古里安辞去总理职务,由他接任。1955年11月,本—古里安复职后,他仍留任外交部长。在此期间,他不赞成本—古里安和达扬在处理边界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立场,主张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采用“对抗方式”处理阿以冲突,在外交事务方面应以“谨慎”代替“勇气”。当第二次中东战争临近时,他辞去了外长职务。以后,主要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担任领导职务。1965年在耶路撒冷病逝,以色列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夏罗设 古犹太地名。迦密山的隘口。位于基顺河北,为地中海海滨至伊斯德伦的交通要道,距米吉多约24公里。士师时代,迦南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攻击女士师底波拉时,从夏罗设率军到基训河。善于利用天时地利的底波拉命大将巴拉率部占领基顺河周围的高地,避开西西拉的铁车适于平原作战的优势,趁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敌人的战车陷入泥泞不得动弹之际,指挥全军将士将迦南人彻底击败,西西拉丢盔弃甲,仓皇溃逃。在夏罗设,西西拉全军覆没,只剩下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的帐棚。雅亿假意保护西西拉,拿奶给西西拉喝,当西西拉沉睡时,用锤子将楔子打穿西西拉的鬓角。西西拉一代英雄就死于一个妇人的手。

夏娃 (Eve) 传说中人类的始祖,世上的第一个女人。“夏娃”一词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生命”,意味着她将成为众生之母。夏娃为亚当生了该隐、亚伯和塞特,他们就成为人类的第一代祖先。(参见“伊甸园”条)

哲人 古代《圣经》学者的一种称号。这一称号主要用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从事《圣经》研究的犹太学者身上,既可指巴勒斯坦的犹太学者,又可指巴比伦的犹太学者,是对坦拿和阿摩拉的一种通称。在犹太人失去主权、圣殿被毁的历史关头,哲人发挥了犹太民族的精神领袖作用。通过对《圣经》的研读,对口传律法的研究,哲

人试图在精神上鼓舞在战场上被打败的犹太人,使他们重新鼓起生活的信心。哲人大多属于法利赛派。在思想上,他们坚持认为犹太人的口传律法与书面律法同等重要,都是上帝在西奈山上传授给犹太民族的,开展对口传律法的研究与对《圣经》的研究同等神圣。在他们的宣传下,犹太人开始了对丰富的口传律法的学习和研究。在研究中,他们还特别重视犹太人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设法在民族流散和混乱的社会中建立起秩序。以口传律法为基础的《密西拿》和《塔木德》的编纂工作就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完成的。一整套适用于海外散居生活准则的制定不仅使全世界的犹太人有了统一的准则,而且还把他们联成一个统一体,使他们在散居两千年后仍认同于同一种文化,同一种传统。

柴迪克 犹太教称号,指体现犹太教理想的人。该词有“正义”、“正直”、“乐善好施”等含义。在《圣经》中,它与“罪恶之人”一词互成反义。《圣经》中有几处甚至用它来称呼上帝。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词指那些在宗教伦理方面体现上帝教义的人。先知哈巴谷和先知以赛亚都被认为是这样的义人。

拉比犹太教使用该词指那些祈祷时充满炽热、真诚情感从而具有防止灾难发生能力的人。《塔木德》认为世界之所以得以继续存在完全依赖于36位完美无缺的柴迪克。没有这些义人的存在,世界早就会垮掉了。被提到的属于这36位柴迪克的有:挪亚、约瑟、撒母耳、以斯帖等。

喀巴拉神秘主义者则把柴迪克与圣力(包括洞察力)联系起来,把他们说成是上帝与犹太人之间的中介。哈西德运动继承这一观点,用它来称呼其关心民众的运动领袖,并把他们宣染成具有超自然能力、能在上帝与普通民众交流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人物。这些人的追随者定期拜访他们,听取他们的指示和济世治病的良方。这些在当时被冠以柴迪克称号的人大多数生活简朴,乐善好施,为人正直。在一般情况下,该称号可以世袭。在今日哈西德派社区,这一称号已由意第绪语“雷比”(Rebbe)即“拉比”取代。只有在以色列除外。那里的哈西德派社区则以“阿德蒙”来代替。

《虔诚者之书》 犹太教虔诚派的著作。此派虔守律法。“虔诚”希伯来语读作“哈西德”,故亦称“哈西德派”。该派起源很早,其信众曾参加公元前2世纪犹太人反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希腊化的玛喀比起义。在取得宗教信仰自由之后就退出政治斗争,并在历史上消失。公元12、13世纪时,在德国又出现了日耳曼犹太教哈西德派。《虔诚者之书》就是该派信徒日常宗教生活的珍贵记录。书的作者不详,原作为该派信徒宗教生活用的灵修手册。

哭墙 见“西墙”。

钱恩 (Sir Ernst Boris Chain, 1906—1979)

英籍德国犹太生物化学家,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生于德国柏林,父亲是俄国犹太侨民。早年在柏林腓特烈·威廉大学学习化学及生理学。1930—1933年,在柏林慈盖医院的病理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对犹太人迫害,他被迫离开德国,避居英国,并入英国籍,先在剑桥大学,后在牛津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在这期间,他先后受到著名生化学家霍普金斯和弗洛里教授的指导。1938年,他与弗洛里一道成功地对青霉素的分离、提纯进行了研究,并首次进行了青霉素的临床试验,为大规模人工合成青霉素以及医治疾病作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他俩因此与青霉素发现者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一道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1948年后,他先后在意大利国家保健研究所、化学微生物学国际研究中心、伦敦大学帝国学院从事科学研究。他除了在抗生素研究方面取得成就外,还在蛇毒、扩散因子、胰岛素研究方面获得建树。

钱恩一生由于学术成果卓著,获得了许多荣誉,其中包括法国荣誉勋位勋章,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等。1969年,被女王册封为爵士称号。1973年退休,但仍四处发表学术讲演。

特米拉 巴比伦一古镇名。公元前597年与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帝国攻击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后,南国犹太王约雅斤投降,尼布甲尼撒洗劫耶路撒冷王宫与圣殿的财富,并将约雅斤王和其家族、宫廷上层人士、官兵和技术人员等1万多人作为战争俘虏掳到巴比伦去,这就是公元前597年,犹太国灭亡前的第一次被掳。此后,尼布甲尼撒立约雅斤叔父西底家为犹太国看守王。公元前588年,西底家反叛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再度出兵围困耶路撒冷。公元前586年7月间,耶路撒冷城再次陷落。西底家王被抓后剜去双眼,带去巴比伦。圣殿财宝器物被掠,圣殿被放火焚烧,城墙被拆,众民被掳去巴比伦,犹太国正式宣布灭亡,这就是犹太第二次被掳。按《以西结书》记载,被掳之民住在巴比伦的迦巴鲁河边,该地称为“提勒亚毕”,希伯来文含义是“五谷山”或“谷仓”。除了提勒亚毕之外,《圣经》中还提到的有“特米拉”与“特哈萨”等地,就是半个世纪之后,被掳之民也从这两地出发归回耶路撒冷的。《圣经》中的特米拉与特哈萨实际上与提勒亚毕是类似的被掳犹太人的聚居点。“特米拉”与“特哈萨”的“特”与“提勒亚毕”的“提勒”同是希伯来文的“小山岗”(Tel),表明后两者仍是有出产的可居之地。被掳的犹太人就是在巴比伦这些众多的聚居点生活。直到波斯帝国兴起,居鲁士王释放他们归回巴勒斯坦,重建圣殿、城墙

的时候为止。

特拉维夫 巴勒斯坦沿海最大的海港城市，曾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的首都所在地。今为以色列最大城市和商业、交通、工业、文化中心，富有特色的中东大城市之一。位于地中海沿岸。面积170平方公里，人口102万（1987年）。城市前身名雅法，是公元前约2000年建立的港口城市，1909年在雅法城郊建立了犹太居民点，采用《圣经·以西结书》中的“特拉亚毕”作为名称，意为“谷山”，它也来自赫茨尔小说中希伯来文“泉山”一词的译音。1920年，特拉维夫脱离雅法设为城镇。随着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至1936年已成为巴勒斯坦最大、最重要的城市。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犹太军队占领雅法，原有阿拉伯居民被迁出。特拉维夫气候为典型地中海海洋气候。冬、春温和，夏季湿热，1月平均气温13℃，8月平均气温26℃。年平均雨量559毫米。现代城区建在与海岸大路平行的三条砂岩山丘脊上，主要街道沿丘间槽地南北延伸，并与东西穿过山脊隘口的短街连接。沿海有狭长平坦的沙滩，内侧是第一条山岭的一系列峭壁。从市中心向东、南是绵延不断的建筑区和郊区。位于特拉维夫旧城的中心商业区发展迅速，并向东、北扩展至住宅区。旧城东、南侧为制造业区。工业大部集中在东北向公路的两侧。政府机构集中在商业区东北。交通以公路为主，网络四通八达。建有两个火车站和一座国际机场。居民绝大部分为犹太人，非犹太人以阿拉伯人居多。犹太居民中当地出生的不到半数，多数来自欧、美，少数来自亚洲、非洲。特拉维夫在以色列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职工总数占全国总数25%，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工厂。主要行业有纺织、服装、食品、卷烟、金属加工、机械、交通车辆设备、钻石加工、家具木器、印刷出版、电器、电子设备等。教育设施有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特拉维夫大学等。文化设施有剧院、博物馆、美术馆、广播电视台。出版国内的大部分报刊和图书。娱乐设施有公园、动物园、体育场和城中运动场等。

特拉维夫大学 以色列一所综合大学。建立于1956年。该大学历史虽短，但发展迅速，现在已是以色列7所大学中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大学。截止1989年，共有攻读各种学位的学生2.1万人，各类进修生、研修生近9千人，所以实际在校学生人数已达3万人，超过了以色列历史最长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1925年，现有学生人数为2.2万）。全校分为9个学院、90个系和65个研究所，共有教师和研究人員2千余人。特拉维夫大学的前身是特拉维夫法律经济学校（建于1935年），自然科学学院（建于1953年）和一所犹太学研究院（建于1954年）。这三个机构1956年合并组成特拉维夫大学。大学建立后得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资助和以色

列政府的支持，校园建设发展很快。座落在特拉维夫北郊的校园占地220英亩，幽美整洁，布局合理。校内的建筑豪华宏伟，各种设施都非常完善和现代化，与欧美的许多一流大学相比也毫不逊色。校园里的很多建筑物都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如基尔曼大楼、爱因斯坦广场、戴维·卡茨礼堂等等。大学有9个学院、5个主要的图书馆，图书馆都与以色列其他大学的图书馆的计算机连网，组成全国性的参考检索系统。

特拉维夫大学最有名的是它的医学和生物学研究。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医科大学生毕业后都申请到这里来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谷物育种研究所利用野生植株原生胚芽培养出许多高产品种，提供给世界上许多国家。生物学院还有中东地区最大的动植物园。大学还有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地球物理、空间科学、电化学和生物技术实验室，有中东地区唯一的一座天文台。比较著名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达扬中东和非洲研究中心、魏兹曼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加菲战略研究中心、犹太人大流散研究所和果尔达·梅厄劳工和社会学研究所等。犹太学研究也是特拉维夫大学的强项之一。这里有一大批从事犹太圣经、犹太教法典、希伯来语言和文学、犹太哲学、犹太史等方面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犹太人大流散研究所和所属的犹太人大流散纪念馆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大流散纪念馆也是所有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和旅游者必定要参观的地方。魏纳尔图书馆里不仅有大量的犹太学图书资料，还收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反犹太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资料、档案和实物。特拉维夫大学与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它与世界各地的43所大学有合作协定，与美国的20所大学有学生交流关系。它的海外学生计划每年向国外提供一定的奖学金，让国外的青年学生到这里来学习一个学期或一年，主要是学习希伯来语、犹太文化和了解以色列的情况。特拉维夫大学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联系更是密切，既接受犹太人的资助，也为各地犹太社团服务，如为阿根廷、墨西哥、南非等地的犹太学校制定学习课程，培训海外犹太学校的教师等。特拉维夫大学也提倡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在其教学和研究中很注意与国家的建设、防务和社会中的法律、教育、卫生、福利事业相结合。大学还为工作中的律师、工程师、教师、医生和政府官员提供学习进修机会，让他们能更新知识。现在以色列政府和国会中不少要人都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过。

特拉普提派 犹太教一苦修派别。特拉普提意为“治愈者”，是一个同艾赛尼派非常相似的禁欲主义派别。一般认为该派在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时代住在埃及亚历山大城郊，马里奥提斯湖滨。关于这个社团的一些有限的资料，来源于《论默念沉思生活》一书，该书一般认为是斐洛所著。该派的起源与归宿今都已无法知道。该派的特

别之处在于他们对社团纪律和生活方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严格性。根据斐洛的记载,社团成员无论男女都以全部热情投身于祈祷和研究。他们每天做两次祈祷,分别在早晨和黄昏进行。其间间隔的时间被全部用来作精神上的锻炼。他们阅读《托拉》,把《托拉》作为寓言看待,并从中寻找智慧,他们认为经上的文字是某种隐秘潜藏的一些象征符号。至于肉体生活的需要,例如食物等,完全在黑暗中进食,许多人两天才进食一次,一些人甚至在周末才进餐;所有成员都严格禁酒、禁肉。自从加入社团后,一个人不再属于世界,因而都完全自愿地把财产交给他的继承人。社团成员们常常分散生活在独立隔开的房子里,这些房子互相接近以便于成员之间能够互相提供照顾和保护,但却不能接近到足以干涉各自的独立性。每个房子里都有一个专门的圣所,供社团成员学习和祈祷。特拉普提派除了《托拉》、《圣经》外,还拥有一些社团创始人的著作,这些著作都以寓言的方式对《托拉》进行解释。斐洛的记载里还提到该派拥有一些奉献给上帝的“新赞美诗”,这些诗篇乃是用不同韵律和节奏写成的。在一周中的6天,社团成员都各自分开独立地生活以寻求智慧。到了安息日他们就在一个公共场所里聚会,在那儿他们聆听社团中对律法和信条拥有最完美知识的人宣道,然后共同进餐。这一餐主要吃粗面包,上面撒了盐和圣水。这个宗派,根据斐洛的记载,尊重7这个数目以及7的平方,但是最为神圣的数字则是50。因此每当到了第50天这个节日,他们就举行通宵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往往有讲道、唱圣诗和进餐,然后是神圣的守夜祈祷等。

特拉普提派同另一个禁欲主义宗派艾赛尼派的重要区别在于后者是反理性的,与此相反,智慧却正是特拉普提派寻求的主要目标。另外,特拉普提派属于上层阶级,而艾赛尼派则明显是出身于低层社会者居多。但他们都是身心二元论者,相信灵肉可以分离,同时他们都注意探索《圣经》文字下暗藏的秘密教条和灵意。

特拉普提派、艾赛尼派和库姆兰社团这三个禁欲主义宗派对于以后以色列人的生活都未留下持久的影响,但他们的半修道院式的社团组织,却为后来的基督教修道体系提供了最早的原型。

特哈萨 见“特米拉”。

特选子民 亦称“上帝的选民”。《圣经》中对犹太民族的一种称谓,犹太神学观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太教教义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从万民中挑选出的一个特别的民族,故称自己为特选子民。该观念的产生与上帝和犹太人立约的宗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最早来自《圣经》。《创世记》中在描绘上帝与犹太民族始祖亚伯拉罕的交流中,就已暗示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特殊关系:“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

他,为要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亚伯拉罕与上帝缔结的约便确立了上帝与犹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摩西在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后,曾将全体犹太人召集在西奈山下,集体确认祖先与上帝订立的约,明确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保证子孙万代遵照执行。(参见《出埃及记》)这一事件对“特选子民”观在犹太民族思想中植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不再是犹太民族的代表许下的承诺,而是犹太民族的集体承诺,对每一个犹太人都具有约束力。

虽然特选子民的观念贯穿整部《圣经》,可《圣经》中对于上帝为何挑选犹太人并无明确的解释,只是说:“耶和華专爱你们,挑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華爱你们……”上帝还吩咐摩西转告埃及法老,犹太人是他的头生子,但不是唯一的孩子。尽管特选子民被认为是一种荣耀,但《圣经》中多次暗示:特选意味着为其他民族承担责任,甚至包括替他们受难。

《圣经》后时代,特选子民的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和阐述。《塔木德》时代的拉比认为上帝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种系统,有的拉比认为《雅歌》中对爱情的炽热表达是对上帝和犹太人亲密关系的一种暗示。传统的拉比犹太教认为上帝之所以选择犹太人是因为世界上只有犹太民族愿意接受《托拉》。这一解释显然对加强这一观念有一定的意义。

历史上,人们对特选子民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种责任,而不是权利。圣洁和荣耀只能被看成是对忠实守约的一种报答,而不是无条件的赐与和犹太民族的一项特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犹太人独特性的表示,说明犹太人具有较高的智慧和品行。近代的犹太学者认为,特选子民的观念除了暗示犹太人肩负着上帝委托的特殊使命,要在全世界传播上帝的旨意,人类应通过他们学习认识上帝和遵守诫律的信念外,已不具有其他任何特殊含义。

尽管特选子民只是一个宗教上的观念,然而,千百年来,特别是在犹太民族多次面临民族危亡,遭受无数打击和迫害之际,特选子民的观念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它不仅使受难的犹太人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使失国离散犹太民族的文化得到一以贯之的继承,而且使犹太人在道德上不断追求完美,在精神上始终保持昂扬,成为世界上一个伟大而优秀的民族。

特勒 (Edward Teller, 1908—) 美国犹太科学家。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家境殷实富有。从小表现出数学天才。1928年从布达佩斯工学院毕业后,去慕尼黑、莱比锡等地深造,专攻物理化学,获博士学位。稍后,为原子物理所吸引,前往哥本哈根,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玻尔,一年后到哥丁根大学任教。纳粹在德国执政后,

他先逃往英国。1935年来到美国,1941年入美国籍。最初在华盛顿大学教授物理学。得知希特勒德国开始原子弹研制消息后,与其他5名科学家说服爱因斯坦上书美国总统建议开展核武器研制工作。1941年加入费密小组,从事原子武器研究工作,并在实验中成功实现了第一次原子核链式反应。后接受著名科学家奥本海默邀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原子弹理论研究。1943年当奥本海默在新墨西哥州建立秘密武器试验室时,他是第一个被吸收的人。1946年,任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提出制造氢弹的设想,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美国第二武器试验室,致力于热核装置研究。尽管这一设想受到包括奥本海默等科学家的反对,他坚持自己的工作。在他的有力领导下,第一颗氢弹于1952年11月1日爆炸成功。他因此被誉为“氢弹之父”。

特鲁姆佩尔道 (Joseph Trumpeldor, 1880—1921) 伊休夫运动著名人士,哈鲁茨运动的创始人。

生于俄国。青年时代应征入伍,1902年成为一名军官。1904年参加保卫俄国东部港口阿瑟岛的战斗,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英勇无畏,左臂失去后仍继续作战,直至最后被日军俘获。在狱中,他不断为其他被俘的犹太同胞编写有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消息,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为此,他获得了由沙皇签发的军事委任状,成为沙俄军队中第一位得到这一荣誉的犹太军官。

1912年,他移居巴勒斯坦,协助雅布庭斯基组建犹太军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人共同作战。稍后,他在加利波利的犹太复国主义驃马军团中任第二指挥。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他回到俄国,试图劝说临时革命政府在俄国军队中成立犹太团。当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成立了哈鲁茨组织(即犹太先锋队)后,他于1919年回到巴勒斯坦。1920年初,巴勒斯坦地区东北部的犹太人居住区(当时该地区在法国人统治下)受到反法阿拉伯人起义的威胁。包括雅布庭斯基在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曾要求该地区犹太人暂时撤离。然而,由特鲁姆佩尔道领导的部分犹太人拒绝撤离,他们集中在泰勒哈伊地区,即靠近今天的吉卢迪村地区。结果,他与其他拒绝撤离的犹太人全部遭到屠杀。但是他在屠杀过程中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成为后来伊休夫抵抗运动的象征。为了纪念他的英勇行为,一些犹太组织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他的墓地,立有一尊巨大狮子塑像。吉勒博阿山的一个居住点也用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

特雷布林卡集中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境内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之一,位于华沙东北100公里靠近铁路的村庄特雷布林卡附近。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有两个营地。第一个营地距车站4公里,1941年12月建立,主要是一个劳役营。第二个规模较大

并绝对保密,代号“T II”(即特雷布林卡二号),距第一营16公里,建立于1942年7月,用于处决列入“最后解决”名单的犹太人。

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消灭犹太人的主要方法是使用毒气。该营有10个毒气室,一个毒气室每次可容纳200人。受害者由铁路货车运来,转至二号营后,按性别分开,剥去衣服,并剥夺其他所有财物,然后被驱入所谓“浴室”的毒气室。毒气室使用的主要是氢氰毒气(即齐克隆-B毒气),毒气由机器从毒气室顶部管道施放。德国使用数百名乌克兰人和大约1000名犹太男囚犯执行死刑和尸体处理。从尸体上取下金牙、假牙和其他贵重物品后,将尸体运至万人坑掩埋,一部分尸体被焚毁。自1942年7月至1943年10月,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75万犹太人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被杀害,这其中包括20万从华沙犹太隔离区中驱逐出来的犹太人。

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二号营和一号营分别于1943年10月和1944年7月被德国人关闭和拆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集中营只剩下约50名幸存者。

租赁 从中世纪晚期开始,租赁制广泛流行于波兰和立陶宛,从16世纪起,租赁术语进入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中。

包办,即“大型租赁”,把国家进项和专卖转交给私人,而私人向国家交纳费用。波兰犹太人首先包办王室的进项:钱币铸造,建造盐场,征收关税和其他税。在波兰—立陶宛国,犹太人于14—15世纪首次在广泛的范围内从事这类包办。1538年波兰议会禁止向犹太人提供王室进项的包办。1569年立陶宛议会向小贵族提供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的专卖权。这项决定可能在经济上对立陶宛犹太人产生致命后果,不过,立陶宛犹太人利用充分的影响,在17世纪末期以前抵制了这项决定的实施。16和17世纪,红罗斯(1939年以前的西乌克兰)的犹太人在关税、盐场和酒类专卖的包办中起到重要作用。后来,犹太人往往是基督教包办者(大部分为亚美尼亚人)的秘密伙伴。

土地租赁,即出租土地所有权或者农业、林业中某些生产种类和农产品加工。在16—17世纪东波兰的租赁者中,犹太人开始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波兰豪绅巨富和小贵族阶级不愿意管理自己广袤的、有时是遥远的领地,就把它们出租给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中的很多人实际上成为他们的经济顾问。犹太租赁者在乌克兰的移民垦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不过,犹太人在那里两头受气,一方面,受到向他们勒索钱财的豪绅巨富的压力,犹太租赁者是这些豪绅巨富的代理人;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农民的仇视,在农民起义和哥萨克起义时受到袭击。17世纪,数万名犹太人死于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率领的部队之手。在波兰“贵族共和国”(1648—1772)存在的最后年月,犹

太租赁的条件、性质和作用走向低谷,只有不多的租赁者掌管一个以上的酒店。由于19世纪东欧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租赁在该地区犹太人经营结构中的比重降低了。

秘库 犹太教徒存放损坏或不宜继续使用的圣书、希伯来语文稿以及犹太教礼仪用品的场所。根据犹太教法规定,凡是受损的圣书或礼仪用品均不能继续使用,但又不允许随意扔掉或焚毁,最好的处理办法是依礼埋葬或作为宗教名人或知名学者的陪葬品在犹太墓地下葬。由于这种礼仪处理方式常常要隔一段时间才举行一次,为了便于犹太教徒及时处理手头已损的圣书等,许多犹太会堂都辟有专门的场所,暂时存放这些不宜继续使用的希伯来圣书、文稿和礼仪用品。这种场所多设在犹太会堂的阁楼、壁洞或地下室,俗称“秘库”(即“储藏室”之意)。著名的秘库有开罗近郊古以斯拉犹太会堂的秘库和巴勒斯坦库姆兰地区存放《死海古卷》的山洞。

人们现在在谈论“秘库”时,主要指开罗郊外一座名叫以斯拉古犹太会堂中的储藏室。1896年,两名苏格兰女学者在访问开罗时,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一卷希伯来文手稿残页,带回英国。次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犹太学者所罗门·谢克特对这些残页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一部分竟是失传的希伯来文本《传道书》的片断。随后,他立即动身前往埃及,在以斯拉古犹太会堂的秘库中出土了大量古代希伯来文稿。他以剑桥大学的名义获得了对这些文稿的拥有权。由他带回的残页共有14万余页。另有6万余页在他到来之前已经卖出,为世界许多图书馆,特别是俄国的列宁格勒图书馆所收藏。在这批发现的古籍中,最重要的是《耶路撒冷塔木德》的古代文本。此外,还有部分迄今鲜为人知的《米德拉西》手稿,大量犹太加昂撰写的《答问》、犹太教卡拉派文稿、6—7世纪太巴列学院所著《哈拉卡》片断、后《塔木德》时代的礼仪文稿、诗歌手稿、迈蒙尼德的书信、早期的意第绪文手稿,以及中世纪犹太律法、商业文件。

20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从未间断对这一发现的研究。现有的研究发现极大地充实了人们对古代和中世纪巴勒斯坦历史和犹太人历史的认识。开罗作为犹太教从巴勒斯坦和巴比伦向北非和欧洲传播的中继站的地位得到了确认。一些学者还根据这批古籍断定艾赛尼派的存在。这一判断日后为20世纪40年代末在库姆兰地区的秘库中发现的《死海古卷》所证实。

俺三 (An San) 又名赵诚。开封犹太人的最早的一位将军。明初人。原是河南中护卫的军士。永乐十八年(1420年),俺三为首的几个军士几次向永乐皇帝告发,揭露封藩在河南开封的周王朱橚(永乐皇帝的同母弟)有图谋“不轨”的行为。永乐皇帝派人案验“得实”,提调周王至京,警告了他,削减了周王的防卫兵力,并采取

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同年十二月,永乐皇帝以俺三“奏闻有功”,“赐姓名赵诚”,并加官晋爵,升任为锦衣卫指挥佾事,后又调任为开原(现在辽宁省开原县)指挥佾事。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又调升为浙江东司都指挥佾事(见明《太宗实录》230、232卷。开封犹太人在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里,称俺三为“俺诚医士”。俺诚—赵诚被永乐皇帝赐姓名和加官晋爵的事迹,也与明《实录》的记载不同)。自此以后,俺氏—赵氏家族平步青云,世代官宦,直至清(1644—1911)中期。

息瓦 犹太民族哀悼习俗之一。该习俗由古代哀悼礼仪演变而来,主要表达对刚刚去世家人(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姐、妹)的哀悼。息瓦的时限在死者下葬后开始起算,共七天。

息瓦期间,家中所有的镜子都要用布遮盖,象征一切皆空。死者家属要穿上领头挂有一黑布条的衣服,不能穿皮鞋,只能拖布拖;不能坐在椅中,只能坐在矮凳或地面上。息瓦在死者家里进行,家人因此必须呆在家中,不动手做事情,包括烧饭和研读《托拉》在内,只诵读《卡迪什》和其他哀悼祈祷。一切接待事宜由朋友邻居安排。亲朋好友往往在此期间登门拜访,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对死者家属的慰问。人们的谈话只限于对死者的赞扬。亲友前来吊唁,男子如满十人即可在死者家中举行正式祈祷,否则,只进行个别祈祷。死者家族既不与客人寒暄问候,也不对来访表示感谢,以示他们完全沉浸在悲痛和对已故亲人的怀念之中。

七天息瓦期间的饭菜通常由至亲好友安排准备。从葬礼上回来的第一顿饭往往由邻居准备,饭菜中总会有煮鸡蛋,以象征未亡人的生活还须继续下去。悼念者前往时亦会带上一些糕点、水果及其他食品。

为防止亲人过于悲伤,《塔木德》规定息瓦的前三天可以流泪哭泣,从第四天起只能追思死者的功德,进行颂述死者善行的活动。

息瓦最后一天的清晨,要举行结束息瓦期仪式。死者家属以手挽手的方式绕自己的住所一圈,表示息瓦期结束。随后,家人可以开始正常生活。据传统,丧期内安息日不守丧,逢重大宗教节日丧期即终止。

《颂赞诗篇》 赞美上帝的诗歌。来源于《圣经·诗篇》第113—118篇。每逢犹太节日都要在犹太会堂中诵读。颂美诗篇按诵读时包括的内容分为两种。一种叫“全篇”,包括上述所有章节,主要在住棚节、哈努卡节、逾越节的第一天,七七节以及以色列国独立日时诵读。另一种叫“半篇”,即不包括第115篇中的1至11节和116篇中的1至11节的内容,主要在新月节和逾越节后6天中诵读。

据《塔木德》记载,吟诵《颂赞诗篇》之风由摩西开创,

后来以色列的先知把这一诵读习俗用于所有犹太人感激上帝救赎之情的场合。《颂赞诗篇》首先由古代犹太人于三大朝圣节期在耶路撒冷圣殿献祭时使用,诵读者往往由利未支派的人担任。犹太会堂出现后,开始在会堂举行的一些仪式中使用,到了《塔木德》时代,终于成为一种固定习俗。

拿八 (Nabal) 古希伯来人物名。迦勒族人,居于巴勒斯坦玛云的一个大富户。据载,他拥有三千绵羊、一千山羊。拿八为人刚愎凶恶,妻子名亚比该,是个美丽、聪明的妇人。大卫等曾住在其家附近,保护居民财产不被盗贼抢掠。一日,大卫在旷野中听说拿八在迦密剪羊毛,便打发10个仆人去见拿八,向他问安,并请求赞助。拿八不但不理会,还口出恶言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仆人将拿八的原话告诉了大卫,大卫非常愤怒,准备带400人去杀他。拿八家的一个仆人将拿八的所作所为告诉了他的妻子亚比该。亚比该急忙准备了200个饼、2皮袋酒、5只宰杀收拾好了的羊、34斤烘好了的麦穗子、100串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等厚礼,亲自去见大卫,她恰好在半路遇上前来杀拿八的那400人。亚比该匍伏在大卫面前请求他宽恕拿八。大卫接受了亚比该的礼物和请求。亚比该回到家里的时候,拿八正摆设筵席,招待宾客,自己喝得大醉。次日早晨,拿八醒了酒,亚比该就把事情的原委全部都告诉了他。拿八听说后,十分恐惧,魂不附体,竟因惧怕忧郁在10天内死去。大卫听说拿八死了,便打发仆人去迦密替他向亚比该求婚。亚比该十分愿意,立即起身,改嫁给大卫。

拿马尼德斯 (Moses ben - Nachman Nahmanides, 约1194-1270) 西班牙著名犹太拉比、学者。西班牙名为彭纳斯特拉·达一波塔。生于西班牙赫罗纳。一度负责故乡赫罗纳犹太拉比神学院工作,许多西班牙的著名学者都在他门下学习过。1264年,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总拉比。他被公认是西班牙犹太社团的领袖,杰出的犹太学者。凡涉及到犹太人的事务,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总要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再作处理。1263年,他奉詹姆斯一世之命,参加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场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功过的公开辩论,基督教一方由250名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头面人物组成,而犹太教一方则只有他一人代表。由于他的渊博知识和雄辩才能,国王宣布他在辩论中获胜,并奖赏奖金300第纳尔。在赫罗纳主教的要求下,他把他的观点写成一本名为《论战之书》的书。然而,组织这一辩论的多明我会头面人物却指责他亵渎神明,要求对他进行审判。国王詹姆斯一世坚持支持他享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多明我会只好寻求教

皇支持。当教皇下令要求国王对他进行惩罚时,他被迫逃离西班牙,前往巴勒斯坦。1267年,他抵达阿克,受到当地犹太社团的热烈欢迎,并被尊为犹太人的精神领袖。他不顾年迈,一边整顿当地犹太社团,一边着手译注《圣经》。

拿马尼德斯流传下来的著作达50部之多。这些论述具体法律问题的著作显示了他对犹太教经典的深入理解和渊博知识,和对初露端倪的犹太教神秘主义作为一门哲学的精深理解。他对《托拉》的注释以及对神秘主义的阐述对以后的学者和喀巴拉运动影响极大。

拿弗他利 (Naphtali) 古希伯来族长。雅各与拉结的婢女辟拉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拿弗他利”希伯来文意为“相争”。拉结因他的出生而认为是她与姐姐利亚相争得了胜,所以给他起名拿弗他利。雅各与众子迁往埃及时,他已有四个儿子:雅薛、沽尼、耶色、示冷。不久死于埃及并葬在那里。雅各临终时曾祝福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嘉美的言语。”

拿弗他利支派 古以色列的12支派之一。雅各与拉结的婢女辟拉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拿弗他利的后裔。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辗转行进时,此族殿后。在侦探迦南地的12人中,拿弗他利支派的代表是缚西的儿子拿比。摩西临终时祝福拿弗他利支派:“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约书亚率众占领迦南后,该支派分得加利利西北一带地区。与西布伦、亚设、犹大等支派的领地为邻。境内有西丁、侧耳、哈米、拉甲、基尼烈、亚大玛等19座城,还有城周围的村庄。公元前993年统一王国分裂后,属北国以色列。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拿弗他利支派也就随之成为“丢失的10个支派”之一(参见“丢失的10个支派”)。

拿伯 (Naboth) 古希伯来人名。古巴勒斯坦一葡萄园主,他在耶斯列的一个葡萄园,恰好毗邻撒玛利亚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宫。亚哈王想得到此园改为他的菜园,以扩大他的苑囿。拿伯却不愿将祖先留下的产业给亚哈王,一口回绝了他。亚哈王因此不乐。王后耶洗别为亚哈王出谋划策,写信给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让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用石头把拿伯打死。亚哈王遂霸占了拿伯的葡萄园。先知以利亚严厉谴责了亚哈王和耶洗别的所作所为,宣告他们和其家族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指亚哈王)的血”、“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拿伯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却因他的葡萄园而闻名于世。“拿伯的葡萄园”成为一条人所共晓的《圣经》典故。

拿伯的葡萄园 《希伯来圣经》典故。喻指令人垂涎欲滴之物。源出《列王纪上》第24章,讲以色列昏庸无道的暴君亚哈王,以卑鄙的手段霸占了拿伯的葡萄园。故“拿伯的葡萄园”一词也含有不惜用一切非法手段弄到自己想要的别人的东西。(参见“拿伯”)

拿单 (Nathan) 古希伯来人名。大卫及所罗门王朝时期的著名先知。大卫向他询问建造圣殿之事,他起初赞成,后得上帝启示,又说建殿者应是大卫的继承者。大卫王为霸占美女拔示巴,不惜用计谋杀拔示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参见“乌利亚”)。此事受到拿单先知的严厉指责:“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她们同寝。你在暗中行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并预言大卫与拔示巴将要出世的孩子必死无疑。果然这个孩子死掉了。亚多尼雅阴谋与所罗门争权继承大卫王王位时,大卫命令祭司撒督、先知拿单和护卫长比拿雅拥立所罗门为王。拿单曾作历史书,记述大卫、所罗门的事迹。

拿细耳人 指自愿奉献给上帝的人。“拿细耳”一词为希伯来文音译,含义是“奉献者”。拿细耳人和常人最大的区别是不饮酒、不剪头发,以蓄发作为归依上帝的标志。拿细耳人的生活必须严格遵照摩西律法的规定,除遵守不饮酒、不剪发的戒律外,他们还要订立多长时间内作拿细耳人的誓约,遵守不能接触尸体等等一系列繁琐的禁忌。誓约期满后应到祭司那里行规定的祭礼,烧掉剪下的头发,之后才可饮酒。亦有终身为拿细耳人的,如士师参孙和撒母耳都是终身为拿细耳人。

在以色列人早期历史中,拿细耳人往往被描述成具有超凡神力的人,因此这一时期的拿细耳人往往和那些因受灵感而进入痴迷状态的先知联系在一起。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阿摩司曾说:“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拿细耳人还同英勇的武士很相近。例如,拿细耳人参孙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勇士。较晚时期的拿细耳人的禁忌在《民数记》第6章及《密西拿》中有记载。这一时期的拿细耳人不再被认为是具有超凡神力的人,而是那些向耶和华许了特别的愿,并遵守诫律离俗的以色列人。离俗的最短日期是30天。除了早期拿细耳人的禁忌外,这一时期的禁忌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拿俄米 (Naomi) 希伯来士师时期,一个名叫以利米勒的妻子路得的婆婆,原住在伯利恒。当时以色列

国内遇上了饥荒,拿俄米便与丈夫与两个儿子一起逃到摩押地,在那里她的两个儿子娶了当地摩押女子为妻。后来,她的丈夫与两个儿子先后去世。那时以色列国内年成好转,她便决定重回伯利恒。其中一个儿媳路得不肯离开她,同她一起回到了伯利恒。众人出来迎接她们返回伯利恒。妇女们都询问:“这是拿俄米吗?”她回答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希伯来文是“甜”的意思),要叫我玛拉(“玛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地出去,他使我空空地回来。全能者降祸与我,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在伯利恒定居下来后,她精心成全了儿媳路得与波阿斯的婚事。她教路得知道当地女人求婚的风俗习惯,即在男方睡时,女子洗了浴,抹上香膏,悄悄掀起他脚尾头的被角,躺在他身边,看他是否喜欢。后来,他们二人结婚后生了儿子俄备得,拿俄米做了这个孩子的养母。俄备得就是著名的大卫王的祖父。

拿撒勒人耶稣 (Jesus of Nazareth, 公元前6—30) 基督教的创始人。约于公元前6年出生于犹太地的伯利恒,在罗马派驻犹太的巡抚彼拉多任内(公元27—36年)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关于耶稣的生平,没有与他同时代的资料可作参证。一般乃以福音书的前三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作为叙述的根据。福音书记载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由圣灵感孕童贞女马利亚,取肉身降世,成为人的救世主。由于没有确切的教外历史资料,曾有人怀疑耶稣是否实有其人。公元1世纪犹太史家约瑟福斯在他的《犹太古事记》中曾称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是“被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兄弟”;古罗马史学家塔西陀的《编年史》写道:“那个使他们有基督徒称号的人,基督,已在提庇留时期,为巡抚彼拉多所杀。”这些资料间接说明,历史上确曾有过耶稣其人。耶稣出生的年代,正值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下令犹太人到耶路撒冷报名上册,马利亚和丈夫约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到犹太的伯利恒,由于客店拥挤,耶稣就生在伯利恒客店的马槽里。此后,有关耶稣早期生活的史料很少,只有一则记载耶稣12岁时,已在耶路撒冷圣殿中听讲道,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耶稣成年后,到施洗约翰那里受了洗,以后就开始在故乡加利利地区传天国的福音。与施洗约翰不同,耶稣不要求人们到旷野苦修禁欲,他深入村落,与众人共同生活,巡回宣讲,地点不限于犹太教会堂,常在路旁、湖边等露天场所讲道。他宣讲上帝的国近了,劝人们要悔改,相信福音。他称自己是“人子”,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在传道时,选召了12名门徒,比较亲密的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多数是渔民或劳动者。除12门徒外,耶稣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人一组去各地传福音。耶稣的言论与行动

触犯了犹太教中占统治地位的大祭司、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与社会上层社会当权者发生了冲突。他不同意法利赛人关于守安息日的烦琐教条,斥责法利赛人等上层社会的民族偏见和等级歧视,主张上帝是爱,人们也要彼此相爱。他将犹太教律法归结为“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这两条,说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犹太教当权者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对耶稣极端仇视,他们千方百计要置耶稣于死地。当逢到犹太教逾越节的前夕,耶稣被门徒之一的加略人犹大出卖,在夜里被犹太教大祭司的差役拘捕,交给罗马的犹太巡抚彼拉多,并迫使彼拉多同意处死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新约·福音书》记载,耶稣被钉死后第三天复活,并向门徒和众人显现,第四十天升天。众门徒领受圣灵,充满能力,开始到处传教。从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领域内逐渐传布。到公元4世纪时,竟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基督教突破犹太民族宗教的框架与范围,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耶稣被接受为拯救人类的弥赛亚。“弥赛亚”意为受膏的君王。“受膏者”希腊文的汉语音译为“基督”(Christos),于是耶稣又称“耶稣基督”。其教因之称基督教。

拿鹤 (Nahor) 古希伯来人名。他拉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弟弟。娶侄女密迦为妻。密迦是亚伯拉罕另一个弟弟哈兰的女儿,罗得的姐姐。密迦以后生8个儿子,即:乌斯、布斯、基母利、基薛、哈琐、必达、益拉、彼土利。这8个儿子以后都有繁衍的后代。如彼土利就是利百加的父亲,利百加后来嫁给以撒为妻,生了孪生子以扫和雅各,雅各是以色列12支派的祖先。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美籍德国犹太物理学家,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生于德国乌儿姆城一个犹太人家庭。家境贫寒,青少年时代在慕尼黑受教育。在校时,除了对数学和物理学有兴趣外,成绩平平,并不机灵。他喜爱音乐,拉一手好提琴。1896年进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后,加入瑞士国籍,在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任职员,同时,开始自己的科学研究。1905年,在《物理年鉴》上发论文《分子尺度的新测定》,取得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随后连续发表了其他4篇重要科学论文。这些论文发展了普朗克的量子概念,提出了光量子除了有波的性状外,还具有粒子的特性,圆满地解释了光电效应;对布朗运动在理论上作出了新解释;宣告狭义相对论的建立;确立了质量和能量的相对性,即质能方程 $E=mc^2$ 。这些理论的提出宣告了人类对宇宙认识的一次重大变革。1914年,他到柏林普鲁士科学院任职。1916年,他的论著《广义相对论原理》发表,随后,他根据广义相对论和运动方程作出三大预言: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发生弯曲;水星近日点的运动规律;引力场中的光谱线向红端移动。1919年,他的第一个预

言为英国天文考察队通过对日食观测证实,其余两个预言也在后来得到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周游世界,应邀讲学。1921年,在访问中国上海时,获得被授予该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消息。然而,授奖决议中没有提到当时尚受到人们怀疑的相对论,只提到他对光电定律和物理学方面的贡献。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与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分道扬镳,致力研究电磁场和引力场的共同关系,试图建立统一场论。1950年,他发表新的统一场论论文。这虽是一篇精密细致的数学论文,但许多物理学家认为是不能成立的。

爱因斯坦不仅是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还是一位爱好和平人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坚决反对德国的侵略行径,主持起草了《告欧洲人民书》。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他因犹太人身份受到当局迫害,他的家被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焚毁。他辞去在柏林的职务,放弃德国国籍,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去美国任教,1940年加入美国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科学家得知德国人在发现核裂变后有可能研制核武器的消息后,把德国这一动向看成是对人类文明的严重威胁。他于1938年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不失时机进行原子能研究,促使美国政府制定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但是,当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以逼其投降后,他对自己在研制核武器计划中的作用感到后悔。后来,他成为由世界著名原子科学家组成的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委员会主席。

爱因斯坦不是一位严格遵守教规的犹太人,但一向把自己看成是犹太民族中的一员,对犹太人的困境和所受的苦难深表同情。在布拉格和在柏林讲学期间,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生兴趣,特别支持建立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计划。1921年,魏兹曼赴美发起成立巴勒斯坦基金会运动,他应邀陪同为筹款努力,他对建立一个犹太人之家的想法很感兴趣。1929年,参加了由魏兹曼主持召开的扩大的犹太代办处会议,在希特勒加紧推行迫害犹太人政策以后,更是如此。然而,他宣称自己不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1946年,在英美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仍坚持这一立场。不过,当现代以色列国在1948年成立后,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积极为犹太人的事业筹集款项。1952年,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兹曼逝世后,以色列当时的总理本-古里安请他接任总统职务,但遭到婉言谢绝。他声称自己“深为这一提议所感动,但不是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他逝世前,还在草拟一份庆祝以色列独立七周年的讲话稿。他发表的著作中论及犹太人事业的作品有《关于犹太复国主义》(1930)和《阿拉伯与巴勒斯坦》(1941)。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犹太民族中最杰出的一位人士。在人类对宇宙认识的贡献上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他的创造性才智和开拓性贡献极大地推动

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开创了人类科学史的一个崭新的纪元。

爱伦堡 (Ilya Grigoryevich Ehrenburg, 1891—1967) 苏联犹太作家。生于基辅一犹太中产阶级人家。青年时代参加革命活动,认为社会变革是解决反犹太主义的最佳途径。1908年,遭沙俄当局逮捕,同年12月流亡巴黎,1917年返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对布尔什维克态度动摇不定,20年代后开始坚定其信念。在随后的20年中,主要担任苏联驻西欧记者一职。1941年回国,撰写了攻击西方社会的《巴黎的陷落》一书,并于次年获斯大林奖金。为了免受政治清洗,总是设法使自己的作品适应苏联官方需要。1948年,因长篇小说《暴风雨》,再度获斯大林奖金。斯大林死后不久,发表长篇小说《解冻》(1954),在苏联文艺界引起激烈争论,他本人则成为50年代苏联“解冻文学”的始作俑者。1963年,苏联政治再度发生变化后,开始受到一些人的指责。

爱伦堡1910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以诗歌创作为主,主要诗集有《前夜之歌》、《为俄罗斯祈祷》、《毁灭性的爱》等。后来的创作则以长篇小说为主,除了已提及的外,还有《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1922)、《人需要什么》(1937)、《九级浪》(1951—1952)等。另写有大量报导、散文、游记和6卷本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

高德温 (Samuel Goldwyn, 1882—1974) 美国犹太制片人,电影业巨头。原姓高德费希。生于波兰华沙。11岁时丧父,独自一人来到伦敦,在一家铁匠铺打工谋生。14岁前往美国,为一家手套厂录用。他的经营才能在推销产品中得到展露,18岁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套经销商,从此摆脱贫困。对万花筒的兴趣使他步入电影业,与其内弟成立“杰西·拉斯基电影公司”。发行的第一部电影《贵族通婚》属于好莱坞最早故事片之一。在高德温之前,美国影片大多在美国东部室内制作。可他认为室外拍摄更具魅力,于是前往美国西部寻找适合一年四季拍片的场所,并终于发现今日好莱坞是一块理想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创建了好莱坞。1917年创建“高德温影片公司”。1924年,与其他影片公司合并成立“米高梅公司”。其后成为独立制片人,是当时最享有盛名的电影业人士。从20年代开始用高薪聘请著名作家编写电影剧本,使所产影片始终保持高水平,富于文学性。其中著名的有《孔雀夫人》(1936)、《呼啸山庄》(1939)、《小狐狸》(1941)、《黄金时代》(1946)等。其中《黄金时代》获奥斯卡多项奖。由于他的眼力和选聘,相当一批演员成为明星。

高德温的制片生涯长达35年,所产影片一直是世界上公认最佳产品。他本人则长期以来一直被誉为好莱坞历史上最杰出制片人。

斋月战争 见“第四次中东战争”。

羔羊 犹太人作为献祭和肉食的羊。《圣经》规定动物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类。洁净的才可作为祭物和食用。《利未记》第11章记:“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瓣、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据此,在一切走兽中除了骆驼、兔子和猪等之外,都可以吃。其中羊是以色列人最主要的食物,这是同他们古时候的牧羊生活相一致的。摩西时代之前,羔羊、绵羊、山羊已多作为祭品,《创世记》说上帝非常欣赏亚伯奉献的“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以色列古代族长在迦南地游牧时,主要放牧牛群、羊群。《创世记》第22章曾描述亚伯拉罕受考验到摩利亚山献燔祭的故事。当亚伯拉罕在把燔祭的柴背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二人同行上山之时,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这段对话说明早在亚伯拉罕时代,以羊羔献燔祭已是希伯来人普遍的作法。后来亚伯拉罕正要拿刀献杀儿子时,突然在山上不远之处发现了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于是他根据天使的指示,用这只公羊代替儿子以撒作为祭物。

以色列人用羊羔献祭的做法还因为同逾越节紧密联系而显得更重要、更规范化。《出埃及记》第12章记叙了逾越节的规矩:“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会众: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再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都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楣和门框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时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世代永远的定例。”跟逾越节的情况相适应,一切头生的人和牲畜都应归耶和华。羊羔在以色列早期游牧生活中,主要献为燔祭,现在由于同逾越节这个出埃及的大事相联系,就获得了“赎罪”的含义。

由于犹太教与希伯来人的游牧生活紧密联系,所以又有以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比之于牧羊人与羊羔的关系,

因此，“羔羊”又有了“群众”的含义。《以赛亚书》记道：“他必象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臂膀聚集羊羔抱在自己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海尔曼 (Lillian Hellman, 1905 —)

美国犹太女剧作家。生于路易斯安娜州的新奥尔良。少年时代在纽约度过，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大学。三年后在一家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起初尝试书评和小说方面的写作，然而，其文学才华却在戏剧创作中得到最终展示。1934年，她的第一部剧作《孩子们的时间》搬上舞台，在百老汇引起轰动，使其一举成名。稍后，去欧洲游历。欧洲法西斯的种种暴行使她成为一名反法西斯人士。她以自己的笔，谴责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阵营对欧洲人民和犹太人的种种迫害，公开宣布自己不仅是作家，更是个犹太人，要与反犹太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与此同时，她的作品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批评倾向，越来越多地揭露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为此，她曾在50年代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在她一系列剧作中，《小狐狸》(1939)、《守望莱茵河》(1941)、《搜索的风》(1944)、《森林的另一边》(1946)都是些有影响的作品，享有较高的声誉。她的剧作对话活泼、情节真实、结构严谨、布局精细，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秋天的花园》(1951)则反映了她对戏剧结构技巧的掌握。

海尔曼还善于翻译和改编他人作品。著名作家阿努伊的《云雀》、伏尔泰的《老实人》、布莱希曼的《多少?》经她翻译和改编、布局愈加巧妙，情节引人入胜，深受观众欢迎。此外，她还著有回忆录三部。她的勤奋、成功终使其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剧作家之一。



海尔曼

海法 以色列东北的港口城市和海法区的首府，临地中海的海法湾。1989年有人口22万5千人，是以色列位于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之后的第三大城市。

海法自古代就有人居住。最早记载于《塔木德》中。1100年被十字军占领后，被称为“凯法”。后又被穆斯林

夺回。1799年被拿破仑率法军攻陷。1839年埃及的易卜拉欣帕夏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夺取海法，但在欧洲列强的干预下，又被迫交还给土耳其。1918年被英国占领，1922年正式被划入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本世纪初以来，由于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的汉志铁路与海法连通，深水港的建成以及伊拉克北部油田的输油管道以这里为终点，海法的地位日益重要。由于它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在1948—1949年巴勒斯坦战争中，犹太武装哈加纳与阿拉伯人进行了对海法的激烈争夺。1948年4月阿拉伯人投降。战前海法有阿拉伯居民5万人，多数在战争中逃离，战后只剩下3千人。现在海法除主要有犹太人外，还有穆斯林、阿拉伯基督教徒(主要为马龙派)以及巴哈教徒。

海法的港口区濒临海湾。居民区和商业区在卡尔梅勒山坡，山顶有漂亮的住宅和许多豪华旅馆，可以俯视海湾的美丽景色。城市的两个部分之间有1959年建成的地下铁道连接。1933年建成的深水港现在承担着以色列主要的进出口任务。海法地区现在也是以色列最主要的工业区。重要的工业项目有铸钢、食品加工、造船(各种小型船只和军舰)、化工、纺织、水泥、炼油(主要是炼从埃拉特用管道输来的伊朗原油)和电力。在卡尔梅勒山上有以色列最大的实用技术研究中心——以色列科技大学和1963年建立的海法大学。海法还有海运博物馆(1954年建)和众多的公园和花园，其中最著名的是波斯花园，内有巴哈教创立者巴哈·阿拉之墓。海法亦是巴哈教世界总部所在地，有著名的巴哈教大教堂。

海法大学 以色列一所高等学府，由海法市市长及市政厅根据以色列北部地区的教育需要于1963年创建。初创时期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提供学术上的援助。1972年起，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它在学术上完全独立。学校使用希伯来语授课。海法大学特别重视促进和发展教学和研究。拥有多种研究机构和研究活动中心，供研究人员作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场所。为使以色列北部地区更多的人能有上大学的机会，海法大学在好几个城市设立了分校。如：奥朗尼姆基布兹教育学校，设在吉兹利尔谷地的奥赫尔·萨拉赫学院，设在上加利利的特尔·海学院等。

海法大学是一所自立公助、非营利性大学。它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以色列政府。其余来自学费及国内外校友会的捐赠。学校管理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负责制定和执行教学大纲，并选举出校长。有关学术方面的事务则由最高学术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的教员和学生代表组成的评议会负责处理。

海法大学有全职和兼职教授、讲师和教员700多人。学生注册人数1987—1988学年为6452人，包括700多名毕业生和两个分校的学生。1967—1988年，海法大学共授于10228名初级学位(学士)，948名中级学位(硕

士),12名高级学位(博士)。另外,还给1432名教师培训生和149名图书馆学培训生颁发了毕业证书。

海法大学设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系。另有三所分校和两所附属学校。还有许多下属研究机构和档案馆。其中包括:盖斯塔夫·海纳曼中东研究所、戈兰研究所、犹太阿拉伯研究中心、R·D·沃尔夫心理压力研究中心、自然资源和环境研究中心、利昂·雷凯纳蒂海事研究中心,以及艾巴·豪当档案馆、德鲁兹档案馆、以色列民间故事档案馆。

海泽 (Paul Johann Ludwig von Hegse, 1830—1914) 德国犹太作家,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于德国柏林,母亲是犹太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文化熏陶。17岁从文科中学毕业,在柏林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和哲学。1848年,加入库格勒为领导的柏林文学团体“斯普累河上的隧道”,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1852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去意大利,对罗马和古典文学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进行了深入考察。次年,应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之召,前往慕尼黑,与盖勃尔成为“慕尼黑诗社”领导人。在他们的倡导下,该社崇尚古典主义,排斥现实主义。

1853年,海泽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倔强的女性》发表,给他带来文学声誉。在随后的40年中,他创作了120多个中短篇小说,20部剧本和大量诗歌。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爱情为题材,以理想主义手法表现存在于他个人头脑中的美好理想。他的作品经常以回忆追述的手法来开头结尾,给人们带来一种留恋过去,缅怀往事的感觉。他的主要作品有《愤怒》(1855)、《特雷庇的姑娘》(1858)、《安德里亚·德尔芬》(1862)、《世界的孩子们》(1873)以及《天地之爱》(1885)等。19世纪90年代,德国现实(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兴起。海泽的作品由于矫揉造作,开始遭到读者的冷落。然而,他在知识界读者中仍享有很高声誉。191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所显示出来的渗透着理想的非凡的艺术才能”。

海格尔 (Abraham Heiger, 1810—1874) 德国拉比,犹太学学者,犹太教改革派的领袖之一。自幼接受传统的犹太教育。从1829年起,在海德堡和波恩学习希腊和东方语言。1832年成为拉比,在犹太会堂祈祷中推行改革。1835年创办了《犹太神学科学杂志》(1835—1847),力图对犹太教改革作出科学论证。他的观点的基础是宗教进化发展的原则和对传统犹太教的激烈批评。1836年他写道,改革运动的目的是完全取消《塔木德》,而是重新评价对《圣经》的态度。他认为必须摒弃表现返回锡安和复兴犹太民族希望的一切祈祷,应该消灭犹太教中民族自我隔绝的所有痕迹,把作为最崇高的宗

教理想体现的犹太教,变成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他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拉比代表大会上激进派最著名的代表,是1869—1871年德国改革教会事务协商会议的领导者之一。

尽管海格尔的观点很激进,但是他的实践活动要温和得多。他领导了弗劳兹拉夫(1843)、法兰克福(1863)和柏林(1870)的改革社区。1872年在他的参与下,柏林创立了犹太学高等学校,他任该校校长直至去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变得较为温和,因为他不愿意犹太教中发生分裂,预防它同基督教相接近,他对基督教持严厉批评的态度。1860年他反对在改革派会堂的公开祈祷中取消希伯来语。他拒绝把安息日移到星期日,虽然准许按照犹太教改革派先锋的例证(雅可布森,1768—1828),在安息日的犹太会堂祈祷中使用乐器,并取消了按照传统概念在安息日不允许从事许多工作的禁令。海格尔作为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海涅 (Heinrich Heine, 1797—1856) 德国诗人,散文家和政论家。生于一个充满自由思想、但遵守犹太传统的家庭。父亲参孙·海涅(1764—1828)是个不走运的商人,对子女的教育影响很小。子女的教育由具有教养的母亲贝蒂(1771—1859)负责。海涅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拿破仑战争。1815年拿破仑兵败,父母要海涅经商。他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银行和汉堡他的叔父所罗门·海涅(1767—1844)的银行工作。叔父决定把海涅培养成律师,就资助他在波恩、柏林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1819—1825)。海涅也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不过,波恩大学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文学史课程(1819—1820)和柏林大学黑格尔的哲学课程(1821—1823)比法学课程更使他感兴趣。在柏林法恩哈根·封·恩泽(1771—1833)的沙龙中,海涅同伯尔纳和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未来的领袖们关系密切。182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同时成为犹太文化科学协会成员。这些年他开始撰写中篇小说《巴哈拉赫的拉比》(1840年完成),内容是13世纪犹太人受迫害的故事。

1825年海涅接受基督教洗礼。从1826年起,他潜心文学创作。他的《歌集》(1827)和《旅行记》(1—4卷,1826—1831)引起读者的激赏,对欧洲文学产生明显影响。《歌集》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反映出诗与现实的矛盾。海涅运用浪漫主义的嘲讽的手法,使梦境破灭,正视现实,包含着对社会的批判。4卷集散文《旅行记》,从《哈尔茨山游记》到《英国片断》,涉及的范围很广,反映作者的思想在进步,战斗的自觉性在加强。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使海涅生活发生重大变化,1831年他移居巴黎,这期间除两次(1843和1844年)短暂地返回汉堡,一直在那里度过余生。在巴黎,海涅与巴

尔扎克、贝朗瑞、柏辽兹、肖邦、大仲马、雨果、李斯特、乔治·桑等人结识，与圣西门的信徒交往。他还和马克思、拉萨尔结下了友谊。他在德、法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使他作为一个政论家在欧洲享有声望。这些年代他的政治诗《新诗集》(1843—1844)、《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1843)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既有强烈的政治性，又有很高的艺术性。他自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一部诗体的旅行记，它将显示出一种比那些最著名的政治鼓动诗更为高级的政治”。1844年西里西亚爆发纺织工人起义，海涅写了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恩格斯称赞这首诗说：“德国当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个亨利希·海涅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发表了宣传社会主义的诗歌。”



海涅

海涅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态度极其复杂。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后来是泛神论者，他憎恨一切宗教，否定犹太教，特别是因为从犹太教内部产生出他所厌恶的基督教。可是，他的下述箴言又充满自豪感：“《圣经》是犹太人的袖珍祖国。”“如果为出生而自豪，并不同革命战士相抵触，不同我的民主信念相抵触，那么，我为我的祖先出生于高尚的以色列之家而自豪……”

1848年，海涅的病情恶化。5月以后完全瘫痪，在被他称为“褥垫墓穴”的病床上躺了8年之久。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写作，口授完成诗集《罗曼采罗》，于1851年出版。他还写了一些散文作品，除《自白》(1854)外，还把40

年代为奥格斯堡《总汇日报》写的通讯精选成集，题为《卢台奇亚》(巴黎的拉丁文别名)。

和另一位德国犹太作家伯尔纳不同，海涅总是敏锐地感到自己是犹太人，这一点可以解释他创作的许多特征。他洞察德国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深层，真诚地关心德国的命运，始终从普遍的人道主义立场看待德国的事情，并用全人类的尺度衡量它们。海涅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歌和散文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文艺界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是，反犹太主义者和纳粹分子首先把海涅看成一个犹太人，然后再是诗人。纳粹分子把海涅的著作从图书馆中清理出去，并付诸一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恢复了海涅著作的出版。

海勒 (Yom Tov Lipmann Heller, 1579—1654)

拉比、犹太教学者、《密西拿》评注家。生于德国的巴伐利亚。青年时代去布拉格师从本贝扎雷。18岁时，就被任命为拉比犹太教的法官。1625年，担任维也纳拉比犹太教法庭庭长。两年后，被召回布拉格，当选为该地区大拉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战争耗费巨大而对波希米西境内犹太人课以重税。他因负责监督征税事务，引起犹太社团反对，后受人诬告蔑视国家和基督教，被罚巨款并遭短期监禁，剥夺担任拉比资格。从1631年起，在波兰境内任拉比，又引起争议。他在被称为“四省会议”的拉比大会上竭力主张恢复禁止买卖拉比职位的法令，遭到富有犹太人的反感，最终被驱逐出境。1643年，出任克拉科夫大拉比，并领导当地犹太经学院工作，直至逝世。1648至1649年发生在契米尔尼基的屠杀犹太人事件给他以很大的打击，为此写下了许多忏悔作品。

海勒的声誉主要在犹太教研究方面，特别是对《密西拿》的评注。他的主要著作是《我的补充》(1614—1617)。在作品中，他提出了对《密西拿》语言的界定，建立了正确阅读法，对《密西拿》文本矛盾之处作出了相应的解释，指出著名《密西拿》评注家贝尔蒂诺罗对《密西拿》评注的出处。该作品所包含的精深知识，加之由文体明晰的希伯来语写成，使得该作品广为流传。现在在大多数《密西拿》版本中，都可，以及其他对亚设法典的评注等作品。他的自传则生动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犹太社团的生活和历史。

流奶与蜜之地 《希伯来圣经》的比喻，意指丰饶之地。源出于《创世记》中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出埃及记》记载的古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进入迦南之事。上帝选召摩西领导以色列民出埃及时，上帝对摩西说：“要将他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指迦南地，即今巴勒斯坦。该地处于约旦河西、地中海东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故在后世语言中，“流奶与蜜之地”通指丰饶之

地或希望之乡,又因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迁入迦南地时,上帝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流奶与蜜之地”和迦南亦称“应许之地”。

流便 (Reuben) 希伯来族长。以色列民族始祖雅各 12 个儿子之一,12 支派中一支派的祖先。据《创世记》载,流便是雅各的长子,为第一个妻子利亚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流便”的希伯来文意为“看!儿子”。他曾反对众弟兄谋害弟弟约瑟的阴谋。当约瑟被众弟兄卖给以实玛利人带走时,他因悲伤而撕裂衣服。后来雅各众子因饥荒赴埃及买粮时,流便最先因早年出卖约瑟的过错而痛悔。但流便在生活中不检点,行为放纵。雅各临终时预言他及他的后裔时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众,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流便生有四子,其后裔形成流便支派。流便的后裔中没有出过领袖人物。

流便支派 古以色列 12 支派之一。雅各与利亚所生的长子流便的后裔。在西奈旷野时已形成 4 族,即哈带族、法路族、希斯任族和迦米族。可拉一党反对摩西、亚伦作乱时,流便的孙子以利押之子大坍、亚比兰支持可拉。摩西对他们采取了极严厉的惩罚措施。约书亚率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后,流便支派分得死海以东地区,包括亚嫩谷边的亚罗珥和谷中的城,靠近米底巴的平原,希实本平原及亚摩利王西宏的王国全地,即约旦河和靠近约旦河的地区。流便支派与同住在约旦河东的迦得支派、玛拿西支派曾在约旦河边筑了一座高大的祭坛,遭到其他支派人的反对,并准备出兵讨伐他们。但在得知他们筑坛不是悖逆耶和华,而是为了向耶和华献祭,就消除了误会,与他们言归于好。流便人、迦得人给这座祭坛起名为证坛,意为: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公元前 933 年统一王国分裂,流便支派和北方其他 9 支派组成北国以色列。公元前 722 年,北国为亚述所灭,该支派被流放到亚述,逐渐为异族同化不再见于史册,成为希伯来历史上的“丢失的 10 个支派”之一(参见“丢失的 10 个支派”)。

流便尼 (David Reuren, 生卒年代不详) 犹太冒险家。可能出生于德国。自称是美索不达米亚哈伯尔沙漠中一犹太人国家的亲王,是失踪的古代以色列流便支派后裔,故名为流便尼。历史上最早记载此人为 1522 年。当年,他宣称他有一则重要信息要向欧洲基督教会统治者转达。他还声称,只要基督教会向他提供武器,他将率领其兄——哈伯尔王的 30 万军队攻打驻扎在巴勒斯坦的土耳其人,收复圣地。尽管他的狂言为犹太人怀疑,然而,当他于 1524 年到达罗马时,却受到教皇克雷芒七世的欢迎和接待。一些富有的犹太家族开始接受他的观

点,并送他大笔礼物。1525 年,他带着教皇写给葡萄牙国王的荐函,前往葡萄牙,受到约翰三世的热情接待。在葡萄牙,他结识了随父母改信基督教的葡萄牙犹太人摩尔科。摩尔科仰慕他的神圣气度,重新信奉犹太教。摩尔科以流便尼信徒身份四下演说,激发犹太人期望弥赛亚降临人心,流便尼遂被人们看成是新时代的预言先知。然而,他的活动引起了葡萄牙当局的怀疑和不满,他被指责图谋不轨,试图煽动犹太人起来推翻基督教会,因而被迫离开葡萄牙。几年后,他辗转来到意大利,与已在那里宣传弥赛亚即将临世的摩尔科会合。1532 年,两人一同到德国的雷根斯堡谒见在该地召开议会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力促查理武装犹太人进攻土耳其。谁知事与愿违,两人因怀疑而遭逮捕,后被引渡给曼图亚异端裁判所处置。摩尔科死于火刑,流便尼被投入西班牙境内一监狱,约在 1538 年死亡,被怀疑是毒杀。

有关流便尼的身世,除了当时一些信件有所提及外,主要来源于被认为是他本人用希伯来语写的日记。他的真实姓名和籍贯均无人知晓,一些学者认为他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犹太人。

流珥 (Reuel) 摩西的岳父。“流珥”一词希伯来语意为“上帝之友”。当年摩西为同情他的同胞希伯来人,打死了欺负他们的一个埃及人,因此从埃及逃到米甸,在牧地里遇见米甸祭司流珥的女儿们,摩西帮助她们打水饮羊,于是摩西被邀到流珥家里,流珥看上了摩西,就把女儿西坡拉给摩西为妻。根据此处记载,摩西的岳父叫流珥。但是在《出埃及记》第 3 章第 1 节却记:“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接着记载摩西看见火烧的荆棘,上帝借此异象选召摩西担负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重任。此处摩西的岳父是米甸叶忒罗。《圣经》更多地方摩西的岳父是叶忒罗。《圣经》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出自不同的底本。用“流珥”的是《耶典》底本;用“叶忒罗”的是《神典》底本。(参见“叶忒罗”)

诺尔道 (Max Nordau, 1849—1923)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原名西蒙·马克西米利安·修德费尔德。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犹太拉比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犹太文化熏陶。青年时代学医。1880 年起在巴黎定居开业行医,成为当时一著名医生(在定居巴黎时,开始使用现名)。他一生酷爱知识,常在行医之余著书立说,发表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见解。发表的著作有政论文章、游记、小说、剧本、评论等。

诺尔道对 19 世纪末欧洲出现的反犹主义深感不安。1894 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对他触动很大。他开始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第二年,他与赫茨尔结识。在随后的 11 年中,两人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友谊。1897 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期

间,他发表演说,介绍世界犹太人的处境,同时积极参与《巴塞尔宣言》的起草工作。大会结束时,他当选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副主席,直接协助赫茨尔从事宣传、组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03年,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他慷慨陈辞,支持赫茨尔提出的“乌干达计划”。为此,遭到了一个坚决反对这一计划犹太青年的刺杀。尽管刺杀行动未能成功,他身上还是留下了枪伤。

1904年,赫茨尔逝世,他拒绝担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席职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遭到法国政府驱逐,而来到西班牙。大战结束后,他提出了一个把60万在乌克兰遭受集体迫害的犹太人移至巴勒斯坦的计划。在这一计划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务实派拒绝后,他断绝了与运动的关系。在他逝世的若干年后,他的遗体才被重新安葬在特拉维夫。

朗道 (Lev Davidovich Landau, 1908—1968)

苏联犹太物理学家,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生于巴库。1922年进入巴库大学,1924年转入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毕业前就发表论量子力学方面的论文。1929—1931年去国外研究访问,先后结识了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包括玻尔、泡利等人。1930年,创立了著名的电子抗磁性理论。1931年回国,在列宁格勒理工学院等校执教。1934年,被授予博士学位。1935年起,负责哈尔科夫大学物理学讲座,创立了苏联理论物理学派,使哈尔科夫大学成为国内著名理论物理研究中心。1937年,去莫斯科,任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部主任。1937—1939年,他因犹太人身份,被当局囚禁两年。1941年,他创立了一种液氮的超流体的理论,1946年,又创立了电子等离子体振荡理论。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几乎涉及物理学的各个方面,并在每个研究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1962年,因在相变理论和超流体理论方面的成就,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朗道早在1946年就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随后屡屡获奖,苏联国内重大奖几乎获遍。他还获得许多国际荣誉,成为丹麦、荷兰、英国、美国等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或成

员。他一生著述甚丰,出版著作达120余部之巨,不少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流传。

1962年,他不幸因车祸受重伤,一直未能全愈。

朗道埃尔 (Gustav Landauer, 1870—1919)

德国哲学家和作家。生于犹太富商家庭。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日尔曼学。大学生时代在普鲁东和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下,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独立的杂志《社会主义者》的编辑。1893年曾因被指控教唆叛国,1899年由于无政府主义活动而两次被捕。他与自己的朋友M·布伯一起于1914年6月参加左翼知识分子小组,企图建立预防战争的国际协会。1919年应邀担任巴伐利亚革命政府的人民教育部长,但是很快因为同共产党的战略有分歧而离职。这个政府被推翻后,他被反革命士兵打死。

朗道埃尔写过许多小说,翻译过文学名著,他还是著名的戏剧活动家:柏林“人民剧院”的创立者,戏剧导演和戏剧刊物的编辑。他去世后出版了关于莎士比亚的讲义(2卷本,1920年)。

朗道埃尔是“文化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这种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人道主义、个性的价值和自由,以及宗教神秘主义的革命概念,他不仅把革命看作为社会政治变革,而且看作为造就人的过程。按照他的观点,社会主义可以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夺取国家政权,而是凭借先锋者榜样的力量来实现,先锋者在旧社会内部建立了新的集体生活形式。他的这种社会主义概念,特别是他关于新社会是独立社区的联盟(独立社区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从事经济活动并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思想,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左翼(青年工人,锡安青年)和第三次阿利亚的许多代表产生过明显影响。在M·布伯和自己的第二个妻子的影响下,朗道埃尔改变了先前对犹太教的否定态度,开始对犹太问题感兴趣。M·布伯高度评价朗道埃尔作为思想家的成就,收集了他的论著,在他死后陆续结集出版。

十一画

教经胡同 位于开封市顺河回族区草市街北头路东的胡同名。该胡同因与开封犹太人历史有渊源而被认为是中国犹太人的一处历史遗迹。目前所称教经胡同实为两条东西平行街道。南面的一条称南教经胡同，北面的一条称北教经胡同。南教经胡同西起北土街，东至草市街，长 272 米，宽约 6.6 米，北教经胡同东起草市街，西至公教医院后墙，长 177 米，宽约 8.3 米。两街之间间隔约 40 米。占地面积约 7 千平方米。这两条胡同原是开封犹太会堂的一部分，属于前院和中院；犹太会堂的后院，即保存希伯来文《托拉》的场地，今为开封公费医院后院。犹太人定居开封后在教经胡同一带建犹太会堂，胡同周围地区便成为犹太人的聚居地。直到明末清初，开封犹太人中的赵氏、石氏、李氏、张氏和艾氏等家族仍在教经胡同及其附近地区居住。现赵氏和石氏家族的支系仍在胡同内居住。

历史上，教经胡同曾有过不同名称，明代(1368—1644)称线儿李家胡同，清代(1644—1911)称挑筋教胡同(南北两条)。1910 年绘制的开封市政图仍沿用这一名称。民国初年因嫌街名“不雅”，而改称现名。

萨皮尔 (Pinhas Sapir, 1909—) 以色列政治家。原名考斯劳斯基，生于立陶宛。1929 年来到巴勒斯坦并成为一名农业工人，后参加巴勒斯坦工人党并长期担任党的中央委员。1937—1947 年任梅高罗特公司副经理，该公司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最大的自来水公司。1949—1955 年先后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1955 年 11 月—1965 年 5 月任工商部长，1959—1974 年当选为议会议员，1963 年 6 月—1968 年 8 月、1969 年 12 月—1974 年 6 月两度担任财政部长，1968 年 8 月—1969 年 12 月任不管部长，1974—1975 年逝世时止任犹太代办处主席。他还曾担任以色列工党总书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倡导计划经济、普遍的社会福利等由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1967 年战争后，他认为长期统治以占领土上的 100 万阿拉伯人不符合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主张以色列尽早结束对大部分以占阿拉伯领土的占领。

萨尔诺夫 (David Sarnoff, 1891—1971) 美国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业先驱。生于俄罗斯。自幼接受传统犹太教育，少年时渴望成为一名犹太拉比。9 岁时随家人

移居美国。家境贫寒，从小边上学边打工，以贴补家用。15 岁因父亲去世，不得不离开学校，在一家电报公司当送报员。对无线电报的兴趣使他很快掌握了莫尔斯电码操作方法。几年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电台的收发报员。1912 年 4 月 14 日，他收到正在沉没中《泰坦尼克号》船发出的遇难信号，迅速把这一消息送发出去，并在随后的 72 小时内不间断地接受这方面的消息，一时成为新闻人物，受到所在公司嘉奖。1921 年，出任新成立的美国无线电公司总经理。为了显示无线电的巨大作用，他实况转播了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拳击赛，轰动一时。三年内美国无线电公司售出了价值 8000 万美元的收音机，获得巨额利润。他于 1930 年任该公司总经理，1947 年出任董事长，成为美国无线电工业巨头。1926 年组织全国广播公司，亲自担任公司总裁。1928 年又创办试验性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并在 1939 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利用电视技术取得成功。尽管电视事业的发展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的名声却不断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参谋部服务，任通讯顾问，由于其杰出的服务，被提升为准将。战后继续领导美国无线电公司，直至 1970 年退休。

萨尔诺夫作为美国无线电和电视事业的先驱，曾在该领域中创下了若干第一。首先他是第一位出任无线电台台长的犹太人，其次他是转播美国政治集会、棒球比赛、美国足球赛、拳击比赛的第一人。此外，他还率先组织向美国听众和观众实况转播音乐会、戏剧演出，为普及无线电和电视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人们的生活从此不再寂寞。

萨克斯 (Nelly Leorvie Sachs, 1891—1970)

瑞典籍犹太女诗人，剧作家，1966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生于德国柏林。父亲是个富有的犹太工厂主兼发明家。1933 年，因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而隐居了 7 年。1940 年，在她丈夫和孩子惨遭屠杀，自己即将要被送入集中营时，她在文友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人的帮助下逃出德国，来到瑞典，并成为瑞典公民。此后，她一直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直至病逝。

萨克斯 17 岁开始写诗，1921 年处女作诗集《传说和故事》发表。亡命瑞典后，她在从事瑞典现代诗歌的德文翻译的同时，继续创作，但其作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问世发表。1964 年诗歌选集《在死亡的寓所中》在柏林出版，1949 年，诗集《星辰黯淡》在荷兰发表。后来发表的诗集还有：《无人再知晓》(1957)，《进入无尘之境》(1961)，《死亡依然在今生》(1961)，《炽热的谜语》(1964)，和《寻找生存者》(1971)。此外，她还写下了一些剧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艾利：以色列苦难的奇迹剧》，该剧写于 1943 年，于 1951 年出版，并被搬上舞台。

萨克斯的创作受到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纳粹主义

势力对犹太人迫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影响。迫害、集中营、流亡、死亡是她诗歌的主题。在她的名篇《啊!烟囱》中,诗人把犹太民族比喻成一个受害者的躯体,他的身上飘流着从纳粹死亡集中营里飘出来的清烟。她那一篇篇充满强烈民族感情的控诉德国法西斯暴行和反映犹太人不幸命运的诗篇,使她成为大战劫后余生欧洲犹太人的代言人。

萨克斯一生以德语创作,到了60年代,已成为欧洲公认的一位杰出诗人。她的诗歌简朴精炼,充满种种象征和意象,并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1965年,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协会的和平奖。1966年,与以色列作家阿格农一道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萨阿迪亚·本·约瑟 (Sa'adia ben Joseph, 882

—942) 中世纪犹太评注家、哲学家。通称萨阿迪亚加昂,阿拉伯名赛义德·伊本·优素福·法优密。生于埃及。从小致力于犹太经典和世俗知识的学习。20岁时发表希伯来—阿拉伯语辞典一部。23岁与卡拉派发生冲突离开埃及。在巴勒斯坦太巴列居住一段时间后,又迁居巴比伦。他曾与巴勒斯坦加昂阿伦·本·梅厄就犹太历法发生争执,为此撰写了《辩别》一书,为传统犹太历法辩护。该书论述有力,其观点终为大多数犹太人所接受。928年,巴比伦犹太领袖大卫·本·撒该任命他为苏拉学院院长。在任期间,对《塔木德》经典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著作若干。在他的领导下,苏拉学院恢复了原有的声誉,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的学生,巴比伦以外的犹太社团纷纷就有关律法问题请教苏拉学院。两年后,他与撒该就一项诉讼意见分歧,两人关系决裂。撒该运用其影响将萨阿迪亚革职,萨阿迪亚虽进行了反击,但最终被迫隐居。七年后,在犹太长老的调解下,两人捐弃前嫌,重归于好。萨阿迪亚再次出任苏拉学院院长。

萨阿迪亚在隐居期间潜心于学术研究,完成了著名的哲学著作《信仰和评价之书》。该书受到希腊哲学和伊斯兰哲学唯理派的影响,旨在以理性方式说明犹太教的神学观念,被视为中世纪前期最有影响的一部犹太哲学著作。在语言学方面,他完成《语法》和《70个独见词的解释》两部著作。他还撰写了大量对《圣经》的评注,并将《圣经》译成阿拉伯文,为中世纪不识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提供了学习《圣经》的机会。时至今日,也门的犹太人仍使用他的译本。他的一生是在与卡拉派和二元神学的诺斯替派斗争中度过的。他对犹太教和犹太传统的坚决捍卫,将犹太学术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迈蒙尼德曾指出:若不是萨阿迪亚,《托拉》很可能早就从犹太人手中消失。可见其贡献之大。

萨缪尔森 (Paul Anthony Samuelson, 1915—

) 美国犹太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生于印第安纳加里,父母均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青年时代就聪明过人,善于思考,15岁入芝加哥大学专攻经济学。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一年后获硕士学位,1941年,获博士学位。学习期间,深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影响,后来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凯恩斯主义研究基础上,被人们称为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学派。1939年,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发表,首创经济波动的模式。1940年,他去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次年,发表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经济理论运算的重要性》。1945年,在美国战时生产局和战争动员重建办公室供职,并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1947年,他的论著《经济分析基础》发表,标志他作为一名著名经济学家地位的确立。书中对经济学中的三大部分: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进行了全面论述,一时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此后,他多次在政府主管经济部门供职,出任美国总经济顾问。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和美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1966年,他的论文集出版。197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美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经济学家。

70年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表现不佳,他的理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影响也日益缩小。

勒韦 (Otto Loewi, 1873—1961) 美籍德国犹太医师、药理学家,1936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生于德国法兰克福。青少年时代只对艺术发生兴趣,只是为了顺从父母意愿,才于1891年进入施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学习。第一位吸引他对科学发生兴趣的是他的大学导师、著名内科教授瑞宁。1896年毕业后,先后在欧洲及美国一些大学任教或从事研究。1921年,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当药理学教授,开始从事神经学研究。通过对青蛙迷走神经的试验,第一次证明某些神经合成的化学物质可将刺激从一个神经细胞传至另一个细胞,又可将刺激从神经元传到应答器官。他把这种化学物质称为乙酰胆碱。1929年,他的朋友戴尔从动物组织中分离出该物质,并证实为乙酰胆碱。1936年,他因化学传递的发现与戴尔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纳粹占领奥地利后,他遭到当局逮捕、关押,在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后,把他赶出德国。他先到比利时,后到英国,1940年,前往美国,并加入美国籍。移居美国后,他主要在纽约大学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长达15年之久。对糖尿病及洋地黄和肾上腺素的作用进行的研究使他成功地设计出了检测胰脏疾病的勒韦氏检验法。

勒宾森 (Micah Joseph Lebensohn, 1828—1852) 希伯来语诗人。生于俄国一个名叫克尔蒙兹

的小镇。其父是一位近代著名希伯来文学家，启蒙运动倡导者。从小受到父亲影响，努力奋发，具有较高的哲学和艺术知识，并精通德语。他在柏林听过谢林的自然哲学课程，十分敬佩和推崇席勒的诗歌。青年时代与希伯来著名学者聪茨和扎克斯结识。在他们的影响下，努力从以色列历史中撷取诗歌创作题材。由于肺病染身，这位天资聪颖、才华横溢的诗人在 24 岁就离开人世。他的一生主要留下 2 部作品。第一部作品《锡安山女儿的诗》由 6 首长诗组成，题材选自古代和中世纪犹太历史。其中的《所罗门与传道书》和《雅亿与西西拉》写得十分动人，充满对锡安的爱。在作品的序言中，他写道：“神圣的祖国即使正被别人主宰，它仍然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以泪和血汇成的河，换来了这块神圣的土地。”第二部作品《锡安山女儿的吉它》是一部短诗集。其中有对大自然和爱情的歌颂，也有对不幸和疾病的哀叹。还有一部分是他人诗歌的译作。他的情诗，把深沉和细腻、苦涩和甜蜜、卤莽和放荡糅合在一起，是一种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自近代希伯来文学兴起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名副其实的情诗。

此外，勒宾森还留下一部名为《特洛伊城的毁灭》的译著。该作品译自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中叙述木马计导致都城陷落部分。

基土拉 (Keturah) 古希伯来人名，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妻子。基土拉可能是亚伯拉罕在迦南所娶，给他生了心兰、约珊、米但、米甸、伊施巴和书亚。约珊生了示巴和底但，底但的子孙是亚书利族、利都是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亚伯拉罕在其晚年把一部分财产分给庶出诸子，趁自己还在世时，打发诸子离开以撒往东方去。这些庶出诸子大约即今阿拉伯沙漠和东方各游牧部落的祖先。其中米甸人最为著名。米甸人与后来以色列的关系颇为密切。据《希伯来圣经》记载，摩西在埃及时为逃避法老迫害，曾逃居米甸部落相当长的时期，并娶米甸祭司叶忒罗之女为妻。在汛的旷野，叶忒罗向摩西献策，从以色列人中挑选长老，管理以色列人。后来米甸人一度强大，侵入迦南压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士师基甸领导下彻底击败米甸人，逐出其势力。

基大老玛 (Chedor-laomer) 古以拦王。《创世记》第 14 章载：“四王与五王战”，其中四王是示拿王暗拉非、以拉撒王亚略，以拦王基大老玛、戈印王提达。五王则指迦南诸王。据考证，示拿王暗拉非即古巴比伦王汉谟拉比，由此推断以拦王基大老玛也是公元前 18 世纪的历史人物，而且是约旦河以东一个强有力的王，几乎可以与暗拉非相匹比。亚伯兰家族此时正在迦南地活动，其侄罗得与亚伯兰分开，向巴旦亚兰平原发展，并长期居留约旦河以东的著名古城所多玛。迦南王在西订谷(今死海)会

盟，企图摆脱基大老玛的控制，基大老玛遂联合其他三王在西订谷与五王战，四王战败五王，掳掠蛾摩拉、所多玛等城，罗得族人及其财产也在基大老玛掳获之列。消息传来，亚伯兰就率领家里的精练壮丁 318 人一直追到但。夜间，亚伯兰同仆人分队击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何把，将被掳的一切财物，连他侄儿罗得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都夺了回来。根据《圣经》对亚伯兰这次追击战的描述，他追击基大老玛，一直追到大马色左边的何把，那么基大老玛的基地极有可能在大马色附近，也就是说，他是古代叙利亚地区的一个统治者。

基大利 (Gedaliah) 古希伯来人物名。分国时期犹大约西亚王时文士沙番的孙子，亚希甘的儿子。耶路撒冷陷落后被尼布甲尼撒任命为犹大省长，不久被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领 10 人所刺杀。公元前 586 年，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进行掳掠。公元前 581 年，尼布撒拉旦再度前来掳掠。巴比伦人彻底摧毁了城墙和圣殿，犹大上层人物和富人全部被掳往巴比伦，只留下些民中最困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基大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命担任犹大省长的。当时的犹大国人的确面临着能否作为一个民族继续生存下去的严峻考验。为了保护犹大留守者的最后一线生机，基大利采取了迎合巴比伦的和平政策。但他却引起巴勒斯坦保守犹太人的不满，最后他在一次内部政变中被刺身亡。

基大利斋日 犹太教次要节日。纪念基大利被杀事件，日期为提斯利月初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灭亡犹大国，摧毁圣殿后任命犹太人基大利为省长，负责管理已遭毁坏的原犹大国国土和未被掳走的人民。基大利虽顺从巴比伦国统治，但却支持先知耶利米的政治主张。基大利任省长一事实上使犹太人在国家灭亡后获得了一种自我管理的自主地位。然而，基大利就任不久，便为王室贵胄以实玛利所刺杀。基大利被杀一事不仅导致原犹大国地区由撒马利亚人直接管辖，犹太人自主地位丧失，而且使当时尚留在犹大境内的犹太人大批逃往埃及，而这批进入埃及的犹太人后来又下落不明，成为一历史悬案。基大利斋日是犹太人流亡后的第一个禁食日。时至今日，正统犹太教徒仍要在这一日到来时禁食一天。

基比亚 古犹太地名。约书亚率以色列人进占迦南后分给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城镇。位于耶路撒冷城北约 6 公里处，靠近拉玛及通往示剑的大道。俗称“便雅悯的基比亚”。因希伯来文原意为“山”，故又叫“上帝的山”或“上帝的基比亚”。扫罗曾在此居住，故又名“扫罗的基比亚”。扫罗称王之后重又居于此。该城是扫罗与非利士人争战时的战略要地。据《撒母耳记下》第 21 章记载，大卫曾在此将扫罗的 7 个儿子交给基比亚人处死，悬挂在山上，以

平息基比亚人对扫罗统治的怨恨。

基比顿 古希伯来地名，但族平原上的一座城市，确切位置不详。约书亚率以色列人进占迦南后，将此城分给歌辖族的利未人，后来被非利士人占领。分国时期，耶罗波安之子，北国以色列的第二代王拿答攻打此城时，被以萨迦支派的巴沙杀害，接着巴沙剿灭了耶罗波安全家。巴沙死后，传子以拉，部下心利刺杀以拉，也消灭了巴沙全家。心利此举不得民心，元帅暗利率兵围困首都得撒，心利在宫中自焚，只作王7日。暗利上台，建立北国第一个较稳固的暗利—亚哈王朝，传王四代，历时45年，公元前843年，才被耶户王朝所取代。

基什尼奥夫事件 1903年4月6日发生在俄国基什尼奥夫的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基什尼奥夫现为摩尔多瓦首都。1812年它作为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归属俄罗斯。自1818年起为比萨拉比亚省中心。1897年基什尼奥夫的犹太人超过5万(占全市人口的46.3%)。根据犹太垦殖协会的资料，1898年基什尼奥夫的38家工厂企业中有29家归犹太人所有，其中印刷厂4家、烟厂5家、面粉厂6家；在犹太手工业中，最发达的部门是缝纫和木工；犹太人2470人从事农产品贸易，1000多人从事布匹服装贸易。

1903年4月6日在基督教复活节时，基什尼奥夫发生了残酷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其直接动因是邻近的杜波萨尔的血祭诽谤，而煽动者是反犹报纸《比萨拉比人》的编辑P·克鲁舍凡(他在该报上发表了恶毒的反犹文章)和宪兵军官列文达尔。反犹暴徒基本上是摩尔多瓦人，也有为此专门来到基什尼奥夫的俄罗斯人。伯恩施坦—柯冈领导的犹太自卫队被警察和军队解除了武装，其成员遭到逮捕。在反犹暴行中打死49人，打伤586人，捣毁房屋和店铺1500多间，欧美社会舆论深为震惊，世界各地对受害者进行了捐助。1903年末到1904年初，敖德萨法庭审理了这起案件。犹太律师O·格鲁金贝格和S·卡尔马诺维奇，以及基督教律师M·卡拉勃切夫斯基、A·扎鲁德内依和S·索科洛夫等人为受害者进行辩护。暴徒获得轻微的惩罚。犹太诗人比利亚克的诗篇《反犹暴行记述》描绘了这一事件，V·科罗连柯在随笔《第13号房》中也对此作了叙述，列夫·托尔斯泰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并认为沙皇政府应负直接责任。

1905年10月席卷俄国的反犹浪潮也波及到基什尼奥夫。该市有19名犹太人被打死，56名犹太人受伤。犹太自卫组织抵抗了暴徒的袭击。反犹事件和犹太经济的衰退导致基什尼奥夫的犹太人移居他地。

基本基金会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的主要金融机构。它在1920年7月于伦敦召开的犹太

复国主义组织会议上建立。它的职能是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稍后还有犹太代办处)有关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一切活动提供经费。在它成立之前从事这项工作的犹太国民基金会，现在专司土地的购置和管理。1921年3月23日基本基金会作为英国股份公司登记。它的办事机构设在伦敦，1926年迁往耶路撒冷。1929年成立了扩大的犹太代办处，其中也有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在这以后，基本基金会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主要的金融机构。

创立基本基金会的主要原因是，在1920年的伦敦会议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及其主席魏兹曼，同以布兰代斯为首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之间发生分歧。以布兰代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建议藉助私人倡议和私人资本，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实际任务。这个建议遭到欧洲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犹太工人运动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他们主张通过社会筹款的办法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1956年，根据以色列议会通过的法令，基本基金会作为以色列公司登记。它的活动以自愿为主。它的募集捐款的委员会几乎遍布有犹太人居住的所有国家。在美国，基本基金会在犹太呼吁联合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基本基金会动员的资金在一开始数额不大，但是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特别是六日战争期间，它的资金数额激增。

基布兹 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集体定居点，是以色列现存社会组织形态之一。汉语中“基布兹”一词是根据该词在希伯来语中的音译而成，而它在希伯来语中的含意是“聚集在一块”或“集体”。基布兹首先由来自欧洲，特别是东欧的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创建。早期的基布兹主要经营农业和畜牧业，稍后亦开始兴办工业。目前的基布兹基本上是农工经济混合体。它的成员过着“共同



20年代生活在基布兹中的犹太拓荒者劳动、共同占有”的集体生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它的分配原则。它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集体所

有,与此同时,集体负责一切生产、服务事业,并提供个人需要的一切。基布兹的形成与现代巴勒斯坦地区出现的一个接一个移民浪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期的移民几乎人人都经历过“集体化”阶段,移民度过的集体生活基本上是日后出现的基布兹生活模式的雏形。对基布兹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主要有社会主义思想、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以及回归自然思想。它们的存在和影响不仅20年代生活在基布兹中的犹太拓荒者

在总体上决定了基布兹的性质、组织型态、生活方式、经营形式和所要实行的基本准则,而且还在意识形态上影响生活在基布兹中的人员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基布兹的目标是把自身建成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生活,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和睦民主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基布兹长期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自愿、平等、民主、财产共有这四项基本准则。自愿准则指的是加入基布兹必须是本人自觉自愿的行动。为保证每个生活在基布兹中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出于自觉自愿,基布兹还规定了“退出自由”的政策。申请者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为期一年的考察期才能为基布兹批准成为正式成员,而退出则在提出后立即生效。平等准则指的是所有基布兹成员一律平等,成员对基布兹的方针、政策、生产、经营、生活等方面的活动享有同样的表决权。无论干的是什么工作,生活水准和福利待遇是平等的。民主准则指的是基布兹中的一切重要决定必须以民主的形式作出。基布兹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它的大会。基布兹大会由全体成员组成,一人一票制。它实行的是泛民主原则,大多数人的意志便是基布兹的意志,一切重要决定只有在大多数人表决同意后才能实行。财产共有准则指的是基布兹的所有财产均为全体成员共同占有,所有收入亦由全体成员共同享用。财产共有准则使得基布兹中无货币流通,不存在个人财产,也没有私人经营。

第一个基布兹于1909年在约旦河东岸建立,起名为德加尼亚(希伯来语意为“粮食产地”)。1911年又一个基布兹梅尔哈维亚建立。到1914年建起的基布兹已达11个。1918年巴勒斯坦全境已有29个基布兹。早期的基布兹基于组成的社团必须小到能象一个大家庭发挥作用的观念,规模一般很小,成员不多,最大的不过上百人,而且以农业生产为主。1921年,第一个大型基布兹埃恩哈罗德在伊兹生勒谷地东部建立。其目的是以组成农工经济混合的大规模集体定居点的方式消除城乡社会差别,并最大限度地吸收新来移民。从理论上讲,基布兹不拥有土地,只拥有土地使用权。基布兹的土地由犹太国民基金会购置。根据基金会章程,土地一经购得,不得出售或转让他人。20年代,由于犹太国民基金会缺乏基金,基布兹运动的发展受到阻碍。30年代,基布兹获得了迅速发展,到1939年,建立的基布兹总数达到117个,基布兹的人数也由1931年的4391人增加到24766人。1945年,在巴勒

斯坦的291个犹太人定居点中有149个为基布兹,以色列国建立后增加到200多个。目前以色列基布兹的总数为250个左右,总人数为12万多人,占以色列总人口的2.8%左右。大的基布兹拥有2千个以上成员,小的只有一二百人,刚成立的则只有几十人。其生产总值占全国12%。

最早的由基布兹联合起来的组织成立于1925年。1927年,根据不同的政治观点,成立了全国基布兹运动和联合基布兹运动两个组织,后来成立的组织还有宗教基布兹运动,无党派基布兹等。1963年,基布兹运动联盟重新组建成一个联合体,各基布兹组织都参加了该联合体。对于政府,它代表基布兹运动处理政治和金融问题。对基布兹本身,它具体指导农业、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制定文教计划,并研究基布兹内的各种社会问题。

基布兹运动 领导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以后为以色列)的基布兹定居点并管理它们的活动的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以色列基布兹自产生之日起在组织上就同犹太工人运动有联系,它们分别附属各个政党,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工总中影响很大,在政治和政府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所有的基布兹联合成三个组织——联合基布兹运动、全国基布兹运动和宗教基布兹运动。它们是20年代产生的一些思想团体——基布兹协会、统一基布兹、全国基布兹经过多次分化改组而形成的。

1925年,基布兹协会联合了一些不大的基布兹,其中包括最早的和最独立的一些农村公社。基布兹协会联合所有的基布兹的企图失败后,它制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方案——严格遵守协会中每个公社完全自治的原则,协会中心对每个公社的内部事务不加干涉。不同于其他基布兹联合会,基布兹协会长期同国外的哈鲁茨组织没有组织上的联系,这种情况,以及俄国革命后犹太移民的中止,使它无法按照生产迅速发展的需要补充自己的成员。只是到了30年代初期,戈登派青年运动的成员开始移居巴勒斯坦,基布兹协会才有可能充实已有的公社,并建立受它领导的新公社。

基布兹协会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有约瑟夫·巴拉茨(1890—1968)和K·卢兹。1933年基布兹协会和戈登派联合后,戈登派的领导人P·拉翁也成为基布兹协会的首领。加入基布兹协会的公社在政治观点上属于青年工人党和工人联合党。这两个党于1930年联合成工党后,基布兹协会的大部分成员加入工党。1951年,基布兹协会同联合基布兹的某些公社合并(这些公社以前由于思想分歧而从它那里分裂出去)成统一基布兹。这个联合会拥有74个基布兹,是当时以色列最大的基布兹联合会,它建立了新的组织框架,将许多成员推举到政治岗位和社会岗位,开展了积极的移民活动、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和教育活动,在以色列和国外的青年组织中进行启蒙工

作,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居民点。统一基布兹的成员基本上是工党成员,他们在工党、犹太工总、犹太代办处和政府机构中占据重要职务。统一基布兹使基布兹生活的规范自由化,力图使这种生活更充分地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包括对于使用雇佣劳动的问题,也不象其他组织那样严格。

第三、四次阿利亚的先锋力图创立组织上不那么闭锁的、而是大型并开放的公社。很多新移民起先加入工人旅,工人旅旨在创建“犹太工人总公社”,在它分裂后,组成了联合基布兹(1927),该派别基本上由哈鲁茨运动的成员组成。它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这样一种公社:既从事农业生产,又经营其他经济领域,公社对于自愿参加者敞开大门。它吸引了国外哈鲁茨青年,派人培训后备力量,1930年它又成为创办基布兹工业的倡导者。它的书记处在规划各个基布兹的经济活动、吸收新移民、建立新的基布兹以及按照联合的需要把一个基布兹的成员调入另一个基布兹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力。联合基布兹为伊休夫的防卫工作出力颇多,是建立帕尔马赫的倡议者,帕尔马赫的支队主要驻扎在它的基布兹中。参加联合基布兹的定居点基本上归附工党左翼。联合基布兹的首领是塔宾金。

1944年工党分裂后,联合基布兹的大部分成员离开工党,同全国基布兹一起创立了统一工人党。由于工党成员和统一工人党的支持者之间,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的分歧趋于尖锐化,联合基布兹发生分裂,22个基布兹——大部分是工党的支持者退出,5个基布兹发生分化。

联合基布兹的活动家在政府机构和民族机构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他们创立了在以色列劳工中进行教育工作、研究基布兹运动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中心,创办了大型出版社,建立了纳粹屠犹的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

随着工党和工人联合党于1968年初联合成以色列工党,联合基布兹和统一基布兹也进行了联合,它们在1979年创立了联合基布兹运动。1986年该组织拥有162个基布兹,约7.5万人,其中4万为基布兹成员。

20年代初期从波兰来到托管的巴勒斯坦的青年卫士的成员,创立了全国基布兹。他们认为小的、紧密团结的公社比大的、开放的公社好。该组织以1927年创立的4个基布兹为核心,在随后的年代里得到迅速发展,原因是青年卫士的成员大量移居巴勒斯坦。在英国政府托管之前,青年卫士的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和阿拉伯双民族的国家。全国基布兹把自己看作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和在巴勒斯坦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它重视自己成员的思想培训,特别注意儿童的教育,有自己的中小学网络。除其他基布兹联合体中也存在的互助方式(借贷基金会,有组织的采购)以外,全国基布兹还创立了销售自己的工业产品的组织和出版社。它保持同国外青年卫士的密切接触。它也捍卫阿拉伯工人的利益,并同他们结盟。它所创立的政治组织社会主义者联盟也接

纳不属于某个基布兹联合体的成员。

由于苏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给全国基布兹同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带来打击。该组织对苏联重新作出评价。于是,坚信共产主义的一些基布兹成员离开了它,或者被它开除。80年代中期,全国基布兹拥有83个基布兹,4.2万人。亚阿利和哈扎恩曾长期担任它的领导。

宗教基布兹运动于1935年由来自德国和波兰的4个哈鲁茨小组建立,迄至以色列成立,它创办了10个宗教基布兹。80年代中期,该组织拥有17个基布兹,7300人,其中3000人为基布兹成员。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宗教理想和伦理理想的综合为基础。宗教基布兹的经营结构与其他基布兹无异,但是它的成员必须遵守犹太教规。其成员最初参加东方工人党,后来属于全国宗教党。宗教基布兹运动在阿奇巴之子青年宗教运动中积极开展工作,阿奇巴之子的成员在宗教基布兹内部创立了若干个基布兹。

尽管各个基布兹联合体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是,它们的基本职能和组织结构相类似。每个基布兹联合体的基布兹代表(由基布兹全体成员选举产生)三四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联合体中心,中心选举书记处以及隶属书记处的各种委员会,委员会分别管理经济、移民、教育和安全等问题。每个基布兹联合体创立基金会,以及总供销机构和满足基布兹其他经济需要的机构,从而在物质上相互帮助。1962年建立的基布兹运动联盟,在征得各个基布兹联合体的同意后,管理基布兹的共同事务,并在政府机关、犹太代办处和犹太工总面前代表基布兹运动。

基训 河流或泉源名。据《创世记》第2章载,耶和华上帝造人以后,又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河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河叫比逊,环绕哈腓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叫基训,环绕古实全地。第三道河叫希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据此,基训河乃是从东方伊甸园流出的四道河之一。以色列分国时期,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山谷中,为城中用水的泉源也称基训。犹太王希西家时,该泉已有下基训和上基训之分。为了解决耶路撒冷饮水问题,特别是为了应付敌人围城时城中用水的困难,希西家王曾修建其著名的地底隧道。其中包括塞住基训的上泉,引水直下,流到大卫城的西边。玛拿西王为了进一步巩固城防,在耶路撒冷城外,从谷内基训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高城墙,环绕俄斐勒。玛拿西王此举是要把基训泉源包括进耶路撒冷的城防系统,以确保泉源在战争形势下能控制在自己手中。上基训泉池在约法门西0.75公里处,下基训泉池在约法门南0.5公里处。

基利心 古犹太山名，为拿伯路（即示剑谷）的南部边界。与以巴路山相对，海拔 947 米。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攻克巴勒斯坦后，约书亚遵命在此山陈述祝福之辞，在以巴路山宣讲诅咒之语。基甸的儿子约坦曾登此山向示剑人讲寓言，谴责他残暴的兄长亚比米勒自立为王，在俄弗拉屠杀自己 70 个兄弟的罪行。亚历山大大帝时，大祭司押杜亚之弟玛拿西娶外邦人参巴拉的女儿为妻，耶路撒冷的长老命其离婚，否则将不许他靠近祭坛，而参巴拉则对玛拿西许诺，若不与其女儿离婚，即另建一殿堂。后来在基利心山建成撒玛利亚殿，该山因而成为撒玛利亚的圣山。

基利波 古犹太山名。基利波山是以法莲山的东北支脉，为基顺河与约旦河的分水岭。南北走向，长 12 公里，宽 4.5—7.5 公里不等。主峰海拔 563 米。东部可作牧场，种植大麦、小麦及橄榄树等。以色列统一王国时期，扫罗王曾率三个儿子在此山与入侵的非利士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扫罗的三个儿子战死沙场，扫罗王伏剑而死，被非利士人剥去军装，割下首级，尸体被钉在城墙之上。大卫听到噩耗，悲痛欲绝，为扫罗及他的儿子约拿单作哀歌，名为《弓歌》，载于《撒母耳记下》第 1 章第 17—26 节。

基希 (Frederick Herman Kisch, 1888—1943)

英国将官，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活动分子。生于印度。父亲是英军军官。从小习武，后成为一名皇家工程兵中职业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在美索不达米亚服役，受伤后送回伦敦，恢复期间曾在伦敦军事情报部工作过。大战结束后，作为英国代表团的一名军事顾问参加巴黎和会。在父亲的影响下，继承了不少犹太传统，关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魏兹曼认为他可以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和英国派驻巴勒斯坦当局之间起中介作用，1922 年，委任他为犹太代办处驻耶路撒冷政治部主任，同时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执行委员会。

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起初阶段，两方人士都对他抱有怀疑和不信任心理。从东欧来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认为他是“英军打入人员”，英国当局则认为他又回到“彻头彻尾犹太人”立场上去。但他的诚实、务实、公正品质最后还是赢得两方面的信任。1931 年，当英国政府在阿拉伯人的压力下改变巴勒斯坦政策时，他和魏兹曼一道辞去了在犹太代办处的职务，去海法经商。在海法期间，他积极支持伊休夫中非政治研究工作，帮助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化事业。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立即报名服役，被任命为英国驻西撒哈拉沙漠第 8 军工兵团总指挥，准将

军衔。1943 年 4 月，在靠近突尼斯的地雷区阵亡。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今天在以色列加利利地区，一座由退役的前英军第 8 军士兵组成的莫沙夫便以他的名字命名。

基甸 (Gideon) 古希伯来人物名。古以色列历史上著名的士师之一。公元前 1100 年左右为基甸士师活动的时代。《士师记》第 6、7 章记载了基甸士师的主要事迹。

以色列人行亚卫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就把他们交给在米甸人手里七年。据《圣经》记载，米甸人强大起来之后，他们向北部迁移，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圣经》描述这个游牧部落“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此时，以色列民族已由游牧生活转入农耕生活，但是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就伙同亚玛力人和其它东方游牧部落前来抢掠，毁坏生产。以色列人非常贫穷，被迫退居山地，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

以色列人呼告上帝，上帝遣使者到俄弗拉。上帝的使者选中了这位大能的勇士基甸，要他凭着自己的大能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上帝的使者用杖击打基甸献上的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基甸就在那里为亚卫神树起了一座坛，并下决心接受上帝的使命，在危急关头拯救以色列民族。

这段时期，由于以色列民族与迦南民杂居，其宗教信仰已染上了很深的迦南烙印，特别是当农耕生活成为以色列人基本生活方式以后。基甸受感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纯洁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为此他拆掉了父亲家的巴力祭坛，砍下了坛旁的木偶，并在新筑的一座坛上用一只牛向亚卫神奉献燔祭。此举震惊了当地人，他们要约阿施交出儿子治死他，约阿施则为儿子辩护说：“巴力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天人们便称基甸为“耶路巴力”，意思是说，他拆毁巴力的坛，让巴力与他争论。基甸这一勇敢的行动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无疑惊醒了一部分以色列人，这给他赢得了很大的名声。所以当米甸人、亚玛力人等其他东方游牧部落再一次渡过大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后，基甸立刻吹响战斗的号角，亚比以谢族人都聚集起来追随他。基甸又打发人走遍玛拿西地，并在亚设地、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展开宣传，玛拿西人立刻响应他的号召，亚设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一个联合起来抵抗米甸侵略的形势就基本形成了。基甸懂得，要击溃声势浩大的，但组织性并不强的游牧部落，并不需要太多的人马，只要一支精兵就能达到目的。为此，基甸决定从追随他的庞大队伍中精选一支力量。他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 2.2 万人回家，只剩下

1万人。基甸在这一万人中再进行一次筛选。他叫这一万人分别到哈律泉旁饮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的,基甸让他们站在一边,凡跪下喝水的站在一边。结果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人都跪下喝水。基甸留下了这300人,打发其余的人各回各的帐棚。因为他知道这300人时刻都保持着警惕性,是最合适的战士。基甸的这支精兵驻扎在哈律泉旁,靠近他们的北边就是米甸人的宿营地。基甸带着他的一部分同伴在深夜侦探了敌人的营寨,在详细了解敌情后,他决定发动一场奇袭战。他将他的300战士分作三队,把号角和空瓶交在各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周吹角,喊叫说:‘亚卫神和基甸的刀!’”到了三更时分,这支队伍来到米甸营旁,在米甸营寨周围吹响号角,燃起火把,齐声呼喊:“亚卫神和基甸的刀!”米甸人从睡梦中惊醒,于是全营溃乱,相互砍杀,狼狽奔逃,基甸所聚集的玛拿西人、亚设人、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就走出营寨,追杀米甸人。经过这场战役,米甸人的力量基本被摧毁,于是以色列人获得了40年的太平日子。

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

美国政治学学者,国务活动家。他出身于德国正统犹太家庭,1938年由于犹太纳粹迫害,全家迁居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军服役,战争结束时他在美军驻德机关供职。1947—1954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自1957年起在哈佛大学国际政治专业任教,1962年成为教授。1956—1960年领导“核武器和对外政策”研究小组,1958—1969年主持美国国防研究规划。

基辛格在博士论文《复兴的世界》(1957)中阐述了自己对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这篇论文研究拿破仑倾覆以来欧洲的国际关系体系。他受到梅特涅(1773—1859,公爵,曾任奥地利外交大臣,1821—1848年任首相)和卡斯尔里子爵(1769—1822,世袭伦敦德里侯爵,曾任英国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同奥地利和法国缔结秘密条约,其矛头主要针对俄国)的现实主义政策的昭示,这些政策导致主要欧洲国家力量稳定的均衡。在《核武器和对外政策》一书(1957)中,他批评了杜勒斯国务卿的“集中报复”的政策,建议采取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区别反应”的策略。

基辛格曾任纽约州州长N·洛克菲勒对外政策问题顾问(1959—1961),总统肯尼迪(1961—1963)和约翰逊(1963—1968)的顾问。1969年他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他还担任了美国国务卿(他是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犹太人)。

基辛格被认为是美苏关系缓和政策的倡导者。按照他的观点,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排除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进行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在他的参与下,1972年美苏签订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SALT),以及美国向苏联出售小麦的协议。1971年基辛格同中国领导人的秘密接触,为中美建交和尼克松总统访华(1972)打下了基础。由于在达成越南停火的巴黎协议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于1973年1月与北越代表黎德寿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0月)是基辛格就任国务卿以来处理的第一场国际危机。在苏联的同意下,他主持了有关接受安理会停火决议(第338和339号)的谈判。在日内瓦和会(1973年12月)以后,基辛格着手签订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局部协议,而把苏联排斥在谈判之外,以减小它在中东的影响。

基辛格在中东各国首都的“穿梭外交”,以及他的韧性、外交才能和擅长利用传媒手段,导致以色列同埃及签订了停火协议(1973年11月)、撤军协议(1974年1月24日)和“过渡协议”(1975年9月1日);同叙利亚也签订了撤军协议(1974年5月)。

基辛格是美国最著名的国务卿之一。导致尼克松下台(1974年8月)的水门事件没有波及基辛格,他在福特总统手下仍然担任国务卿。不过,后来对基辛格外交政策的批评加强了。批评者认为,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消除了美国在弹道导弹领域里的优势,缓和具有单方面性,不能遏制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基辛格主张帮助安哥拉的反共势力,不过,他的建议遭到美国国会的拒绝。1975年底,他被迫辞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但仍保留着国务卿的职务。在1976年竞选运动期间,基辛格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

基辛格的犹太出身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对以色列的态度。起先这种态度是相当节制的,后来他关于以色列的言论变得越来越友好。他同以色列一些主要政治活动家——梅厄、拉宾和阿隆,以及阿拉伯领导人(特别是萨达特)建立了私人接触。1979年他被授予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名誉博士的称号。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外,基辛格还著有回忆录《白宫岁月》(1979)。

基拉耳 见“亚比米勒”。

基顺 巴勒斯坦北部一河流名。基顺河为巴勒斯坦地区仅次于约旦河的一条重要的河流。“基顺”一词希伯来文含义是“屈曲”,意指该河河道曲折。此河向西北流经以斯德伦平原,尔后穿过迦密山北崖下的峡谷,继而流入亚柯平原,再经沙滩地带注入地中海。基顺河因女士师底波拉在此地击败迦南王将军西西拉而闻名。据《士师记》载,士师底波拉时期,以色列人被迦南王耶宾压制。女士师底波拉决定抵抗迦南王耶宾,她挑选了巴拉组织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屯扎于他泊山。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

战车和全军到了基顺河。这时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么？”于是巴拉率领1万战士上他泊山。这次战役的结果是，西西拉被击败，全军溃乱，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役，西西拉全军覆没。迦南王耶宾的失败，与基顺河有密切关系。由于巴勒斯坦为典型地中海式气候，降水主要由地中海吹向东方的带水汽旋风吹到巴勒斯坦上空凝结而成，因此降水量呈突发性的特点，而且全年降雨基本集中在1月份。雨季到时，河水猛涨，其它时候，往往河道干涸。而西西拉的战车只有在宽广干涸的河道上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女士师充分地掌握了基顺河的水位特点，适时地组织了以色列战士的抵抗，利用基顺河汛把敌人冲没。据载，1799年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被拿破仑击败后，也在基顺河遭到同样的命运。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 基督教派中以宗教为出发点，积极支持在故土以色列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思想。如果单独把犹太复国主义看成是一种旨在促使犹太民族重新回到故土以色列，并在那里成立一个独立犹太人国家的现代犹太复兴运动，那么，便不可能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看成是一种先于兴起在19世纪后半叶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不过，倘若从宗教出发，人们便可发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具有比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悠久得多的历史，它深深地扎根于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救世观。只是当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和现代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运动出现后，这一思想才逐渐世俗化、实用化、政治化。即便如此，它所包含的宗教传统和宗教意义仍十分明显。事实表明，英国政府在考虑是否应发表《贝尔福宣言》时，就曾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象劳合·乔治首相和贝尔福外交大臣这样的人士在考虑犹太人问题时是不可能排除宗教因素的。此外，从50、60年代世界对以色列国的态度上，人们也似乎可以看出基督教和《圣经》传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可以预见，今后基督教世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还会受到《圣经》以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神学背景 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虔信派教徒和英国清教徒的一些团体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应该让犹太人根据古代先知所作的预言返回圣地。千禧年主义的出现更加强了这一观念的可信性。许多持这一观点的人都认为应该让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以便当基督再度降临时，能够创造一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新世界，并在那里治理一千年。这种思想首先在16世纪的英国产生，然后传至欧洲大陆，18世纪后又由清教徒带至美国，并在那里壮大了声势。一个时期，信仰基督复临主义的教徒甚至要求国家的统治者采取某些政治措施，以保证犹太人获得重新在圣地定居的权利。尽管19世纪以前，这类活动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却为后来基督教世界

赞同犹太人返回圣地一事奠定了基础。

稍后，基督教中新出现的千禧年主义派别，如使徒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会、后期圣徒教会等，更是把促使古代先知所说的末世和千禧年的到来当作他们神学的中心任务。1830年，由爱尔兰圣公会教士达比在英国创立的普利茅斯弟兄会强调，为了实现《圣经》预言和促使基督复临就必须首先让犹太人返回他们的故土，他们认为在基督复临以前，犹太人和所有其他民族要先经历一段受难的审判时期，只有经过那一时期，基督才会复临，并与剩下的犹太人一道在耶路撒冷治理整个世界。许多基督教新教重要派别的教会至今仍采纳和推行这一观点。

1848年，基督徒托马斯创立了基督弟兄会，运用古代希伯来众先知的预言和《圣经·启示录》来解释时事和未来。该基督教派支持犹太人返回故土以色列，并采取实际步骤加以协助，如积极支持锡安热爱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营救面临大屠杀威胁的犹太人等。由斯密斯1830年在美国成立的摩门教则把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看成是基督复临的一种预兆。1891年，摩门教传教士海德被派往耶路撒冷，在橄榄山顶诵读“犹太复国主义”祈祷词，宣布圣地是属于犹太人的。另外一些基督复临派则把允许犹太人返回故土以色列看成是信仰末世主义的一种义务，一些组织还干脆把他们的总部搬到了以色列。

19世纪，许多千禧年教派都曾开展过在圣地落户的运动，以恭候基督的复临。不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政治意图的出现 在许多宗教派别积极宣传和支 持犹太人返回故土以色列的同时，19世纪一些信仰基督教的政治家也开始支持犹太人返回故土以色列的活动。当然，这些人的目的除了部分是出于宗教信仰上的考虑，更主要的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所在国在中东的政治影响。沙夫茨伯里伯爵(第七)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首先制定了一系列由英国出面安排将犹太人安置在巴勒斯坦的详细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曾在英国政府官员中传阅，而且在欧洲实行新教的国家和美国领导人中传阅。加拿大神学家蒙克曾亲自前往巴勒斯坦，支持在那里建立第一批犹太人定居点的活动。英国神秘主义者奥利芬特不仅本人在巴勒斯坦定居，而且大力援助从俄国来的第一批犹太拓荒者。他还代表犹太人向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统治者说情，并在伦敦成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基督教团体援助热爱锡安运动。赫茨尔的友人威廉·赫奇勒也是出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

美国最著名的信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士是威廉·布莱克斯通。他是《基督来了》一书的作者。在书中，他一再宣扬犹太人返回故土以色列是符合天命的观点。他曾于1891年和1916年两度以备忘录形式向美国总统讲述了用政治手段实现他这一观点的必要性，呼吁美国

政府出面干预,让犹太人返回故土以色列,并以此作为解决沙皇俄国迫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有好几百名美国著名人士在这一呼吁书上签名表示支持。他本人一生数次参加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始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19世纪下半叶,不少基督教徒出于人道主义或政治考虑,公开支持犹太人返回故土的行动。1852年,英国乔治·高勒上校发起成立了促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协会,以协助英国在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培训犹太农业技术员。他还发表了以犹太人在以色列定居的方式扩大英国在叙利亚影响的建议。成立于1865年英国的巴勒斯坦开发基金会,实际上是一个支持犹太人在故土以色列定居的中心。它的成员中包括在耶路撒冷进行考古发掘并预言犹太人将会治理这一地区的英国考古学家沃伦和呼吁人们支持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廉德尔。意大利哲学家兼政治家墨索尼洛则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看成是一种将欧洲文明带入中东地区的一种极好形式。国际红十字组织创始人邓南特则将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看成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人道主义办法,1863—1876年间,他曾试图唤醒西欧犹太人组织对巴勒斯坦犹太定居点的兴趣和关注。1875年,他在伦敦发起成立了巴勒斯坦殖民协会。

1887年,当要求支持犹太人在故土以色列定居一事提交英国议会时,英国著名实业家、经济学家爱德华·卡扎勒特呼吁英国政府出面支持犹太人返乡活动。他是第一位把故土以色列看成是犹太民族精神和科学中心的基督徒。他还预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总有一天会建立起来。

20世纪,尤其是《贝尔福宣言》发表以来,基督教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支持建立犹太人国家的活动发生了变化。英国成立了巴勒斯坦协会,在1916—1924年和1930—1946年间为协调英国政策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努力。类似的组织在其他国家也有成立。不过,最积极、并以公开形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是美国基督教的一些团体。1930年,爱德华·罗梭牧师发起成立了主要由牧师参加的支持巴勒斯坦联合会。1932年,美国巴勒斯坦委员会成立,其成员包括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政府官员。1940年成立的基督教巴勒斯坦局的成员包括来自自由教会的牧师3千人。后两个组织于1946年合并成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拥有成员15000人。该组织不仅出版论犹太复国主义正义性的书籍,而且对以色列国的成立表示同情和理解。

基路伯 犹太教经典中所载长有翅膀的天使,也叫基路冰。《创世记》载: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后,就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去耕种土地。为了不让他们再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上帝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

发火焰的箭,把守去生命树的道路。此外有关基路伯的一个最生动、最典型的描述见于《以西结书》:以西结先知被掳到巴比伦的迦巴鲁河边时,描述了他见到的一个异象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象光辉的精金。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象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象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象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象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个方向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至于轮辋,高而可畏,四个轮辋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象大水的声音,象全能者的声音,也象军队哄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上的苍穹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像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辉的精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根据以西结对他的异象的详细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基路伯有人、狮子、牛、鹰四种脸象;有两对翅膀,上面一对相接,下面一对遮体,其肢体下有四个可随意而行的轮,而活物的上面坐着耶和華上帝。

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摩西遵照上帝的命令,制造了绣有基路伯的帐幕和约柜,在精金做的施恩座的两头,要安放用金子铸出接连一块的两个基路伯。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隐施恩座,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基路伯的制造由巧匠比撒列负责。基路伯代表上帝的降临,所以施恩座前是绝对神圣的,祭司进前执行圣职时要遵守律例,否则就会干罪。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拿自己的香炉在耶和華上帝面前献上凡火,立刻有火从基路伯里发出,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華面前。所以上帝告诫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

大卫逃离扫罗之手后,曾向上帝作赞美诗,其中说到耶和華“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所罗门秉大卫遗命建造圣殿时,他用橄榄木作两个基路伯,各高十肘,安在内殿。这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各长五肘,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十肘。那一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也是十肘,两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不仅如此,所罗门又在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两扇门上也都刻着基路伯。看来,由摩西在旷野中会幕里设置的基路伯到所罗门圣殿里的基路伯,其意义除保持着它代表耶和華降临的本义外,已逐渐发展有宗教装饰的作用。

梵蒂冈和犹太问题 梵蒂冈作为天主教会首领罗马教皇广义上的同义词,与犹太人的关系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具有重大影响。

梵蒂冈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1904年1月25日赫茨尔在梵蒂冈同教皇庇护五世会晤,请求他颁布特殊的教皇通告,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或者至少取消天主教会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意图的抵制。同时,赫茨尔表示,在建立犹太国后,保障巴勒斯坦境内的基督教圣地的治外法权。觐见教皇未能取得任何结果。庇护五世在会晤中表现出宗教成见、不理解和漠不关心。基督教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重新唤起。当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得到协约国的支持,以便在土耳其战败后把巴勒斯坦的治理权利移交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认为,这件事也须得到梵蒂冈的支持。为此,N·索科洛夫预先在同几位红衣主教协商后,于1917年5月10日会晤了教皇本尼迪克十五世。这次,教皇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非常友好。索科洛夫的儿子在许多年后发表的对这次觐见的详尽描述证明,索科洛夫同教皇的会晤是犹太复国主义和梵蒂冈相互关系史上的转折点。

1921—1922年冬,哈伊姆·魏兹曼两次同梵蒂冈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加斯帕利会晤,加斯帕利对天主教会和基督教朝觐者的法律地位问题感兴趣。魏兹曼宣称,法律地位问题由作为托管国的英国管辖。以色列宣告独立之前犹太复国主义和梵蒂冈之间最后一次直接接触,于1945年4月举行,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摩西·切尔托克受到庇护十二世的接见。这次会晤具有官方性。

梵蒂冈和以色列国 当联合国大会赞同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时,该计划有关耶路撒冷及其所有圣地国际化的条款得到梵蒂冈的热烈支持。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梵蒂冈两次向交战双方发出呼吁,要求停止流血冲突,恢复圣地的和平,耶路撒冷及其郊区由国际共管,保护巴勒斯坦的所有圣地,保障祈祷者自由出入,以及所有宗教机构的活动自治和基督教徒权利的不可侵犯。梵蒂冈的第二次呼吁以教皇告谕的形式提出。以色列总统魏兹曼于1949年4月23日作了公开答复,他宣称以色列保障宗教机构的安全,同意捍卫圣地的不可侵犯性。1950

年1月,以色列外交部长M·夏里特在议会发言中强调,以色列对同基督教会的主要机构达成协议感兴趣,以色列政府力图完全保障整个基督教会,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权利。1952年,夏里特再次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的接见。约翰二十三世(1881—1963,1958年起为罗马教皇,主张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还是在任红衣主教时,就以同情犹太民族著称。

尽管梵蒂冈和以色列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以色列国正式参加了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葬礼,以及约翰二十三世于1958年和保罗六世(1897—1978)于1963年的加冕礼。

1964年1月,教皇保罗六世在罗马教廷史上第一次访问了圣地。教皇和以色列总统夏扎尔交换了礼品和信函。六日战争引起梵蒂冈对以色列和耶路撒冷问题的态度的巨大变化。耶路撒冷新老城的统一以及在全城推行以色列法律,使得基督教圣地置于以色列政府管辖和保护之下。1967年6月22日,以色列通过了《1967年圣地保护法》。1967年7月梵蒂冈派遣特使赴以色列,以便同以色列政府讨论战后形成的新形势。以后梵蒂冈屡次宣称,由于已经变化了的局势,天主教会希望赋予圣地以受到国际法保障的特殊地位。

在梵蒂冈和以色列建交之前,两者之间的接触通过以色列驻意大利大使和梵蒂冈驻耶路撒冷代表来进行。1969年,以色列外交部长A·埃文在梵蒂冈受到教皇保罗六世的接见。1970、1971年和1972年,由于埃以停火、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被杀等事件,教皇和以色列总统之间交换了信件。1973年,以色列总理梅厄受到教皇长时间的接见,接见中讨论了中东局势、某些国家中犹太人的遭遇、阿拉伯难民的命运,以及巴勒斯坦圣地的地位和耶路撒冷的未来等问题。

梅厄 (Golda Meir, 1898—1978) 以色列政治家、外交家,第一位女总理。通称“梅厄夫人”。生于乌克兰基辅。父母均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者,从小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启蒙教育。1906年随家人移居美国密尔沃基市。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宣传组织才能,四年级时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在家人影响下,青年时代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先后与著名犹太复国主义政治领导人伊扎克·茨维、本—古里安等人结识。20岁时当选出席在费城召开的第一届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大会。1918年,和丈夫子女一起移居巴勒斯坦,起先在一基布兹生活,为创建犹太家园辛勤劳动。1934年参加犹太工人总工会,担任妇女工人理事会书记。1946年,在犹太代办处领导人被托管当局逮捕关押期间,担任代理主任和伊休夫首席发言人。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后去美国积极为即将成立的犹太人国家寻求支持和筹集资金,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1948年5月,肩负秘

密使命出访约旦,劝说约旦国王不要采取敌视犹太人政策。当月14日出席以色列国成立大会,是25位在《独立宣言》上签名作证的人士之一。

1948年9月,她放弃担任的耶路撒冷市长一职,出任首任驻莫斯科公使。一年后回国,在本—古里安内阁中担任劳工部长,为提高以色列妇女地位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出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在10年任期内,多次出访美国,为美以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并成功地与非洲若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65年卸任后,担任巴勒斯坦工人党总书记。1968年,联合其他政党,成立以色列工党。1969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1970年2月艾希科尔总理突然病逝,她担任以色列第四任总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领导犹太人国家的犹太女子。

1973年10月领导国家在“赎罪日战争”中取得胜利,但由于以色列军队在战争初期损失严重,于1974年6月辞职下野。1978年12月在家乡阿维夫村舍逝世。著有自传《我的一生》。

梅厄政府 1969年2月—1974年4月以梅厄为总理的以色列政府。L·艾希科尔总理于1969年2月26日去世,G·梅厄夫人继任总理。她在外交政策上奉行强硬路线。M·达扬、I·阿隆、I·加利利(1911年生,1948—1949年曾任以色列临时政府国防部长)参加了政府的组建。同时,梅厄也得到以P·萨皮尔为首的温和路线的拥护者的支持。全国宗教党支持梅厄,因为梅厄反对削减正统拉比院的权限。在梅厄政府成立前两个月,一些工党联合成工党联盟。在第七届议会选举中,工党联盟获得了56个席位。尽管以塔米尔为首的自由中心退出了加哈尔,加哈尔集团还是保住了自己26席的实力。

1969年10月,梅厄组成了全国联合政府。这届政府的24位部长中,有6位属于加哈尔集团。加哈尔坚决反对美国国务卿罗杰斯1970年7月提出的和平计划,于同年8月退出政府。在全国宗教党奉行温和路线的领袖沙比尔于1970年7月去世后,党的领导中强硬的、不可分割的以色列运动的支持者的影响加强。1973年4月,卡齐尔当选为以色列总统。同年9月根据沙龙的倡议,成立了利库德集团。

梅厄执政期间,以色列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赎罪日战争”。以色列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攻击缺乏戒备,战争初期损失严重。战争在以色列人民中间引起极大的震动,爆发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各种尖锐的批评不绝于耳。政府无力平息民众的情绪。1973年最后一天举行的第八届议会选举,未能完全反映民众政治情绪的变化。梅厄仍然担任政府首脑,政府的组成与往届区别不大。不过,这个政府存在不长。1974年4月初,以阿格拉纳特为首的调查战争初期失利原因的委员会,公布了部分报告。报告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委员会认

为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和某些军官应对战争初期的失利负个人责任。至于政府成员的政治责任问题,委员会认为这已经超出自己的权限范围。一位战争的参加者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前,就提出追究国防部长达扬的责任。这个要求得到工党联盟成员的支持。迫于压力,梅厄于1974年4月辞职。她最可能的继承人P·萨皮尔拒绝领导政府,在梅厄的影响下,1974年6月组成了以拉宾为首政府。

梅纽因 (Yehudi Menuhin, 1916—) 美国犹太小提琴演奏家。生于纽约一犹太人家。4岁开始在西格蒙德·安克尔学小提琴,7岁首次在旧金山公开登台演出,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引起轰动。11岁在巴黎演奏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协奏曲成功,蜚声国际乐坛。后在欧洲进一步学习琴艺,先后在阿道夫·布施和乔治·艾奈斯库门下学习。1934—1935年,在世界巡回演出,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之后,他息台两年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艺。他的成功艺术生涯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盟军和救援活动举行的数百场演出,以及战后为克服战争带来创伤举行的种种义演。1963年,在英国的斯托克·达贝尔农创办耶胡迪·梅纽因音乐学校,以培养有音乐天赋的儿童。1965获不列颠帝国二级勋位。曾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乐司主席、在瑞士格施塔德和英国巴斯主持音乐节,为促进音乐在世界范围的作用作出了贡献。

梅纽因以演奏稀有作品和新作品著称,把许多鲜为人知的乐曲介绍给广大听众,并在讲学和演出活动中推广和介绍东方音乐。作曲家巴尔托克曾应邀为他创作了《独奏小提琴奏鸣曲》。1966年和1967年,分别在巴斯和美国两度与印度的西塔尔琴演奏家和作曲家申卡尔联手演出二重奏。申卡尔专门为他谱写了独奏曲《普拉巴蒂》。60年代后,亦从事乐团指挥。近年来已成为一名室内乐指挥家。

梅奇尼科夫 (Elie Metchnikoff, 1845—1916)

俄国犹太动物学家,微生物学家,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生于乌克兰一乡村。母亲是犹太人。17岁进入哈尔科夫大学,后到德国留学,23岁获博士学位。1870—1882年任敖德萨大学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教授,但在80年代俄国出现的反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中被迫辞职,出逃俄国,在意大利墨西拿避居,其母被迫含冤身死,妹妹一家也因他遭受株连。在意大利,他主要从事胚胎学研究。通过研究,他发现并建立了吞噬细胞理论。1884年,他又发表《机体对细菌的斗争》一文,揭示了白血球具有治疗创伤和抗御外物的作用。1888年,他受著名科学家巴斯德邀请,在巴黎大学任教,并担任新成立的巴斯德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所长)。在该所任职期间,他通

过无数实验,证实吞噬细胞(反应在人身上为白血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动物抵御急性感染的第一道防线。1903年,他与合作者成功地使类人猿感染梅毒。1908年,他因在动物体内发现噬细胞而与德国犹太免疫学家埃尔利希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1912年被推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梅奇尼科夫撰写的主要著作有:《炎症的比较病理学》(1892)、《传染病的免疫性》(1901)、《老年》、《人之本性》(1903)、和《乐观主义哲学漫谈》。

梅格德 (Aharon Megged, 1920—) 以色列著名小说家。生于波兰,1926年随家人定居巴勒斯坦。中学毕业后创办斯多特芽姆基布兹,并在其中生活了1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任犹太办事处驻美文化代表。1968—1971年担任以色列驻英文艺参赞。

1950年,梅格德创办了文学周刊《一萨》,并一直任编辑达15年之久。主要从事小说和戏剧创作。1954年曾因《我与海德娃》获尤西西肯文学奖。

梅格德文笔流畅,擅长讽刺,主题通常反映不同代人之间的冲突和相互缺少沟通。其主要作品有:《傻瓜的运气》(1962)、《活在死者之上》(1970)、《短暂的生命》(1980)。《福伊格尔曼》(1988)是他的近作。



梅勒

梅勒 (Norman Mailer, 1923—) 美国犹太作家,政论家。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朗布兰奇,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犹太人居住区长。19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太平洋战区与日军作战。战后从事写作。1968年,参加过纽约市市长竞选,但未能如愿。

梅勒作为作家和政论家,著述甚多。《裸者与死者》(1948)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成名作,作品通过对美军攻克日军占领小岛战役的描写,反映了权力与人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梅勒的主要作品有:《北非海岸》(1951)、《鹿苑》(1955)、《美国梦》(1965)、《我们为什么呆在越南》(1967)、《刽子手之歌》(1979)等。50年代末,梅勒较多从事政论文的写作,1959年发表了《自我广告》,稍后发表的还有《白种黑人》,作品分析了“垮掉的一代”心理状态和道德观念。

梅勒是美国犹太作家中最不具犹太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反映美国社会问题。鉴于他本人对政治的兴趣,使他的不少作品偏重于与当时时政大事结合。然而,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还是有所察觉,正如他在短篇小说《研究瑜伽的人》中所说,犹太人跨立在两者之间:一方面是对自己从未见过的国家的丧失感,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现在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厌恶感,反映了普遍存在于美国犹太人之中的“做犹太人难,不做犹太人也难”的矛盾心理。

推罗 古犹太城市名。又译作“提尔”或“太尔”。古代腓尼基重要城邦之一,今即黎巴嫩的苏尔。位于地中海东岸、迦密山以北、西顿以南约40公里处。约建于公元前20世纪初,最初为腓尼基近海的一个多岩石的岛屿。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该城后,筑起一海堤使其与大陆相连,一度(约公元前10世纪)取代西顿而成为希腊海域最大的海港。据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文献记载,从公元前20世纪中叶之后,即从推罗初建后不久,长期受到埃及和赫梯的侵扰,曾归埃及管辖。公元前10世纪,其国势达到鼎盛时期,远征非洲。公元前9世纪末还在北非(今突尼斯境内)建立殖民点——迦太基。推罗居民长期从事航海活动,与地中海各地贸易关系相当密切,以出口推罗紫色纺织品而远近闻名。公元前8世纪后,国势渐衰,多次遭到亚述和新巴比伦王国的骚扰。公元前6世纪为波斯帝国所占。公元前332年又遭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军队的侵略,3万居民沦为奴隶。公元前64年被划入罗马版图。据《圣经》记载,推罗人与以色列人关系一直较为密切,如,《列王纪上》第5章、《历代志下》第2章分别记载说,推罗王希兰是大卫王的朋友,在大卫王建圣殿时,推罗王为大卫王提供了建材及技术,所罗门王以20座城池作为酬谢送给推罗王。为所罗门圣殿制造各种铜器的,就是推罗人。

救世运动 犹太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为了把自己

说成是救世主或为了在故土以色列重新建立大卫王朝和犹太人国家而发动的一种运动。这一运动自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虏”以来，一直到18世纪，几乎从未停止过。导致这一运动出现的主要因素有：犹太人自古以来对救世主弥赛亚降临的期盼；犹太人丧失家园的事实；在流亡中对“加路特”的实际感受；非犹太人社会对犹太人施加的种种迫害（以宗教迫害为尤）；以及为了向世人昭示上帝的公正，希望能恢复主权犹太人国家的强烈愿望。一般说来，只要流散中的犹太人能平静地生活，这种希望获得救赎的思想便只是体现在犹太人的正常祈祷中；一旦犹太人面临驱逐、屠杀或其他威胁其生存的迫害事件，这种思想就可能被一些自称是“救世主”或“先知”的人利用。除非这种人被证明是假弥赛亚，否则他们发起的救世运动总会得到一部分犹太人的支持和拥护。

《圣经》中对救世主的期望就作过种种描写和预言。在罗马占领期间，犹太人的历次起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看成是一种救世运动。人们把巴尔·科赫巴称为“弥赛亚王”就体现了这一起义的救世性质。在伊斯兰教兴起时代，发生多次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武装冲突，从根本上说也是具有类似性质的运动。十字军东征时代在圣地出现的反穆斯林压迫的斗争，其目的就是要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救世王国。1172年，也门犹太人把当时遭受的残酷迫害看成是救世主降临前的阵痛，反映了人们的救世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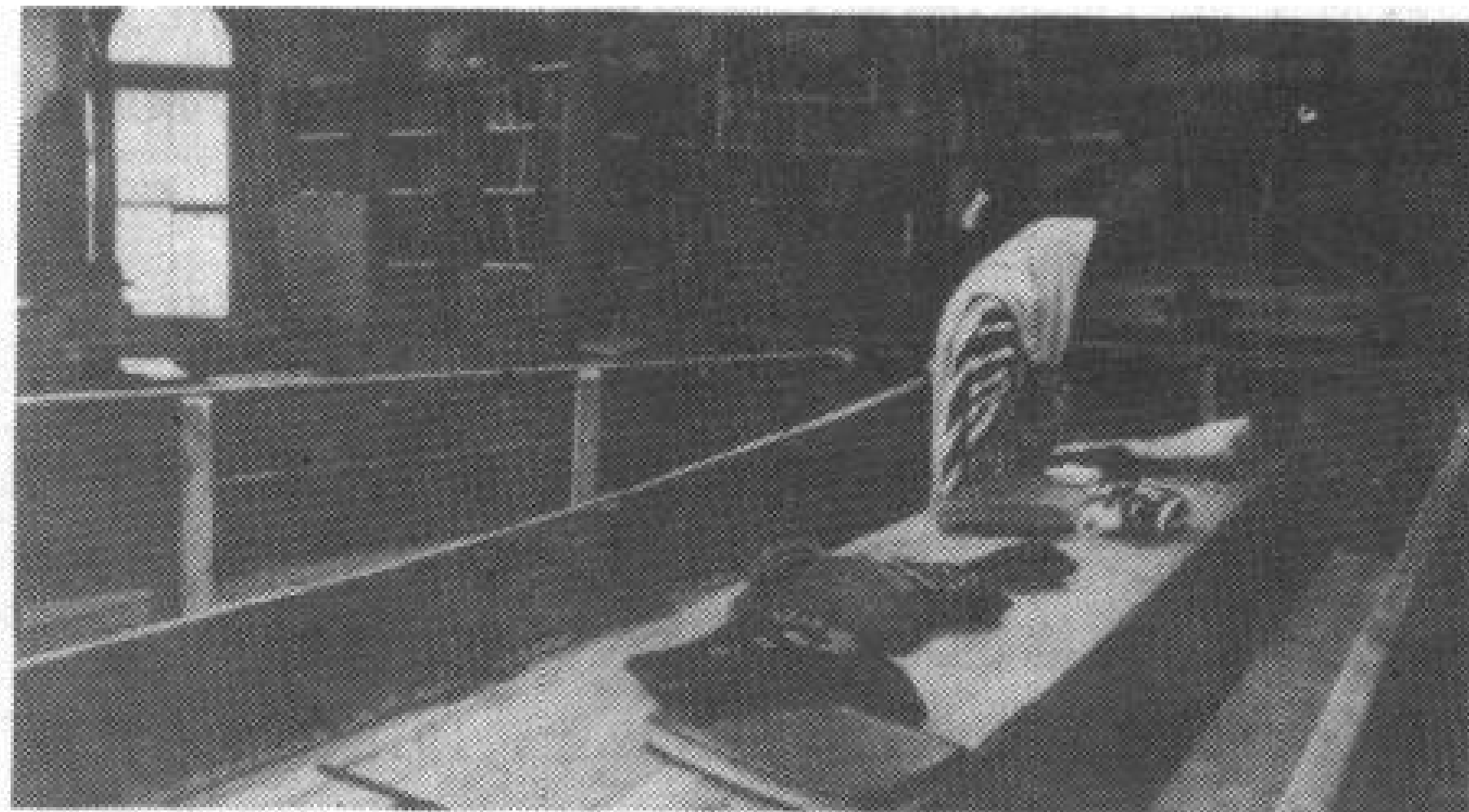
13世纪以来，阿什肯纳兹社团由于生活稳定，很少出现宣扬救世主义的运动；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塞法迪犹太社团中，这种思想却异常活跃。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丢失的10个支派还活着的传闻、《光辉之书》的出现，以及一些自称是“先知”人的各种活动。由于《光辉之书》中救世思想的广泛传播，许多犹太人都把1391年发生在西班牙的强迫改宗事件，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事件，以及1492年西班牙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事件看成是救世主即将降临的预兆。1524年欧洲突然出现的救世人物大卫·流便尼把人们对企盼救世的期待值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流便尼的救世宣传吸引了包括教皇克雷芒七世在内的许多人。尽管他本人后来被当作异教徒死在大牢中，他的救世主张却由于他的门徒所罗门·摩尔科得到广泛的传播，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波兰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为后来出现的假弥赛亚沙贝塔伊·泽维领导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世运动铺平了道路。沙贝塔伊·泽维领导的救世运动在加沙的拿单协助下在欧洲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尽管运动在1666年失败，使全世界的犹太人的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但救世运动作为一种主张在犹太人中仍有一定影响。18世纪还出现了雅各·弗兰克领导的另一场救世运动。19世纪，救世运动作为一种宗教运动已不复存在，然而其思想影响仍在继续。19世纪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尽管是犹太民族

的一场政治、世俗解放运动，但究其实质，仍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犹太民族自古以来的救世思想。

《救赎之星》 现代犹太哲学著作。由现代犹太教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弗朗兹·罗森茨维格所作。它是作者依据1918年在波兰华沙附近体验东欧犹太人生活时的感受写成。书中主要观点最早出现在作者从战场上寄回家的明信片上，战后再由作者发挥成书，1921年正式出版。作者试图以人的经验、常识以及语言在对话中的实际运用为根据，提出一种存在主义宗教哲学，解释上帝、世界、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书中将宇宙的全部存在归结为三个基本要素：上帝、世界和人。这三者之间通过创世、启示和救赎过程相互联系在一起。世界通过创世与上帝发生联系，上帝通过启示与人联系在一起，人则通过救赎与世界联系起来；由创世、启示、救赎三个力组成的三角形，与由上帝、世界、人组成的另一个三角形叠合在一起则组成一个六角星。这个六角星便是救赎之星。

对于书的作者而言，《圣经》并不是历史上出现过启示的终结。因为启示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会不断地在探索不止的个人面前显现。此外，作者还认为经卷的不可侵犯性以及诫命的有效性只有通过那些愿意向圣训敞开心扉的个人进行对话才存在。

晨祷 犹太教礼仪之一。犹太教徒每天上午进行的祈祷仪式。它是一日三祷中最精湛重要的一次祈祷。它是唯一的一次男教徒要披戴经匣和祈祷披巾的日祷。传统上，晨祷是为了纪念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在圣殿被毁后，犹太拉比将此解释为是用来代替圣殿中每日举行的晨祭。在晨祷仪式中，人们要在天刚刚破晓时诵读《示玛》，以便在太阳出来时正好诵完，紧接着是诵读《阿米达》和其他祷词，祷词诵读完后，还要口颂一系列祝祷。晨祷分个人的和公共的两种。个人晨祷在家中举行。公共晨祷通常在犹太会堂中举行。



在祈祷室进行晨祷的犹太教徒

《晨曦》 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份希伯来语月刊。该

刊由著名希伯来语作家斯摩梭斯金于1868年创办,并任主编。在发刊词中,办刊的宗旨得到了最明确的阐述:“如同我曾斥责那些自充神圣的阿谀奉承者,他们披着神圣的外衣,在周围制造喧嚷以扼杀犹太人思想,我还将声讨那些用甜言蜜语使犹太人民远离他们祖先遗产的自矜博学的谄媚者。他们对我们说,让我们与其他民族一样!我回答:是的,让我们与其他各民族一样追求和掌握知识,离开腐朽和愚昧之路。让我们成为我们所散居栖身的各个国家的忠实公民,但我们也应象其他各民族一样尊重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民族尊严。我们坚信结束我们颠沛流离的一天终会来临。主权将回到犹太人之家。我们的这一信仰决不会令人羞愧丢脸。同样,当我们坚持使用伴随我们在各民族之间迁徙的、并且为我们的诗人和先知用以吟诵的古老语言时,所有民族也不会对此感到惭愧。”这一宗旨在批判启蒙运动消极作用的同时,为近代希伯来文学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民族主义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不仅扭转了希伯来语言及其文学出现的衰落趋向,而且对后来希伯来语言的复活和希伯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晨曦》除了在理论上阐述进步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且发表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到评论、争鸣无一不登。由于它在文学上的作用和影响,造就了一批希伯来作家群体,如小说家布兰德斯泰特、诗人犹·利·莱文和门德尔克兰、学者大卫·卡哈纳和什洛莫·鲁本,语言学家本一耶胡达等。一些著名作家如阿扎尔·舒尔曼、犹·利·坎特、利林伯卢姆等先后参加过该刊编辑工作。

晚祷 犹太教礼仪之一。犹太教徒每天晚上进行祈祷的仪式。习俗认为,晚祷是为了纪念犹太人祖先雅各,在晚上睡梦中得到上帝赐福一事(《圣经·创世记》第28章第11—22节)。晚祷在天黑后进行,以诵读《诗篇》有关章节开始,随后是两段对上帝的赞颂,其中一段感谢上帝把《托拉》晓谕给以色列人,接下来是诵读《示玛》,后又是一段对上帝的赞颂,感谢上帝帮助以色列人摆脱沦为埃及人奴隶一事,最后是为和平和圣城的祈祷。有的教徒在这之后还要默诵《阿米达》和《卡迪什》。

曼杰利什塔姆 (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 1891—1938) 苏联犹太诗人。生于波兰。青年时代就读于杰尼谢夫学校,1907年去巴黎学习法语。1909—1910年,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古法语和康德哲学。俄国革命后,居住在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1918年在一教育人民委员会中工作,后在莫斯科定居。主要从事写作和发表文学评论。1934年5月13日遭逮捕,经过酷刑审讯后,流放切尔登城。曾试图自杀,未遂,精神开始错乱,但仍能写作。1937年刑满,返回莫斯科,次年在休养期间再

次遭逮捕,并被单独押往西伯利亚集中营。1938年,在给妻子的信中提及自己病倒在海参崴附近一集中营,后便宣告失踪。苏联有关部门后来宣布他已去世。斯大林死后,他的名誉得到恢复,并开始出版他的作品。

曼杰利什塔姆作为一个诗人,不赞成俄国象征主义派作品中神秘和抽象观点,主张诗歌应明晰、简洁和形式完美。为此与吉米廖夫、阿赫马托娃等人共同创立了“阿克梅”诗派。他的第一部诗集《石头》发表于1913年。1918年,第二部诗集《哀歌》发表,后由于诗歌无法在苏联出版,转而写儿童故事。流放期间写有长诗《沃罗涅日札记》等。《时间的喧闹》是他的文学评论集。1971年,其妻子出版了一部描写两人共同生活的书《希望对希望》,获得评论界的好评。

崩得 在意第绪语中是“联盟”的意思,全称为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是俄国、尔后为波兰和美国的犹太社会党。它于1897年10月在维尔诺(维尔纽斯原来的名称)建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独立组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在明斯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9名代表中有3名是崩得成员。不过,崩得代表屡次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在犹太自治问题上发生冲突。崩得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承认它是犹太劳动者在民族特征上(而不是在地域特征上)的唯一代表。因为犹太人不同于俄国的其他民族,后者集中在某些固定的领土上,他们在那里是多数民族。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个组织是按地区建立的,它们联合居住在给定地区的全体党员,是不管他们的民族归属如何的。崩得提出必须为犹太党员建立单独的地方组织。在20世纪初,这种分歧是如此尖锐,以至崩得于1903年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返回)。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其他领袖同崩得的立场进行了斗争。

崩得完全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提出,犹太人只有移居到历史家园,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与此相对立,崩得主张在犹太人居住的地区和国家中解决犹太问题。崩得不把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看作为统一的民族。因此反对全球性的犹太政策,把自己的目标局限于实现俄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和文化自治。崩得的最高机构是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1898年12月由侨居国外的俄国大学生和工人组成的“国外委员会”,是崩得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代表。20世纪初,崩得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政治工作中,它成为犹太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12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彻底分裂,崩得留在孟什维克派中。1917年底,崩得共有400个组织,4万名成员。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崩得分成左派和右派(1920)。右派大部分成员侨居国外,而左派部分成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1914年11月,德军入侵波兰的威胁日益明显,崩得中央委员会在华沙建立了波兰崩得组织委员会。1921—1939年波兰崩得用意第绪语出版周刊。在不独立的波兰,崩得作为合法政党活动。1930年,崩得加入了社会国际。

从崩得在波兰存在之日起,它就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宗教政党,但在各个领域同其他犹太工党合作。有时,它甚至同犹太复国主义工党左翼锡安工人在市政选举中合作。崩得的代表在波兰犹太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占绝大多数,1939年该委员会代表14个工会,498个分会,计有9.9万名成员。1936—1939年,在纳粹占领波兰前夕,波兰崩得的政治影响达到巅峰。在波兰被占领期间,它积极地组织了犹太抵抗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某些波兰崩得成员在犹太工人委员会的帮助下逃到美国,并在那里组织了崩得代表机构。崩得第一届国际代表大会于1947年在布鲁塞尔召开。

在以色列国成立后,崩得否定以色列在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在这方面,它不同于除共产党以外的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其他犹太工党。现在,崩得差不多在一切有犹太人生活的西方国家中发挥作用,但是,无论在哪里,它都不在犹太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崩得始终不渝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可是它存在于以色列,只是在以色列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它不起什么作用。

第一次中东战争 又称独立战争或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建国后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它从1948年5月15日开始,到1949年7月20日最后一个停战协议(以色列和叙利亚)签订而结束。

1948年5月14日,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终止。巴勒斯坦犹太人立即根据联合国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181号决议),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五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外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向以色列宣战。战争初期,阿拉伯国家投入的总兵力约42000人,其中,外约旦阿拉伯军团7500人,伊拉克军队10000人,埃及军队5000人,叙利亚军队5000人,黎巴嫩军队2000人,沙特阿拉伯解放军、救世军约10000人。以色列当时有三支武装力量,最主要的一支是哈加纳,从1948年5月31日起改名为以色列国防军。另两支武装力量伊尔贡和斯特恩邦同意停止独立活动,在除了耶路撒冷以外的以色列所有领土上加入以色列国防军。根据联合国的分治计划,耶路撒冷为“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以色列总兵力约3万人。

战争一开始,阿拉伯国家联军进展比较顺利。埃及军队从以色列南部越过边境,大股部队沿着海岸向加沙进发,另一支部队在加沙北部从舰艇上登陆,第三支部队沿

着东北方向向比尔谢巴推进。埃及部队攻占了希伯伦和贝特勒赫姆,在那里与外约旦阿拉伯军团会合,占据了耶路撒冷南部的阵地。占领了加沙的埃及军队向特拉维夫出击,在特拉维夫南面阿什杜德一地遭到以色列军队的拼命抵抗。这一战斗的主要阶段从5月29日开始,重新编组的一个旅的埃及军队越过阿什杜德,然而在该市北部3公里处的桥边受阻。以色列工兵已预先将桥炸毁。以色列军队把刚刚服役的头4架飞机投入战斗。然而埃及部队成功地隐蔽起来。位于阿什杜德附近的这座被毁桥梁,离特拉维夫32公里,它是埃及军队在整个战争期间到达的最北点。埃及军队在受阻后改变目标,进攻南方的内盖夫,控制了这一地区的所有重要公路。

在耶路撒冷战线上,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取得很大成功。5月18日,阿拉伯军团占领耶路撒冷老城阿拉伯人区,同时包围老城的犹太人区。接着又派一支部队攻占了耶路撒冷通往海岸平原公路上的要地拉特伦,切断了以色列的增援,并且切断了由沿海平原向耶路撒冷的供水管。5月28日,耶路撒冷老城犹太区被迫投降。耶路撒冷新城区的以色列军也十分危急,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以色列武装力量三次试图夺回拉特伦,均未成功,并遭致重大伤亡。

在以色列中部,伊拉克军队一个装甲旅和两个步兵旅(一说为一个装甲团和一个步兵旅)于5月24日攻占了呈三角形的纳布卢斯、杰宁和图勒卡姆。图勒卡姆离地中海只有10英里,以色列面临被拦腰切断的危险。5月25日,伊军又向纳塔尼亚推进,他们攻占了一个基布兹,并向图勒卡姆附近的其他三个基布兹发起进攻。为了抑制伊军的攻势,以色列军队从北部向三角形地区渗透,力图夺回杰宁,但未能成功。

在北部,叙利亚军队从太巴列湖南面攻入以色列。叙利亚投入精锐步兵旅、装甲营、炮兵师和坦克连各一个,于5月15日夜发起进攻。经过残酷的战斗,叙利亚军队陆续攻克了一些犹太居民点。战线转移到德加尼亚,在那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以色列军队击毁了3辆叙军坦克。叙利亚军队撤退了,但是仍然占领着德加尼亚东部的丘陵地带。6月6日,叙利亚军队重新向太巴列湖北部的居民点发起进攻。6月10日,他们占领了约旦河西岸的据点。黎巴嫩部队在北线马尔基亚也与以军打响了。

以色列只控制了阿克、海法、特拉维夫等沿海地区、耶路撒冷新城至地中海一带狭长地带,处境十分危险。5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英国提出的停火决议案,并授权联合国调解员、瑞典红十字会主席福克·伯纳多特订出停火生效的具体时间。在伯纳多特斡旋下,阿以双方同意从6月11日起停火4周。阿以军队利用停火期间巩固自己的阵地。以色列进口大量武器,扩充实力。它从美国运来轰炸机,从法国运来坦克和大口径火炮,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麦塞什密特式飞机和坦克。停火结束时,以

军已扩至6万多人。而阿拉伯国家参战兵力只增至5万余人,武器装备没有什么改善。阿以之间的军事实力发生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变化。

停火有效期到6月9日6时结束。军事行动重新开始,一直延续了10天。在这10天中,以色列军队最大的一次进攻,是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的中部战线上对外约旦阿拉伯军团的出击。经过一天半的战斗,在坦克部队的首次参与下,以色列军队占领了中东最大的机场——卢德机场。随后,以色列坦克营向卢德发起攻击,占领了该城。7月12日,以色列军队又占领了拉姆拉。不过,以色列军队企图占领拉特伦和潜入耶路撒冷老城的努力遭到失败。以色列在北部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7月16日攻占了拿撒勒。由于这个行动,从海法港到太巴列湖的整个下加利利地区为以军所控制。

7月15日,安理会又通过了美国提议的第二个停火决议,未规定停火期限。7月18日下午停火生效。以色列利用这次停火机会大量移入犹太人和采购军需物资。以色列军队得到训练和扩充,到10月中旬,已猛增至9.9万人,编成12个旅。阿拉伯军队也扩至7万人,编成18个旅。

10月15日,以色列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主要针对埃及军队控制的地区。这天以色列派出车队向内盖夫的犹太居民点运送非军事物资,晚上6时借口埃及人攻击车队,在卡拉提亚交通路口发起攻击。经过7天战斗,以军控制了通向内盖夫的道路。在这次战斗中,以军投入了3个步兵旅、1个装甲坦克营和最强的炮兵支队。以色列空军首次取得空中优势。以色列海军在加沙海岸附近击沉埃及旗舰“埃米尔·法鲁克”号。10月21日凌晨以色列军队开始猛攻比尔谢巴,9时15分占领该城。埃及军队10月28日撤离阿什杜德,11月6日撤出马杰达勒。在法卢贾地区,几乎整个埃及旅2500人处在以军的包围之中,受围的官兵坚守3个月,直到签订停战协定后才撤出。10月31日,以色列占领了整个加利利地区。

10月26日,安理会应埃及要求,在巴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对内盖夫的进攻。英国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大举进攻的行动深感不满,它在会上提议,以色列应从内盖夫撤出,不然的话,联合国应对以色列采取制裁。29日,在纽约竞选总统连任的杜鲁门听到安理会情况后,立即指示美国驻安理会代表团设法阻止英国提案通过。安理会在美国一再坚持下,删掉了有关制裁的内容,于11月4日通过了一项一般性提案,提请争执双方“注意”撤回10月15日前的位置。杜鲁门在总统竞选获胜后不久,公开表示反对“任何企图夺走以色列的内盖夫的主张”。

12月3日,英国在安理会上提出把联大分治决议规定的阿拉伯国并入外约旦,美国声明不能予以支持,提案被否决。英国于是改变主张,设法将已为阿拉伯军团占领

的约旦河西岸土地划归外约旦,造成既成事实。12月13日,在英国的支持下,外约旦议会通过了兼并约旦河西岸土地的决议。

11月,以色列国防军制定了“霍列夫”行动计划,以把埃及军队赶出以色列南部边界。12月22日午夜,沿海地带遭到以色列炮火的猛烈袭击,以军戈拉尼旅投入军事行动。腊法和加沙之间的通讯中断,以军占领关键制高点的企图得以实现。12月26日早晨,以军占领了埃军东翼的中心堡垒,包围了比尔·阿斯卢杰——埃军战线在东北最大的据点,由此打通了从后方到达埃军防御工事的中心点奥贾的道路。以军主力于12月26日拂晓开进奥贾地区,晚上和埃军警戒部队发生战斗,但是以军未能进行决定性的进攻。以军在实施对奥贾北部和西部要冲的封锁后,于27日清晨发起攻击。在攻击中,以军装甲坦克旅的一个营起了决定性作用。以军遭到埃军的顽强抵抗,埃军地面部队在空军掩护下投入战斗。上午8时,边境重镇被以军攻占,埃军撤出自己的据点。以军继续追击,从而控制了比尔谢巴到奥贾的公路,把埃军完全赶出以色列领土。

12月28日,以军沿着奥贾向西和西北的方向,踏着埃军撤退的足迹,越过边境侵入埃及领土西奈半岛。29日以军向埃军主要基地阿里什进攻。30日,以军抵达阿里什机场。正当以军在离阿里什3英里的沙丘上布置对阿里什的进攻计划时,接到1月2日撤出西奈半岛的命令。原来,英国通过美国政府向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说它要按照1936年签订的英埃条件保卫埃及领土。以色列领导人本—古里安应美国总统的要求,命令停止战斗,并命令部队立即撤出西奈半岛。

1949年1月3日,以军撤出西奈后,随即进攻腊法城,埃及驻军顽强反击,守住了腊法城。但以军夺得了城南俯瞰铁路和公路的制高点,造成了加沙埃军被包围的局面。1月6日,埃及政府被迫宣布同意与以色列进行停战谈判。以色列于7日同意停火。同一天,以色列空军击落英国5架战斗机。事后以色列宣称,它把英国飞机误认为是埃及战斗机。英国对此大为恼火,要求以色列赔偿,同时向亚喀巴增派部队。1月12日,埃以双方在希腊的罗得岛开始停战谈判。2月24日埃及首先与以色列签订了停战协定。

3月初,以军分两路进攻内盖夫南部地区。3月7日,以军夺取亚喀巴西面5英里的埃拉特要地,获得了通向红海的出口处。3月23日、4月3日和7月20日,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分别与以色列签定了停战协定。至此,9个多月断断续续、打打停停的战争宣告结束。

经过这场战争,以色列多占了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划给“阿拉伯国”的573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占领了西耶路撒冷。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两个国家,“犹太国”的面积为14942平方公里,“阿拉伯国”为

11203平方公里。这样一来,以色列总面积达到20673平方公里。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354平方公里,约旦控制了约旦河西岸5295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东耶路撒冷。1950年4月23日,约旦宣布将约旦河西岸地区(又称东巴勒斯坦)并入外约旦,改国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所谓“阿拉伯国”被瓜分完毕。在这次战争中,阿拉伯联军死亡1.5万人,伤约2.5万人;以色列军队死亡0.6万人,伤约1.5万人,近10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其财产损失估计达20亿英镑。

以色列能赢得这场战争,与美国犹太人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阿以开战不久,以色列危在旦夕。在这个紧急关头,梅厄夫人飞到美国求援,她在那里受到美国犹太人的热烈欢迎。她对他们说:“掌声保不住以色列国的生存。战争不能靠演讲、宣言或是幸福的泪水取胜。时间是关键,不然,鼓舞将是空的。”“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梅厄夫人终于获得美国犹太人7500万美元的捐助,以色列用这笔巨款购买了武器。为了扭转战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给以色列驻联大代表埃班发出一份急电说:“以色列急需几星期的喘息时间来重新组织和装备军队”,“以色列需要立即停火”。于是,美国促使安理会安排了阿以双方为期4周的停火。这给予以色列一个重要的喘息机会。

阿拉伯联军由优势转为劣势,其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内部矛盾加剧。名义上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充任阿拉伯武装部队总司令,统率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实际上多数国家不听他的指挥,各打各的。外约旦和埃及都不愿意在它们的近旁再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早在1947年11月初阿卜杜拉和梅厄夫人秘密会晤时,就谈到了他的计划:他准备接受联合国分治巴勒斯坦的方案,并将接管按分治计划成立的阿拉伯国,把它并入外约旦,然后同犹太人的国家达成和平协议。埃及出兵巴勒斯坦的部分动机是想占领一些巴勒斯坦的土地,免得巴勒斯坦全部或大部分落入阿卜杜拉的手中。在第一次停火期间,阿卜杜拉在英国的支持下立即着手吞并巴勒斯坦的剩余土地。埃及对此举表示反对。这样,阿拉伯国家在停火期间卷入了内部纷争,对停火结束后的军事行动没有认真进行准备,从而使局势发生有利于以色列的变化。

在关键时刻,英国撤消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是使阿拉伯联军转向劣势的另一原因。阿以战争爆发后,英国除供给埃及、叙利亚、外约旦武器和弹药外,还派了37名英国军官到外约旦阿拉伯军团直接指挥战斗,其中包括担任军团司令的格拉布。1948年5月27日,英国代表在安理会上表示立即采取措施使英国不再介入战争,其中包括:撤走阿拉伯军团内英国军官,停止供应阿拉伯国家武器弹药。英国这种作法,使约旦军队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巴勒斯坦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正式成为英、土作战战场是在1917年。1914—1917年巴勒斯坦被土耳其政府及其同盟军当作发动对苏伊士运河和埃及进攻的基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为土耳其军队提供军需品,人们承受着沉重的赋税、徭役,财产被掠夺。1917年,英军将土耳其人赶出埃及后,继续向北追击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除了兵灾外,还爆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土耳其政府经济濒于崩溃。犹太人一直对世界各地犹太人慈善基金依赖性很强,特别是传统的犹太人由于缺乏合理组织从而陷入了困境。1917年耶路撒冷和萨费德的犹太人有几千名死于饥荒。新移民的情况略好,由代表各机构部门的战时危机委员会管理经济事务。美国犹太人用军舰运送而至的钱和食品在缓和危机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土耳其政府对犹太人的态度动摇不定,其有把犹太人看作亲土耳其派的传统,并由于与德国、澳大利亚结盟等政治因素,这种观念得到加强。但新移民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亲密联系又使其对犹太人的忠诚发生怀疑。战争爆发初期,土耳其政府从犹太人独立村落和特拉维夫征兵。同时,拘捕了敌方俄国的犹太人,逐往埃及。随后大约有11300名犹太人离开了巴勒斯坦。大多数人留在埃及的军营中,有500人参加了土耳其军队。犹太人首领努力阻止犹太人进一步被逐和迁移。为了表示其忠诚,希伯来学校许多学生进入了伊斯坦布尔的军官学校。而土耳其军政府一方面拘捕犹太复国主义者,另一方面对其他犹太人态度良好,一些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没有联系的犹太人首领还被邀请参加制定政府的各项方案。1917年10月31日,英国军队发动了土耳其政府意想不到的进攻,占领了东部的贝尔谢巴。然后,继续占领了加沙。英军首领H·H·艾伦比率领军队向北部推进,一路没有遇到土耳其军队的大规模抵抗,到达加法与耶路撒冷之间的铁路枢纽利达以后,与土耳其军队展开了激战,将其逐出利达并分割为两半。随后夺取海岸城市加法,并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军。1917年12月8日对耶路撒冷发起总攻,第二天土耳其军队便宣布投降。从此,结束了土耳其政府在巴勒斯坦地区401年的统治,巴勒斯坦又沦为英国的托管地。

第一次阿利亚 1882—1903年期间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浪潮。这些移民为民族意识所驱动,力图掌管和定居巴勒斯坦。这次移民运动为首的是一个不大的青年小组,它确信,犹太问题只有通过犹太人民返回自己的历史家园的方法才能得到解决。于是,在俄国出现了锡安热爱运动的第一批小组(比卢成员也属于这个运动),它们把自己的目的确定为:从政治和民族精神上在巴勒斯坦复兴犹太民族,并在巴勒斯坦建立农耕居民点。在它们的影响下,一批东欧犹太人在1882—1884年期间来到巴勒斯坦。埃特蒙·德·洛希尔男爵的财政和行政帮助使移

民们获得新的土地,并于1890—1891年期间建立了一系列定居点。在这些定居点中,居住着1万名犹太人。约有3千人住在雅法。那时,希伯来语开始成为口语,犹太人创办了一些用希伯来语授课的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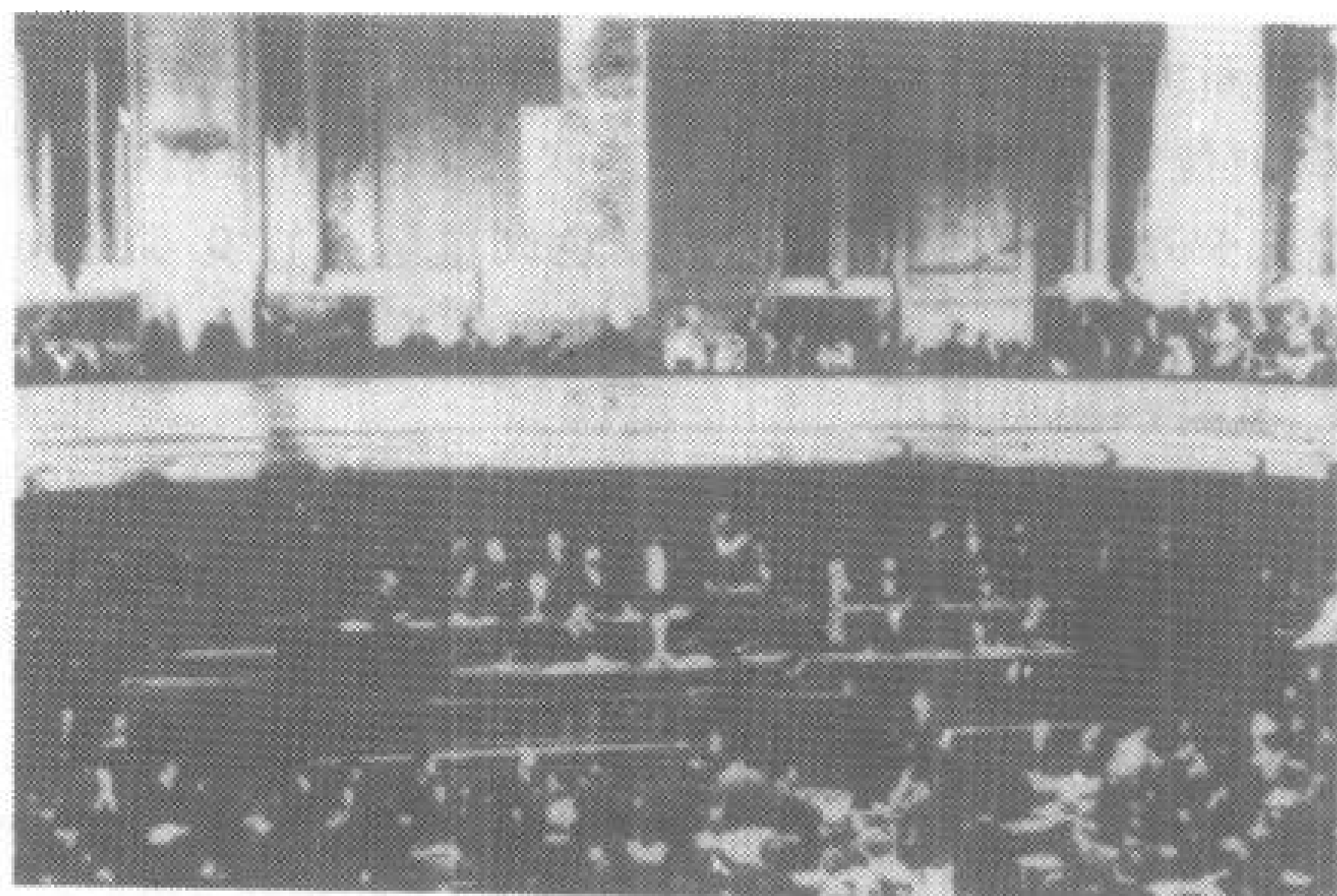
19世纪80年代初,也门犹太人开始移居巴勒斯坦。第一个有组织的小组于1882年到达。这年年初,在耶路撒冷居住着200个也门犹太移民,而到1885年,那里已经居住着400个也门犹太移民家庭。1890年也门移民开始在雅法定居,3年后在那里建立了雇佣劳动联合会,目的在于把阿拉伯工人从犹太农村定居点中排挤出去。在第一次阿利亚期间,共有2.5万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使该地区的犹太人口增加到4.7万。不过,由于生活条件过于艰苦,很多犹太移民后来离开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控制的土地约1万公顷。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一次聚会。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的巴塞尔开幕,31日闭幕,历时3天。大会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先驱和著名领导人赫茨尔亲自倡议和组织召开。原计划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由于当地犹太社团和拉比团的反对,而易地举行。本次大会是自犹太人在世纪初被驱散到各地以来所召开的第一次正式的世界性犹太人会议。它的召开标志着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开端。来自东欧、西欧、英国、美国和阿尔及利亚的197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中包括各方面的人士,有青年人和老年人,正统派和改革派,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会议对世界犹太人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作出了一系列对犹太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决议。大会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制定了行动纲领,宣布成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治组织,并选举了它的领导机构。

会议通过的《巴塞尔纲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第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文件。它以明确的语言和公开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家”。宣言中还包括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确定的四项具体措施。它们是:(1)不断鼓励犹太人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民定居;(2)组织和联合所有的犹太人;(3)大力加强犹太民族情感和提高他们的觉悟;(4)采取步骤,争取有关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和同情。

会上成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标志着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终于有了统一的政治组织。它不仅把东、西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而且将全世界的犹太人连结在一起,为犹太民族的解放事业进行共同的斗争。在这之前,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从事的是“务实行动”,所有活动以向故土以色列移民定居为中心展开;而西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则主要从事“政治行动”,以外交方式争取有关国家,特别是某些大国的支持和认

可,争取国际间对犹太人事业的经济和财政援助。统一组织的出现象征着“务实派”和“政治派”的结合和团结,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会场
(1897年,巴塞尔)

大会还选出了以赫茨尔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的领导机构,一致通过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旗帜和颂歌,建立了总部设在维也纳的行动委员会。

大会所确定的会议程序成为后来若干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模式。大会的程序为:(1)海外犹太人社团形势报告;(2)故土以色列形势及移民安置活动报告;(3)议案辩论;(4)议案表决和选举领导机构。这样安排的会议程序作为模式被接受,成为后来的若干次代表大会的固定程序。

本次代表大会的海外犹太人社团形势报告由诺尔道所作。会议的正式用语为德语,会议公报亦用德语发表。台上的发言为意第绪语化的德语,被与会者戏称为“大会德语”。

第二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39年8月16日至26日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政府放弃了分治计划。在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谈后,于1939年5月发布了又一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极为不利的白皮书。白皮书规定:在未来5年中最多只能向巴勒斯坦移民7万人,并严格限制犹太人购置土地。与会代表一致谴责了白皮书的立场,宣布伊休夫已做好反对对犹太人种种限制的准备。卡茨奈尔森提出了“非法”移民计划,号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动员其所有力量为实现犹太民族的奋斗目标而努力。

在面临战争的情况下,整个执行委员会成员当选连任。在大会的闭幕式上,魏兹曼以激动的心情说道:“我唯一要祈祷的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下次会议召开时还活着。”大会主席乌色什金则表达了他对波兰犹太人命运的严重关注。

第二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46

年12月9日至24日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这时的政治形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终于大白于天下；欧洲的犹太社团已几乎不复存在；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已经开始了武装反对英国托管当局的斗争；修正党回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并派出代表团参加大会；旨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共同体的巴尔得摩计划(1942)，已经在1945年纽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议上，被批准为现阶段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纲领；英美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主张废除白皮书，立即给10万犹太人发放迁入巴勒斯坦许可证，取消对犹太人购买土地的各种限制；然而，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英美委员会的建议；伊休夫武装抵抗运动开始加强；伊休夫和犹太代办处的领导人被托管当局逮捕；莫里森计划(在巴勒斯坦建立由4个区域组成的联邦方案)已经公布；英国建议在伦敦召开犹太人—阿拉伯人会议，以寻找一项共同解决方案，并宣布在会议开始前释放犹太领导人。代表大会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举行的。大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对莫里森计划和伦敦会议确定犹太人的立场。魏兹曼强调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重要性，以及争取获得美国总统杜鲁门和美国公众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伊休夫事业的同情和支持的重要性。大会经过辩论通过了“建立一个与世界民主体制相适应的犹太人国家”的政治纲领，否决了莫里森计划中提出的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犹太人联邦的方案，同时拒绝参加拟议中的伦敦会议。魏兹曼由于反对最后一项决议，赞成出席伦敦会议，宣布辞去主席职务。大会没能选出一位新的主席，主席职位宣告暂缺。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也是魏兹曼最后一次出席代表大会。

第二十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68

年6月9日至19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本次大会不同于以往。第一，它是在“六日战争”后在统一的耶路撒冷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第二，大会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气象，有许多青年代表团、学生代表、阿利亚运动成员出席了大会。阿利亚运动是大会辩论的焦点。以色列政府决定设立移民吸收部的做法得到了大会的认同。《耶路撒冷纲领》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增加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目标是：促进犹太民族的团结，突出以色列在犹太生活的中心地位；通过世界各地阿利亚运动，扩大犹太民族在其历史家园故土以色列的聚集，加强在先知正义和和平思想基础上建立的以色列国的实力；通过犹太教育，加强希伯来语、犹太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传播，保存犹太民族的认同意识；保障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的权利。

戈尔德曼辞去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一职，大会未能选出新的继任人。路易斯·平卡斯当选为执行委员

会主席，以接替已故夏里特留下的职务。

第二十八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72

年1月18日至28日在耶路撒冷举行。在本次大会上，会议代表不再由各党派之间达成的协议决定，而是由各国自行选出。有选举权的代表为559人。协会的成员有大约90万人。大多数来自以色列的代表都是由以色列各政党根据其在以色列议会中名额比例提名选出。塞法迪和东方犹太人社团派出了代表和观察员约90人。由犹太学生世界联合会和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选派的青年代表团阵容庞大。大会主要讨论了海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具体任务，其中包括犹太教育、青年工作，以及动员自由国家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等。受到重视的议题还有以色列不同社团之间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差别和住房短缺问题。大会还对苏联犹太人争取移居权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先前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在担任两任领导职务后仍未移居以色列便失去再次当选权利的决议被认为违背了大会章程，从而宣告无效。

平卡斯再次当选执行委员会主席。

第二十九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78

年2月20日至3月1日在耶路撒冷举行。大会原定1977年1月举行，但由于大会法庭裁决允许90%不经过选举而组成的代表团与会的提案违背会章而推迟。约有100万犹太人在大会准备阶段登记为协会会员。

本届大会忠实地反映了1977年以色列发生的政治变化。以色列工党在选举中落后于利库德集团和海外联合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在550个有选举权的席位中，利库德集团占据174个，成为第一大党。接下来的是海外联合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拥有113席。工党只获93席，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代表为75人。

大会决定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设在以色列的所有部门必须根据平等对待犹太教内正统、保守、改革等教派的原则，分配管理。

来自利库德集团的杜尔琴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利库德集团的代表还取得了掌管阿利亚部、青年部、教育部的权利。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总务委员会主席由工党代表担任，安置部由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共同掌管。工党代表还获得司库的职位。

第二十三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51

年8月14日至30日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举行。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所确立的运动目标已经实现，现代以色列国在1948年5月14日宣告成立。已经成为以色列国总统的魏兹曼未能出席本次大会，但给大会送去了书面发言稿。大会的开幕式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墓地旁举行，以表示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先驱的敬意。会

议执行主席洛克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作了总结,回顾了从巴塞尔到耶路撒冷的历史进程。大会辩论的中心议题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犹太人国家建立以后的作用和地位。由于《巴塞尔纲领》在1948年以后已不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为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耶路撒冷纲领》所取代。《耶路撒冷纲领》确定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巩固以色列国的存在,鼓励流散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和促进犹太民族的大团结。大会以后成立的联合体包括了除犹太复国主义修正党以外的所有派别。

会议为执行委员会选举了两主席。选举戈尔德曼为驻纽约主席,洛克为驻耶路撒冷主席。会议还通过了一项要求以色列政府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在以色列国中正式地位的决议。1952年11月24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和犹太代办处合法地位的法案。

第二十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60年12月27日至1961年1月11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本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辩论由于本—古里安对协会的尖锐批评而引起的以色列政府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在以色列国中的正式地位问题。其他方面的议题还有阿利亚运动、移民吸收、海外犹太文化和教育。

戈尔德曼再次当选为协会主席和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之后,由于洛克的辞职,夏里特被选为耶路撒冷执委会主席。

第二十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64年12月30日至1965年1月10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本次大会的口号是“面向海外”。这也是会议的中心议题。自从以色列国成立以来,戈尔德曼认为有必要重申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应该包括维护犹太民族在海外的生存权利,以及以色列国对犹太人民的支持。和以往几届代表大会一样,代表们对以色列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之间的关系,对阿利亚的义务等发表了看法。大会一致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加深犹太人民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认识,扩大这一运动在犹太人生活中的影响。在承认犹太民族独特性,以及具有连续历史的基础上,强调散居犹太人的团结,相互间的义务,对历史命运的共同责任,以及承认以色列国在保证犹太民族前途上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戈尔德曼再次当选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夏里特仍被选为耶路撒冷执行委员会主席。

第二十四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56年4月24日至5月7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由于苏伊士运河出现的紧张关系,以色列国的安全成了主要议题。代表

们对苏联集团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入埃及感到不安。

有关以色列的内部问题,如阿利亚运动、移民安置活动、筹款组织等,均在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大会决定所有的经费都集中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财政部和联合以色列呼吁委员会手中。

戈尔德曼当选为协会主席,从而使自1946年以来一直空缺的职位得到了填补。

第二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37年8月3日至16日在瑞士的苏黎世举行。大会自“乌干达计划”以来,再次面临困难局面。1937年7月7日前往巴勒斯坦调查阿拉伯人骚动的英国皇家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在阿拉伯地区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在面积较小的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对这一建议意见分歧,工党领导人本—古里安支持这一建议,卡茨奈尔森则反对这一建议。魏兹曼在指出这项建议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也抱怨这项建议对犹太人过于苛刻。大会经过激烈辩论决定授权犹太代办处和英国政府举行谈判,以取得一项比较满意的分治建议,并将谈判结果报告代表大会以便作出最后的决定。

此外,大会在巴塞尔举行了一项特别会议,纪念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40周年。纪念大会由乌色什金主持。参加过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激动地回忆了那次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会议。

第二次中东战争 又称苏伊士战争。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英、法资本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以色列在英、法的支持下于10月29日向埃及发动的战争。11月7日,交战各方同意停火。因为战争发生在埃及的西奈半岛,所以以色列人也称它为西奈战争。

战争的缘起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革命成功后,埃及政府就计划在尼罗河中游阿斯旺修建一个高水坝,控制尼罗河洪水,以利用水力发电和扩大耕地面积。据当时估计工程耗资约10亿美元,完工后可使埃及国民收入增加1/4。为了修建水坝,埃及曾向美、英和世界银行求援。1955年12月,美、英表示愿在第一期工程中赠送埃及7千万美元(其中美国提供5千6百万美元),世界银行也将贷给埃及2亿美元。但美、英同时提出了许多监督条件。1956年5月底,美国副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会见埃及驻美大使,谈到援助修建水坝问题时,除了坚持原有的条件外,还提出了两项新的要求:一是埃及必须公开宣布今后不再同苏联进行军火交易,二是纳赛尔必须利用他在中东的地位,促使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前此,埃及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大量的苏联武器,其中包括米格式战斗机、伊柳辛式轰炸机、中型和重型坦克、

大炮、潜水艇、驱逐舰以及导弹等重要军事装备。

1956年6月18日,英军最后撤离苏伊士运河区,次日,埃及宣布将同苏联合作修建水坝。7月19日,美国国务院突然宣布中止对水坝的援助,对埃及施加压力。24小时后,英国宣布撤回援助,世界银行的贷款也随之取消。纳赛尔对此十分气愤,说:“这不是撤消援助,这是对我们政权的进攻。”

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亚历山大港解放广场向25万群众发表重要演说,并宣读了“关于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法令”。法令规定: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的全部财产移交埃及,管理公司的一切机构全部解散,运河航道将由埃及成立机构管理。苏伊士运河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极为重要。它全长175公里,沟通地中海与红海,成为东西方交通的咽喉要道,使欧亚两洲之间的航程,比绕道非洲好望角缩短6千到1万4千公里。苏伊士运河于1859年由法国人德勒塞普斯驱使埃及数十万民工开始建造,历经10年方才竣工。从1924年起,苏伊士运河公司96%的股票掌握在英、法手里。1955年运河收入达1亿美元,埃及所得仅有3百万美元。1936年签订的英埃条约确认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驻军的权利。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决定,沉重地打击了英、法在中东的权益。英、法即决定进行武装干涉,英国国防部于8月3日着手制定作战计划。以色列内阁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发生分歧。总理本-古里安主张对埃及采取强硬路线,他在第三届议会选举(1955年11月)后仍然兼任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夏里特持较为灵活的路线,倾向于较多地依靠联合国。1956年7月,同意本-古里安的观点的梅厄,取代夏里特任外交部长。9月7日、29日,以色列作战部长和外交部长先后应邀访法,与英、法研究如何采取联合军事行动。10月22日,英法以首脑在巴黎举行会谈。24日,三国最后决定了联合作战计划。以色列按计划于10月29日下午,派一个伞兵营空降米特拉山口,发动了针对埃及的战争。

战争爆发前,以色列国防军共有10万人,编成18个旅,拥有坦克400辆,作战飞机150余架。埃及总兵力15万人,编成约6个师,拥有坦克500余辆,作战飞机250余架。英、法参战的陆军约有3个师、1个旅、2个团、1个营,约2.2万人;空军有21个空军中队,作战飞机约320架;海军有作战舰只约50艘,其中航空母舰5艘(舰载机约150架),巡洋舰6艘,战列舰1艘。

战争的过程 纳赛尔对英、法的入侵有一定的思想准备。8月9日,他下令成立埃及民族解放军。10月24日,埃及和叙利亚、约旦成立了联合司令部。但是,纳赛尔没有预料到以色列会首先向西奈半岛发动进攻。以色列军队于10月29日下午4时越过埃、以边界,分三路向西奈半岛埃及驻军(约2个师)突然发起攻击。中路向阿布奥格拉进攻,矛头直指伊斯梅利亚。北路沿地中海海岸袭

击加沙地带腊法和阿里什。南线由孔蒂拉向西奈半岛南端沙姆沙伊赫推进。埃军司令部于当日下午7时才获悉以军进攻的消息,急令苏伊士运河西岸的第4装甲师和2个步兵旅渡河进入西奈半岛准备进行反击。双方在西奈半岛展开激烈战斗。

10月30晨,法国总理摩勒和外交部长比诺赶到伦敦和英国首相艾登会晤。下午6时,英、法两国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以双方立即停火,并从运河两岸各自后撤10英里,由英、法派军进驻运河区的重要港口。如果在12小时内不履行上述要求,它们就要进行军事干涉。埃及当晚举行内阁会议,决定拒绝英、法的通牒。11月31日,英、法正式宣布成立两国对埃作战的联军司令部。下午7时起,英、法空军出动大批轰炸机对埃及主要机场进行轮番轰炸。至11月3日,炸毁埃及飞机200余架。纳赛尔发现英、法伙同以色列企图全歼埃军主力于西奈半岛的阴谋后,立即下令埃军从西奈半岛全线后撤。西奈半岛于11月4日被占领。

11月1日起,英、法空军连续对塞得港狂轰滥炸。塞得港是埃及第二大港,扼苏伊士运河的北口,一面临海,三面为湖泊和沼泽包围,只有向南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向运河中部的开阔地带。11月6日晨,英、法从马耳他海运送2万2千名海军陆战队在塞得港附近登陆。英、法联军占领塞得港后沿苏伊士运河南下进抵卡卜。11月2日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通过了立即停火的决议。11月5日,以色列在占领沙姆沙伊赫后,宣布停火。在美苏的压力下,英、法于11月7日同意停火。

国际舆论的反应 亚非拉各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运河和反抗侵略的斗争。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9月17日,毛泽东在接受埃及大使递交国书的答词中再次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苏伊士战争爆发后,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继埃及之后与英、法断交,约旦和伊拉克也同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约旦都宣布总动员,表示愿将全部力量交由埃及支配。

在11月1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有10个亚非拉国家的代表发言,一致谴责英法以的侵略行为。由于英、法拒绝执行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于11月2日通过的停火协议,11月3日埃及政府要求立即召开联大会议。在这次大会上,19国亚非国家提出一项提案,要求立即停火,制止把军队、军火运进这个地区,以色列军队撤回停战线后。这个提案以59票对5票获得通过。

英、法的侵略也遭到欧美人民、包括本国人民的反对。11月4日,伦敦5万市民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反对政府侵略埃及。英、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10月31

日,英国反对党工党对政府提出弹劾。工党领导人盖茨克尔称政府的侵埃决定是“非常愚笨的行动”。11月3日,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和英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安东尼·纳丁因不同意政府对埃及政策而辞职。法国的摩勒政府也受到来自议会和社会党内部的抨击。英国首相艾登于11月23日宣布自己疲劳过度,到牙买加去休养。1957年1月,他在各种压力下,终于辞去首相职务。

大国的争夺 在苏伊士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同英、法在中东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和争夺。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美国力图利用英、法的困境,取而代之。1956年7月28日,美国派了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去伦敦参加外长会议,打算说服英、法放弃使用武力。艾森豪威尔还亲自和艾登通了电话,强调依靠武力解决运河问题是“站不住脚的”。10月29日苏伊士战争爆发。30日清晨,美国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出提案,要求埃以双方立即停火;以色列军队撤退到1949年停战线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该地区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色列不接受本提案时,不给它任何援助。对于美国的提案,英、法使用了它们的否决权。美国总统助理亚当斯说这是美国 and 两个“最老的和最亲密的盟国”之间发生了“公开和痛苦的分裂”。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获悉英、法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后,立即召见英、法驻美使节,表示美国反对英、法把军队开进运河区。同一天,艾森豪威尔也向艾登和摩勒发出警告。英、法空袭埃及后,10月31日,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讲话,认为英、法“采取这些行动是错误的”。11月1日下午和晚上,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美国代表提出的提案要求:(1)各方立即停火,停止将军队和武器运入该地区;(2)缔结停战协定的各国立即将军队撤回停战线后;(3)联合国各会员国不将军事物资运往敌对地区;(4)一俟停火生效,即采取步骤使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并恢复安全的航行自由;(5)联合国秘书长观察本决议执行情况,并就此事迅速向安理会和联大提出报告,以便它们采取自己认为符合宪章的适当的进一步行动;(6)在决议得到遵守以前,联合国大会继续进行紧急会议。11月2日,大会以64票对5票通过了上述提案。艾登说:“在联合国大会中带头采取反对以色列、法国和英国的行动的,不是苏俄,也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而是美国政府。”

联合国决定建立国际紧急部队后,美国力迫英、法早日停火和撤军,它想通过国际部队控制运河。由于英、法仍然拒不执行限期停火的决定,美国便以中断石油供应,不准使用美援武器,甚至动用第六舰队,对英法进行威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也对英、法提出严厉警告,他声称如不立即停火,苏联将不惜对英本土实施核攻击。针对苏联的举动,艾森豪威尔表示:“假使苏联直接攻击英、法,我们当然要卷入一场大战。”英、法宣布停火后,

美国一方面进一步排挤英、法,另一方面则把苏联作为它争霸中东的对手。美国坚决反对英、法和苏联参加联合国紧急部队,以便由它一手操纵这支部队插足埃及。11月6日,艾森豪威尔和艾登通电话时,希望艾登能够不附加任何条件遵守联合国协议,认为这是“排除俄国制造麻烦的高明办法”。1956年12月22日,英、法军队全部撤出埃及。联合国部队也按规定于12月24日开始撤出塞得港,不久又撤出了运河区。

1957年,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提出撤军条件,要求联合国部队长期驻扎在埃及亚喀巴湾沿岸地区,以保证以色列的自由通航,并要求以色列和联合国部队共同占领加沙地带。苏联对美国 and 以色列提出指责,加上阿拉伯国家的坚决反对,以色列军队于1957年3月16日撤出埃及领土。同时,联合国部队进入加沙和沙姆沙伊赫。3月17日,埃及政府宣布接管加沙地带,并任命了自己的行政长官。

战争的后果 在这次战争中,埃军死亡约650人,伤约5000人,被俘和失踪约6200人,损失飞机约215架。以军死亡约200人,伤约900人,被俘4人,损失飞机15架。英法联军死亡26人,伤约130人,损失飞机5架。

战争结束后,埃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清除英、法的残余殖民势力。1957年1月2日,埃及政府废除了1954年签订的英埃条约。1月15日,埃及颁布命令,规定所有在埃及的外国银行、保险公司、贸易公司必须归埃及人所有。1956年11月27日,约旦宣布废除英约同盟条约,撤消英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同月,叙利亚接管了国内英、法开办的学校。迄此,英国在中东只剩下波斯湾沿岸一些小块的殖民地,法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地也大部分独立。

由于纳塞尔是第三世界国家集团的发起人之一,以色列同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合作,使以色列同那时形成的第三世界国家集团的关系急剧恶化。苏伊士战争以后,以色列西南边境相对安静,并保障了南端埃拉特经亚喀巴湾通向红海的自由航道,藉此与西非和亚洲进行贸易,因为苏伊士运河对以色列仍然是关闭的。以色列军队撤出战争期间所占领的土地后,它同苏联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同美国和英国达到相互谅解。不过,法国成为以色列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苏联继续向埃及和叙利亚、英国则向约旦提供武器。

第二次阿利亚 1904—1914年期间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移民主要来自俄国和东欧,一开始他们在农村定居点和城市中当雇工。这次移民的动因是:在经历一些反犹事件后,俄国犹太人受到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相结合的思想的影响,民族自我意识有所加强。在俄国犹太人中间,锡安工人运动的创始人包罗霍夫和哈鲁茨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戈登的思想颇具影响。他们两人都把

犹太人必须参加体力劳动这一点列入自己的纲领中。在第二次阿利亚期间,一些青年创立了武装保卫犹太定居点的组织。

在这期间,由于宗教迫害和1903—1905年的严重旱灾(在旱灾期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去),也门犹太人的移居重新掀起高潮。在1907年来到巴勒斯坦的也门移民中,绝大部分人是首都萨那的居民,以及北也门农村有耕作经验的农民。

1910年也门犹太人在雷霍沃特附近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定居点。也门农民的移居促使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积极活动,以扩大也门的阿利亚。为此目的,1911年向也门派遣了专人。经过工作,1912年底从也门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有1500个,他们在农村定居点安家落户。也门的阿利亚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阿利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首先,企图以移居乌干达代替移居巴勒斯坦的计划所造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赫茨尔的去逝,犹太移居活动的衰落,这些情况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整个事业造成致命威胁,直至由于第二次阿利亚而得到克服。第二次阿利亚同时吸收了民族复兴和社会公正的思想。它的大部分成员出生于东欧,是1903—1905年俄国迫害犹太人事件的见证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过犹太自卫。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充满当时在俄国广为流行的社会主义同犹太复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思想。这些哈鲁茨青年把劳动看作是国家复兴的主要手段,他们力图在巴勒斯坦创立平等劳动者的自由社会,把“掌握劳动”看作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他们要在伊休夫的各个经济领域、包括农业和建筑业中,用犹太人替代阿拉伯人。在为实现犹太人劳动的斗争中,产生了合作农业定居点的新形式,它们以移民自身的劳动为基础:基布兹,稍后有莫沙夫,它们不仅对巴勒斯坦形成的犹太新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且对这种社会的道德面貌产生巨大影响。在巴勒斯坦,也产生了犹太工人阶级、信贷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工会。

1905—1907年,犹太国民基金会在巴勒斯坦购置了新的土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改变了对巴勒斯坦移居活动的态度,在雅法创立了自己的执行机构——巴勒斯坦局(1908),而且领导该局的A·鲁宾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第二次阿利亚的活动家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和合作。犹太人独立劳动的原则奠定了他们以后向巴勒斯坦移居活动的基础。

1908—1913年建立的小型定居点,开辟了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新途径。第一个合作定居点德加尼亚的创立(1909),成为未来集体农业定居点(基布兹和莫沙夫)的范例。在建立农业定居点的实践中,向多种领域的农业经济过渡是重要的新形式,这种形式奠定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随后建立新居民点活动的基础。

从事农业劳动的另一种方式,是建立了工人定居点,工人也获得一小块土地,从事副业生产。这种类型的第一个定居点埃因—加尼姆创立于1908年,第二个则是创立1913年的纳哈拉特·耶胡达。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创办的私人公司也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系列定居点。在第二次阿利亚期间,巴勒斯坦犹太人口极大地增加了。1914年犹太人口达8.5万(巴勒斯坦总人口为70万),1.2万人居住在1881年以后建立的44个农业定居点中。1914年,耶路撒冷犹太人增加到4.5万,太巴列增加到5千人,萨费德增加到7千。海法犹太人从1900年的1500人增加到1914年的3000人。雅法是阿利亚的门户和中心,其犹太人口1914年增加到1.05万。1909年雅法附近建立了一个区,它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是犹太人的城市——特拉维夫。

其次,在教育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正是在第二次阿利亚阶段,希伯来语和以它为基础的文化牢固地根植于巴勒斯坦。开始出版希伯来语日报(本—耶胡达编的《茨维》,以及《自由运动》),工人运动的杂志也问世了(《青年工人》和《联合》),它们对巴勒斯坦以及境外犹太青年产生巨大影响。一批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定居巴勒斯坦,他们中有:约瑟夫·布伦纳尔、A·戈登、费赫曼、D·舍莫尼、阿格农。希伯来语成为越来越广泛的犹太人——工人、教师和学生的口语。1904年德国援助协会(一个有益的慈善组织)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师范学院。1905年在雅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用希伯来语授课的中学——赫茨尔中学。1906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贝察别尔艺术学院。1912年在海法开始建立综合技术学院——巴勒斯坦第一所高等学校。与此有关,爆发了德国援助协会和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之间的争论。前者坚持综合技术学院用德语授课,而犹太大学生和教师一起罢课,他们的口号是:“没有希伯来语就没有综合技术学院!”德国援助协会的任何威胁手段都未能使罢课者妥协,他们拒绝放弃希伯来语。这场“语言之战”导致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用希伯来语授课的中学系统,1914年该系统共有3200名学生。

第二次阿利亚结束时,巴勒斯坦共有40个莫沙夫,1.2万人。在这些定居点中,有24个或者是利用埃特蒙·德·洛希尔男爵的资金建立的,或者是得到这些资金的帮助。新伊休夫(包括城市、特别是雅法和哈法的新居民)占巴勒斯坦犹太人的1/3,而且这1/3是最为活跃的。这些年中奠定了伊休夫独立组织的最初基础。除了两个工人政党(青年工人党和锡安工人党)以外,1911年以后工人组织一个接着一个诞生。1912年建立了患病职工补助会。这些组织的产生是由奥斯曼帝国的内部状况的变化促成的。青年土耳其派的革命(1908)导致了立宪制度的建立和更大的政治自由。同时,奥斯曼帝国衰弱了的官僚机构不能有效地维持国家秩序和保护它的人民的安

全。新制度力图防止帝国的衰落,它从一开始就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否定态度,把它看成是促使国家衰落的一种因素。在种情况下,伊休夫采取了防卫措施,从而产生了“卫士”组织,它把利用犹太人的力量保卫定居点看作为自己的任务。

第二次摩西行动 本世纪80年代以色列政府空运埃塞俄比亚黑人(法拉沙人)回归巴勒斯坦的行动。1984年11月,首批埃塞俄比亚犹太黑人220名乘一架波音707飞机到达特拉维夫。以后两个月间,共空运25000名犹太黑人到达以色列。

埃塞俄比亚黑人被称为法拉沙人,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部族。在埃塞俄比亚穷乡僻壤已居住了2000多年,他们自称是世界上仅有的犹太人后裔,甚至自诩是那位美丽的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当年访问耶路撒冷时所罗门所生的私生子的后裔(参见《列王纪上》第10章)。这种说法是荒诞可笑的。比较可能的事实是:法拉沙人本是非洲的土著居民。当时,犹太士兵驻守在这个部落住地附近。还有一些犹太商人也取道也门,深入内地经商。这些犹太人向法拉沙人传教,于是他们皈依了犹太教。从公元4世纪开始,法拉沙人为维护犹太教的信仰,顽强地同周围信奉基督教的部落发生冲突。并且反抗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族国王的统治。直到17世纪,他们才被征服,沦为奴隶。法拉沙人信奉原始犹太教,守逾越节,宰杀羊羔,洒血在犹太会堂周围。由于法拉沙人长期生活在基督教环境里,他们也吸收了一些基督教的习俗,在法拉沙人中也有教士和修女。但他们不讲希伯来语而讲埃塞俄比亚语。以色列政府是按《回归法》在1975年承认这些黑人的犹太人身份,同意他们到以色列定居。

公元前13世纪,摩西曾率领在埃及被奴役的希伯来人(即犹太人的祖先)离开埃及,是为第一次摩西行动,因此,这次行动被称为“第二次摩西行动”。

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898年8月28日至31日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赫茨尔致开幕词,他号召全体犹太复国主义者起来做自己所在犹太社区的工作,以便抵制形形色色同化主义思想对犹太人的侵蚀。赫茨尔的这一号召后来发展成大会的行动计划“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本届大会为建立犹太殖民托拉斯制定了蓝图,大卫·沃尔夫森被指定负责该方案的具体实施。刚刚从故土以色列考察回来的列奥·莫茨金向大会作了有关新、老伊休夫情况的详细报告。一个要求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领导层中包括犹太无产阶级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者代表团出席了本次大会。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遭到搁置的“政治派”和“务实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争执在本次大会上被重新提了出来。大会通过的建立犹太殖民托拉斯

的决议使得两派的争执得到了缓和。赫茨尔被与会者再次选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

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13年9月2日至9日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诺尔道没有出席本次代表大会,作为对大会摒弃赫茨尔路线的无声抗议。执行委员会与沃尔夫佐恩及其支持者在犹太殖民托拉斯组成人选问题上发生争执。鲁宾代表巴勒斯坦办事处向大会报告了第一批安置活动。列维就30年来在故土以色列移民安置活动发表了调查报告。这两个报告实质上都对在巴勒斯坦不断进行“小规模”移民安置活动进行了赞扬,认为这才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在魏兹曼和乌色什金的共同倡议下,大会通过了建立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决议。著名诗人比亚利克出席了大会闭幕式。

沃尔夫佐恩被选为协会主席,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逝世。

第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21年9月1日至14日在美国的卡尔斯巴德举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本届大会与上届大会已相隔八年。犹太人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已完全不同于上一届会议。这时的政治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奥斯曼帝国崩溃解体,《贝尔福宣言》发表,英国开始统治巴勒斯坦,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乌克兰犹太人遭到集体迫害,伦敦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议已于1920年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期间,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以布兰代斯为首的美国犹太组织在伦敦会议上与魏兹曼的领导发生冲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已经更迭。由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柏林阶段”随之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心由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已经转移至英国伦敦。在“伦敦会议”上,魏兹曼当选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索科洛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的形势也出现了变化,阿拉伯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已举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反犹暴动。魏兹曼就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在大战中的政治活动向大会作了报告,并号召全世界犹太人民支持建设故土以色列的努力。鲁宾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在耶斯列德山谷购置大片土地的方案,请求批准。然而,该方案却遭犹太国民基金会董事会否决。

比亚利克在大会期间为巴勒斯坦犹太工人的作用作了辩护,结果,来自故土以色列的工人代表第一次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大会选举魏兹曼为协会主席。

第十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31年6月30日至7月15日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第十六届代

表大会闭幕后,巴勒斯坦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29年8月爆发了与阿拉伯人的流血冲突,133名犹太人在冲突中死亡。英国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冲突起因。1930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辛普森关于土地垦殖问题的报告和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对犹太移民人数作出了限制,并公开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国民基金会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动表示不满。为抗议英国当局的新政策,魏兹曼辞去了犹太代办处主席的职务。最后由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在致魏兹曼信中宣布取消白皮书中有关禁止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和垦殖的规定,问题才得到解决。

在本次大会上,许多代表都对魏兹曼执行的以最大限度与英国当局进行合作的政策表示不满。以修正党和其他代表团组成的反对派声称,魏兹曼的对英政策缺乏合法性。他们要求公开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当这一要求为大多数代表拒绝后,雅布庭斯基当场撕掉了他的代表证,并高呼:“这里举行的根本就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口号。这一冲突还为1935年修正党最终退出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埋下了伏笔。

面对这一形势,魏兹曼拒绝收回他的辞职声明。大会最后选举索科洛夫为协会主席。由于魏兹曼政策的坚定执行人阿洪索罗夫被选为犹太代办处政治部部长,在实际行动中,执行委员会仍继续执行魏兹曼的路线。

第十八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33年8月21日至9月4日在捷克的布拉格举行。会议召开时的政治形势是:纳粹分子开始夺取德国权力,德国犹太人面临进一步遭受迫害的威胁;巴勒斯坦出现通货膨胀现象;阿诺索罗夫被暗杀。由于劳工代表认为阿诺索罗夫的被杀与修正党一系列煽动活动有关,两派之间的冲突在本次大会上达到了高潮。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阿诺索罗夫被杀事件。大会还为乌色什金70岁生日举行了一项特别庆典。

索科洛夫再次当选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劳工代表在执委会中的名额得到了增加,本一古里安和夏里特被选进了执委会。犹太代办处政治部部长一职也由夏里特担任。

第十九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35年8月20日至9月4日在瑞士的卢塞恩举行。本届大会上来自各方面的代表都作了发言。索科洛夫作了海外犹太人情况报告;本一古里安作了巴勒斯坦建设报告;乌色什金作了犹太国民基金会活动报告;索尔德作了青年阿利亚救援德国犹太儿童活动报告;卡茨奈尔森就希伯来文化事业作了报告。代表大会最大的派别劳工派提出了一项广泛的联合计划,为魏兹曼重新当选为协会主席一事扫清了道路。

大会选举索科洛夫为协会和扩大的犹太代办处名誉主席,选举魏兹曼为协会主席。本一古里安再次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并开始逐步成为执委会中的中心人物。

第十三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23年8月6日至18日在美国的卡尔斯巴德举行。大会召开前一年,国际联盟正式将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授予英国政府。根据托管委任状第4款规定,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正式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负责处理在建立犹太民族之家方面所有犹太人的合作事宜。在本次大会上,代表们就犹太代办处是否应当包括非犹太复国主义者议案进行了激烈辩论。反对这一提案的人士认为允许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参加犹太代办处的领导工作会危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的存在,支持这一提案的人士则认为吸收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参加有利于扩大统一战线,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尽管魏兹曼本人支持这一提案,但提案终因未能在本届大会上争取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遭到否议。代表们对于争取获得建设巴勒斯坦所需资金来源问题也进行了充分讨论。阿诺索罗夫就一项经济发展计划议案进行了说明。大会还通过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开学方案。魏兹曼再次当选为协会主席。

第十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27年8月30日至9月11日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巴勒斯坦的繁荣遭到随之而来的一次严重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打击开始消失,约有8千名工人失业。饥饿和贫困使得不少人离开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事业面临一场危机。如何设法摆脱这一危机成了本届大会必须优先考虑的中心议题。原计划庆祝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30周年活动因此受到影响。魏兹曼提出了一项克服危机的方案,鲁宾就拓荒行动及其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意义发表了精彩演讲。

在执行委员会选举中,劳工代表没能当选,哈里·萨克成为执委会中最有力的人士。协会主席一职仍由魏兹曼担任。

会上还宣读了马丁·布伯和索科洛夫为纪念著名希伯来文学家哈姆逝世而写的悼词。

第十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29年7月28日至8月10日在瑞士的苏黎世召开。这一年正好是赫茨尔逝世25周年纪念,索科洛夫在开幕式上首先发表了纪念讲话。两年前在巴勒斯坦出现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经济开始复苏,就业量开始增加,新的移民又开始来到。魏兹曼再次就扩大犹太代办处的代表范围发表了讲话。他呼吁应将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包括在犹太代办处内。尽管代表中有人竭力反对这一提案(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修正党成员),但大会还是接受了魏兹曼的提议,决定

在会后召开犹太代办处扩大会议。

上届执行委员会由于其对待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受到与会代表的严厉批评。大会结束时，选出了新的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两名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代表，两名劳工代表和鲁宾。魏兹曼再次当选协会主席。

会后举行的犹太代办处扩大会议在代表的广泛性方面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参加人员包括魏兹曼、索科洛夫、塞缪尔、马歇尔、爱因斯坦、梅尔切特勋爵、布鲁姆、阿施、瓦尔堡等人。

第十四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25年8

月18日至31日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本次大会受到在巴勒斯坦出现的繁荣景象鼓舞。第4次阿利亚为巴勒斯坦带来了数万名波兰犹太人，巴勒斯坦的住房建设和土地开发都有了长足进展。许多代表认为私人企业是解决巴勒斯坦建设问题的根本出路，人们对集体定居点的批评达到了最高点。大卫·本-古里安参加了大会的辩论，他对巴勒斯坦的工人状况和活动发表了意见。鲁宾辞去了担任18年之久的犹太代办处移民安置部部长职务。基希上校被任命为犹太代办处驻耶路撒冷政治部部长。大会继续选举魏兹曼为协会主席。

第十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11年8

月9日至15日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本次大会获得了“和平代表大会”的美誉。在这次大会上“政治派”和“务实派”之间的争执和冲突终于结束。现实主义的“综合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得到了一致公认。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沃尔夫森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几个阶段的转变作了阐述。他把赫茨尔时代称之为“维也纳阶段”，他本人领导的时期称之为“海牙阶段”。他认为现在是向新阶段过渡的时期。大会就在故土以色列的各项活动和希伯来文化事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在乌色什金倡导下，整个大会的发言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希伯来语。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在卡普兰斯基的发言中，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问题被第一次涉及。

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协会主席由瓦尔堡担任，汉特克·列维·雅各布森、索科洛夫等人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协会的总部由科隆迁往柏林。

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05年7

月27日至8月2日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会议由大会新任主席诺尔道主持。他首先在发言中对赫茨尔的逝世表示了哀悼。随后便是关于“乌干达计划”的激烈辩论。向乌干达派遣的“领土考察团”发表了乌干达的自然条件不适于犹太人大规模移居的报告，使得反对这一计划的代表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会议通过表决以压倒多数票否决

了“乌干达计划”，并规定除了巴勒斯坦和它的邻近地区叙利亚外，任何人不得向大会建议任何其他领土作为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地址。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内的领土主义者反对这一立场，并在决议通过后宣布退出代表大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组织一个独立的协会——犹太领土主义者协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分裂。“务实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原先大会作出的在公共法律（即“特许状”获得之前）建立以前暂不组织大规模移民和建立大规模定居点的决定被取消。务实派领导人奥托·瓦伯格在本次大会上给人的印象深刻。他强调有限定居点的政治作用，以及以有组织、有系统推广这一做法的必要性。由于诺尔道拒绝接受担任协会主席一职，大会选举了沃尔夫森担任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协会总部也由维也纳移至沃尔夫森居住的德国的科隆。

第八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07年8

月14日至21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海牙当时是举行第二届国际和会的地点，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为的是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置于世人的注目之下，也符合赫茨尔所倡导的公开原则。在本次大会上，“政治派”和“务实派”之间的不同观点得到了缓和，大会决定在故土以色列的安置活动不应等到获得“特许状”后再进行，而应先行于特许状，只要不超出《巴塞尔纲领》所规定的范围，有计划的小规模安置活动应立即着手进行，因为只有当这些小规模活动取得成就后，特许状才有可能得到。沃尔夫森作为赫茨尔亲密的战友和信徒，一直很好地担任着负责调解这两派立场和观点的工作。魏兹曼在会议上所作的“论综合犹太复国主义”的讲演，把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派的立场和务实派的立场结合起来，为这两派的联合奠定了一个共同思想基础。“我们必须具有争取获得特许状的雄心壮志，但我们的这一雄心壮志只有通过我们在故土以色列的实际努力才能实现。”这一观点为大会所接受，大会决定从1908年起在巴勒斯坦雅法设立巴勒斯坦办事处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的代表，负责指导那里的农业定居活动。会议决定办事处由阿瑟·鲁宾负责。沃尔夫森再次被选为协会主席。

第九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09年12

月26日至30日在德国汉堡举行。这是自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以来第一次在德国举行的会议。由于1908年土耳其发生青年革命，犹太人普遍认为土耳其当局会改变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在本次大会上，沃尔夫森的领导地位遭到了由乌色什金、魏兹曼、索科洛夫等人组成的反对派人士的挑战。来自故土以色列的工人代表第一次出席代表大会。他们与反对沃尔夫森的人士共同组成了一个反对用经商手法对待移民安置活动的联

合阵线。他们认为以经济效益来衡量每一项安置计划未必正确。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以奥本海默计划为准则,开始实施合作安置工作。这显然是“政治派”对“务实派”人士作出的一项重大让步。

沃尔夫森最后再次当选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和执行委员会主席,执行委员会还包括了瓦尔堡和雅可布斯凯姆。

第三十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82年12月7日至16日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召开时正好是以色列1981年大选结束之时。以色列代表的组成象前一届大会一样,反映了本次大选的结果。会议中心议题是阿利亚(特别是面临苏联减少批准犹太人离境、以色列犹太人外流这一局面应采取的对策);进一步增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相互了解;反犹主义的新威胁;以及重新组织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大会对一百年来来的犹太移民运动和负责移民安置部门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并给予高度评价。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赞扬了凯撒城遗址发掘进展;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阿利亚运动;要求建立以色列政府——犹太代办处联合机构处理阿利亚事务;指示执行委员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重组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和修改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章程问题。大会结束前通过的不再在阿拉伯人密集地区安置犹太移民的决议引起与会者的争议。大会主席认为该决议有悖于以色列政府这方面的政策,他指出在何地安置移民应由政府决定,而不是协会决定。决议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达成妥协,但未有结果。

大会选出了由34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但却将各部门部长职务的分配留交总务委员会决定。来自利库德集团的、自1978年一直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杜尔琴再次当选。

第三次中东战争 又称“六·五”战争,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当时国名为阿联)、约旦和叙利亚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只打了六天即宣告结束,所以,它也被称之为六日战争。

战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后,埃及和苏联的关系趋于密切。1958年1月,埃及和苏联签订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12月底,两国签订了苏联援助埃及建设阿斯旺高坝第一期工程协定。1960年1月,埃苏就苏联参加建造阿斯旺高坝第二期工程达成协议。1964年苏联提供给埃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已达5亿英镑。

1966年2月23日,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叙陆军参谋长贾迪德出任总理,空军司令阿萨德任国防部长。叙新政权加强了同苏联的关系。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1.5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建设有“叙利亚阿斯旺水坝”之称的幼

发拉底河水坝和水力发电站;接着又向叙利亚提供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1966年11月4日,埃及与叙利亚缔结了共同防御协定,其中规定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侵略都将被认为是对另一国的侵略。此后,以色列与叙利亚、约旦的边境局势紧张。1966年11月11日,以色列一辆边防警察指挥车在约旦的萨木村附近边境上踩响地雷,炸死3人。13日清晨,以色列装甲部队袭击了萨木村。一营约旦士兵从希伯伦赶来迎击,遭到了以色列的伏击,约旦方面死伤50余人。1967年4月7日,以色列出动海市蜃楼式飞机侵入叙利亚领空。在以叙空战中,叙利亚6架米格式战斗机被击落,叙以边境局势更为紧张。同年5月1日,纳赛尔宣布,根据埃叙共同防御协定,埃及已同意向叙利亚派遣空军部队。

5月13日,埃及副总统萨达特出访朝鲜回国途中,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苏向他通报了以色列计划在5月17日向叙利亚发动进攻的情报。纳赛尔为了警告以色列不要冒险,于5月15日向西奈半岛增派了两个师的兵力。次日,埃及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法齐通知联合国部队指挥官,要求他的部队从西奈半岛撤走。5月19日,埃及军队接管了加沙地带,22日,封锁了亚喀巴湾,不准以色列船只和为以色列运送战略物资的外国船只通过。23日晨起,封锁亚喀巴湾的埃军进入阵地。同一天,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指责埃及的行动是“对以色列的侵略”,等于是“一次武装进攻”。美国总统约翰逊也发表声明,称埃及封锁亚喀巴湾是“非法的”,并对以色列表示支持。5月3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埃及,签订了双边防御协定。协定规定,一旦战争爆发,约旦军队将归阿拉伯联合司令部指挥。

5月27日凌晨3时,苏联驻埃及大使紧急求见纳赛尔。大使表示,苏联接到美国来自以色列的情报,称埃及打算立即向以色列开战,苏联政府敦促埃及“不要首先开火”。苏联大使还说,苏联已从美国得到保证,以色列不会发动进攻,如果以色列发动进攻,苏联决不坐视不顾。纳赛尔当即否认埃及有进攻以色列的意图,并保证埃及不会开第一枪。苏联把谈话内容通报美国,美国又立即把这一情况转告了以色列。

5月27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带着美国保证提供武装支持的诺言回到特拉维夫。5月31日,以色列情报局长访美时得知美国将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6月1日,以色列内阁改组,艾希科尔组成以工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工党在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加哈尔集团(自由运动和自由党的联盟)和退出工党的拉菲加入了政府。拉菲的领导人摩西·达扬出任国防部长。2日,达扬提出了侵占西奈的作战方案。5日,以色列突然向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了进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以色列动员的兵力达25万人,编成25个旅,有作战飞机约290架,坦克约1000辆,装甲人员运输车1500

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国总兵力为 32.8 万人,编成约 42 个旅,有作战飞机 680 余架,坦克 2300 余辆,装甲人员输送车约 1800 辆。

战争的过程 以色列首先进攻埃及。6 月 5 日 7 时 45 分(开罗时间 8 时 45 分)以色列首批飞机在特拉维夫起飞。以色列选择这一时刻发动空袭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因为这一时刻埃及的空防最为松懈,他们的晨班巡逻机正返航加油,而接班的飞机尚未起飞,指挥官正在上班的路上。从早晨 7 时 45 分到 10 时 35 分的 2 小时 50 分里,以色列飞机共 17 批以每次不到 10 分钟的间隔起飞,连续对开罗、苏伊士运河附近和西奈地区的 10 多个最重要的埃及机场和萨姆-2 型导弹基地狂轰滥炸。埃及可以立即起飞作战的约 340 架飞机中,有 300 架被炸毁,少数尚能使用的飞机也因跑道受损而无法起飞。埃及 350 名飞行员中,有 100 名死亡。5 日下午,以色列又对约旦、叙利亚机场进行轰炸,约、叙损失 74 架飞机,以色列掌握了制空权。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第一批抵达犹太圣地——
西墙旁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

以色列对埃及第一次空袭半小时后,即 5 日上午 8 时 15 分,以色列地面部队 9 个旅,编组成 3 个装甲师分三路向西奈半岛推进:北路攻打坎塔腊,中路直指伊斯梅利亚,南路奔袭陶菲克港和苏伊士城。为了挽回败局,西

奈地区埃军发起两次反攻,力图夺回阿里什和阿布奥格拉,但是都没有成功。7 日,以军向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战略要地沙姆沙伊赫推进。8 日,以军已经抵达苏伊士运河东岸。纳赛尔要求苏联紧急提供战斗机、坦克等装备,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6 月 9 日,埃及被迫宣布停火。

以色列对约旦的进攻是在对埃及进攻后不久开始的。6 月 5 日下午,以色列装甲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同时对南面的耶路撒冷老城和北面的杰宁城展开攻击,约军被迫逐步撤退。部署在约旦河西岸的两个约旦坦克旅在 48 小时内被击溃。7 日,以军南北两路都抵达约旦河西岸,占领了面积约 4800 多平方公里的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8 日,约旦宣布接受停火。9 日上午,以色列集中 10 个旅的兵力向叙利亚发动进攻。以色列兵分三路攻击叙利亚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戈兰高地。10 日中午,以军占领了戈兰高地首府库奈特拉,从而控制了通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几条主要公路。11 日,叙利亚同意停火。

在“六·五”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埃及西奈半岛约 61000 平方公里、约旦河西岸约 5200 余平方公里和戈兰高地约 1150 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其所占领土相当于以色列本土面积的三倍。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走了东耶路撒冷,把东、西耶路撒冷合并,并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埃、约、叙三国军队死亡约 4300 人(埃及约 3000 人),受伤 6100 余人(埃及约 5000 人),被俘和失踪 7500 余人(埃及约 5000 人),损失飞机约 440 余架(埃及为 350 余架),坦克约 960 余辆(埃及约 700 辆)。以色列军队死亡约 1000 人,伤约 4500 余人,被俘和失踪 15 人,损失飞机约 40 架,坦克约 400 辆。

停火协议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5 小时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动用连接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热线,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取得联系,双方表示愿为中东停火而努力。6 月 6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苏代表提交的关于阿以双方“立即实现停火”的决议草案。7 日,安理会应苏联要求再一次召开会议,通过了苏联代表提出的“限期停火”的决议草案。决议要求阿以双方在当天格林威治时间 20 时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以色列 8 日晨宣布接受停火,条件是阿拉伯国家也必须实现停火。约旦、埃及和叙利亚相继接受了停火。7 月 10 日,安理会决定派遣联合国观察员进驻苏伊士运河区等地监督停火。11 日,联合国观察员进驻有关地区。

11 月 22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由英国提出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提案,即著名的第 242 号决议。决议强调“必须于中东建立公正及持久和平”,“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以色列军队撤离其于最近冲突所占领的领土”,并要求“保证该地区国际水道的自由通航”,“达成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以色列对第 242 号决议作出独特的解释。决议中要求以色列撤军的英文是“from territories”,而不是“from the territories”,以色列认为,这不是指以军必须

从所有领土上撤出。

1968年5月1日,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宣布以色列承认第242号决议,把它看作为达成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协议的一种手段。以色列认为决议没有呼吁它从所有领土上撤军,所以它坚持“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应该在谈判过程中加以确定,它不可能返回到战前的边界上,并且在签订和约之前不从任何领土上撤出。埃及和约旦在经过犹豫之后接受了第242号决议。它们宣称,任何协议的必要条件是以色列撤到1967年6月4日的边界上;在达成协议之后,它们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叙利亚拒绝了第242号决议。

第242号决议通过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任命瑞典驻苏联大使贡纳尔·雅林为调停人。雅林在耶路撒冷、开罗和安曼之间来回访问,与阿以双方频繁磋商,但是在整个停火线上,尤其是苏伊士运河两岸,战争仍然不断发生。雅林的努力未能导致双方立场的改变。1969年4月到7月,美、苏、英、法四国驻联合国代表举行四大国会议,进一步讨论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由于各方分歧很大,会议未能取得进展。

1970年3月,苏联在纳赛尔的要求下,运给埃及40部萨姆式地对空导弹发射架,100架米格歼敌机,并派出掌握导弹的1500名军事技术人员。这种情况引起美国的严密注意。4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派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赴中东,同阿以双方商讨解决办法。6月25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提出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为“罗杰斯计划”。它主张埃及和以色列实行“3个月的有限期的停火”;在这期间双方各派代表同联合国特使雅林会谈,讨论以什么方法执行第242号决议,使以军撤出,并使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主权和独立。以色列接受了“罗杰斯计划”,同时强调,它的军队只撤到安全和公认的边界,这种边界应该由和平协议确定。以色列接受罗杰斯的建议时获得美国的保证:与停火一起,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地区禁止部署新的导弹或者其他武器。7月23日,埃及正式宣布接受罗杰斯计划。

新的停火协议8月7日生效。但是,以色列拒绝参加由雅林为中介人的与埃及的谈判,理由是埃及没有把导弹撤出运河区。纳赛尔去世、萨达特继任总统后,情况有了转机。1970年底,在同美国磋商后,以色列政府决定恢复以雅林为中介人的谈判。1970年12月29日以色列议会批准了这项决定。

战争的后果 1967年6月9日,即埃及接受停火的第二天晚上,纳赛尔在共和国宫的办公室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承担(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宣布他决定“放弃一切政府职务和不再发挥任何政治作用,回到群众中去”。纳赛尔发表讲话几分钟后成千上万的群众涌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讨以色列,并要求纳赛尔撤消

辞职的决定。10日早晨,埃及国民议会举行会议,拒绝纳赛尔的辞职决定,要求他继续领导埃及政府,直到以色列从它所占领的埃及领土上全部撤走。纳赛尔同意继续担任总统后,撤消了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密尔和空军司令西德基·马哈茂德以及其他9个将军的职务。战争的失败给纳赛尔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1970年9月28日他因心脏病饮恨长逝,享年52岁。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积极准备为洗雪耻辱和收复失地而斗争。

1967年9月1日,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会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到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边界,并宣布:“阿拉伯的基本义务和信念是:不承认以色列,不同它和解,不同它举行谈判”,这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的“三不政策”。为了对以色列表示抗议,苏联于1967年6月10日断绝了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东欧国家也纷纷同以色列断交。1972年到1973年初,有七个非洲国家同以色列断交。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法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急剧恶化,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美国开始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的最大武器供应国。

以色列国内在以色列未来边界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加哈尔集团(利库德集团的前身)以及以色列工党和全党宗教党的某些成员主张,以色列不应该从1967年6月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从而实现“不可分割的以色列国”的理想(即“大以色列计划”)。少数左翼集团(包括共产党)呼吁归还所有占领的领土。以色列工党、统一工人党、独立自由党的大部分成员,以及各宗教党的许多成员准备归还大部分领土,以换取同埃及和约旦的和约。由于以色列政府中对所占领土的将来有意见分歧,政府没有通过有关未来边界的任何决议。但实际上,它主张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统一的耶路撒冷归以色列所有,沙姆沙伊赫由以色列控制,约旦谷成为以色列的“安全边界”。

第三次阿利亚 1919—1923年期间进行的、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的第二次阿利亚的继续。当时《贝尔福宣言》已经发表,英国实行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加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哈鲁茨运动创办了许多犹太青年农业培训中心,以帮助他们移居巴勒斯坦。在这段时期中还成立了其他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如贝塔尔、戈登派和带有宗教色彩的青年运动。

由于阿拉伯人的压力,1920年秋英国托管当局发布命令,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的定额(每年1.65万人),1921年6月又规定,只有资本家、大学生和其他有业务专长的人员可以移居巴勒斯坦。1922年公布了第一份白皮书,把“犹太民族家园”的概念限制在巴勒斯坦西部(也就是说,不包括外约旦),并宣告,只有根据当地居民的利益,考虑到每个时期该地区的经济容量,移居才被

获准。尽管有这些限制,第三次阿利亚的人数仍然超过3.5万,结果,1923年底伊休夫超过9.3万人,犹太人耕种的土地达5.6万公顷。在这期间创立了犹太工人总工会和哈加纳,产生了新的农村定居点,犹太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了。

第三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899年8月15日至18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赫茨尔首先就其本人与德皇威廉二世于1898年10月18日和11月2日分别在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举行两次会谈的情况作了通报,报告中还提到了在米克维以色列的一次会见。尽管这几次会谈和会见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会谈本身就已经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这毕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第一次与当时世界大国首脑正式讨论犹太复国主义这一问题。大会就最早由赫茨尔提到的“特许状”的准确含意以及《巴塞尔纲领》中提到的“公共法律”的含意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代表们希望能澄清特许状的含意到底是指从所有大国处,还是仅仅指从土耳其当局处获得的许可。赫茨尔最后被迫接受指从土耳其当局获得许可这一解释。在本次大会上,代表们还就犹太殖民托拉斯的建立定居点活动仅限于故土以色列和叙利亚一事作出了决定。“务实派”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在“特许状”获得以前就应大力开展移民安置活动的提案没有得到会议的批准。有关文化问题的一些争论虽有所提及,但无任何结果。赫茨尔再次当选为协会主席。

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01年12月26日至30日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赫茨尔向大会报告了他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一些成就,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他与土耳其苏丹本人的会见。此外,他还就犹太殖民托拉斯的主要活动提出了一份报告。然而,这方面的成就并没有使代表团感到满意,特别是不能使那些组织了民主阵线的青年人感到满意。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应当主要集中在促进犹太民族内在精神的振兴上,因此,他们要求运动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振兴犹太文化上,而不是放在政治活动上。这届大会的最主要成果是根据赫尔曼·沙皮拉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的提案精神设立了犹太国民基金会,用于在巴勒斯坦地区购置土地,开发农业和造林,并规定土地一经购置便不可转让,成为犹太民族所有的公共财产。这次资金的设立最终使在巴勒斯坦建立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实验定居点成为可能。

大会还对代表大会举行的时间作了变动,决定今后代表大会将每两年举行一次,而不是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经选举决定协会主席仍由赫茨尔担任。

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03年8月23日至28日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这是赫茨尔参加

的最后一届代表大会,也是迄此为止争论最激烈、气氛最不和谐的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召开前的政治形势是,一方面赫茨尔为之奋斗的犹太移民“特许状”仍遥遥无期;另一方面俄国不断出现反犹事件,特别是那年春天,在俄国基希涅夫发生了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为受迫害犹太人寻找一项解决办法的压力增大。面对这一形势,以赫茨尔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开始产生寻找“临时解决方案”的念头。这些被考虑到的“临时方案”有“艾尔—阿里什计划”,“乌干达计划”等。由于埃及当局的反对,赫茨尔为之奔走呼号多时的“艾尔—阿里什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英国政府建议在东非建立犹太人家园的“乌干达计划”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会议开幕后,赫茨尔向大会提出了这一计划,要求大会审议。他对此解释说:“这一计划并不涉及代替锡安的问题,它现在是,而将永远是一项帮助那些无能的慈善事业和避免使流散的犹太人再遭受苦难的应急措施。”会议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俄国犹太人对该计划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在最后就该提案进行的表决中,295票支持向乌干达派遣“领土考察团”的计划,178票反对,98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然而,以切尔诺为首的俄国代表团却在表决结果公布后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大会顿时面临垮台和瓦解的危险,只是由于赫茨尔本人的呼吁和妥协,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会议还就其他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弗兰兹·奥本海默提出的建立合作安置点计划等。赫茨尔继续当选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但于1904年7月3日在任期中病逝。

第四、五次阿利亚 由于波兰的反犹经济政策和美国对移民的限制,1924—1928年出现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高潮,即第四次阿利亚。1924年1.3万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其中半数是波兰犹太人。大部分移民拥有少量资本,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小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建设事业的扩大。1925年移民达到创纪录的数字——3.3万人。1926年,由于巴勒斯坦发生经济危机,移民只有1.3万人,而离境人数倒有0.65万人。1927—1928年移民为1万人左右,不过,也有同样多的人离境。在第四次阿利亚期间,有8.5万犹太人(其中0.92万也门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他们中有2万人后来又离去了。第四次阿利亚促使犹太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和犹太工商业的发展。1930年英国政府公布了第二份白皮书,内容对犹太人不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反对白皮书中所规定的政策,结果,1931年这种政策实际上被取消了。

1929—1939年间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为第五次阿利亚,移民超过25万,其中1/4以上是纳粹当权(1933)后离开德国的犹太人。按照同德国当局的协议,犹太移民携带的资本约3200万美元。这批移民极大地丰富了伊休夫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伊休夫的性质。因为这些移民具有大量的财富、宝贵的劳动技能、管理经验,以及在科学、文化和艺术各个领域高度的专业水平。第五次阿利亚期间离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约有2万。1940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45万,拥有土地15万公顷。在1940—1948年期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共计10万左右,有时候也把这股移民浪潮称为第六和第七次阿利亚。

第四次中东战争 又称十月战争,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发生的战争。埃及、叙利亚两国把10月6日作为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的日期。这一天是犹太教的赎罪日,所以犹太人称这次战争为赎罪日战争。当年10月是伊斯兰教的斋月,所以阿拉伯人称这次战争为斋月战争。

战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1967年六·五战争以后,以色列侵占了埃及大片领土,埃以之间长期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局面。1970年10月,萨达特继纳赛尔担任埃及总统后,面临着“不战不和”给埃及造成严重困难的局面。六·五战争造成数十万埃及难民流离失所,他们渴望重返家园。这种情绪对埃及官兵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强烈要求投入战斗,洗刷六·五战争失败的耻辱。“不战不和”的局面也使埃及经济恶化。苏伊士运河被迫关闭停航后,埃及失去了年达5.7亿多美元的运河税收。1968—1973年,埃及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100亿美元。1971年,埃及军事预算高达14.95亿美元,占预算收入的1/4。萨达特总统认为,“摆脱困境的出路只有战斗”。

为了加紧战前的准备,1973年1月底,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首脑在开罗开会,商讨未来战争的共同战略。1月31日,埃及和叙利亚组成了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8月22日,埃、叙两国武装部队参谋长、作战部长等高级指挥官在埃及亚历山大最后审定了作战计划。10月初,两国决定10月6日作为发起进攻的日期。当年10月6日为犹太教的赎罪日,这是宗教上进行忏悔的日子,以色列全国不办公,人们到教堂或在家进行祷告。当年10月又是伊斯兰教的斋月,白天不吃不喝进行斋戒。这一天对于双方都不是适宜打仗的时间。埃叙选择这一天来发动战争,就带有突然性。

10月4日夜间,以色列得到有关阿拉伯军队调动的情报。国防部长达扬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讨论后,和军事情报局长泽拉一起向总理梅厄夫人汇报。埃拉扎尔建议取消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假期,把装甲部队集中到埃以和叙以边界两条战线。梅厄决定次日召开内阁特别会议,研究当前局势和对策。5日内阁会议上,埃拉扎尔强调了战争的危险性。而泽拉得到美国情报机关的支持,认为埃叙军队不可能发动进攻。10月6日清晨4时,以色列情报机关才确信,阿拉伯国家将在当天向以色列发动一次袭击,估计进攻时间在日落以前。梅厄召开内阁紧急会议,

她仍然拒绝埃拉扎尔提出先下手对埃叙集结军队进行袭击的主张。直到10月6日上午10时,以色列才发布紧急动员会,这时离战争爆发只有4个小时了。

开战前,埃、叙等阿拉伯国家集结兵力达50余万人,编成16个师、47个旅,有坦克4000余辆,作战飞机1000余架。以色列总兵力为30余万人,编成7个师、18个旅,有坦克约2000辆,作战飞机约360架。

第一阶段 战争分南北两线进行。埃、叙的军事目标是:在南线越过苏伊士运河,占据东岸的据点;在北线占领戈兰高地,并向太巴列湖推进。

10月6日下午2时,埃、叙军队分别从南、北两线同时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埃军部署在苏伊士河西岸的4000门火炮和250架作战飞机,猛攻西奈半岛“巴列夫防线”的以军阵地。巴列夫防线1969年初建成,全长160公里,纵深10公里,以当时以军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的名字命名。防线的主阵地以运河为屏障,依托河堤构成。河堤平均高25米,在临河一侧的陡坡上密布铁丝网和地雷,河堤全线构筑了19座要塞和30个坚固据点。埃军在炮火轰击15分钟后,8000名突击队员乘橡皮艇强渡运河,首先占领了被炸药包炸开的缺口。7日,埃军以两个师的兵力突破了巴列夫防线。8日,埃军收复了西奈第二大城市东坎塔腊。9日,越过运河的埃军增至6个师,约10万人,控制了运河东岸宽约10—15公里的地带。

10月6日下午在埃军向运河东岸发动进攻的同一时刻,叙军以3个师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在戈兰高地分路向以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至7日,叙军兵力增至5个师,其中3个摩托师,2个装甲坦克师,有45000名士兵,1200辆坦克,300多架苏制飞机。叙军的空中优势主要体现在防空能力上,它有20个导弹基地,120个导弹发射架。7日清晨,叙军先遣部队已经到达戈兰高地南端,从那里可以看到约旦。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到达1967年6月以前他们所占有的工事。至9日,叙军已收复了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

第二阶段 以色列为了改变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力图首先稳住叙以战线,解除对以色列本土的威胁,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埃及。从10月9日起,以色列在叙以前线集中了15个旅的兵力和1000辆坦克,在空军主力的掩护下,对叙军实施反突击。10日晚,获得增援的以军把叙军击退到1967年的停火线。11日,以军已经在叙利亚领土上同叙军和伊拉克2个师作战。12日,以军迫使叙军撤退到通向大马士革公路上的工事里。13日,以军攻入离大马士革40公里的萨萨地区的叙军工事。叙军陷于困境,要求埃及支援。14日,埃军5000名在1000辆坦克支援下,向米特拉、吉迪和哈特米亚三个山口发起进攻,与以军800辆坦克展开激战,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埃军在损失260余辆坦克后被迫撤退。以军于15

日重新夺回戈兰高地。

10月13日,美国架设“空中桥梁”,向以色列运送飞机、军火和反坦克武器。以军对埃军的进攻从15日晚开始。以色列根据美国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侦察到埃及第二、三军团防线结合部有一处未加防御的空档,就派出一支装甲先遣队,他们身穿埃军制服,口操阿拉伯语,乔装成前线调防的埃军,在大苦湖北区偷渡过河,突入西岸。第二天增调后续部队,扩大突破口。17日,以军在渡河地点建立桥头堡,并架起浮桥。进攻西岸的以军从18日起袭击埃军阵地,破坏埃军交通和通讯联系,摧毁埃军许多防空导弹发射场和炮兵阵地,使埃军在运河中段的防空火力配系陷于瘫痪,从而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制空权。部分以军沿着从伊斯美利亚到开罗的公路前进。不过,以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指向南方。聚集在一块不大的领土上的以军对驻扎在运河东岸的埃及第三军团后方和苏伊士城构成威胁。到19日晚上,突入运河西岸的以色列部队已经增至四个坦克旅、一个机械化旅和一个伞兵旅。

停火协议 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以色列的急剧变化。为了安排停火问题,苏联政府邀请美国国务卿于10月20日访问莫斯科。21日两个超级大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立即停火的共同提议。主要内容是:(1)要求现在战斗的一切方面,在它们目前占领的阵地上停止一切射击并终止所有的军事活动,至迟不得超过本决定通过后12小时;(2)要求各有关方面于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所有部分;(3)各有关方面于停火时起,在适当方面主持下,立即同时开始谈判,目的是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22日,安理会通过了这项建议,决议于22日19时52分生效。埃及和以色列接受了这项决议,叙利亚拒绝了它。

以色列以埃及破坏停火决议为借口,以极快的速度继续进攻。以军两个师包围了苏伊士城,切断了驻在运河东岸的埃及第三军团的退路。与此同时,以军在叙利亚赫尔蒙山进行空降,攻占了叙军在戈兰高地的最后一个阵地。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苏联合提出的监督中东停火的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采取措施,立即派遣联合国观察员监督以色列部队和埃及部队停火,并为此目的使用联合国目前在中东的人员,首先使用目前在开罗的人员”。决议规定第二次停火于24日生效。以色列军队继23日占领苏伊士—开罗公路的几个路口和阿达比亚的海军基地后,24日又进攻苏伊士城。24日晨7时,以军深入苏伊士运河西岸埃及腹地20英里,离开罗仅50公里,构成对埃及首都的明显威胁。埃及要求以军撤回到10月22日第一次停火时的界线。为了支持埃及的要求,苏联集结兵力,作了军事干预的准备。25日美国下令全球武装部队220多万人,包括核打击力量、战略空军司令部,全部进入戒备状态,以此与苏联相对抗。由此,停火线仍然维持10月24日的状态。至此,以色列军队占

领了运河西岸约1900平方公里的土地,埃及军队收复运河东岸约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军还越过叙利亚戈兰高地占领了叙770平方公里的土地。埃及第三军团2万人、约300辆坦克被以军包围。以军还摧毁了埃、叙的大部分海军力量,地中海东部很大一片海域和红海整个北部海域实际上都处在以色列海军控制之下。

在这场战争中,埃、叙等阿拉伯国家军队死亡约8500人(埃及5000人),受伤约19000人(埃及12000人),被俘和失踪的8550人(埃及约8300人),损失坦克2550余辆(埃及为1100辆),飞机和直升机约450架(埃及为265架)。以色列军队死亡2552人,伤约8800人,被俘和失踪500余人,损失坦克800辆,飞机和直升机115架。

在战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基辛格多次访问中东,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调解。1973年11月11日,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在苏伊士城附近签署了六点协议,其中规定埃以双方在联合国监督下立即开始就脱离军事接触问题进行谈判。1974年1月18日,埃以双方签署了第一阶段脱离接触的协议。3月5日,以色列部队按商定的计划撤退完毕。1974年5月29日,叙利亚和以色列也达成第一阶段脱离接触的协议,并于5月31日正式签署。1975年9月1日,埃以达成第二阶段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1976年2月22日,以军撤退完毕。

石油武器的运用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各国把石油作为捍卫国家主权、收复失地和反对强权政治的战略武器,采取减产、提价、禁运以及国有化等措施,配合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斗争。

阿拉伯国家根据进口中东石油的国家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友好、中立、不友好三类。凡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之一的国家划为友好一类,可以获得阿拉伯产油国减产前的石油供应数量:(1)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2)对以色列实行某种经济制裁;(3)为阿拉伯各国提供某种军事援助。凡是积极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则被划为不友好一类,停止对它们的石油供应。

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斗争对美国打击很大。美国石油消费总量有80%以上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美国在国外的军事用油,更是大部分依赖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石油供应减少后,美国许多工厂因而关门停工。美国宣布了一系列节省石油和电力的紧急措施。尼克松在1973年11月7日的电视讲话中承认,美国“正在走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能源不足的时期”。

西欧的石油消费基本上依赖进口,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就是中东地区。许多西欧国家,如英国、西德、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为了获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供应,都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采取拒绝合作的态度。日本消费的石油98%依靠进口,而进口石油中80%来自中东地区。它起初采取中立立场,为了享受阿拉伯友好国家的石

油供应待遇,日本政府于1973年11月22日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军队应从六·五战争所占有的土地上撤出,应当承认与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时候,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断绝了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这种政治状况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对美国的依赖。

战争后果 这场战争给以色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带来重大损失。据估计,以色列在战争中的物资消耗和财产损失超过70亿美元。巨额军费开支给以色列经济造成严重困难,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枯竭,通货急剧膨胀。这导致以色列社会舆论的不满以及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某些变化。抗议运动,特别是复员官兵的抗议运动,加强了反对党的力量。1973年11月18日,以色列当局成立了以最高法院院长阿格拉纳特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委员会没有考察政治责任问题,而只涉及到军事方面。委员会的报告把主要责任归咎为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其他一些军官。结果,埃拉扎尔和军事情报局长泽拉被迫辞职。委员会的这种做法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更大的风波。梅厄内阁已经无法维持下去,梅厄说:“我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走不下去了。”她于1974年4月11日提出辞职。5月28日,以拉宾为总理的新内阁组成。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前国防部长达扬没有进入新政府。

战争后,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它的传统友好国家西欧各国和南非对以色列表示疏远。以色列所依赖的美国也谋求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74年2月28日,美国和埃及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6月,美国和叙利亚也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第四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900年8月13日至16日在英国伦敦举行。赫茨尔在大会开幕式上就选择伦敦作为本次会议的举办地作了赞扬:“英格兰,伟大的英格兰,自由的英格兰,环顾四海的英格兰是最能够理解我们抱负之邦。我们深信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将从这里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本次大会议论的中心是罗马尼亚犹太社团所面临的严重局势。当时的罗马尼亚当局推行反犹主义,导致数千名犹太人被迫离开罗马尼亚,留下来的则继续遭受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和限制。赫茨尔认为,罗马尼亚犹太人遭受到的迫害,再一次证明了必须尽快为犹太民族寻找一个能属于自己家园的主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由于获得“特许状”的可能还渺渺无期,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引起世人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此应采取的对策。

在本次大会上,故土以色列犹太人的地位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赫茨尔仍继续被选为协会主席。

得撒 古犹太地名。北国以色列早期的都城。得撒最

先是迦南一王的都城,约书亚率以色列人到达迦南后,攻占了此城,并杀死了得撒王。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统一王国于公元前933年分裂,北国以色列继示剑之后定都于此。第一代王耶罗波安死后,其子拿答在得撒继位登基,约只一年,就被以萨迦支派的巴沙所杀。巴沙剿灭耶罗波安全家,亦在得撒登基。巴沙死后,传子以拉,以拉及全家又被其部下心利所杀。心利此举不得民心,元帅暗利率兵围困得撒,心利在宫中自焚,只作王七日。暗利上台,建立了北国暗利—亚哈王朝。此时,北国才迁都撒玛利亚。得撒曾以风景优美而闻名于世,在《雅歌》中有这样的诗句:“你美丽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

祭司 犹太教的神职人员,亦称为“科亨”。该职位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10世纪,统一王国所罗门王初建耶路撒冷圣殿时的撒督为祭司;再早就是上溯到摩西所任命的第一代祭司、他的哥哥亚伦。《圣经》中记载没有经过受膏油礼的士师或君王,如基甸、大卫、所罗门也曾按上帝指示献祭。但从《圣经》时代乃至现代,祭司为世袭制,只传给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祭司最高者为大祭司,是一切神职人员之首。犹太人被掳归回复建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祭司的权势达到空前的高度。到了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祭司的职司减少,特权也丧失殆尽。现代拉比在传授教义和解释律法方面代行祭司的职务,但没有祭司的身份。祭司的身份仍属于亚伦的后裔,犹太人中以科亨、科温、卡茨为姓的,就是这一部分人。他们优先享受在会堂宣读《律法书》之权,并在节日为会众祝福。犹太教改革派不承认有关祭司和祭司特权的规定。

祭坛 犹太教祭祀台,是犹太教徒奉献牺牲之处。早期并无固定的地方,堆一堆土或石头即成,后来随着圣所位置的固定,祭坛的形式有了变化,一般用石头或砖头砌成,有时也用木材或金属制造。同时,祭坛的置放地点也由野外搬进会幕或置在圣殿中。

《希伯来圣经》中涉及到祭坛的记载有多处,最早见于洪水之后,义人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挪亚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作为燔祭。这是《希伯来圣经》记载中的第一个祭坛。希伯来始祖亚伯拉罕曾在多处建立祭坛。在哈兰地蒙召,亚伯兰率其家族向迦南地迁移,到达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摩利橡树下为耶和华筑了第一座坛。接着亚伯兰就在伯特利东边的山为耶和华筑了第二座祭坛,并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与罗得分开后,迁移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亚伯兰在那里建了第三个祭坛,同时上帝重申他与亚伯兰的立约:“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亚伯拉罕所建最著名的祭坛当推摩利亚祭坛。据《希伯来圣

经》载，亚伯拉罕蒙召到摩利亚建立祭坛，并把儿子以撒放在祭坛的柴上，准备献为燔祭。这时，天使阻止了亚伯拉罕，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亚伯拉罕于是取了一只公羊献为燔祭。同摩利亚祭坛相联系的有关上帝的考验的故事，一方面说明古代中东地区以人献为燔祭的祭祀传统已非常流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希伯来宗教反对以人献为燔祭的野蛮作法，这对后来以色列宗教与文化有重大影响。

亚伯拉罕死后，以撒率家族在基拉耳一带游牧，基拉耳牧民不断与希伯来牧民发生冲突。以撒被迫南迁到亚伯拉罕的居留地别是巴。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表示上帝与他同在，以撒就在这里筑了一座坛，并求告耶和华的名。雅各遵父母之命，为躲避哥哥以扫的忿怒，逃到舅家拉班处，途中经伯特利，雅各枕在一块石头上梦见上帝的梯子。清晨起来后，雅各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这个石头柱子其实就是石制的祭坛。雅各在石头上浇油为后世祭坛“分别为圣”的做法提供了先例。雅各从哈兰归回途中，在示剑购买了一块地支搭帐棚，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命名为“伊利伊罗以色列”，也就是“上帝，以色列上帝”的意思。雅各家族不久与示剑土族发生严重冲突，这支弱小的家族几乎陷入示剑周围居民敌意的包围之中。在这严峻的形势下，雅各率家族抵达伯特利，在那里筑坛祷告，特别强调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这是《圣经》记载中第一次把祭祀耶和华同“外邦神”对立起来；同时，它强调献祭人应“自洁”，这对后来希伯来祭祀活动也发生重大影响。

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后，在利非汀杀败亚玛力人。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摩西就在山顶上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意为“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在西奈旷野，摩西传达颁布“十诫”，紧密联系如何祭祀，如何崇拜上帝。《出埃及记》第20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你们不可作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作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这些规定严格把崇拜祭祀上帝与拜偶像区别开来，并说明祭坛的神圣性和它的主要功能是奉献燔祭和平安祭。

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期间，其宗教信仰进入“会幕中心”时期。此阶段，犹太教经摩西改革而逐步定型化，随之祭坛的形式也发生变化。《出埃及记》第27章记载了正式用于会幕中的祭坛式样。这种木制裹铜的祭坛样式非常便于搬动，这是同当时希伯来人的游牧生活和“会幕中心”信仰相一致的。会幕建成之后，祭坛放在帐幕门前。另

一个专门用来烧香的坛则放在法柜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达摩押平原，摩押王请来巫师巴兰诅咒以色列人。巴兰却受感动，分别在基列琐巴力的高处、琐腓田的毗斯迦山顶和毗珥山顶上筑了七个祭坛，奉献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并歌诗以祝福以色列民。约书亚攻克迦南艾城后，在艾城附近的以巴路山上筑了一座祭坛，这座祭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成的。这次祭祀活动可能是以色列人旷野生活40年后一次最隆重的宗教活动。据《圣经》载，“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刻写在石头上……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约书亚这次筑坛、刻石和宣讲律法，显然是在恢复和强化摩西奠立的信仰，为以色列人进占迦南作好精神上的准备。攻占迦南全地结束后，约书亚命令流便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回归约旦河东岸的份地。流便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在靠近约旦河的迦南地筑了一座坛。这座坛在当时几乎引起12支派的一次大分裂。因为在刚刚进占迦南地时，全以色列的信仰中心在示罗，示罗有耶和华的会幕和祭坛，这样约旦河东岸支派所建祭坛就证明他们是“悖逆了耶和华”。东岸支派向来到基列地的大祭司以利以撒的儿子非尼哈及随行的以色列10个军事首领作了解释。于是他们筑了一座坛，不是为献祭，乃是为两部分支派之间作证据。流便人、迦得人给坛起名叫“证坛”，意思是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上帝”。

士师基甸时代，以色列人由于与迦南诸民族杂居，其信仰几乎完全迦南化了。基甸起来拯救以色列人，他首先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受感之处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随后，基甸拆毁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并在原地的磐石上用石头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基甸就用砍下的木偶作柴，献上父亲的一只七岁的牛作为燔祭。这个材料表明迦南崇拜与以色列耶和华崇拜之间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巴力祭坛的旁边必有雕刻的木偶，属于巴力神的偶像。另一个著名士师参孙的父亲玛挪亚也曾筑坛祭祀。《士师记》第13章记，“玛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玛挪亚和他的妻子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了上去。”

还有许多筑坛是为了献燔祭和平安祭，犹大、以法莲等以色列支派屠杀了便雅悯地的一切人和牲畜，仅剩下一些便雅悯俘虏。以色列众支派曾在米斯巴发誓绝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作妻子，现在却又面临着以色列传统中的12支派即将失去1支派的危险，所以以色列人在伯特利筑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以寻求解决便雅悯问题的途径。大卫王时代曾做过一次人口普查，以色列的战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普查结束时，迦南地正好爆发瘟疫，从

但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万人。瘟疫发作地区正于耶路撒冷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耶路撒冷幸免于瘟疫的袭击。大卫认为这场瘟疫是因为自己擅自清点人数，干犯上帝，于是他接受先知迦得的建议，买下了亚劳拿的禾场，“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这次建坛献祭，旨在赎罪，要求上帝免去在以色列中流行的瘟疫。

耶罗波安发动政变后，在迦南北部建立北国以色列。为了避免北国居民继续到耶路撒冷献祭，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和但两地筑坛祭拜金牛犊。其中以伯特利为后来北国之祭祀中心。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暗利—亚哈王朝在信仰上更加堕落，亚哈娶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而耶洗别是一个狂热的巴力信徒，所以耶罗波安王朝推行的金牛犊崇拜更完全为巴力崇拜所代替。亚哈在北国都城撒玛利亚建造巴力庙，在庙里为巴力筑了祭坛。王后耶洗别在全境推行巴力崇拜，捕杀耶和华的先知，拆毁耶和华的祭坛，大建祭祀巴力的祭坛。亚哈王朝时的以利亚先知曾在耶洗别的捕杀下逃遁，后潜回并在迦密山顶挫败巴力先知。当众巴力先知通过种种法术求告巴力的名却一整天没有反应的时候，以利亚先知重新修好山顶的一座已被毁坏的耶和华祭坛，先知以利亚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这样在迦密山顶观看这场斗法的以色列群众终于认识到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圣经》的这段描述还显示了巴力祭祀与耶和华祭祀的另一不同之处：巴力先知们在祭坛周围跳跃、狂叫，甚至于以刀自割，使身体流血，借此使精神达到迷狂状态，而耶和华先知则以真诚祷告来求得上帝的“应允”。这是犹太教与当时的迦南宗教十分重要的一个区别。犹大王亚哈斯破坏了南国“圣殿中心”的崇拜传统，他不仅使他的儿子经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的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当时这种属于外邦人形式的丘坛一定很多，而它们同样用于供献燔祭等。亚哈斯王又根据他在亚述国看到的一个祭坛样式描下图案，并让当时的大祭司乌利亚按图制造。亚哈斯王随后用这个新筑的土坛代替了耶路撒冷圣殿中传统使用的铜坛。亚哈斯王时代的丘坛大约到了犹大王希西家时代被废去。

玛拿西继希西家后，亚述宗教与文化又进一步影响犹大国。希西家一度废除的丘坛又被重建起来，玛拿西又为巴力筑坛，他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斯所行的，祀拜天上的万象。而祭祀万象正是亚述宗教的最重要的特征。玛拿西甚至在圣殿的两院里为天上的万象筑坛，祭拜。至此，犹太的祭祀传统几乎丧失殆尽。所以《圣经》批评他“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太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

晚期犹太的最著名宗教改革家约西亚王在位时，采取了最严厉、最彻底的措施，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玛拿西在耶和華两院中所筑的坛，约西亚王都拆毁打碎，把灰倒在汲沦溪中。犹大境内历代以来凡为西顿人的神亚斯他录、摩押人的神基抹、亚扪人的神米勒公等所筑的祭坛，约西亚王都拆毁打碎，予以清除。他甚至将他的改革推进到他势力所能达到的伯特利等地。这些地区以偶像崇拜为标志的祭坛和殿宇也被摧毁。约西亚王重新修理了耶路撒冷圣殿，他使犹太的祭坛崇拜完全恢复到古老的传统。被掳归回的第一批犹太人在领袖所罗巴伯和祭司耶书亚率领下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首先在圣殿原来的根基上筑坛献祭，向耶和華表示感恩，祈求保佑，由此开始，进行修建“第二圣殿”的艰难工作。

康熙碑 见“《重建清真寺记》碑”。

悼念灯 犹太教礼仪用品，为哀悼已故亲友而点用的一种灯。《圣经》上就有：“人的灵是上帝的灯”一说。然而，这一习俗的真正起源却在中世纪的德国，由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率先使用，随后很快为其他犹太社团所接受，成为今日的一种习俗。根据有关规定，使用悼念灯的主要场合是：死者家属坐息瓦期间；父母或其他关系亲近的亲属的忌辰（以犹太历为准）；赎罪日前夕。

悼念灯由特制的蜡烛做成，通常放在玻璃或金属容器中，至少能连续点燃24小时。目前，在部分犹太会堂或老年人家中，蜡烛制成的悼念灯已由电灯代替，以防止火灾或对会堂的污染。悼念灯可以在家中点燃，也可在犹太会堂中点燃。在点燃时，一般要同时诵读特别悼念祝祷。

在以色列国，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和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将士，悼念灯点燃次数已有所增加，通常要在大屠杀纪念日和阵亡将士纪念日点燃悼念灯。

盖尔曼 (Murray Gell—Mann, 1929—)

美国犹太物理学家，196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生于纽约。青年时代就显露出卓越的才华。他15岁考入耶鲁大学，19岁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3年后即完成学业和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52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核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学方面的研究。1955年，回母校任物理系副教授，两年后成为正教授。早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他便开始对亚原子粒子的研究，1953年，提出某些核粒子的“奇异性”概念。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他于1961年提出了著名的 Su_3 对称八重法规律，把以前人们认为是杂乱无章的基本粒子，按各自的自旋角动量及宇称性，系统地分门别类，然后再用一个公式表示同一组内各粒子之间的质量关系。八重法不仅把

已知的粒子全部包括在内,而且对尚未发现的粒子的存在作出了预测,与著名的门捷列夫提出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有异曲同工之效。根据这一分类,他预测了反 Ω 粒子的存在,还对它的质量、自旋量、宇称、奇异数和电荷进行了推测。1964年,这一粒子被发现,性质和他的预测完全相同。后来,他还与其他科学家提出了夸克理论。1969年,他因这方面的成就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金。除了诺贝尔奖外,他还获得了许多科学奖,并被选入美国科学艺术协会和国际科学协会。他还与尼曼教授合著了科学界欢迎的《八重法》一书。

《密西拿》 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公元70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人摧毁,标志犹太教所罗巴伯“第二圣殿”时期的结束。犹太教中心转移出巴勒斯坦,而熟习精通摩西律法的法利赛派律师,在犹太社会取得领导的地位,被犹太群众尊称为“拉比”。拉比们教导犹太人学习律法、遵行律法外,还对律法进行诠释、评注。这一时期的犹太教称为拉比犹太教。从公元70年到公元7世纪长达600多年的拉比犹太教时期,犹太教的经典在希伯来经典的成文律法外,发展出大量的“口传法规”,这些就是几个世纪犹太拉比诠释律法的成果。以后成为众多的拉比法规文集,汇总起来称为《密西拿》。希伯来文“密西拿”意为“重新阐述”。这部《密西拿》的形成过程为:公元171年至217年间,犹太亲王(也称圣者拉比犹大)掌管乌沙犹太教公会。这时犹太社会流传大量口传法规,这些法规是根据成文律法条文在实际生活案例上的具体应用。这些口传的律法教导犹太人“可行什么”和“不可行什么”,才是符合摩西的律法精神的。在犹太亲王的主持下,集中犹太拉比社团的名士,将历来100多位卓越有名的拉比的13部法规文集,加以分类、整理与补充。经过20多年拉比集体的辛勤工作,编辑成功一部以晚代希伯来文写成的巨著——《密西拿》。

这部《密西拿》是公元3世纪初年(约公元200—210年间)完成的犹太教口传律法总集。该总集共6大卷63篇。6大卷的分类名称如下:(1)《哲拉音》,希伯来文原意为“种籽”,共11篇,内容为有关农事耕种的律法条例;(2)《摩埃得》,希伯来文原意为“节期”,共12篇,内容为安息日和其它节期的仪礼律法;(3)《纳西姆》,希伯来文原意为“妇女”,共7篇,内容为关于订婚、结婚、离婚、誓约等有关婚姻的律法;(4)《纳哲钦》,希伯来文原意为“损害”,共10篇,内容为关于民事与刑事的律法,涉及借贷、赔偿、债务、继承等民事关系,和偷盗、拜偶像等刑事处理条例;(5)《科达希姆》,希伯来文原意为“圣物”,共11篇,内容为圣殿崇拜与献祭、捐献的律法;(6)《托哈鲁特》,希伯来原文意为“洁净”,共12篇,内容为关于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规定,包括身体、食物、居室与用具等方面。

《密西拿》为口传律法专集的总称,但书中所列每一

条文也称作“密西拿”,如节期卷中关于安息日的特殊规例,可称作“安息日的密西拿”。

公元3世纪之后,《密西拿》在犹太人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逐渐出现一些问题与漏洞,它不能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于是促使其需要作进一步的补充与修订。特别是巴比伦犹太中心的高级拉比集团,他们认为这部《密西拿》有其极大的局限性,它的许多解释只属于巴勒斯坦的传统,没有结合巴比伦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完全包括已有的律法条例和补充的口传法规。巴比伦的拉比们继续整理这些补充条例并加以全面的诠释评注,于是又编成另外一部用阿拉米文写成的律法释义汇编,称之为《革马拉》(希伯来文含义是“补全”)。所以《革马拉》实际上是《密西拿》的释义和补篇。公元4世纪中叶,希伯来文的《密西拿》与阿拉米文的《革马拉》编合在一起,成为《巴勒斯坦塔木德》,到公元5世纪末,内容更充实的《巴比伦塔木德》完成。

希伯来经典犹太人称为“律法和先知”,“律法”指摩西律法;“先知”指《前先知书》四卷与《后先知书》四卷(即《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与《十二小先知书》),《律法和先知》是不可废去、不可更改的犹太教正典,而《塔木德》则是后来产生的犹太教宗教生活准则的经典,它包括犹太人生活的全部准则与道德伦理的规范。

密抹 古犹太地名。又名“默马”。位于耶路撒冷北约10公里处,盛产大麦。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后,此镇被划归便雅悯支派。统一王国时期,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进攻迦巴的非利士人,扫罗王则带兵驻扎于密抹。不久非利士人再次入侵,控制了隘口。约拿单只带一名战士杀进非利士军营,击溃非利士人,建立奇功。著名先知以赛亚曾预言,亚述人进攻耶路撒冷时,将在密抹放置辎重。公元前538年被掳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回国后,有100多人居住在密抹。玛喀比王朝约拿单在位时,密抹曾为行政首脑机构所在地。

隐多珥 古犹太城镇名,位于以萨迦境内,他泊山以南3公里、书念东北5公里处。约书亚率以色列人进占迦南后,隐多珥被划归玛拿西支派。扫罗王时期隐多珥城中有一著名女巫。扫罗与非利士人打仗,心中十分慌乱,询问上帝结局将如何。因扫罗犯过大错误,上帝没有回答他。于是他转而询问隐多珥女巫。扫罗过去曾严禁通鬼交神之事,女巫起初不敢用占卜术。但扫罗向她发誓绝不向她施罚,她才行其巫术。她问扫罗要招谁,扫罗说招撒母耳。不料撒母耳真现其形,女巫自己也非常恐惧。撒母耳指责扫罗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必定降罪,以色列军队明日必定战败,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必将丧命于沙场。撒母耳的预言果然应验,以色列军队全军覆没,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基利波山殉难。

隐基低 古犹太地名。即哈洗逊他玛。位于死海西岸。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占迦南后，划归犹大支派。此地风景秀丽，多温泉、棕树和葡萄树。亚摩利人曾占领隐基底。基大老玛离开加低斯和伊勒巴兰去西订谷时，经过该地并占领它。大卫躲避扫罗王的追击曾藏身于该地的山洞中。分国时期，南国犹大王约沙法时，亚扪人、摩押人和西尼山人途经该地侵犯犹大，后败于该地的旷野中。此地中世纪时渐成荒漠，今只有少数阿拉伯人居住。

《隐喻之书》 犹太教希伯来文著作。此书赋予希伯来文 22 个字母以各别的灵义，认为《托拉》（《律法书》）有隐含之义，它把宇宙的发展分为若干周期，每一周期代表上帝的一种属性以阐发《律法书》的灵义。该书论述宇宙发展的前三个周期，即恩宠期、审判期和怜悯期。人类第一时期蒙上帝的恩宠，以后由于人类犯罪堕落，于是进入上帝的审判期，人类现在正处于审判期内，表现在《律法书》中为一整套的禁令戒律，许多律法条例均以“你不可”起始。但人类接受审判期的惩罚，以后又将蒙上帝的赦免和怜悯，这就是第三期的怜悯期。这三期符合以色列民的历史，即起初选民的恩宠期，以后亡国被掳至巴比伦的审判期，最后实现了被掳归回的怜悯期。《隐喻之书》于 13 世纪出现于西班牙，作者不详。

婚书 犹太民族结婚时使用的一种契约。它是由双方当事人事先订立，在婚礼仪式上由新郎签署，然后交由新娘保管的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它主要不是为了证明婚姻关系，而是为了保障女方未来的权利和经济利益。根据犹太教律法，犹太男子享有自由休妻的权利，随时可以以任何理由与妻子解除婚约，为了维护女方的权利，使休妻者在经济上付出昂贵代价，自古以来就实行婚书制。婚书上主要录写丈夫对妻子的一系列义务（以经济义务为主）。这些义务有的来自《圣经》，有的来自《塔木德》，有的来自历史上著名犹太学者在论述婚姻问题时提出的做丈夫的义务。婚书中的条件还规定，一旦丈夫休妻，要交出的财产数，寡妇有权继承亡夫财产等。除了传统内容外，婚书还可以包括婚前双方商定的其他结婚条件，如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规定丈夫不得另娶等。尽管今天，女方的上述权利已由民法保障，填写婚书仍是犹太法律所规定的一道结婚手续，是犹太民族传统婚礼上必不可少的一种仪式。

婚后按传统使用阿拉米语，手写而成。不过，在历史上就不时出现两种文字并行文本。一种仍为阿拉米语，另一种是婚姻双方使用的语言。在以色列，有人建议婚书应改用希伯来语，然而，以色列总拉比尚未就此表态。中世纪婚书印有花边，本文用手写。现代婚书只具有象征意义，大多为印就式，只留部分空白以备记录具体条件之

用。左下角有证人签署，右下角由新郎签署。

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埃及犹太社团就已开始使用婚书。今天，正统派和保守派犹太教仍规定教徒必须先订立婚书才能结婚。（参见“犹太婚姻”）

维厄瑟尔 (Elie Wiesel, 1928—) 犹太教育家、作家、1986 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生于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哈西德派聚居的小镇。自幼接受犹太传统教育。1944 年春，德国法西斯占领该镇，全镇犹太人都被押往集中营。他本人、父母以及三个姐妹全都关押在波兰境内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他曾亲眼目睹父亲遭杀害、妹妹被焚烧的惨况。1945 年，他被转押至另一集中营，后幸存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先在法国生活、读书，同时为法国和犹太人的一些报刊撰稿谋生。1956 年移居美国，1963 年成为美国公民。先后在美国一些大学执教。

维厄瑟尔的名声首先来自文学。其文学生涯开始于 50 年代，在法国作家弗朗西斯·莫里亚克的鼓励下，于 1956 年用意第绪语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世界保持沉默》，以文学的形式叙述了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经历，引起人们的注意。随后不断有作品发表，其中主要的有《夜》(1960)、《大墙以外的城镇》(1961)、《耶路撒冷的乞丐》(1968)、《火焰中的灵魂》(1972)、《约》(1980) 等。他的作品集中反映犹太民族遭纳粹屠杀的悲惨命运，指出大屠杀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以及大屠杀对人类的启示，具有较强的感召力。为此，他先后在世界范围内获数十种文学奖。

维厄瑟尔又是一位著名演说家，演讲主题集中在以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亲身经历谴责人类社会存在的所有暴力、仇恨、压迫。他经常应邀前往世界各地发表演讲，目的在于教育人民和启迪人的心灵，为增强世界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为世界上一位著名的和平人士。1986 年，由于对和平的热爱和对暴力的仇恨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维泽利 (Naftali Herz Wessely, 1725—1805)

犹太近代著名学者，希伯来语言学家，文学家。生于德国。在丹麦的哥本哈根长大。早年接受启蒙主义，决心为犹太民族复兴作出贡献。由于观点相同，与门德尔松结为知交，成为共同推进犹太启蒙思想的重要人物。1782 年，德皇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宽容法”，为打消犹太虔诚派对这项法令的疑虑，他发表了题为《漫话安全和权利》的小册子，敦促奥地利犹太人接受这一法令，走出犹太隔都。1785 年，与门德尔松等人共同创办首份希伯来语杂志《文摘》。该刊物在犹太人中传播启蒙思想和提高希伯来语文学鉴赏力，发展流畅的文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维泽利的主要文学成就在诗歌的创作上，叙事诗《敬

畏》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这首诗气势恢宏，音韵铿锵，按照欧洲诗人的旨趣重新描述了以色列伟大立法者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古老传说。全诗贯穿着当时风靡欧洲的古典主义精神。作品所表现出的通俗的内容、和谐的韵脚，以及词藻华丽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圣经》语言，在当时都是史无前例的创新。它还是以近代欧洲式风格运用希伯来语的一种新的尝试。正因为如此，维泽利从事文学创作的年代被誉为希伯来文学新时代的开端。

维泽利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发表了好几部语言学专著，其中于1765年发表的《封闭的花园》就是很有影响的一部学术著作。他还是《旧约·圣经》德文版的译者。该译本译笔新颖，用时代精神进行注释。由于这个译本和诠释，犹太青年开始领悟到《圣经》所包含的崇高道德准则，领略到古希伯来语的华美堂皇，使许多人通过已经成为书面语的希伯来语学会了富有活力的德语，有力地推动了德国犹太启蒙运动的发展。

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 — 1951) 奥地利哲学家、逻辑学家、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出生于维也纳，祖父是一位改信新教的犹太商人。1912年进入剑桥大学，师从罗素学习数理逻辑。他的学习和研究进展迅速，甚至在哲学思想上给罗素以启发，特别是在所谓“逻辑原子论”方面。1918年他完成《逻辑哲学论》一书，该书的主要论点是：语句是现实的图画，语句与现实有共同的东西，这就是两者的逻辑形式，语句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结构相同的关系，实在是由简单事物组成的，而语句也是由基本语词构成的。这本书对逻辑经验主义者和从事逻辑分析的语言哲学家，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1929年，维特根斯坦从奥地利偏僻的乡村重返剑桥致力于哲学研究。他后期的哲学思想与前期相比有很大的转变，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生动、活泼、多变的复杂的语言现象，而抛弃了那种静态、严格的逻辑分析。他后期著名的哲学思想是“语言游戏”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个词的意义就在于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离开用法就不能谈语词的意义。他认为哲学家害的是语言病，他们忽视了语言的日常用法，而为其形而上学的用法所迷惑，他的工作就是分析和治疗这种疾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先在伦敦盖伊医院当看门人，后来到纽卡斯特的圣维多利亚医院，当临床研究实验室的实验员。1944年他回到剑桥继续上课。他的个性和脾气使人难于和他交往，他时时感到孤独。1947年他终于辞去教授职务，重新过了隐居生活。

维塔尔 (Hayyim ben Joseph Vital, 1543 — 1620) 巴勒斯坦犹太教喀巴拉领袖。生于巴勒斯

坦，早年在萨费德师从摩西·阿尔舍克拉比学习犹太教经典。当艾萨克·本·所罗门·卢里亚于1570年到达萨费德后，他很快成为卢里亚最得意的门徒和追随者。卢里亚也认为在他的所有门徒中，只有维塔尔对他的教义和思想理解得最深刻。卢里亚死后，维塔尔声称只有他一人拥有卢里亚教义的准确文本，并在以后的一生中为卢里亚思想得到正确传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了赢得犹太群众的拥护，他曾散布弥赛亚本·约瑟的精神已经从他的老师卢里亚传到了他的身上消息。后来，他果真赢得了能行神迹的名声，被许多人请去驱邪。1577年，他移居耶路撒冷，成为当地犹太教拉比，并领导耶路撒冷的一所经学院达8年之久。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在大马士革度过。

维塔尔在世时写下不少作品，但生前一直拒绝发表任何著作。在他病重期间，一些追随他的人设法从他身边取走部分手稿，私下抄录传阅，这些手稿中包括了他对卢里亚教义的评注。后来，这部分作品被后人整理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论述卢里亚教义的《生活之门》和指导神秘主义发展方向的《神圣之门》。这些作品被认为是了解卢里亚喀巴拉思想的权威著作。

维森塔尔 (Simon Wiesenthal, 1908 —)

犹太社会活动家，维也纳犹太咨询中心创办人。生于奥匈帝国的布察兹镇(今波兰境内)。1932年获布拉格工科大学建筑工程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波兰的利沃夫定居，开店经商。1939年的苏德秘密协定使利沃夫为苏联占有，他被迫关闭自己的私人商店。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落入纳粹之手，被关进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幸存下来，但其家庭成员中有89人已被纳粹残酷杀害。怀着对纳粹分子的刻骨仇恨，他于1947年与30名志愿人员在奥地利的林茨开办“犹太人命运及其迫害者咨询中心”。中心的宗旨是对犹太难民提供资助并对审讯纳粹战犯的工作提供证据。1954年，他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奔走，从事收集、了解在逃纳粹战犯下落的工作。1959年，他在阿根廷了解到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下落，并协助以色列成功将其捉拿归案。1961年，他在维也纳开设了犹太人咨询中心，并继续从事侦辑前纳粹战犯的工作，在以后的几年中搜寻出约1000名在逃战犯，成为著名犹太社会活动家。1971年，美国成立的旨在提醒人们不忘大屠杀悲剧和保卫犹太人权利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就是以其名字命名。

维森塔尔一生还写下大量著作，其中包括《毛特豪森集中营》(1946)、《大穆夫提：轴心国家代理人》(1947)、《我捉艾希曼》(1961)、《维森塔尔回忆录》(1967)、《向日葵》(1970)、《希望之舟》(1972)等。

十二画

替罪羊 源出《圣经》典故，指替人受过的羊，以后转指无辜而代人受过的人。《圣经·利未记》第16章第8至28节载，古犹太人在每年赎罪日那天要挑选两只公山羊，由大祭司抽签，一只宰杀献给耶和华上帝作赎罪祭；另一只即为替罪羊，要放到旷野去归给邪灵阿撒泻勒。大祭司先要把两手按在这只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之后，派专人把这只羊送到旷野放掉，说是归给旷野的邪灵鬼魔阿撒泻勒，实际让此羊一去无影无踪，以此象征性地表明此替罪之羊已将人们的一切罪孽都带走净尽，此羊不复存在，而人所犯的罪也得以除赎，因此这羊就是替罪羊。那位送羊到旷野去的人回来之后要沐浴更衣，行洁净之礼。

到了公元1世纪的新约时代，放替罪羊到旷野去的作法又有些改变，经大祭司行两手按羊头归罪在羊身上之礼后，这只替罪羊被领到耶路撒冷以东约20公里的一个悬崖上，然后把这羊从悬崖上摔下去，这只替罪羊跌得粉身碎骨，象征一切罪孽消灭净尽。

《塔木德》 犹太教的口传律法总集，是仅次于犹太教《托拉》的主要经典，也被称为“口传《托拉》”。

公元3世纪初年，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密西拿》编成，它包括六大卷共63篇。以后在犹太人生活的实际应用上，出现一些条例需要有更明确的诠释与补充，巴勒斯坦和一些外地的犹太拉比编成了另外一部释义汇编，称为《革马拉》，它是用阿拉米文写成的《密西拿》的注释和补篇。公元4世纪中叶，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密西拿》与用阿拉米文写成的《革马拉》合在一起，两部份在书页上左右并列，成为一部更大的巨著，这就是《塔木德》。这部《塔木德》也称为《巴勒斯坦塔木德》或《耶路撒冷塔木德》。巴勒斯坦基督教的兴起与发展，促使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学术研究走向没落，这时巴比伦的犹太拉比社团，继续对《塔木德》进行增订与编纂工作，在公元5世纪末完成了《巴比伦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比《巴勒斯坦塔木德》更加充实完备，它是一部反映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犹太人一千年左右年代里的宗教、文化、政治生活的巨大著作，长达250万字。内容包括《圣经》训诫、历史、诗歌、寓言、法律、民俗、宗教礼仪，甚至包括农业、建筑、天文地理、医学以及民事刑事等等。《塔木德》实际上是代表公元1世纪末到公元500年间犹太古代宗教、哲学、历史、生活习俗各



《塔木德》版本之一，四周为后人的评注

由于《巴比伦塔木德》编撰于《巴勒斯坦塔木德》之后，经精通摩西律法拉比们的研究，更主要的是犹太实际生活中的实践，所以《巴比伦塔木德》的律法权威性超过《巴勒斯坦塔木德》。一般律法问题的争论以《巴比伦塔木德》作为正确与否的衡量标准，而《塔木德》在生活上的实际应用，每每也修改了摩西律法的硬性条文。例如，摩西律法中三次提到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律法，此条律法实际上并没有如实地被遵行，因为肢体伤害以致残缺，对双方均无益处，问题的解决可在伤害者与被伤害之间协议处理，受害者可以饶恕伤害者，也可以要求其他形式的补偿；在被伤害者失去一只眼的案例上，根据摩西律法，被伤害者可以要求剜去伤害者的一只眼睛作为补偿，以达到极端的满足，但却被视为不是强制性的条规，被伤害者只要愿意，他可以得到金钱或其他形式的满足。犹太拉比在《塔木德》制定的口传律法就这样说：丢去一只眼睛的受害者不应要求伤害者的眼睛，但是可以向伤害者要求补偿他所失去的眼睛的价值。通过这种妥协的方式，摩西规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条款，事实上被废止了。犹太拉比们应用《塔木德》的“哈拉卡”部分，极力解释摩西律法，使之与当代现实生活相适应，说明律法应该如何应用在现实生活中。在整个中世纪，欧洲

犹太人对《塔木德》的研究非常活跃。时至今日,犹太教正统派仍然认为载于《塔木德》的律法乃出于上帝的启示,对这部律法集的诠释和补充的工作仍在继续。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犹太文化得以复兴,《塔木德》再次受到重视。犹太教正统派教徒认真研习着《塔木德》,并试图争取将《塔木德》定为以色列国的大法。

《巴比伦塔木德》曾在犹太人民中间口头流传数百年,成书后在印刷术发明前使用手抄本,约在公元1482年首次在西班牙印刷出版。

《塔古姆》 亦译《塔尔贡》。《希伯来圣经》的阿拉米语译本。古犹太国灭亡后,希伯来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普通犹太人开始以阿拉米语为国语,而不再学习希伯来语。尽管犹太教规定在犹太会堂中诵读《圣经》必须使用希伯来语,但是,为了犹太教自身的传播,照顾广大不懂希伯来语的会众,当时的犹太会堂在用希伯来语诵读《圣经》时,又将其译成阿拉米语。久而久之,就出现了阿拉米语的译本——《塔古姆》。最早出现的《塔古姆》是即席口译记录,中间夹有大量解释性词语和评注,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翻译,只是一种意译。担任这项翻译的人通常为特别指定的教会成员。随着犹太人宗教意识的增强,这种将《圣经》译成口语的习俗很快就中止了。

从流传下来的《塔古姆》可以看出,《塔古姆》中仍写有希伯来文的《圣经》,只是在希伯来文的旁边,增加了对应的阿拉米语译文。同《希伯来圣经》一样,《塔古姆》也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和《圣文集》三部分。古抄本共存近10种。15世纪后,开始有印刷本问世。《翁克劳斯塔古姆》被认为是最完美的阿拉米语译本。由二世纪著名阿拉米文翻译家翁克劳斯翻译。《塔古姆》的全抄本于1956年首次在巴勒斯坦地区发现。

塔尔米德哈卡姆 犹太经典《密西拿》中对有学问的犹太人、特别是拉比犹太教学者的一种称谓。意为“圣贤的门徒”。古代犹太人大多以侍奉、追随一位得到社会认可学者的方式学习知识,并在侍奉过程中观察和学习圣贤的思想情操、行为规范、处世哲学等。这样的人被称为“塔尔米德哈卡姆”。尽管做一名塔尔米德哈卡姆能得到某些特权,如不用交纳税款,免除社区中的公差、义务等,但他必须在许多方面约束自己,为人必须虔诚、善良、仁厚、正直、谦逊、能自我规范自己的行为、注意自己的衣着、举止、善于为人师表、对同仁的恭敬,但在学术讨论中要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在提出问题或回答他人提问时要一语中的,并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处理人们提出的与《哈拉卡》有关的各种问题。

犹太教的传统之一是尊重知识,尊重学者,人们往往把一位获得塔尔米德哈卡姆身份的人看得比无知的祭司还要高,并规定对侮辱塔尔米德哈卡姆的人必须罚以重

金,情节严重者还可能被逐出社区。卖掉自己财产与塔尔米德哈卡姆女儿结婚被视为一种高尚行为。

坦拿时代对塔尔米德哈卡姆的要求因所从学者的不同而不同,有的要求门徒全盘接受自己的思想,有的则要求在掌握基本要义的基础上逐渐行成个人的观点。现代以来,任何一位有学问、精通犹太教经典的人都可称为塔尔米德哈卡姆。

塔姆 (Igor Yevgenyevich Tamm, 1895—1971)

苏联犹太物理学家,195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生于俄国的海参威,1913年,他年仅18岁便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留学。次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国学习,1918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数所大学执教。1924年,为莫斯科大学录用。1930年,担任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教学之余,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理论、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1930年,他系统地阐述了光在固体中的声振动和散射的量子理论。1932年—1933年,发表论述半导体金属中存在着表面电子态的论文。1934年,他接任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部主席职务。1937年,他与夫兰克合作,经过反复试验和探讨,运用经典电磁理论解释了切伦科夫辐射理论,后又在波动力学的基础上完善了这一理论。1940年,他又解决了基本粒子理论中基本核粒子相互作用这一根本性问题,建立了所谓塔姆法。1950年,他与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提出利用电离气体中的电荷来作为控制热核电力的手段。1958年,他因这方面的成就与另两名苏联物理学家切伦科和夫兰克共获诺贝尔物理奖金。

塔姆著述甚多,影响最大的是《电学原理》一书,现已成为主要教课书。他一生多次获奖,代表苏联政府出席苏欧科学会议。1959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另外,他还是波兰科学院院士和美国科学艺术学院院士。

喜克索斯人 一群由闪族和亚洲人混合而成的侵略者,约于公元前1674年占领埃及北部,在第十五王朝期间进行统治。“喜克索斯”一词,埃及语意为“外来的统治者”。他们把马和战车、排弓、改良的战斧和先进的防御工程技术传入埃及,并在东北部三角洲的阿瓦利斯建立首都。《创世记》记述约瑟曾在埃及法老宫中为相,主持储粮备荒工作,有人认为就是正值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的时候,那时的埃及法老是喜克索斯人,和约瑟基本上同属亚洲的闪族人种,任用约瑟为相,赋予他最高权力是可以理解的。公元前1567年,阿瓦利斯落入底比斯起义者雅赫摩斯之手,从而结束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的108年统治。从雅赫摩斯一世起,埃及进入帝国时期,即新王国时期。

彭齐亚斯 (Arno Alan Penzias, 1933—)

美籍德国犹太天体物理学家,197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生于德国慕尼黑,父亲是个木匠,在希特勒当政后,全家人因犹太身份被纳粹放逐到波兰,过着流浪生活,后偷偷回到慕尼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纳粹开始变本加厉迫害犹太人,在这一情况下,全家人分批逃往英国,1940年,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籍。青年时代,他先后在纽约市立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并于1954年在美国陆军通讯部队当了两年雷达技术员。1962年,获博士学位。由于仰慕设在新泽西州的美国著名贝尔实验室的高级天线设备,放弃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而去贝尔实验室工作。在那里,他与美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威尔逊合作,负责建造一座20英尺喇叭型反射天线接收系统,当他们开始监视来自环绕银河系的一个气体环的射电辐射时,意外地探测到一种均匀的背景天电干扰噪音。经过一系列的测量和研究,认定这一噪音是整个宇宙间到处存在的一种残余热能,约相当于3K的温度。这一发现正好与宇宙是在几十亿年前起源于一次原始大爆炸的理论的预言相吻合,导致宇宙背景辐射研究中一项难题的解决。1978年,他因此与威尔逊以及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孟共获诺贝尔物理奖金。

1972年,彭齐亚斯出任贝尔实验室无线电物理研究部主任。1976年,升任贝尔实验室射电研究部主任。现任贝尔实验室副总裁一职。

联合分配委员会 犹太慈善组织,全称为美国犹太联合(基金)分配委员会。1914年,根据F·M·瓦尔堡(1871—1937,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犹太银行家)等人的倡议建立,它以下述三个组织为基础:美国犹太救援委员会(主要由出生于德国的有影响的犹太活动家建立),中心救援委员会(由美国犹太正统思想的领袖建立),以及人民救援委员会(由一些犹太工人组织建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分配委员会给予战争地区数十万无家可归的俄国和奥匈帝国犹太人以帮助,并且耗资1500万美元救援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1919—1920年,联合分配委员会耗资2270万美元建立救援机构,以帮助波兰和乌克兰犹太人。1921—1924年,耗资2450万美元,主要帮助俄国犹太人。根据与苏联政府的协议(1922),联合分配委员会在苏联建立了一些医疗点、贷款银行和职业学校。

对于东欧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与犹太垦殖协会一起,在1924年建立了拥有资本500万美元的基金会。1931年,开设了700多个贷款银行,发放低息贷款,小额贷款不计息。仅仅在波兰,通过这些银行就给100万人提供了帮助。1923年,联合分配委员会在波兰建立了卫生合作社和儿童社会保障团体。30年代,联合分配委员会给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的东欧国家的犹太人提供食品。它还给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罗马尼亚和外喀

尔巴阡的学校和宗教机构予以帮助。联合分配委员会的领导(部分是非犹太复国主义者,部分甚至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帮助伊休夫的各种教育机构和经济机构(1926年,它向巴勒斯坦经济团体捐助180万美元,该经济团体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投资项目)。1933—1939年,欧洲纳粹威胁的增长促使美国犹太人增加联合分配委员会的进款,这些进款在经济危机的年代中曾经急剧地降低下来。在纳粹威胁增长的岁月里,欧洲犹太移民成为联合分配委员会直接关注的对象。1939—1945年,耗资7900万美元主要帮助和拯救欧洲犹太人。1943—1944年,波兰犹太地下组织收到联合分配委员会空投的30万美元。瑞士的联合分配委员会分部向欧洲国家和上海寄送钱财,而它的主席S·迈欧(1882—1950)参加了拯救匈牙利犹太人的活动(1944),并同德国人谈判,试图阻止德国人把犹太人继续送往死亡集中营。联合分配委员会促使8.1万犹太人从德国占领的国家中,主要经由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巴尔干地区撤离。

40年代以前,联合分配委员会对犹太复国主义持中立态度。纳粹的暴行和以色列的复生完全改变了它的立场。它的活动在1945—1952年期间达到高峰,它耗资3.42亿美元,向从集中营中迁移出来的25万犹太人,以及幸免于难的欧洲社区的犹太人提供食物、衣服和药品。为了改善被英国政府抓获的、拘禁在塞浦路斯岛上的5万“非法”犹太移民的生活条件,联合分配委员会也支付了大笔款项。1949—1950年,它为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花费了大笔资金。从1949年开始,它资助以色列的养老机构。与特拉维夫的市政当局一起,联合分配委员会在考虑到城市老年居民患有慢性病的情况下,实施卫生保健纲要。它也继续帮助伊休夫以及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整个犹太教育体系。它还向从北非侨居法国的犹太人提供帮助。

自成立之日起迄1980年年底,联合分配委员会耗资13亿美元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其中,花费在以色列犹太人身上的资金超过3亿美元。

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于1967年11月22日通过的关于在中东地区建立公正及持久和平的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1. 确认为履行宪章原则,必须于中东建立公正及持久和平,其中应包括实施下列两项原则:

(1) 以色列军队撤离其于最近冲突所占有的领土;

(2) 终止一切交战地位的主张或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与其在安全及公认的疆界内和平生存、不受威胁及武力行为的权利;

2. 复确认必须:

(1) 保证该地区国际水道的自由通航;

(2) 达成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

(3) 经由包括建立非武装地带在内的措施,保证该地

区每一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及政治独立；

3. 请秘书长指定特派代表一人前往中东与有关各国建立并保持接触，以期促成协议并协助努力依照本决议案的规定及原则达成和平及各方接受的解决办法；

4. 请秘书长就特派代表所做的努力的进展情形，尽速向安全理事会具报。

联合国安理会第 338 号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于 1973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的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1. 要求现有战斗的各方，不迟于本决定通过后 12 小时，在它们目前占领的地点，立即停止一切射击并终止所有的军事活动；

2. 要求各有关方面于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的所有部分；

3. 决定由各有关方面于停火的同时，立即在适当主持下开始进行谈判，旨在建立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联合基布兹运动 见“基布兹运动”。

斯特恩 (Otto Stern, 1888—1969) 美国犹太物理学家，194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生于波兰的兰扎里(后归为德国)，家道殷实，早年在德国一些大学学习，1912 年，获普伦茨劳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与爱因斯坦一道从事博士后研究。1914 年，在法兰克福任教。1923 年起，在汉堡大学任物理化学教授，并在那里建立了分子束研究室。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研究工作难以进行，他在几个犹太同事被解雇后，愤然辞职以示抗议，随后移居美国，并入美国籍。

斯特恩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1912—1919 年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他曾根据爱因斯坦特殊热量的理论和纳恩斯坦热处理第三定理进行推论，得出鄂图和特曲德的结论。1919—1942 年转而从事实验研究。1921 年，他与助手革拉赫用银原子光束通过不同质的磁场的方法，证实了原子磁矩的存在。1923 年，他采用分子束测量质子的磁矩，发现它的磁矩比原先认为的大 2.5 倍。1943 年，他因发展了研究原子和原子核性质的分子束方法，测量出质子的磁矩方面的成就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斯特恩来到美国后一直在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任教和从事研究，1946 年退休，以便给青年人更多的机会。

斯特恩邦 见“争取以色列自由战士”。

斯宾诺莎 (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7)

17 世纪荷兰著名犹太哲学家。原名巴鲁赫(Baruch)，后来自己改称贝内狄克特。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

太商人家庭。青年时曾受教于犹太教拉比莫太拉等人，因此不仅熟悉犹太教的经典和法令，也学会了希伯来文。1654 年，父亲病逝后搬进凡·丹·恩德学校，专门研究哲学。在种种迫害和压力下，他从 1663 年起，迁居海牙附近的福尔堡小村子。1669 年又定居海牙，受到朋友们的保护和关怀。他自己一生主要靠磨光学镜片为生，并从事哲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理智改进论》。斯宾诺莎在克服笛卡尔二元论的过程中，建立了唯物主义哲学。他反对笛卡尔两个实体的说法，认为宇宙只有一个实体。他的世界观理论体系有三个主要环节，即实体、属性、样式。他所说的实体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整个自然界或物质世界。它是唯一的、无限的，自身以自身为原因；自然界(实体)中的一切事物都互为因果，互相作用。他坚持按自然的本来面目了解自然，承认实体是自身的原因，从而把相互作用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种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具有辩证法精神；他还认为，无限的实体有无限多的属性，但其中有两种最重要的属性，这就是广延和思维，它们各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着同一实体，而决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这一看法是为了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然而他又把这两种属性看成是互相平衡的，各不相干的，因而没有能最终彻底摆脱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他又认为，在唯一自然界中所包含的无数个体事物是由实体派生的，是实体的变形，他称之为“样式”。也就是说，一切个体事物都在自然界之中，依赖自然界而存在，并且只有通过自然界才能认识。实体与“样式”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原因与结果、本质与现象、无限与有限的关系，但他又认为，实体是不动、不变的，样式是运动变化的，把实体和样式又割裂开来，使实体变成了“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人的自然”。在必然性问题上，他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批判了神学目的论，提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著名思想，朴素地说明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然而，他又把自然实体称作神，这就使他的哲学披上了泛神论的外衣，减弱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在认识论上，他强调认识自然，获得与自然相一致的知识，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才可靠，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他主张改进理性，考察各种知识和求知的方法，把知识和求知的方法分为三种，即感性经验得来的知识、推理的知识和直观的知识。认为直观的知识是最高级的知识，认识的途径就是借理性的直观获得天赋的工具“真观念”，再借这种天赋工具推演出其他知识，正象人们最初利用天然的工具制造出更复杂的工具一样，他看到感性认识的局限，认为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但他夸大了理性认识的作用，犯了笛卡尔唯理论的错误。只是他与笛卡尔不同，他主张“真观念”虽由理性直观获得，却“必定符合它的对象，也就是说，客观地包含在理智中的东西，一定必然存在于自然中”，表现了他的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倾向。

斯摩梭斯金 (Perez Smolenskin, 1840—1885)

希伯来文学家。生于俄国一犹太人之家。少年时代目睹自己的哥哥被沙皇强行征兵入伍,后再无音信。到了上学年龄,家人把他送入俄国人学校,接受世俗教育和学习俄语。正统犹太教徒发现此事后,将其强行送入犹太经学院学习犹太教经典。学习期满后,在敖德萨居住了5年。敖德萨是当时俄国最开明的犹太文化中心,在其他文人影响下,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在成功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故事后,开始着手创作长篇小说《生活道路上的流浪者》。小说出版后受到好评,在19世纪70年代曾在东欧犹太人中广泛流传。

1868年,他移居维也纳,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在维也纳,他亲手创办了希伯来月刊《破晓》。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该刊物发行不久便成为当地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语刊物。刊物上的大部分文章,文学故事都出自他的手。办刊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在白天去一家印刷厂作工。繁重的劳动,终于累垮了身体,1885年,因患肺结核死亡。

斯摩梭斯金对当时正在西欧犹太人中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持反对态度,他特别反对那种只把犹太人看成是一种信仰不同的宗教团体,而否认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观点。他认为犹太人的民族性必须在以希伯来语为媒介的独特文化传统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表达。由于这种文化传统植根于《托拉》,任何宗教上的改革都会导致民族情感的削弱。不过他认为犹太民族的振兴可以在散居中得到实现。可是当1881年俄国发生了大规模对犹太人集体迫害事件,他改变了这一看法,转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赞成在巴勒斯坦为东欧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以复兴犹太民族的设想。

提革拉毗列色 (Tiglath-pileser III) 后亚述帝国的开创者,英明的国王(公元前745—前727在位)。他曾率军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重新走上向外征讨扩张的道路。提革拉毗列色走上舞台,标志亚述的中兴。他把亚述军队配备铁武器装备,使之成为古代西亚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他以下的两个亚述王是撒曼以色列五世(公元前727—前722)和撒珥根二世(公元前722—前705)。他们都是镇压以色列王国,并最后灭亡以色列王国凶残的亚述帝国统治者。在提革拉毗列色征讨期间,以色列王国米拿现(公元前743—前737)临终之前还向他纳贡1000他连得白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他平定了大多数沿海城市,同时派兵占领亚实基伦和加沙。公元前734年,还封锁埃及边界。此后两年间,他有步骤地消灭亚兰国的力量,曾派人暗杀以色列王国国王比加,吞并以色列的加利利地区。公元前729—前727年,他的胜利达到权力的最高顶点,但不久即去世。

提勒亚毕 见“特米拉”。

提歌亚 巴勒斯坦一古城镇名。与隐基底相对,在伯利恒南约9公里、耶路撒冷南约15公里处。公元前933年,所罗门王死,统一王国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国第一代王罗波安曾在提歌亚修筑堡垒,还修造伯利恒、迦特、亚杜兰、希伯仑等15个城池,使之成为坚固城。在城内储存粮、油,设置守卫军长等。公元前8世纪时,著名先知阿摩司就是提歌亚农村的牧人兼修理桑树的,因目睹时局的险恶,蒙召作先知,首先到伯特利宣讲公平、公义之道,但受到祭司亚玛谢的赶逐。由于阿摩司是最早一位留有书卷的先知,提歌亚因此闻名于世。

提幔 巴勒斯坦东部以东地一城镇名。得名于以扫长子以利法的儿子(《创世记》)。以东人为以扫的后裔,历史上长期与以色列人为敌。所以以东常是先知咒诅谴责的对象。公元前6世纪的先知以西结曾预言灾难将降于以东地。他以耶和华的代言人宣布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幔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但。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忿怒在以东施报,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报,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25章第12—14节)。先知阿摩司也预言提幔和以东都城波斯拉将被火烧毁(《阿摩司书》第1章第12节)。上述提幔、底但均为以东重要城镇,提幔在北部,底但在南部,波斯拉则为以东的京都。

雅亿 (Jael) 《希伯来圣经》人名。基尼人希伯的妻子,杀死迦南王将军西西拉的女杰。士师时期,北方迦南王耶宾拥有900辆铁车和一员大将西西拉,以其军事优势咄咄逼人,以色列人多年在其压制之下。他们不堪忍受耶宾的奴役,纷纷前往女士师底波拉处,希望她能拯救以色列民族。底波拉审时度势,联合以法莲、便雅悯、西布伦、以萨迦等支派勇士在北部以斯德伦平原与迦南王耶宾的大将军西西拉对阵。底波拉善能掌握天时地利,她让大将巴拉率领1000名战士,首先占领控制平原周围的高地他泊山,避开西西拉的铁车适于平原作战的优势,趁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敌人的战车陷入泥泞不得动弹之际,指挥全军将士如猛虎下山,将迦南人全军击败。大将西西拉丢盔弃甲,仓皇逃命,最后逃到雅亿的家。雅亿请西西拉进帐棚,并用被子把他遮盖起来。西西拉又向雅亿要水喝,雅亿给他拿来了奶。喝过之后,西西拉让雅亿守在帐棚门口不让人进来。一会儿,西西拉便沉沉睡去了,雅亿

便拿着锤子、槌子悄悄走过来，将槌子从西西拉的鬓角钉了进去。当巴拉率追兵赶到时，雅亿将西西拉的尸体交给了他们。

雅布庭斯基 (Vladimir Jabotinsky, 1880—1940) 作家和政论家，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思想家和创始人。生于敖德萨，18岁时就成为《敖德萨之页》和《敖德萨新闻》的驻外记者，以后在伯尔尼和罗马工作。在国外的逗留(1898—1901)有助于雅布庭斯基更深入地了解欧洲文化和当时欧洲的紧迫社会问题。1901年返回敖德萨后，他成为《敖德萨新闻》的编辑和主要的小品文作家。

1903—1905年席卷俄国的对犹太人的迫害，激起了雅布庭斯基的犹太民族自我意识，促使他投身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他加入了犹太自卫队，并和梅厄·迪津戈夫(1861—1936，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曾任特拉维夫第一任市长)一起筹款购买武器。1903年8月，他参加了于巴塞尔举行的第三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赫茨尔的发言。他对赫茨尔的人格和思想都非常敬重，然而反对赫茨尔提出的犹太人移居乌干达的计划。1908年，根据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建议，他在土耳其领导犹太复国主义机关刊物的出版。1913年，他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并支持在耶路撒冷创办希伯来大学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他作为莫斯科报纸的记者来到西欧。当土耳其站在德国一方宣布参战(1914年10月)后，雅布庭斯基着手建立犹太民族武装，以加入协约国的军队中。他认为，犹太人参战能使自己在战后的世界事务中获得发言权。1917年，英国政府同意在英国武装力量中建立犹太军团。

1920年，雅布庭斯基移居耶路撒冷。1921年他当选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执委会成员。由于英国限制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他和魏兹曼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在对待英国态度上的分歧加深。他主张对英国持强硬立场，认为英国托管当局和总督塞缪尔奉行的政策具有反犹性。1922年英国白皮书发表后，他向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提交了备忘录，强烈谴责英国政府，但是执委会为避免与英国政府的政治冲突，否定了他的备忘录。1923年1月，他退出了执委会。

1925年4月在巴黎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修正派联盟成立大会上，雅布庭斯基当选为主席。他要求正式宣告犹太复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在约旦河两岸建立犹太国家，但是这个要求在1927和1931年先后于巴塞尔召开的第十五和第十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被否决，主要是担心引起阿拉伯人的反抗，以及争取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政治斗争受挫。雅布庭斯基在自己的组织中建立了青年运动组织贝塔尔，把它看作为培养新一代犹

太人的学校。他向犹太青年提出的口号是：“只有一面旗帜”，即统一的民族目标，从而与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对抗，后者把阶级目标和民族目标结合起来。

纳粹在德国掌权(1933)后，雅布庭斯基呼吁组织全世界抵制德货的运动。他反对犹太代办处与德国政府签订有关把德国犹太移民的财产运到巴勒斯坦来的协议，他认为这样做破坏了对德货的抵制。同一年，作为犹太工人总工会和工党领导人之一的H·阿尔罗佐罗夫(1899—1933)在特拉维夫海滨被杀。凶手被控为修正派联盟的成员。犹太工总认为，修正派联盟中存在着法西斯主义倾向。这在伊休夫内部引起激烈的斗争，并导致内战的边缘。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雅布庭斯基和本—古里安达成协议，以求修正派联盟和犹太工总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过，这项协议在犹太工总全体成员公决时被否决。修正派联盟和犹太工总之间的破裂，导致前者退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在1935年9月于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上成立了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由雅布庭斯基任主席。该组织执委会设在伦敦，雅布庭斯基1936年在那里定居。

雅布庭斯基继续从事文学和政论活动，用各种语言出版了许多有关犹太问题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著作。他还把欧美文学的经典著作(但丁，歌德，爱伦·坡的著作)译成希伯来文。随着纳粹的猖獗，他预见到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因此提出150万东欧犹太人从居住国撤出的计划。不过，这个计划既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又遭到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激烈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1939)，雅布庭斯基赴美，以期实施组建犹太军队的计划，这支军队将站在协约国一边反对纳粹。翌年8月4日，他因心力衰竭在纽约附近的贝塔尔营地去世。他曾在1935年11月写下遗嘱，请求把他安葬在他死去的地方，而后按照犹太国家(他坚信它会很快建立)政府的决议，把他的骨灰运往这个国家。然而，只是到1964年，根据艾希科尔领导的以色列政府的决议，雅布庭斯基及其妻子约安娜(1884—1949)的遗体才被运往以色列，并埋葬在耶路撒冷。

雅各 (Jacob) 古希伯来人物名。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次子。又名“以色列”，被后世的以色列人尊为他们的第一代祖先。据《创世记》载，雅各与其孪生哥哥以扫出生在别是巴附近。雅各因紧紧地抓住以扫的脚后跟出生而得名(“雅各”的希伯来文意为“抓住”)。以扫和雅各在母腹中时便互相争夺。上帝对他们的母亲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中出来，预示两人的后代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必会彼此相争。长大后，以扫与雅各性格截然不同，以扫擅长打猎，常在旷野，性情鲁莽。雅各则为人安静，喜居帐棚，多有心计。以撒偏爱以扫，母亲利百加偏爱雅各。少年时，一次以扫打猎回来饥饿难忍，雅各正在熬煮红豆汤。以扫迫不及待地向雅各要汤喝，雅各趁机

说：“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于是以扫便以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名分（参见“一碗红豆汤”）。以撒年迈时，想祝福以扫，便让以扫先去打猎物煮给他吃。雅各在母亲利百加的帮助下趁以扫打猎未归时，煮了一只羔羊，用羊皮包在手及脖子上冒充以扫，瞒过老眼昏花的父亲，骗得以撒的祝福。以扫打猎回来得知此事，痛不欲生，决心杀死雅各。为躲避以扫的报复，雅各遵从母命，匆匆逃到住在哈兰的舅舅拉班家避难。途经路斯时梦见一个梯子直耸云天，梯子上有众天使上下来往，最上端站着耶和华。耶和华将他躺着的那片土地赐给了他及他的后裔，并祝福他：“你的后裔要象地上的沙粒一样众多，将扩展到海边、东方、北方和南方……我与你同在……。”次日清晨雅各醒来说，这里是上帝的殿，所以将该地起名为伯特利。为了纪念这一不寻常的梦，他把所枕的石头立作圣石，并往石头上洒了橄榄油。“雅各的梯子”后来转喻为“天梯”。雅各到了舅舅家，对拉班的次女拉结一见钟情，以14年的劳动为代价娶了2个表妹利亚和拉结为妻，此后又服侍拉班6年。在这期间，雅各以勤劳与机智赢得大批的牛羊，尔后返回迦南。回迦南途中，雅各将一队牛羊赶在前面，送给以扫作为见面礼，以求兄长的谅解。当夜，雅各在雅博渡口与天使摔跤，两人一直摔到黎明。由此，雅各又得名“以色列”。“以色列”的希伯来文意为“与天使较力”。雅各与以扫见面后，兄弟宿怨尽释。随后雅各携家小财产去疏割，在那里建造房屋，为牲畜支搭帐棚。以后，又渡过约旦河到达示剑，他与家人在示剑筑坛挖井，住了多年。但因为女儿底拿在那里遭哈抹之子示剑的玷污，雅各众子设计杀戮示剑城全部男子，而迁居伯特利。雅各在他的12个儿子当中，他偏爱约瑟，因此约瑟遭到众兄弟的嫉妒，他们伺机将约瑟卖给以实玛力人，带去埃及。回家却对父亲谎称约瑟被野兽吃掉。雅各以为爱子当真惨遭不幸，不禁老泪纵横，悲痛欲绝。后迦南全境闹饥荒，雅各率众子逃往埃及，与已经成为埃及法老宰相的约瑟相见。雅各又在埃及生活了17年，临终时一一祝福了他的众子，并嘱咐约瑟把他葬在迦南。死后仿效埃及习俗以香料熏身，葬于迦南的麦比拉洞中。雅各生有12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西布伦、迦得、亚设、但、拿弗他利、约瑟、便雅悯，他们的后裔在埃及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的12支派。

雅各·约瑟（波罗诺耶的）（Jacob Joseph of Polonnoye, 约1710—1784）犹太教哈西德派创始人“美名大师”以色列·本·以利撒的门徒，第一位发表作品的哈西德派领袖。生于波多利亚，自幼学习犹太经典，在与以利撒美名大师会见以前已是沙尔戈罗德犹太会堂著名拉比。因传播哈西德派思想，于1748年左右被剥夺拉比职位，并被逐出家乡。随后，他在涅米罗夫、拉什科夫、波罗诺耶宣传哈西德派教义，并在波罗诺耶出任拉

比一职。

雅各·约瑟在哈西德派中是个喜欢清静独居的人物，从不拉帮结派。在继承美名大师权力问题上与美名大师另一门徒多夫·贝尔发生冲突和不和。为此，他从未在自己著作中提及多夫·贝尔的名字。在以后的年代，主要从事著书立说，传播哈西德思想的事业。恩师美名大师的思想多由他直接传播，赢得了所有哈西德派信徒的尊敬，被誉为哈西德派运动第一理论家。

他的代表作《雅各·约瑟文集》发表于1780年，除了介绍美名大师的思想外，还抨击了犹太教传统派领袖和在研习《托拉》上的传统观点。他盛赞柴迪克，认为柴迪克是上帝对普通民众发生影响的唯一渠道和中介。他的这一观点使得东欧许多犹太拉比担心哈西德派思想会导致犹太教所不容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因而一再发布禁令禁止哈西德派思想的传播。

雅各（本·亚设）（Jacob ben Asher, 约1270—约1340）犹太法典及《圣经》评注家。生于德国，其父是著名犹太文献编纂家亚设·本·约希勒。从小随父亲学习《哈拉卡》，深受父亲的影响。1303年，因德意志发生迫害犹太人事件，父子逃离德国，流亡西班牙。最初住在巴塞罗那，后搬至当时犹太文化中心托莱多。雅各从不追逐个人名利，主张为犹太民族的集体荣誉钻研犹太经典，生活十分贫困，但从不接受拉比职位的供奉。他学识渊博，著述甚多，完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对其父断案文献的选编。在名为《亚设拉比断案摘要》一书中，他略去了原著的大量铺陈，只保留断案结论，使观点更突出明了。

雅各的最高成就是他所著的犹太教律法汇编《四类书》。该书可称之为是一部鸿篇巨著。全书分成四个部分，由1700个章节组成，包揽了几乎所有的犹太律法。它的最大特点是把全部律法系统分为四类，为后人在研究犹太律法分类方面确立了标准，成为日后两百多年律法汇编的典范。此书选材严格，风格简朴清晰。作者将法德地区犹太人的研究风格和西班牙犹太人的研究风格结合起来，写出了一部为全世界犹太人都能接受的作品。书中所收大部分律法主要依据《塔木德》时代以后犹太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塔木德》本身。到了15世纪，它已成为除《圣经》以外犹太人最常见书籍，各地拉比断案也多以此为据。

雅各布（Francois Jacob, 1920— ）法国犹太生物学家，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生于法国南希城。从小就对医学感到兴趣。1938年，进入巴黎大学医学院。1940年，德国攻占法国，他逃往伦敦，后加入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兰西运动，作为一名军医转战各战场，数次受伤，因表现英勇而获自由十字勋章。战后重返医学院，1947年获博士学位。由于生物学的崛起，

他又攻读生物学。1950年,进入巴斯德研究院。1954年,完成博士论文《溶源性细菌和前病毒概念》,又获一博士学位。1956年,升任实验室主任。1960年,出任巴斯德研究院细胞遗传学系主任。1951年起,他开始与利沃夫合作研究溶源性细菌的遗传基础,发现细菌的基因呈线性排列成环状,基本上可以在任何一处切断。1958年,他与莫诺合作探索细菌酶合成的条件。在研究中,他们发现了调节基因,把研究酶的调节作用推向了新阶段,并为后人破译遗传密码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研究还揭示了正常细胞中调节基因和结构基因之间的平衡使细胞能够适应各种环境,打破这种平衡则会刺激那些对细胞或有益或有害的新酶的产生。1965年,他因此与沃尔夫·莫诺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

1964年,雅各布开始担任法兰西学院遗传学教授,讲授和研究细菌、噬菌体的遗传机制以及突变的生物化学作用。他一生还多次获其他科学奖和荣誉学位。1970年,他出版了一本论述生物学各个发展阶段的著作《生物的逻辑遗传史》。

雅各的梯子 《希伯来圣经》典故,含义为通天的梯子,记于《创世记》第28章。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他用欺骗的手法骗得了其孪生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和长子的祝福,后因害怕以扫的报复,便逃往哈兰地舅舅拉班家避难。在途中,天黑后,走到一个地方,已精疲力竭,便拾起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睡了。睡着后他作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来下去。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头,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把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象地上的尘沙一样多。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次日清晨雅各醒来时,为了纪念这一不寻常的梦,他把所枕的石头立作圣石,在石头上洒了油。“雅各的梯子”因此指通天的梯子。

《雅煞尔书》 古代以色列人的一部战歌集。《圣经》中几次提到这部歌集,如《约书亚记》第10章记载约公元前11世纪时,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和迦南的亚摩利人打仗时,因天色将暗,约书亚祷告上帝,使太阳在天空停住,不再下落,一直到把敌人打败。这件奇迹就记载在《雅煞尔书》上,歌云:“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阿,你要止在亚雅仑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又如,在以色列统一王国第一位王扫罗在位时,沿海的非利士人入侵,扫罗王和他儿子率领的军队英勇战死,即将继位的大卫王为扫罗和他的儿子作了一首很著名的挽歌(名为《弓歌》),此歌亦载在《雅煞尔书》上,今此歌保留在《撒母耳记下》第1章11—27节里。

《雅煞尔书》的全诗集没有留传下来。

雅赫维 见“耶和华”。

《雅歌》 《希伯来圣经》第三部份《圣文集》中的一卷诗歌。《圣文集》共十一卷,在《诗篇》、《箴言》、《约伯记》这三大卷书之后,是五卷较短的书卷,即《雅歌》、《路得记》、《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这五类书卷被视为一组,犹太人称之为“米吉罗特”意为“五卷”。他们在纪念犹太历年中五个重要节期里分别诵读其中特定的一卷,所以这五卷书也称之为“仪礼五卷”,书的排列顺序也就是五个节期的先后顺序。这五个节期和诵读的书卷是:逾越节诵读《雅歌》以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大爱;收割节(五旬节)选读《路得记》;耶路撒冷陷落日诵读《哀歌》;住棚节(收获节)选读《传道书》;庆祝普珥节选读《以斯帖记》。可见这“五卷”的内容与情节,是与这五个节期的特点相适应的。

《雅歌》居五卷之首,希伯来名称是“歌中之歌”,意指这些歌是众歌中最优美的。《雅歌》按字面歌词所表达的内容是描写男女青年相互倾吐爱慕之情的情歌集,全书共八章,没有条理清楚的段落,其中作为主线的内容情节包括:书拉密女在山林之间遇见心爱的牧羊人;书拉密女与恋人互诉爱慕之情;书拉密女与她的恋人再度回到乡村田园。

上面情歌所表达的故事情节有两种,其一是所罗门王与书拉密女的“二主角说”:所罗门在乡间的葡萄园偶遇美貌的书拉密女,所罗门王极钟情于书拉密女,于是乔装为牧羊人,数度前往林中寻觅,在林深之处互诉爱慕之情。之后,所罗门才以王的身份迎娶书拉密女到王宫,举行隆重婚礼。《雅歌》中曾有如下描述: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兴高采烈地出去,“观看所罗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筵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故事情节第二种是“三主角说”,男主角除所罗门外,还有一乡间的牧羊青年,所罗门虽钟情于书拉密女,但书拉密女不慕荣华富贵,仍一心一意爱恋乡间朴实忠厚的牧羊青年。最后,牧羊青年与书拉密女的忠贞爱情得到胜利。《雅歌》赞颂这对青年男女坚贞纯洁的爱情说:“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全部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因此,《雅歌》从词面的解释,它是歌颂人间高尚纯洁爱情的诗歌。

但是,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之所以值得保留在《圣经》正典之内,是因为远在《雅歌》列入《圣经》正典之前,已有了被广为接受的隐喻解释法。公元1世纪,素孚众望的犹太拉比阿奇巴认为,《雅歌》所描写男女的爱情代表上帝对其选民的爱和选民对上帝的回爱。他说:“《圣文集》的书卷都是神圣的,而《歌中之歌》(指《雅歌》)却是最神圣的。”这种以夫妻的爱情关系比作神人之间的圣爱关

系,《先知书》中不乏其例。如以赛亚先知曾将救赎以色列民的圣者比作“丈夫”,被离弃的以色列如心中忧伤的“妻子”(《以赛亚书》第54章第5—6节),何西阿先知也以自己和堕落为娼的妻子的关系比作上帝与悖逆之民的关系。

《雅歌》歌颂人间纯洁的爱情,因此“爱”与“爱情”的词语在诗歌中出现的次数超过其他任何《圣经》的书卷。这种人间的爱情,希伯来语读作“阿荷巴”,表达上帝对人的“圣爱”则读作“哈赛德”,而希伯来《圣经》中通译为“慈爱”。但在《圣经》的某些章节中,也出现上帝用人间爱情(阿荷巴)来表明他的爱,如《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中说:“我以永远的爱(阿荷巴)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哈赛德)吸引你。”在此,爱情与圣爱之间也能相通,词语先后并用,说明《雅歌》的字面解释与隐喻解释也可并存而不悖。

斐洛 (Philo of Alexandria, 约公元前20—公元50) 希腊化的犹太哲学家。生于罗马帝国的属地亚历山大城的一个犹太显贵家族。有关他的生平不详。人们只知道他的家族与罗马朝廷和派驻当地的罗马官员有一定联系,但在信仰上却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家人对犹太教的笃信使斐洛耳濡目染中了解了犹太经典。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哺育使他一生没有偏离犹太人的传统理想和信念。他还从犹太人的口头传说和书籍中熟悉了犹太民族的历史、神话和早期寓言。他生活在希腊化时代,所受的正规教育促使其精通希腊哲学、历史、诗歌。他曾作为阿格里帕的客人到过耶路撒冷,并通过朝圣和考察积累了有关圣殿祭祀的详细知识。公元40年,作为亚历山大犹太社区中一位社会活动人士,他曾亲自率领一个犹太代表团去罗马觐见卡利古拉皇帝,呼吁撤消要求犹太人象敬上帝那样崇拜罗马皇帝的法令。

斐洛一生主要从事著述活动,许多著作都一直保留至今。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对《托拉》的论述占绝大部分。这方面的著作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解释《托拉》中的律法条文,如《论创世》、《论十诫》、《论犹太族长》;第二类是对《托拉》的哲学阐发,采用隐喻式的叙述的手法,将犹太律法的内在涵意转化为一系列抽象哲学概念;第三类是通过《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评论,揭示《托拉》的神学意义,如《关于〈创世记〉的问答》、《关于〈出埃及记〉的问答》。在这些作品中,斐洛力图为他崇奉的犹太教信仰注入一种新的活力,使之在新形势下能延续和光大,同时有意识地将希腊哲学溶入希伯来传统,致力阐发犹太教神学思想,进而把犹太教的神秘主义成分理论化、体系化。

在哲学方面,他赞成柏拉图和斯多葛派观点,引进希腊哲学“逻各斯”概念,并把它解释为上帝和人联系的“中介”。他认为逻各斯作为一种“神圣的智慧”,具有全智全能的品格,是和上帝的意志一致的,同时它又代表上帝所

具有的“仁慈”和“公正”这两种品格和能力,故逻各斯的活动便成了上帝自身业绩的表现。斐洛以此证明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逻各斯为中介来保持和发展的。这样,上帝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尊严得到了保持。另一方面,上帝通过逻各斯的作用使自己创造的过程具体化和合理化。这一思想实际上为后来形成的基督教奠定了基础,斐洛亦被称为“基督教之父”。

斐洛生前显然与以色列的犹太圣贤没有什么联系。除了约瑟福斯外,没有任何早期犹太学者提到斐洛。犹太圣贤和中世纪的犹太思想家既没有接触过斐洛的作品,也没有受到他思想的影响。犹太学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注意到斐洛及其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思想家大多接触到他的思想和受到他的直接影响。使徒保罗的作品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语言上都与斐洛极为相似。他的不少著作早在4、5世纪就被译成拉丁文,可见基督教对他的重视和敬重。

喇合 (Rahab) 约书亚时代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据《约书亚记》载,约书亚在攻击耶利哥城之前,派两个以色列人去侦察耶利哥的虚实。这两个人来到耶利哥,住宿在妓女喇合家。喇合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女人,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以东所取得的胜利,深深打动了喇合的心,她决定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当耶利哥王在城中追捕这两个以色列探子时,喇合就将这两人藏在她家屋顶上的麻秸中,而对追捕的士兵谎称两人已经逃跑。追兵走后,喇合又用绳子将他们从窗户缒下城墙,并给他们指示逃离的方向。为报救命之恩,两名探子担保,一旦耶利哥城被攻克,只要喇合将朱红线绳系在缒他们下去的窗户上,她和她的全家就能安然无恙。约书亚率军攻下耶利哥城后,以色列人兑现了他们的诺言。约书亚命两个探子把喇合及她的全家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喇合全家因而免遭灾难。

喀巴拉 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泛指一切犹太教神秘主义派别。最初的喀巴拉称为麦卡瓦,公元1世纪开始流行于巴勒斯坦,犹太教神秘主义最古老的经籍是《创世之书》,出现于3—4世纪之间。麦卡瓦的主要经籍是《光明之书》,成书于12世纪。在13世纪,《隐喻之书》也出现于西班牙,作者不详。著名的《光辉之书》也出于西班牙喀巴拉派的手笔。喀巴拉自13世纪以来,数百年内多次出现。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犹太人愈益盼望“弥赛亚”降临,喀巴拉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法术喀巴拉不同于侧重默念的一般的喀巴拉,而提倡使用法图和标有上帝圣名的护符。到16世纪,喀巴拉的中心转移到最著名的喀巴拉大师卢里亚的故乡加利利地区的萨费德。卢里亚派喀巴拉提出的基本原理,即无限之主退隐于自身之中,神光散射,神光广被宇宙和宇宙复兴。这一派对17世

纪兴起的沙贝塔伊运动很有影响。

最高拉比院 某个国家或地区中,在涉及宗教设施、司法诉讼和行政管理问题上被授予最高权威的犹太宗教机构。它通常由具有拉比称号的人士组成,受《哈拉卡》法典权威的精神领袖——最高拉比或者若干最高拉比领导。由于有关历史资料的匮乏,无法准确确定这种机构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追踪它的发展历程。现在知道的是,加昂时期(7—11世纪)巴比伦的蓬贝迪塔耶希瓦授予一些最有权威的拉比法庭首领以主拉比的称号。然而某些学者则认为,最高拉比院的出现与犹太宗教和学术思想中心向欧洲的转移密切相联。他们得出结论说,最高拉比院的欧洲起源说毋庸置疑。印证了这种见解的有这样一种事实:中世纪西班牙曾有拉比法庭,其成员差不多总是由地方社区选举的,而领导法庭的拉比则由国王任命。由世俗政权任命的人士,往往履行最高拉比的职能,这种人士在哈拉卡领域中的权威性不容置疑。例如,1257年阿拉贡的詹姆士一世任命自己的犹太秘书为阿拉贡王国犹太人的最高法官。在纳瓦拉1391—1401年国王的御医履行“王国犹太人最高拉比”的职责。在法国,1297年首次提到作为国王和犹太人之间中介人的犹太“总监”。12—13世纪,英国有犹太长老的职务,其作用主要具有财务性。在西西里,为了处理犹太社区成员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阿拉贡统治者于1396年任命了犹太最高法官,犹太人称他为 dienehelele。13—15世纪,葡萄牙犹太人的首领为最高拉比。在普罗旺斯,14世纪设有犹太民事和刑事法官的职位,该法官也担任最高拉比的职务。不过无疑的是,几乎各地最高拉比的职位由具有深邃的《哈拉卡》知识和在犹太社区中享有很高权威的人士担任。在西班牙最高拉比职位被视为国家高级职位,这一称号最杰出的承担者是著名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哈斯戴·克雷斯卡斯。在卡斯蒂利亚,履行最高拉比职务的是整个卡斯蒂利亚犹太人的领袖和法官,他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3世纪德国国王任命《哈拉卡》领域中的著名权威罗滕堡的梅厄·巴鲁赫为最高拉比。在波兰和立陶宛,国王起先把任命地区拉比的权限留给了自己,但是后来,独立选举最高拉比的权利被归入犹太人广泛的自治权中。

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苏丹设立了哈哈姆—巴什的职位,哈哈姆—巴什有权审判居住在帝国领土上的犹太人,有权任命地方拉比和收税。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哈哈姆—巴什——哈依姆·纳胡姆于1909年担任此职。

拿破仑一世在法国推行的犹太社区管理改革,设立了最高拉比的职位。从18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伦敦犹太大会堂的拉比未获官方承认,而从1845年起官方承认他是全国犹太联合会的最高拉比。德国没有最高拉比院。

1933年最大的改革派拉比之一的列奥·贝克成为德国犹太人国家代表团的代表,但这个世俗机构没有最高拉比院的任何职能,欧美其他许多国家中也没有最高拉比院。

以色列最高拉比院的首领是两位最高拉比:塞法迪拉比和阿什肯纳兹拉比。塞法迪最高拉比的职位由奥斯曼帝国政权于1842年从法律上加以确定。直到本世纪20年代,他由塞法迪地方社区的首领们推选,既具有土耳其封号哈哈姆—巴什,又具有从17世纪开始存在的荣誉称号“锡安一号”。奥斯曼帝国政府承认他是巴勒斯坦犹太社区在同政府的相互关系中的代表,以及该社区所有精神事务和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威。阿希肯纳兹最高拉比没有得到土耳其政府的正式承认,但是对于他的社区成员来说,他是哈拉卡问题和社区管理方面的最高权威。

1921年根据英国托管当局的倡议,巴勒斯坦成立了最高拉比院,它的正式名称是“巴勒斯坦最高拉比委员会”。最高拉比院的首领应该是两位最高拉比:阿什肯纳兹拉比和塞法迪拉比,他们是拉比院的共同主席。两位拉比不是由自己的社区推选的,也不仅仅在自己社区范围内发挥作用,他们是全国所有犹太人的宗教代表,共同履行所承担的职责。以色列国建立后,议会通过的有关法律没有给最高拉比的选举和最高拉比院的职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象过去一样,最高拉比院是各个拉比法庭所辖一切案件的最高上诉机构,也就是说,它是涉及以色列犹太人一切个人问题——结婚和离婚、供养妻子和孩子等的最高上诉机构(根据双方同意,这些拉比法庭也有全权解决收养、继承和监护问题)。在以色列任命拉比职务,须要由最高拉比院和宗教事务部共同确认。

最高拉比委员会和最高拉比的选举往往伴随着各个国家机构和社区机构之间长久的、有时是持续数年的争论。近年来屡次提出废除最高拉比院中的两头政治制,而由一位最高拉比替代两位最高拉比的问题。巴勒斯坦托管区和以色列最高拉比的职位由一系列杰出的宗教权威担任,其中有A·库克、温退尔曼、赫尔佐克、戈林(以上为阿什肯纳兹最高拉比)、乌齐埃尔、尼西姆和约瑟夫(以上为塞法迪最高拉比)。

最高限额 指学校、政府机关、工矿企业、行业协会等机构在招工录用过程中对某一类人实行的数量限额。最高限额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俄国。目的是为了限制犹太人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人数,20世纪以来为许多国家采纳,其中尤以东欧诸国为烈,成为这些国家一种主要用来限制犹太人求学、就业、发展的手段。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当局对犹太人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吸引犹太青年进入俄国人办的学校学习。这一做法遭到了当时正统犹太教徒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鼓励犹太人子女进入这类学校接受教育是一种离间犹太青年,

促使他们背离本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信仰的一个步骤。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政府开设的犹太国立学校体系,认为向犹太青年传授世俗知识是为了毁灭犹太人的信仰,于是千方百计阻止犹太青年去这样的学校学习。统计资料表明,1853年,在俄国人办的中学里只有159名犹太人,占在校人数的1.3%。大学中犹太学生数则更少,总共只有几十人。但是,随着犹太启蒙思想在俄国犹太人中影响的扩大,犹太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开始改变先前对俄国人士开办的学校的戒心和看法,把接受科学知识看成是振兴民族的一种必要手段,从学人数开始激增。到1880年,犹太中学生的人数已达8千人,占在校学生数的11.5%,犹太大学生人数达556人,占总数的6.8%,而且,数字每年还呈上升趋势。一些地区,如在敖德萨,犹太学生人数已占总数的35.2%;在立陶宛,占总数的26.7%。犹太知识分子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由于当时俄国的犹太人不得在政府行政机构供职,因此,犹太知识分子便大量集中在一些可以自由开业的部门,如医学、法律、新闻等,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员。这一现象的出现造成了一种与想在这些部门保住自己的饭碗或打算进入这些部门工作的非犹太人的竞争局面。非犹太人开始感到了压力。一场限制犹太人跨入知识分子行列的宣传随之出现。1880年,很有影响力的俄文报纸《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标题为《犹太人来了》,拉开了首先在教育部门限制犹太人数的序幕。

随后,俄国许多地区纷纷开始实行限制犹太人学生入学人数的做法。而这一做法与亚历山大三世领导下的政府所制定的防止贫穷下层人民子女进入大学和中学的政策不谋而合。舆论还指责犹太学生将反叛和革命思想带入俄国学校,使他们的基督教同学受到不良影响。1887年7月,俄国教育部对犹太学生进入大学和中学人数作出正式规定。规定犹太学生人数的最高限额在俄属波兰地区不超过10%,其他地区不超过5%,首都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不超过3%。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学校干脆不收犹太人入学。1905年,俄国革命后,还一度出现了限制改宗犹太人入学的个别事件。

这一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正逢犹太青年大规模涌向俄国学校时期,因此对犹太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入学人数的限制,犹太父母送子女受洗现象开始出现,以便使自己的子女能够继续他们的学业。不少犹太中学生在毕业时纷纷受洗。1907年之后,这竟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位来自芬兰,在立陶宛供职的神甫为了谋取暴利,干脆以一种较低的价格向所有希望得到受洗证明的人出售洗证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这一倾向曾展开过斗争。这一规定还导致成千上万犹太青年移居出国,去西欧一些国家的大学求学,出现了西方大学城中的俄国人竟大部分是犹太人的现象。到了1892年,由于这一限制,犹太中学生人数下降到5394人(只占总人数

的7%)。

1905年,俄国革命暴发后,最高限额曾一度在大学中取消,但随着革命的失败,又开始恢复执行,不过,最高比例获得增加。1917年十月革命后,这一规定再次被废除。尽管有人不时指责苏维埃政府在某些时候、某些地区仍暗中执行限制犹太人的最高限额政策,但苏维埃政府从未正式发布过这方面的政策和言论,也无任何确凿证据能够证明人们的指责。

在东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限额是波兰出现的种种反犹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波兰当局把最高限额作为将犹太大学生人数限制在最低范围之内的手段。1920年至1935年,波兰大学生人数激增,由1921—1922年的34266人增加到1935—1936年的47200。而在此期间,犹太的学生人数以及所占的百分比却降了下来。1920—1921年,波兰的犹太大学生数为8526人,而到了1935—1936年,下降为6200人,减少了35%。犹太学生在波兰学生总人数中所占百分比也由1921—1922年的24.6%下降到1935—1936年的13.2%。这种变化在一些系科中表现更为突出。如在医学系,1923—1924年的犹太学生数尚为1402人,占总人数的30.2%,到了1926—1927年,便急剧下降到698人,占总人数的18.6%,到1935—1936年,只剩下占总数13.8%的学生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波兰的14所国立高等院校和9所私立大学全都实行了最高限额制,严格控制新生中的犹太人数,致使大批合格的犹太学生被拒之门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在罗马尼亚,尽管最高限额从来没有成为政府法律,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得到了实行。克卢日大学于1922年率先实行限制犹太人入学人数的最高限额。其他大学,信仰基督教的学生纷纷成立组织,阻止犹太学生入学,或把已入学的犹太学生赶出校园。在医学系,常用的方式是阻止犹太学生使用实验室,进行医学解剖等。20年代后期,许多学生因此被迫去外国大学就读,以完成学业。1933年,罗马尼亚实行了特别入学考试制,绝大部分犹太考生都被判不及格而得不到录取,少数被录取的也因信仰基督教学生有组织的反对和阻挠被迫离开,造成许多系科无犹太学生的反常现象。1934年,罗马尼亚通过了雇工法,规定无论什么部门,在雇佣人员时必须保证罗马尼亚人占80%,在管理机构中不得少于50%。这一法律条文在纺织、银行、商业等部门影响尤为严重,造成大批犹太人员失业,因为在这些行业中犹太人受雇的比例历来很高。许多行会和工会,如律师协会、职员工会,纷纷清除它们的犹太会员,或拒绝接受犹太人入会。1935年,罗马尼亚议会发言人要求在议会中实行犹太人席位限制,这一要求当即得到罗马尼亚东正教大主教的支持。1940年,由德国纳粹扶植起来的罗马尼亚当局,开始正式从各学校中清除犹太学生,一些私营企业、部门也开始清除犹太

雇员。

在匈牙利,议会在1920年便通过了一条在高等院校中限制犹太学生数的法律。法律规定只有达到民族、伦理标准的人才能被录取,同时规定各民族在大学中的比例不得超过该民族在整个社会中的人数比。根据匈牙利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法律显然是针对犹太人的。匈牙利犹太人组织为此曾提出过抗议,但未起作用。许多被拒于大学门外的犹太学生只好去国外大学就读。被录取的犹太大学生常常因受到非犹太学生有组织的侮辱和殴打,不得不离开学校。1939年,匈牙利议会还通过又一条限制犹太人的法律,规定拉比神学院的毕业生不得进入法律专业学习。

赎子礼

犹太教古代礼仪之一。长子出生后家人向大祭司亚伦的男性后裔献上五舍客勒白银钱款的祭礼,用以赎买此子。这个礼仪来源于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为了迫使埃及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而采取的击杀埃及人畜头生子事件(参见“逾越节”),为了感恩上帝在此期间保护以色列长子不遭杀戮,以色列人原打算将这些长子献给上帝充任祭司,但后来祭司之职改由利未支派人来充任。为此,以色列人向祭司的后裔捐献一定数量的钱款,以象征用钱赎回自己的儿子。

该典礼在婴儿出生满月时举行,现该礼仪已废除不用。

赎罪日

犹太民族主要节日之一。时间为每年提斯利月第十日。这一天是犹太人一年中最庄严、最神圣的日子。对于虔诚的犹太人教徒而言,还是个“禁食日”,在这一天完全不吃、不喝、不工作,在会堂祈祷,赎回他们可能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罪过。全世界的犹太人,包括不很虔诚的犹太人也会在这一天去犹太会堂祈祷,参加特别祈祷仪式。

这一节日来源于《圣经》。据《圣经·利未记》记载: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犯有罪孽,耶和华晓谕摩西,要举行仪式,赎以色列人的罪,“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古老的赎罪仪式为:挑选两头拈阄过的公山羊,由大祭司当着会众的面在祭坛上将其中一头宰杀,作为全体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献祭;然后,大祭司用双手按在另一头活着的山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可能犯下的种种罪孽,把这些罪统统归到羊身上,然后派人把这头羊送到旷野去,让它承担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

现在这一古老的赎罪仪式已废,只有少数正统犹太教徒还每年举行祭坛式赎罪仪式,不过宰杀的不再是羊,而是鸡。大多数则通过祈祷和忏悔表达赎罪愿望。

犹太会堂在赎罪日全天都举行宗教仪式,有晚间仪式、上午仪式、下午仪式,接着是纪念仪式和结束仪式。在晚间仪式上,拉比手捧《托拉》,全体会众面对开启的约柜

肃立,诵读《柯尔·尼德拉》祷词。在纪念仪式上人们回忆已故亲友,诵读怀念他们的《卡迪什》。在结束仪式上,要表达对以色列上帝的希冀和信仰。最后,象征赎罪日结束的羊角号吹响,号声示意上帝已赦免犹太人的罪过,生活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拉比和赞礼员在主持仪式时要穿上特别的白袍,以象征纯洁、悔悟、死亡。人们通常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而不用“我”表达对自己罪过的忏悔,因为犹太人认为集体应承担个人犯罪的责任。

赎罪日要告诉人们的第一件事是承认自己犯有罪过,并对此表示忏悔。第二是要求人们通过忏悔、赎罪活动,不再重犯以前做过的错事和用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犯下的罪过。

在以色列,这一天全国上下几乎一切活动都停顿下来,不出版报纸,不播放任何电视和广播节目,没有公共交通运输。所有学校、商店、餐馆、娱乐场所和机关企事业单位都24小时关闭。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肃穆之中。

赎罪日战争

见“第四次中东战争”。

赎罪祭

古代犹太教献祭形式之一。犹太律法规定,百姓或祭司若违背上帝的诫命而犯了罪,须将无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利未记》第4章第1—35节及第6章第24—30节详细记载了献赎罪祭的方式:献祭者要把牛牵到会幕门口,用头按住牛头,在耶和华面前将牛宰杀。祭司将牛血带到会幕,手指蘸上血水,对着圣所的幔子弹七次,再把血抹在会幕内香坛的四角上,然后将剩余的血倒在会幕门后燔祭坛的脚跟。牛的脂油要烧在坛上。官长应以公山羊为供物。百姓可用母山羊或绵羊代替。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铜器则必须擦磨洗净。

赎愆祭

古代犹太教主要的献祭形式之一。《利未记》第6章、第7章对有关内容作了详尽的规定。所谓“愆”是指一般性过错,主要包括:虽听到别人发誓的声音却拒绝出来作证,无意中摸了诸如不干净的死兽、死畜、死虫等不洁之物,或摸了别人的污秽之身或物,冒失发誓要行善或行恶,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抢夺别人的财物,欺压邻居,捡拾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起假誓等等。犯了这类的罪,除了要向受损者赔偿(如归还所抢之物)之外,还要向上帝献上赎愆祭。祭品为母羊或山羊、或羊羔。如果无力献羊,就献2只斑鸠或2只雏鸽,1只作为赎罪祭,1只作燔祭,具体的献祭方式是,祭司要先把赎罪祭献上,把鸟头揪下来,但不能把鸟撕断。这只赎罪牲的血要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流到坛的脚那里,燔祭也照此办理。如果无力献2只雏鸽或斑鸠,则可献素祭,即以细面伊法十分之一为祭品。献了赎愆祭,祭司即可为他赎了罪。祭牲应在祭坛旁边宰杀,羊血要洒在祭坛周围,祭肉

要在坛上焚烧,祭司中的男丁可以吃祭肉,但必须在圣所吃。

黑豹党 以色列东方犹太人为抗议西方犹太人对他们的歧视而成立的政治组织。

以色列建国以来,在来自欧美的西方犹太人和来自亚非的东方犹太人之间始终存在着种族间的鸿沟。西方犹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客观上处于比东方犹太人有利的地位,东方犹太人不仅政治上无权,经济收入也普遍低于西方犹太人。1968年,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贫民区的一些年轻的东方犹太人成立了一个抗议性政治组织。1971年1月,该组织仿效美国黑人政党“黑豹党”的名称,正式定名为黑豹党。黑豹党表示其目标是消灭在收入、居住、教育、就业和政治生活中对东方犹太人的歧视。70年代初是黑豹党的鼎盛期,它广泛进行舆论宣传,举行游行示威,布置纠察线,有时还对西方犹太人的设施及其组织、集会进行暴力攻击。黑豹党的活动引起了以色列政府对东方犹太人问题的重视,当时的议会经常请黑豹党成员在议会有关种族问题的会议上发言、作证。黑豹党不久就因内部政见分歧和个人权利争夺而分裂。在1973年第八届议会选举前,黑豹党第一次分裂。查理·比顿为首的一派与共产党(拉赫)组成“争取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一部分成员组成一个名为“蓝白豹”的组织,蓝、白两色是以色列国旗的基色,该组织借此名表示它更强调以色列全体犹太人的共同性。原黑豹党的多数成员则加入了一个名为“以色列民主”的政治组织。1977年,黑豹党第二次分裂。其左翼的一支继续与共产党(拉赫)结盟,成为“争取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的成员,左翼的另一支和其他一些左派组织合并为“为以色列争取和平和平等运动”。其右翼分别成立了“犹太复国主义豹”和“自由”两个组织。1981年,黑豹党又分裂为三派。一派成立了名为“团结”的组织,一派组成“青年”组织,第三派加入了东方犹太人的政党“泰米党”。从此,独立活动的黑豹党不再存在。

智利犹太人 最早到达智利定居的犹太人是表面皈依了基督教,但仍秘密信奉犹太教的被称为“马兰内”的西班牙犹太人,他们大约在16世纪初西班牙本土大规模驱逐犹太人时就来到智利。但随着1570年拉丁美洲也跟随西欧实行宗教审判制度后,这批马兰内犹太人因受残酷迫害不得不改信基督教或逃到北美。19世纪中犹太人又开始陆续进入智利,其中一些是在犹太垦殖协会帮助下由东欧来的移民。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智利才正式出现集中居住的犹太社区。1934—1946年到达智利的犹太人为15000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逃避纳粹迫害的难民,有些人到智利后,又转到阿根廷、巴西等犹太人较多的国家定居。智利犹太人大多数经营小买卖和从

事体力劳动,也有少数成功者进入上层社会。到1985年,智利犹太人共有3万多,他们主要集中居住在首都圣地亚哥(26000人)和瓦尔帕来索市(1600人)。

智慧文学 古典希伯来文学中表现哲理的诗文。主要由《圣经》中的《箴言》、《约伯记》、《传道书》、《次经》中的《传道经》(亦称《便西拉智训》)、《所罗门智训》以及散见于经典其他各处片段组成。希伯来智慧文学的先声是上古中东地区的智慧语录,已发现的最早典籍有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普塔霍蒂普箴言》。然而,古犹太人留下的智慧文学作品比周围各国留下的都要丰富。从最早出现的智慧文学萌芽到成熟集子的出现告诉人们,智慧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士师记》中的“树王的寓言”和“参孙的谜语”可以看作是《圣经》中最早出现的智慧文学。第一部智慧文学的集子是《箴言》,由若干短小格言、哲理诗等组成。由于它反映的主要是指导古代犹太人日常行为规范的具体经验,亦被称为“低级智慧”。书中收集的大量箴言植根于现实生活,经过文士的提炼,以智慧的真知灼见指导人生。从文学角度看,《箴言》中的格言多用诗的形式,或用对句,或用韵语。哲理诗则采用诗体演说或韵文讲义。

《约伯记》是智慧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篇目,由42章组成。作品通过善人约伯受难提出了人类受苦原因和上帝是否公义这一带哲理性的问题,赞颂了古代犹太贤人怀疑神权、维护自身利益、谋求社会公义的言行。《约伯记》作为一部诗剧体的长篇哲理作品,一向被看作是希伯来文学的瑰宝,并以精深的主题、宏大的构思和优美的语言博得历代名家的赞誉。

《传道书》是一部反映经磨砺劫后的哲人对人生、宇宙反思的作品,由12章组成。作者从最悲观的立场去看待人生和世界。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生活。在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世间万物都沿着一个不可知的轨道周而复始地循环,无所谓新旧好坏,无论何物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人与其劳而无功,不如逆来顺受,享乐暂时的人生满足。《传道书》成书于犹太民族失意之时的公元前2世纪左右,书中虚无主义的观点反映了人们对沉重现实的失望。尽管如此,作者在对人类存在及其独立理智进行哲学思考时,还是表现出作为一个智者的敏锐洞察力,率直的坦诚和心灵的智慧。

《便西拉智训》是《次经》中两本智慧书之一,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论述智慧的来源,智慧的测试和智慧的赏赐;下卷以人格化手法让“智慧”作自我介绍,从中引出一系列伦理劝诫。《所罗门智训》是《次经》中另一本智慧书。作者以所罗门王讲道的口吻,从赞美创世之上帝出发,论述真正的智慧使人归于上帝、获得不朽的生命;而虚假的智慧则使人走向愚蠢的无神论或偶像崇拜,最终走向死亡的道理。这两本智慧书是彻底的宗教书卷,将智慧传统

导向服务于正统信仰的方向,并将《传道书》的哲学和伦理学的怀疑论转换为对犹太上帝观念的强烈卫护。

其他智慧书还有《伪经》中的《玛喀比传四书》、《死海古卷》中的《诱惑人的娼妓》等。

智慧文学的主要特征有:(1)哲理性。智慧文学中不论是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还是鸿篇巨制的思辨论丛,都渗透了认真严肃的探索精神,闪射出去芜存菁后的哲理光辉;(2)世俗性。智慧文学不同于《圣经》中其他样式文学,它直接来源于五彩缤纷的世俗生活,将大量感性体验上升为对人生和宇宙的理性认识。书中向年轻人展示的世界真相和为人处世准则都是现世性的;(3)教诲性。智慧文学不是通过智者的言语教诲民众,就是通过贤人的思索劝奉读者,在总体上服务于犹太民族的宗教观;(4)文学性。智慧文学采用的主要表达方式是自成系统的并行体诗歌结构,以“同义平行”、“象征平行”、“综合平行”、“反义平行”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这种简洁洗练的并行体不仅听上去抑扬顿挫,音韵优美,而且极有助于道德说教和记忆,成为一种理想的、有艺术性的表现手法。智慧文学还通过各种修辞手法将抽象哲理寓于人们熟悉的具体形象之中,使人们在艺术美的鉴赏中得到精神的训导和心智的启迪。

希伯来智慧文学是《圣经》文学中一份最优秀的遗产,也是世界伟大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策玛克 (Shlomo Tzemach, 1886—) 现代希伯来作家。生于波兰普翁斯克。1904年随第二次进入圣地移民潮移居巴勒斯坦。1909年去法国进一步深造,学习文学、哲学和农学。1913年学成后,返回巴勒斯坦,投入重建犹太民族家园的斗争,是一名为巴勒斯坦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作出贡献的拓荒者。

策玛克在移居巴勒斯坦前便开始试笔,但作品直到1907年才得以发表。他的作品主要以短篇为主。不少作品直接描写犹太移民的生活,人们从中可窥视到随前两次进入圣地浪潮移居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精神状态。作者常常将主人公对爱和对家园的渴望,与冷酷的现实交织在一起,以揭示移民的心灵,《以利亚胡的毁灭》(1910)和《完人》(1909)是这方面作品的杰出代表。

从巴黎返回后,策玛克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业余时间写作,发表的作品大多数是散文和评论文章。在评论方面,对布伦纳的作品有独到的见解,评论常常独具一格。

《答问》 对犹太人或犹太社团提出的与犹太传统、教义、习俗或与犹太经典、文化有关问题作出的书面回答。撰写《答问》的传统开始于《塔木德》时代,到加昂时代正式为拉比犹太教所接受。历史上,几乎每个犹太拉比都或多或少地从事过《答问》的写作活动。《答问》的出现与犹太民族被赶出家园有关。自犹太人于2世纪大规模在

世界各地散居以来,如何在分散的犹太社区保持信仰和文化的统一,便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人们往往把在新环境中遇到的新问题向犹太权威机构或著名拉比提出,以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犹太权威机构或著名拉比作出的答复则被视为犹太法典的补充,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由于《答问》触及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得所有犹太社团在解决各自面临的问题时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增强了各地犹太生活方式的趋同性。此外,《答问》的出现还使得各犹太社团之间的联系和接触加强,使生活在边远地区的犹太学者与犹太文化中心地区犹太学者保持一种不间断的联系,使犹太人的精神联系得到最大限度的维系,有效地克服了因遥远的地理距离造成各犹太社团之间的分离状态。

《答问》自出现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不断变化的世界需要不断更新的解释。依据历史,《答问》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从7世纪到12世纪为第一阶段。作品大多出自巴比伦加昂之手。其特点是简洁、明了。内容主要集中在犹太宗教礼仪方面,对在全世界范围内规范犹太宗教生活发挥了重大作用。从13世纪到15世纪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犹太文化中心已从中东地区转移的西班牙和法德地区。有影响的《答问》作者大多来自这一地区。《答问》内容主要集中在宗教生活和哲学思想方面,篇幅开始增长。流传下来的《答问》成为犹太教经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犹太人的生活具有约束规范性。从16世纪到18世纪为第三阶段。西班牙犹太人被集体逐出,犹太文化中心从地中海地区逐渐转向东欧地区。犹太社区的分布进一步分散,各社区之间趋同性开始减弱。人们关心的问题集中在世俗生活方面,《答问》内容的实用性有所增强,哲学性有所减弱。大量《答问》得到了保存,成为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犹太生活的重要资料。19世纪迄今为第四阶段。随着犹太人解放时代的到来,《答问》对犹太生活的影响开始减弱。《答问》主要集中讨论现代生活对犹太人的影响和不同派别对面临问题的争论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学术性。以色列国成立后,《答问》的作者面临如何解答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进行治理和保持文化传统等问题。

历史上出现过的《答问》面广量大,其特点是写出来的多,保存下来的少,手稿形式的多,收集成册的少。目前,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巴尔·伊兰大学正在对流传下来的《答问》进行系统的梳理、分类。对《答问》的研究已成为犹太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犹太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集中营 纳粹德国政权大规模地关押和消灭在政治上或种族上为纳粹所不容的人士的地方。

集中营建立初期(1933—1939) 第一批集中营的创立旨在隔离和集中被怀疑反对纳粹制度的人士,但很

快就发展成大规模地镇压和消灭纳粹占领国中各民族千百万人的机器,这些人所谓敌人或者“劣等”民族的成员。集中营在执行屠犹政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帝国总统保护人民和国家特别法》(1933年2月)成为纳粹任意拘捕行为的法律依据。

1933年2月,纳粹实行紧急状态,以国会纵火案为由大肆逮捕共产党人。1933年3月,通过了授予纳粹政府特别全权的决定,它可以逮捕“老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等)领导人、职业活动家以及犹太人——作家、记者和律师。1933年7月普鲁士的被捕者为14906人,而在整个第三帝国为26789人。冲锋队、党卫军和警察局建立了约50个集中营,其中最老的是柏林哥伦比亚之家集中营。逮捕和刑讯的方法,对与被捕者有关的人员的贿赂和恫吓,甚至引起德国法律界的抗议。由于戈林的干预,冲锋队和党卫军管辖下的大部分“野蛮集中营”被解散。奥拉宁堡、利希藤堡和哥伦比亚之家集中营继续存在,它们每个都囚有近千名犯人。1934年4月,希姆莱执掌普鲁士盖世太保的权力,集中营完全归属党卫军管辖,法庭无法干预盖世太保的事务。1936年2月希姆莱授予盖世太保逮捕和侦查权,盖世太保所实施的逮捕不受法庭侦查,集中营的行政机构归属盖世太保。只是逮捕后才出示逮捕证(或者根本不出示),在狱中经过长期审讯后迫使被捕者在逮捕证上签字。一些小集中营被取消了,关押者被转移到较大的集中营中。1937年底,集中营关押的人减至8千,开始把刑事犯和所谓害群之马——无赖、酒鬼等送往集中营。1938年4月被“预防性拘禁”的刑事犯从监狱转往集中营。差不多同时,犹太人第一次仅仅由于是犹太人而被关进集中营。

在德国占领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1938)以后,政治犯(马克思主义者、纳粹反对者和犹太人)的数量增加了。1938年犯人总数从2.4万增加到6万。犹太人由于“破坏种族纯洁”而遭到拘禁,只是如果能够获得移居证明,他就可以获释。这导致1939年集中营中犹太人数大为减少。大战前夕,集中营中犯人总数为2.5万。自1939年起,集中营归帝国安全总局(PSHA)管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集中营 战争伊始,集中营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被拘禁的人数增加了,德国本土和境外的集中营网络扩展了,集中营的职能改变了。“预防性拘禁”服从从经济上剥削和大规模迫害拘禁者的任务。以保卫帝国安全为借口,逮捕的人数为1935—1936年的10倍。在其他占领国中,数千名反对者被关进地方集中营,而许多人被转移到德国本土的集中营。从战争开始到1942年3月,关押人数从2.5万上升到10万,1944年则达100万,仅有5—10%的关押者是德国公民。1939年德国集中营管理机构受命建立了100个各种类型的集中营。1940年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建立了一系列劳动集中营,按照希姆莱的“迁移”计划,还建立了过境集中营。

1942年初在波兰建立了消灭集中营。甚至在1944年,还在奥地利毗邻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地区,为匈牙利犹太人建立了专门的集中营。从1941年起,在若干集中营开始使用火葬场。

集中营的“医疗”试验 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拘禁者就被用来作所谓生物“种族研究”。根据希姆莱的倡议,在党卫军医疗组织的管辖下,既在集中营内,又在集中营外对大量男女进行了“医疗”试验。按照消灭“劣等种族”的纲领,1941年制定了立即为200—300万犹太人和茨冈人绝育的方案。例如,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借助X射线和注射腐蚀性的化学制剂或植物制剂使拘禁者绝育。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大夫门格尔在广泛范围内,主要以犹太孪生儿童为对象进行了残忍的“遗传试验”。另一位纳粹学者从事颅骨的干缩试验,以便收集颅骨为斯特拉斯堡解剖研究所的“人种研究”服务。德国空军司令部对飞行员在紧急状态下的生存能力感兴趣,根据它的命令,达豪集中营进行了研究人忍受高压和低温能力的试验。人为地使集中营的关押者感染上传染病,以便检验新的药品和毒品的效用。党卫军的医生为了移植,对关押者截断骨骼,割取肌肉。他们还摘取受试者的内部器官,把被癌症所损坏的组织植入人体。受试者不能够立即死去,他们随后在痛苦和毫无护理的情况下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中某些人幸存下来,但是成为残废。

集中营中的劳动 1938年党卫军司令部利用集中营的劳力从事建筑。党卫军的行动配合了重建柏林和纽伦堡的计划。集中营也为了军事需要使用奴役劳动。犯人劳动的利润达数亿马克,成为党卫军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每个犯人的生活费,包括饮食和服装,每天不超过0.7马克。每个工作日(长达11—12小时)带来的利润达6马克。考虑到犯人在集中营中的平均关押期(约9个月)和纳粹对尸体的掠夺(提取金牙套等),党卫军剥削每个关押者所得的收入平均为1631马克。这个数目还不包括工业利用尸体的收入和被害者在关到集中营之前被没收的财产价值。许多私营军工企业也利用集中营的廉价劳力。这些劳力占上述军工企业所有劳力的40%。

私营军工企业的劳动条件比集中营还要差,它是工人高死亡率的直接原因。私营企业使用了集中营25万“犯人”的劳动,其中17万在军工部门的企业中劳动。集中营的死亡率(1942年为60%,以后为80%)甚至令纳粹政权感到过高。纳粹政权担心劳力资源枯竭,下令集中营吸收新成员,并降低他们的死亡率。力图最大限度地剥削关押者的劳动,这使得德国武装力量司令部、党卫军经济机关的领导以及为军队工作的企业家,对全部消灭犹太人的政策产生某种抵触。自1942年起,军事工业广泛利用关押者的劳动。在装备有大规模屠杀手段的集中营(如奥斯威辛)中,党卫军军官和医生对定期运送到的关押者进行筛选,让体弱的(包括儿童)去死亡,而把健壮的

人留在集中营中,以便驱使他们劳动。

集中营的管理结构 从1934年7月起,集中营由希姆莱任命的T·艾凯领导。艾凯作为残酷而狂热的纳粹分子和巧妙的组织者,确立了集中营统一的范式,在1939年11月以前对集中营进行巡视。奥斯瓦尔德·波尔中将被授命管理集中营的经济。

集中营的大门是一层建筑物,建筑物的中央耸立着装有钟和探照灯的塔。门的上方通常写有“Arbeit macht frei”(“劳动生自由”)一类的标语。集中营的管理结构包括:(1)管理室,由管理室主任领导,各处领导服从管理室主任;(2)政治处,自治的盖世太保分部,负责关押者的个人事务,而从1943年起管理死刑(这个处确认通过筛选送入毒气室中毒死的犹太人名单);(3)“预防性监禁”集中营,由党卫军军官管理,党卫军军官负责集中营棚房的秩序和纪律(也有负责劳动分配和领导劳动队的官员);(4)行政机构,负责处理集中营的内部事务和经济事务及管理问题;(5)党卫军的医生。

集中营主要由党卫军守卫。1944年每100万关押者有4.5万守卫者,其中3.5万为党卫军成员,其余的为占领国居民所组成的辅助部队成员。守卫者获准不受限制地使用武器,镇压逃跑者和叛徒。如有关押者逃跑,守卫者要受到审判;打死逃跑者的守卫者则获得奖赏。

集中营中关押者的日常生活 集中营的关押者有政治犯,“劣等种族”的代表——犹太人和茨冈人,刑事犯,“反社会分子”——无赖、酗酒者和劳动纪律的破坏者。同性恋者组成一个特别小组。每种关押者都佩有标志——号码和特殊颜色的倒立的三角形(政治犯为红色)。犹太人佩带补充标志——倒立的黄三角形,它被缝在第一个三角形的下面,以便组成大卫星。后来,在某些集中营中关押者的号码被刺在手上。由一些关押者(主要是德国刑事犯)组成低级的辅助管理机构,它对其他关押者采取恐怖行动。辅助管理机构由集中营营长领导,他由管理室主任任命。关押者受到可怕的侮辱,德国守卫者在进行射击试验时,选择关押者身体的某个部位作靶子;侮辱女关押者,唆使狗撕咬关押者等。在守卫者中有公开的施虐狂,例如,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女党卫军成员伊尔玛·格列泽杀死了若干被关押的妇女,割下她们的乳房,用人皮为自己做灯罩。

关押者来到集中营后,应该交出自己所有的个人财产,借用囚服、匙、饭盒和杯子。被关进集中营的人丧失了与外界的任何联系和自己的一切个性特征,包括被剥夺姓名、社会地位、职业和财产,甚至头发。从他迈入集中营大门之日起,他就成为一个号码。关押者没有任何权利,他不能向任何人申诉,除了无条件服从命令的义务外,没有任何行动的自由。关押者清晨匆匆起床,然后接受检查,大部分情况下风雨无阻地在露天被监督劳动11—12小时。返回集中营后再次接受仔细的检查,以期证实关押

者无一人失踪。关押者有短暂的休息,以服用少得可怜的食物。战争期间关押者的口粮越来越少。极不卫生的条件和饮水的匮乏,导致疾病、包括腹伤寒和斑疹伤寒的流行。集中营的医生及其助手往往用注射剂害死病人,或者以草率的治疗加速病人的死亡。

对集中营规则最小的破坏都会引起残酷的惩罚:对性器官不少于25下的击打,把头按入水中直至窒息,而最常见的是在集中营全体人员面前把当事人吊死。在集中营中笼罩着恐怖和饥饿。许多关押者由于害怕集中营中通上电流的铁丝网而自杀身亡。身体衰弱到极点的关押者是送进毒气室的首批候选人,他们常常和死人一起被送进火葬场。

灭绝营 在“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框架内,从总体上歼灭犹太民族是灭绝营的唯一职能。希特勒分子本身非正式地称这些营为“灭绝营”。这些营的主要部分是毒气室和火葬场。受害者来到灭绝营后,立即被迫脱去衣服,妇女被剪掉头发(头发可以在工业上加以利用),然后被驱赶到毒气室。

万湖会议(1942)以后,加速了建立大型灭绝营的步伐,这些营主要座落在波兰领土上。1941年赫尔姆诺营使用了毒气室。1942—1943年,在贝尔热茨、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布尔营也相继使用毒气杀害犹太人。一些大型集中营,首先是奥斯威辛,成为杀人的中心。奥斯威辛集中营每天杀死2万人。根据A·埃希曼的命令,波兰犹太人和第三帝国被驱逐的犹太人首先应该被消灭,因为消灭他们无须运输,而波兰未并入德国的那部分领土的统治者G·弗兰克坚持在他管辖的土地上“肃清”犹太人。1942年初,在“移居”的名义下,开始把犹太人从波兰隔都押解到死亡营。

1942年3、4月,开始把欧洲其他部分的犹太人押解到灭绝营(也包括把犹太人从集中营转运到灭绝营)。这一行动延续到1944年底。起先运来的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利用他们建造灭绝营。在特雷布林卡(1943年8月)和索比布尔集中营(1943年10月)起义后,这两个营和贝尔热茨营被摧毁,灭绝中心转移到西部——奥斯威辛和斯图戈夫。利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一直延续到1944年11月。这种屠杀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而停止。

据目击者回忆,1941年希姆莱下令奥斯威辛集中营作好有秩序地和迅速地大规模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准备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决定使用毒气。1941年9月3日约900名俄罗斯战俘和病员被赶到集中营地下室,并被毒死。这场试验以后,波兰领土上很快出现了大型“死亡工厂”,其主要“车间”是“毒气浴室”和火葬场。毒气室建成淋浴间的样子。在集中营乐队伴奏下,受害者被赶去“淋浴”。700—800名脱光衣服的各种年龄的男女挤在这25平方米的毒气室中。毒气通过淋浴装置从圆筒瓶中进入密封的毒气室,4—5分钟即可将人毒死。犹太人受命

从毒气室中拖出尸体,把扭曲的尸体和完整的尸体分开排列,在摘下戒指、金牙和剪掉头发后,让集中营长官查验,并放到专门的炉子或沟壕中焚烧。金子运往第三帝国银行,作为党卫军的收入,头发和骨头供工业用,灰烬作肥料,衣服在消毒后送往其他集中营。

当苏联军队从东方、而英美军队从西方开始进攻后,希姆莱下令紧急疏散被占领领土上集中营的关押者,然而没有为这种疏散提供任何交通工具。1945年初,数十万名关押者步行进行了“死亡行军”,行军在寒冷和风雨中持续了若干天,没有任何必需品和食物。向关押的德国人发放了武器,并命令他们帮助党卫军。疲惫、饥饿、口渴、对逃跑者和病弱者的射杀,造成了大批人死亡。在指定到达的集中营中,许多新来者由于饥饿和拥挤而死去。25万关押者在这次“疏散”中毙命。

集中营中的反抗 尽管集中营和死亡营警卫森严,关押者还是在可能情况下进行反抗,相互之间表现出团结、互助和善良的品质。关押者把弱者和病友带到工地上,以免他们受到纳粹分子的迫害。为病人偷送食品和药物,虽然这种行为会招致所有参与者的死亡。关押者也聚集在一起祈祷,犹太妇女尽力弄到蜡,以便点燃安息蜡烛。

有些被送到集中营的关押者,宁可在座位上被枪杀,也拒绝走出车厢。逃跑极其困难和危险,但时有发生。各个集中营都建有地下组织,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甚至有国际地下组织活动,它搜集集中营的运输、大规模屠杀的情报,并把情报送出营外。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组织了关押者、主要是苏军战俘的大规模逃跑行动。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以国际政治中心为首的关押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4月)举行起义,导致集中营被摧毁。在预定要消灭的集中营关押者中,只有50万人在第三帝国瓦解后仍然幸存。他们中大部分身体残废,精神崩溃。没有关于受害者数目的准确资料,不过,许多报告和文件证实,在集中营中有400万犹太人丧生。

尽管有严格的监视、经常残酷的惩罚以及同外界隔绝,仍然发生了有组织的反抗。1944年10月奥斯威辛筹备的总起义遭到失败,几乎所有起义者丧生。来自施德列茨隔都的犹太人于1942年11月在特雷布林卡举行暴动,1942年年底来自格罗德诺隔都的犹太人再次在该营进行武装反抗。1943年8月,关押者冲进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武器库,并袭击看守,150名关押者得以逃脱,但是数百人被抓住并被杀死。1943年10月,索比布尔的关押者起义,400名冲决障碍的关押者中,有60名得以逃脱,并加入苏联游击队。普拉舒夫的犹太战斗组织为关押者筹划了逃跑行动,并为起义聚积了武器,但是起义未能举行。犹太人在一系列劳动营和战俘营中进行武装抵抗。在卢布林和博尔卡赫有犹太地下组织,它们帮助关押者逃跑。

纳粹大型集中营和大型灭绝营见附表22和23。

集体迫害 主要指19世纪末以后,发生在东欧,特别是俄国的迫害犹太人行动。自犹太人在东欧安家落户后,那里便不断有集体迫害行为发生。17世纪,就曾发生过哥萨克集体屠杀犹太人事件。1871年,敖德萨也曾发生集体屠犹事件。第一次大规模迫害犹太人事件发生在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之后,刺杀凶手并不是犹太人,但由于在调查中发现涉嫌被捕人员中有一名是犹太女子,顿时谣言四起,刺杀罪责被转嫁到了犹太人头上,加上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后期加剧推行歧视犹太人的政策,不少俄国的反犹报纸借机大肆渲染,终于导致了一场以犹太人为目标的集体迫害浪潮在俄国掀起。1881年4月,沙皇被刺后的第一个月,乌克兰的伊丽莎白格拉德镇出现了第一次袭击犹太人的事件,随后,类似的袭击行动便在周围近30个城镇发生。5月初,迫害行动扩大到赫尔松、陶里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其中发生在基辅的袭击事件最为严重,对当地犹太人的迫害持续了整整3天,当地的市政官员和警察当局对此置若罔闻,不采取任何制止暴力事件的措施。

1881年8、9两月,切尔尼戈夫和波尔塔瓦两省再度发生迫害事件。秋季以后,大规模的迫害行动开始减少,但小规模袭击犹太人的事件仍不断发生,如1881年圣诞节期间的华沙,1882年复活节期间的巴尔塔,仍有袭击事件发生,导致2人死亡,120人受伤,若干犹太女子遭强奸。1883年春天,罗斯托夫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及其周围地区突然出现新的袭击事件。1884年7月,下诺夫哥罗德又发生了19世纪80年代集体迫害事件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袭击犹太人事件。在这次长达4年的集体迫害浪潮中,单是俄国南部地区就有200多个城镇的犹太人遭到袭击,他们的财产不是遭抢劫,就是被毁坏。在莫斯科,约有2万犹太人受到驱逐。1882年5月,新上任的内政部长伊格纳切夫颁布了声名狼藉的“五月法令”,明文禁止在犹太区内外建立任何新的居民点,允许乡村居民把“有罪的犹太人”赶走,并限制犹太人的入学人数。数以千计的犹太大、中学生被关在校门之外,犹太人从事脑力劳动的百分比开始降低。集体迫害行动和反犹歧犹政策便使犹太人几乎完全陷入贫困,有40%的犹太人失去生计,靠救济度日。

19世纪80年代发生在俄国的集体迫害事件,对俄国犹太人发展的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犹太人开始觉醒,并重新思考本民族的前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在俄国兴起。几十万犹太人被迫迁徙,其中绝大部分去美洲安家落户,约有2万5千人则选择了巴勒斯坦,掀起了第一次向圣地移民的浪潮。

1903年至1909年间,俄国掀起了第二次集体迫害犹太人的浪潮。它的发生与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有着

密切的联系。沙皇政府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允许反动报刊自由刊登反犹宣传和无端指责犹太人的文章,借以转移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以及制造俄国的革命运动是犹太阴谋一个组成部分的假相。当时的贵族组织,如俄国人民联盟、双头鹰社等总称为“黑色百人团”就是这次集体迫害行动的组织者。头一起迫害行动发生在基什尼奥夫于1903年逾越节期间,事件由克鲁金瓦主编的一家当地报纸的反犹宣传挑起。在这次袭击事件中,有50名犹太人丧生,数百人受伤,1500多户犹太人家和商店被抢被毁。尽管这一事件遭到当时世界舆论的谴责,一系列接踵而来的迫害事件还是不断发生。1903年9月,戈梅利发生了另一次袭击事件。1904年秋季,斯梅洛、罗夫诺、亚历山德里亚等地纷纷发生袭击犹太人事件,许多犹太人被强迫入伍,送到前线与日军作战。1905年,在弗奥多西亚、梅利托波、日托米尔都出现了迫害犹太人事件。同年10月,沙皇政府颁布了给人民以自由和建立国家议会的宣言。但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却没有结束。11月的头一个星期就发生一系列严重屠犹事件,其中发生在敖德萨的最为严重,300多人丧生,数千人受伤。发生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一次袭击造成了120名犹太人死亡。1906年,又有两起集体迫害事件发生。一次发生于6月的比亚韦斯托克,80余名犹太人丧生,被抢劫的财产不计其数。另一次发生在8月的谢德尔采,30人丧生,180人受伤。在这一集体迫害浪潮中,共发生过上千起袭击犹太人事件,事件发生地达64个城市,626个村镇。反犹太屠杀直接导致了俄国犹太人的第二次大迁徙,加快了犹太人去巴勒斯坦移居的步伐,造成了第二次进入圣地运动。同时,这一屠杀行为还导致欧洲犹太人民族意志的觉醒,极大地推动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向前发展,并促使犹太人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思想的产生。

1917年至1921年,俄国再次出现一系列集体迫害犹太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严重性上都大大的超过前两次。造成大屠杀的原因是俄国爆发的革命和随后出现的国内战争。1917年革命胜利以前,沙俄军队便在前线地区屠杀犹太人和抢劫犹太人的财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曾下令采取有力措施制止红军中和国内发生的迫害犹太人行为。但是,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屠杀事件开始愈演愈烈。1919年,苏联红军攻占基辅前夕,乌克兰反动军队制定了一系列用军事手段屠杀犹太人的计划。1919年2月15日,屠杀在普罗斯库诺夫开始,仅几个小时,就有1700余名犹太人被枪杀。第二天,在邻近的费尔西汀镇又屠杀了600人。随后,乌克兰各地不断发生枪杀犹太人事件。到1919年夏天,已有近6千名犹太人丧生。1919年秋,在A·I·邓尼金统帅下的反革命武装“白军”从北高加索向俄罗斯进犯,一路以“打击犹太,拯救俄国”为口号,开始有目的地杀害犹太人。仅1919年9月上旬就有1500名犹太男女儿童遭到屠杀。

1921年,白军又在捷李耶夫进行报复性大屠杀,4000犹太人因此丧生,整个村镇被大火焚毁。屠犹事件只是在苏维埃政府控制了整个局面才逐步平息下去。有关这一次集体迫害的严重性和后果难以作出正确估计。根据已知的材料,在约530个地区先后发生过一千余起屠杀事件,有6万多犹太人丧生,受伤人数是这个数字的几倍。反动势力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使得许多犹太人投身红军和加入苏维埃政府。另一方面,这次集体迫害浪潮促使犹太人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犹太家园的愿望得到了加强,建立一支独立的、强大的犹太人武装的思想也得到了确立并付诸行动。

奥地利犹太人 10世纪的历史文献最早提到过奥地利犹太人。1194年,奥地利出现了固定的犹太定居点。13世纪初期,奥地利(主要是维也纳及其郊区)成为犹太文化重要的中心之一。在教会的影响下,奥地利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不断增长,迫害犹太人的事件时有所闻。1420年,无端控告犹太人玷污圣饼,使得在布尔考市引起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在恩斯市烧死了270名犹太人。为此,犹太人称奥地利为“血腥的国家”。15世纪中期,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奥地利。尽管不久奥地利又重新出现了犹太人,但是,部分地被驱逐的事件屡见不鲜。从1536年起,奥地利犹太人必须佩带特殊的识别标志。1564—1619年反宗教改革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进一步加剧。1621年维也纳犹太人被限制在城外的专门地区居住。1648—1649年,许多犹太人为逃避迫害从乌克兰逃到奥地利。1669—1670年,犹太人重新逐出维也纳。驱逐犹太人的命令生效到1848年,但实际上它不总是得到执行。某些御前犹太人,如奥品赫梅尔和维尔特赫梅尔,获准在维也纳居住。1752年,在维也纳居住着450名犹太人(基本上是御前犹太人的12个家庭的亲属和佣人)。1727年通过了控制犹太人婚姻的法律,其目的在于限制犹太人口的增长(这种法律生效到1848年)。

玛丽娅·特蕾西亚女皇(1740—1780)一方面对犹太人参与经济活动感到兴趣,另一方面又对犹太人怀有深深的敌意,这两种因素决定了她的犹太政策。1753年的《犹太章程》包括犹太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以犹太社团充分的司法自治为基础。某些犹太金融家和工业家获准移居维也纳,某些人被赐予贵族封号。在加利西亚地区被哈布斯堡王朝吞并(1772)后,犹太人口增长到两倍多,犹太人大量涌入维也纳。1781年,约瑟夫二世(1780—1790)取消犹太人必须佩带黄色标志的决定,并取消向犹太人征收人头税的做法。他的“宽容法令”(1782)规定犹太人或者成立用德语授课的小学,或者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普通学校去。法令奖励犹太人从事农耕,准许他们从事手工业生产和上大学。1784年,犹太司法自治被废除,在犹太人中推行义务兵役制。有同化倾向的犹太名流和知识分

子欢呼“宽容法令”的颁布,但是,大部分犹太人把它看作为对犹太习俗和犹太文化的威胁。1803年,在奥地利本土上居住着332个犹太家庭,而在整个哈布斯堡王朝居住着近8.7万个犹太家庭。约瑟夫二世死后,奥地利政府同化犹太人的趋势加强。1820年的法令规定,所有犹太拉比都必须研习哲学,并且在公开祈祷中只能使用德语。犹太儿童必须上基督教学校。与此同时,犹太人积极参与工业、交通、贸易和银行的活动。许多犹太人成为著名的德语作家和记者。

某些犹太人积极参加了1848年革命。不过,在革命期间也发生了反犹活动,发行反犹报纸,散发反犹传单。1849年宪法取消所有歧视性法令,但是,1851年宪法被废除,犹太人的权利又部分地受到限制。犹太人的婚姻重新应该得到政府的批准,他们被禁止获得任何不动产。1860年,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被部分地取消,而1867年奥匈宪法禁止根据宗教特征实行的任何歧视。1890年的法令允许在每个居民点存在统一的社区。1893年建立了获得政府资助的犹太拉比学院。在这段时期中,奥地利的上层犹太人同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由于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的原因,19世纪末期在奥匈帝国反犹主义得到加强,从而导致奥地利犹太人民族自我意识的巩固。1906年成立了全国犹太党,要求承认犹太人是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中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之一。以居住在维也纳的西奥多·赫茨尔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奥地利的犹太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逃入维也纳的犹太人达3.6万。1918年,在奥地利居住着30万犹太人,其中20万住在维也纳,10万住在其他32个社区中。1919年9月10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战胜国和奥地利在圣日尔曼昂莱市(巴黎附近)签订的和约,保障奥地利的犹太人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尽管如此,在大中学校中仍然有种族歧视的现象。1921年,逃入奥地利的犹太人被剥夺了获得奥地利国籍的权利。许多犹太人支持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党的领导人中有若干犹太人,在犹太问题上他们奉行同化路线。30年代末期,犹太人在奥地利的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牢固的地位。1919—1939年,大量的犹太学校和班级用希伯来语授课。犹太青年运动有许多支持者。1934年,维也纳和格拉次的犹太社区的领导权已经转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在奥地利联邦首相、基督教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多尔富斯摧毁了社会民主党(1934)以后,犹太人的状况大大恶化了。

1938年3月13日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当时,奥地利有181778名犹太人(其中91.3%住在维也纳)。纳粹分子立即剥夺了犹太人的基本公民权利。犹太组织和社区的活动被禁止。许多犹太活动家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其中某些人在达豪集中营中身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

离奥地利。在1938年11月10日一夜中,近8千名犹太人被捕(其中5千人被送进达豪集中营),有680名犹太人自杀或者被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109060名犹太人被迫移居国外,奥地利剩下66260名犹太人。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有11240名犹太人移居到中立国。在纳粹屠犹中,约7万名奥地利犹太人被杀。

战后,“被迁移的”人中成千上万犹太人途经奥地利。他们中绝大部分都移居到以色列,只有少数人在奥地利定居下来。1965年,奥地利的犹太人社区有9537人(其中8930人住在维也纳),1973年增加到1万人。1962年,奥地利通过的法令保证归还犹太人财产,并向纳粹迫害的牺牲者作出赔偿。

1956年,以色列和奥地利建立了外交关系。1956年奥地利成为2万名匈牙利犹太人、1968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犹太人、尔后成为苏联犹太移民奔赴以色列或者其他国家途中过境临时逗留的国家。

1976年,奥地利社会党主席布尔诺·克赖斯基出任奥地利联邦总理。他是在奥地利政府中担任如此高职的第一个犹太人。1973年10月,在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从苏联发出途经奥地利开往以色列的载有犹太人的列车以后,克赖斯基不顾以色列的强烈抗议,下令关闭了舍瑙供东欧犹太人奔赴以色列途中临时逗留的过境营地。

维也纳是奥地利最大的犹太聚居区。1923年,维也纳的犹太人达20万之多,是欧洲第三大聚居区。许多维也纳犹太人为自由职业者。1936年,维也纳共有2163名律师和3268名医生,其中犹太人分别为1345名和2440名。1893年建于维也纳的拉比学院是欧洲研究犹太文学和历史的最大中心之一。维也纳也有培养希伯来语教师的专门师范学院。这个城市的犹太足球队和体育俱乐部颇具声名。在维也纳起主导作用的报纸《新自由报》(西奥多·赫茨尔曾在该报工作)部分地属于犹太人。在维也纳生活过许多著名的犹太作家、作曲家和学者(其中有作家茨韦格,瓦塞尔曼,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和韦尔弗;作曲家马勒和勋伯格;学者弗洛伊德,波普尔和诺伊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维也纳的犹太人为4千人,1950年为12450人,1974年在册的约9千人。

奥帕托舒 (Joseph Opatoshu, 1886—1954)

意第绪语小说家。生于波兰一个犹太拉比世家。从小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学习了许多犹太教经典。10岁,被送入一俄国人学校学习。青年时代的经历和阅历使他意识到东欧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思潮。稍后,他去法国学习工程技术,但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欲望使他最终放弃在工程学校的学业。很快,他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在大桥的另一边》的初稿。这时,他父亲已移居美国。为了与家人团聚,他于1907年来到纽约。美国的社会给他印象很深,他不仅热爱这片土地,而且把它看成是海外犹太人的新的中

心。初到美国,他主要靠打工谋生。1910年,经过修改后的处女作终于发表。两年后,他的一中篇小说《马贼罗曼史》发表。这两本小说描写的都是波兰的犹太人生活。1913年后,反映美国犹太人的生活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内容。1914年,美国最负有盛名的意第绪文学报《日报》开始发行,他随即成为该报的固定撰稿人,并在以后40年中一直保留这一职位。1921年,长篇小说《在波兰的森林中》发表,引起评论界极大的兴趣,很快成为畅销书,在美国和波兰发行。他作为意第绪语文学界一名重要小说家地位随之确立。1922年,为收集创作素材他回到了波兰。1934年,他去巴勒斯坦访问。在返回的途中,他再次访问了波兰,所见所闻被写入1943年发表的小说《当波兰沦陷时》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年代,他一直为犹太人所遭受的不幸呼喊,以便引起世人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

奥帕托舒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作家。在作品中,他常把历史事件以想象的方式加以发挥,写成一部部波澜壮阔、有起有伏的动人故事。无论是在《在波兰的森林中》,还是在《最后的起义》中,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内容充实、想象力丰富这一特点。作者还将对本民族的爱融入作品之中。犹太人的世界观,犹太人的生活,犹太人的苦难,犹太人的爱与恨,无一不在故事中得到充分展示。而他的叙事技巧和对意第绪语词汇的灵活运用,使他成为意第绪小说史上的一位巨匠。

奥兹 (Amos Oz, 1939—) 以色列当代著名小说家。生于耶路撒冷,1957年加入基布兹,曾在棉田、果园干过各种农活,后一度从事教学工作。1957—1960在以军中服役(“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期间曾两度被召回以坦克部队)。毕业于以色列著名学府希伯来大学。后去英国牛津大学进修。除了写作以外,他还担任兼职教师等。

60年代起,奥兹开始从事创作。196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的迈克》使他一举成名。作为一名土生土长、在以色列建国后成长为作家的犹太人,他的作品深深扎根于以色列的土壤之中,着重反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由于作者擅长从历史上汲取创作素材,他的小说往往洋溢着一种史诗般的风格,读后令人振奋。

目前,奥兹是一位专业作家,作品数量众多,发表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儿童故事等。其中为读者和评论界称道的有《罪恶的律师山》、《触及水,触及风》(1974)、《在以色列的土地上》(1983)、《理想和平》等。

奥兹是第一位以其作品赢得国际声望的以色列当代作家。他不仅获得众多的文学奖,作品还被译为30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流传。

他同时还兼任以色列最有影响的报刊《第七日》的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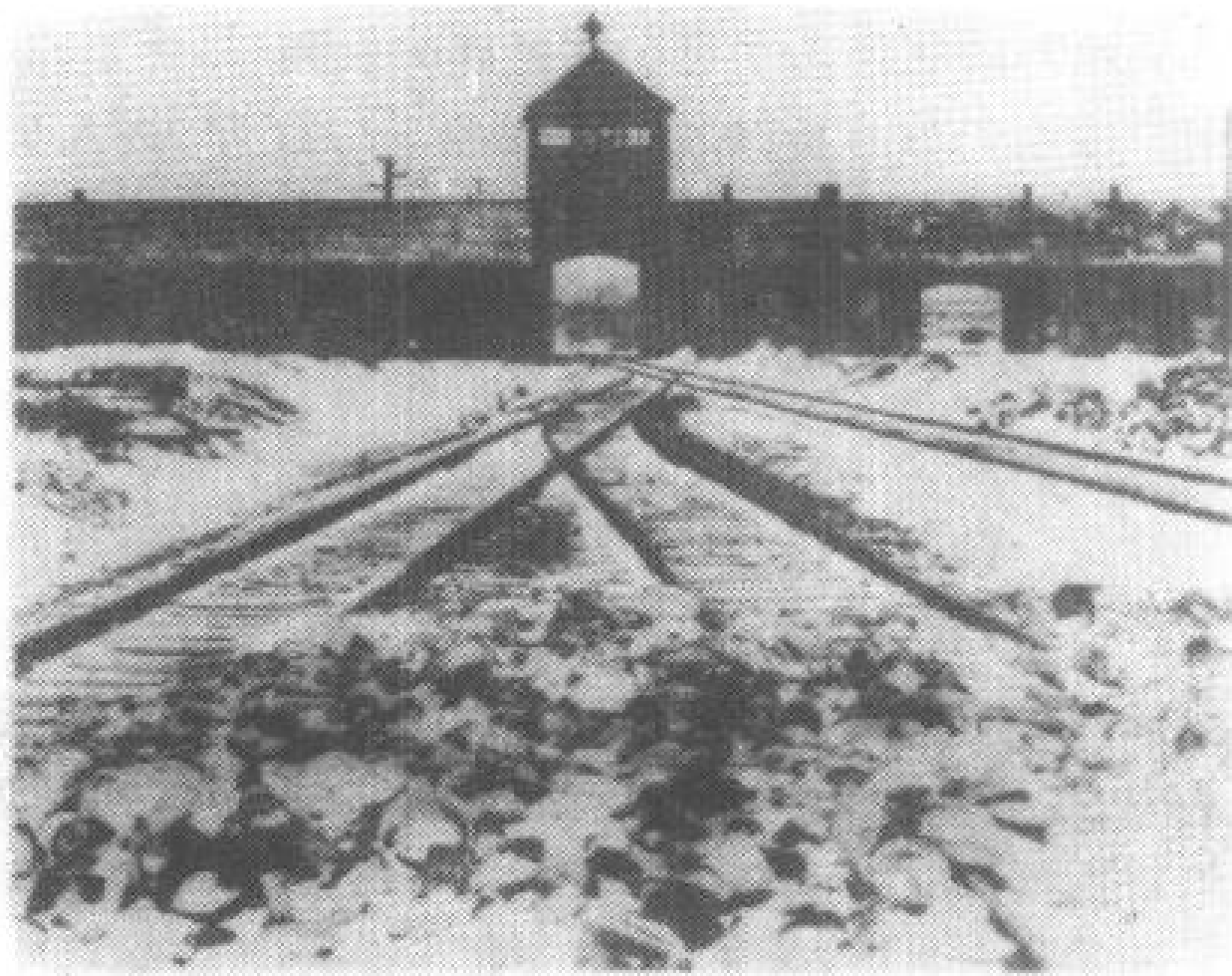
辑。

奥斯威辛集中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在波兰加利西亚的奥斯威辛镇附近。

1940年4月27日,纳粹头目希姆莱下令在奥斯威辛建立集中营。6月14日第一批波兰政治犯被送到这里。这个“奥斯威辛一号”集中营主要用来关押波兰人和德国人,里面的犹太人不多。1941年10月,德国又在布热津卡(即比克瑙)村外增设了“奥斯威辛二号”,又称比克瑙集中营。党卫军在这里建立了大规模的综合灭绝设施,包括大型毒气室、储放尸体的“尸窖”以及焚尸炉,用于消灭犹太人。在德沃雷村附近还有另一集中营(后来称为“奥斯威辛三号”),原用于关押政治犯,1942年5月被改为苦役集中营,为附近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所属的合成汽油和橡胶工厂提供劳动力。

从1940年到1944年的三年多里,德国党卫军突击队长鲁道夫·赫斯任奥斯威辛集中营总司令。纳粹把从荷兰、比利时、法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希腊等国家押送来的犹太人先集中进行挑选,将有劳动能力的男女青壮年送到劳役集中营做苦工。其余的“落选者”,主要是年老体弱者、儿童和母亲们,则立即被送到死亡营。他们被告之要洗淋浴,让他们脱光衣服进入“浴室”,齐克隆-B晶体从毒气室顶部放入。3—10分钟后室内的人全部被毒死,半小时后尸体被抬出埋掉或火化。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五个毒气室每24小时可以杀死6万人。纳粹分子对服劳役者也定期挑选,把由于劳累、疾病或饥饿而身体衰弱的人挑出来处死。因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这种淘汰率



被称为“死亡之门”的集中营大门,数百万犹太人由火车运抵并在此遭屠杀

很高,服劳役者的平均寿命为3—5个月。德国人还挑选许多犯人进行医学试验,如试验便捷的绝育方法,对孪生

子女进行活体或尸体解剖等。

集中营的体力劳动(如搬运尸体、清扫毒气室和焚尸炉等)都由挑选出的犹太人承担,他们也在隔一段时间后被处死。集中营的警卫队(被称为“骷髅队”)是凶残的纳粹分子,犯人只要有一点不满的表示就会遭镇压。据赫斯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时供认,至少有250万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处死,另外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有人认为奥斯威辛的死难者高达400万人,其中犹太人200万。1945年1月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时,那里只有5000幸存者。赫斯于1947年3月被作为战犯在奥斯威辛处死。波兰1946年在这里建立了国立奥斯威辛纪念馆以缅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此的死难者。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巴勒斯坦 奥斯曼帝国统治阿拉伯巴勒斯坦长达400年(1517—1917)之久。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民族源于中亚西突厥乌古斯人的游牧联盟,11世纪时征服并开始迁居小亚细亚,13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雏形奠定。

1517—1574年间的奥斯曼帝国 这是帝国统治的黄金时代。苏丹谢莱姆一世有“耶武兹”(意为勇猛、严厉)之称。他统治期间,奥斯曼帝国的版图扩大了一倍。1514年8月,他在查尔迪兰战役中大败伊朗萨非王朝后,把目光投向衰弱的埃及马木留克王朝,打算把马木留克王朝的军队逼离埃及,从而远离在非洲的军需供应基地,然后在亚洲击垮他们。1516年8月24日谢利姆一世在叙利亚北部代比克的战役中给予马木留克军队以毁灭性打击,相继占领了阿勒颇、大马士革、哈马、胡斯等叙利亚北部的所有大城市,并从大马士革派遣军队控制了邻近地区。德鲁兹信徒的首领和贝督因人部落的首长从叙利亚各地赶去宣誓效忠新统治者和离开大马士革征服加沙的大臣帕夏。1516年底,整个国家已完全处于谢利姆一世的控制之下。1517年初,谢利姆一世对埃及开始发动进攻时,访问了耶路撒冷。他儿子苏莱曼一世继位之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瓦利(阿拉伯行省总督)举行起义,试图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但结果,瓦利被奥斯曼帝国杀害。这场起义使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蒙受灾难。起义后,奥斯曼帝国撤掉所有穆斯林官员,一切职务均由奥斯曼人担任,并按照苏莱曼一世制定的帝国政治体制对军队和民间进行管理,实行封建军事分封制。他把被征服的领土分割给奥斯曼人管辖,每一块领地都必须派遣骑兵参加作战,并且根据领地大小确定所派随军服务人员的人数。所有地区的骑兵都有统一旗标,战争由贝伊(奥斯曼帝国一个地区或小省的长官)指挥。而随着帝国的壮大,它的版图远远超出了原来的阿纳托利亚地区,因此有必要采取适应新形势的行政管理制度。在小省数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委派高于贝伊职位的官员更便于统治。这些官员管辖几个小省,必须绝对效忠苏

丹。帝国征服巴勒斯坦的前50年是新型管理制度演变形成的决定性时期。当时巴勒斯坦被划分为四个大区:耶路撒冷、加沙、纳布卢斯和萨费德。每个区组织严密,政治、军事和司法独立,并又划分为几个农业区。其中耶路撒冷分为两个区: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加沙分为三个区:加沙、赖姆莱和利达;纳布卢斯分为四个区:杰贝勒沙米、杰贝勒杰利,卡昆和巴尼萨贝;萨费德开始时有六个区:萨费德、提卜宁、西提、什科夫、阿克和太巴列,后来西提并入提卜宁区。当时巴勒斯坦属大马士革省,秩序正常稳定,农业区的管理也趋于恢复。帝国统治前50余年中,巴勒斯坦人口增加了一倍,几乎达300万,主要是乡村的农民、贝督因部落游牧民和半游牧民,耶路撒冷、希伯伦、加沙、赖姆莱、纳布卢斯和萨费德六大城市只有15万人口。当时主要农作物有大麦、小麦、玉米、大豆、蔬菜、棉花和芝麻,果类有海枣、无花果、石榴、浆果、橄榄等。犹太人及基督徒善制葡萄酒和葡萄蜜。贝督因人和当地农民饲养牲畜。胡拉湖和基尼烈湖的居民普遍从事渔业,地中海沿岸也有渔业点。农业的繁荣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如耶路撒冷出产橄榄油,以油为原料生产的肥皂出口欧洲;在萨费德及其邻近地区,犹太人创建了织布和染纺工业中心;纳布卢斯和恩泽提姆发展了制革业;迈季代勒、利达、纳布卢斯和阿克发展了纺纱业等。手工业方面,除马木留克王朝时期就开始从事的犹太人外,耶路撒冷、贝特谢安等地的基督徒兴起宗教物品的手工艺制作,卖给到巴勒斯坦的朝圣者或出口海外。

1517—1574年间的犹太人社团 奥斯曼帝国建立初期,随着西班牙难民的移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社团壮大起来。圣地犹太人除150户寡妇外,达300户,他们享有稳定的收入且不受征税支配。大约有200人受到公共基金和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募捐资金的救济。1502—1524年间,犹太人社会的首领是R·伊萨克·肖拉。当时的犹太人分为四个阶层:(1)东欧犹太人,大多是迈蒙尼德时代就居住在那里的东欧犹太人后裔,这一时期他们与来自意大利的移民紧密联合;(2)西欧犹太人,是被驱逐的犹太难民,构成该城人口的主要部分;(3)来自北非的马格里布移民;(4)土著居民的后代摩尔人,他们一直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一时期精神统治权以摩尔人和马格里布人手中转到西欧犹太人手中。犹太学者及每位成员间常就祈祷、会堂诸事项发生争执。巴勒斯坦中部的纳布卢斯和南部的希伯伦、加沙都有犹太人居住。如萨费德的犹太人达300户,经济状况良好。那里有三个会堂,分属西欧犹太人、马格里布人和摩尔人。在欧洲犹太人帮助下,萨费德的犹太人度过了马木留克王朝退却和奥斯曼帝国征服时的困难时期。由于巴勒斯坦经济状况好转,移民人数大增,人口达1000户(约5000人)。移民中以西班牙难民为最多,不少人去了耶路撒冷,那里的犹太人从1526年约200户增加到1554年的338户。列维·哈比贝拉比也

住在那里,管理社会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在圣地居住过的著名人物还有大卫·伊本·阿比·齐美拉阿比和犹太教法典研究院院长贝扎列·阿什纳齐拉比。大多数移民居住在萨费德,该地发展成为一所重要工商业城市。16世纪中叶,萨费德犹太人达1万,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和邻近的恩泽提姆、比亚和加利利的农村聚集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犹太人。萨费德还以《摩西五经》及其教义的重要中心而闻名。雅各·伯拉贝拉比试图在那里恢复圣职授位仪式,该仪式已几百年不举行,但遭到圣地圣贤,特别是列维·哈比贝拉比的激烈反对。作为这一时期的神秘哲学教育中心,那里居住着许多伟大学者研究神秘哲学。在艾萨克·卢里亚拉比到萨费德前,那里已有一些著名神秘哲学家以及他们倡导的哲学体系。卢里亚建立的神秘哲学实践性体系得到巴勒斯坦以外各地犹太人的广泛支持。这一时期,人们萌发了拯救世界、驱逐奥斯曼帝国的愿望,以西班牙难民最为强烈。在杜纳·格纳萨和其侄子唐·约瑟夫的努力下,他们决心重建废墟中的太巴列。杜纳·格纳萨和唐·约瑟夫向苏丹租赁了太巴列地区,并派代理人去管理该地的犹太人。太巴列慢慢发展成为一座城市。唐·约瑟夫死后,所罗门·阿贝纳斯获得太巴列的统治权,在太巴列建设了一些公共工程。不过,由于政治经济因素,重建太巴列的计划最终半途而废。

1574—1700年间的奥斯曼帝国 苏莱曼一世后的200多年间,奥斯曼帝国渐趋衰落。札尼塞里(土耳其苏丹近卫军)表示了谢利姆一世创建时的严格纪律,他们频繁发动骚乱,过分要求薪水和官位,对苏丹政权构成长久威胁。统治中心的混乱首先波及到沙漠边境。穆斯林首领们利用机会重建废墟中的家园。其中最为杰出的领袖是马安家族的法赫鲁丁二世(1590—1635),他是黎巴嫩德鲁兹信徒的埃米尔(亚非地区穆斯林酋长)。他征服萨费德地区和君士坦丁堡东部的阿杰隆,驱逐了各地强盗,使加利利成为一个宁静安全的地区。同时,他为了实现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地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十字军国家的愿望,与意大利托斯卡纳结盟,扩张他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他占领了杰宁地区,逼近卡尔迈勒山,与德鲁兹山的贝督因人签订协约。但1613年,他被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驱逐,不得不侨居意大利五年。复位后,法赫鲁丁二世继续扩张,成为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他甚至与西班牙皇帝的代表签定协约,打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马安家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扩张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军队从水、陆两路对他们进行围攻。法赫鲁丁想用西顿和贝鲁特贿赂大马士革瓦利,同时派人到意大利寻求援助,但最终不绝望投降。1634年,他在伊斯坦布尔被俘,翌年被处死。马安家族的彻底失败也没使奥斯曼帝国的形势有所好转。札尼塞里军队不断暴乱,苛捐杂税繁多,欧洲大片土地丧失,帝国势力日趋衰落。

1574—1700年间的犹太人社团 16世纪下半叶,巴勒斯坦地区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贝督因和德鲁兹骑兵不断抢劫萨费德和加利利的工商业城市。1516年的一份文件命令500到1000户的萨费德犹太人迁往塞浦路斯,这个命令后来被取消,但降低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一些著名学者也开始离开该城。虽然萨费德并没有完全被遗弃,太巴列也是如此(17世纪末该地已无一位犹太人),但他们确实是衰弱了。而耶路撒冷则遭到贝督因谢赫(阿拉伯族酋长)贪婪地剥削和压榨。穆罕默德·伊本·法鲁克担任该地贝伊后,对人民施行暴政,尤其是犹太人承受了沉重的赋税。一年后,大马士革帕夏驱逐了伊本·法鲁克,但赋税并没有减轻,许多犹太人特使到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地区筹集资金挽救社团,从而使耶路撒冷等地的犹太人社团重新发展起来。耶路撒冷处于困境时,希伯伦和加沙曾是难民的避难所。1648年后,随着大批战争难民涌入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犹太居民增多。统治者趁机向犹太人强加赋税,许多穷人等待着以前正常送到的巴勒斯坦以外地区犹太人社团的援助,但援助没有能及时送到而且不足。不少特使到国外寻求帮助。如沙比泰·塞维去欧洲途中曾经加沙。加沙是内盖夫和西奈的首府,大商业中心及亚非两洲间的交通要道,那里有一个重要的犹太人社团。由于其享有独立行政管理权,也曾是犹太难民的避难所。16、17世纪该地聚集了许多著名学者。它还成为沙比泰主义的重要传播中心。这一时期,耶路撒冷重新获得精神领袖地位,它是大多数巴勒斯坦学者的中心,并且吸引了一些来自东部国家的学者。尽管物质条件艰苦,统治者强暴,但17世纪的犹太人还是成功地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稳固了自身的地位。

1700—1800年间的奥斯曼帝国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政权地位发生了变化。1699年,与神圣同盟之间持续了16年的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被迫签定割地的《卡尔洛维茨和约》,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各种特权。札尼塞里兵团实力衰弱,奥斯曼苏丹不得不允许穆斯林瓦利自己征兵组织地方武装。骑兵团和步兵团相继建立,由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马格里布人雇佣军组成。他们的津贴从当时政府财政收入中拨给,地方统治者借此横征暴敛,吞噬弱小地区,扩大自己版图。这些军队恰又是18世纪奥斯曼帝国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1733年,阿拉伯独立运动先驱扎希尔·欧麦尔继承父位。1742年,他出兵占领太巴列、拿撒勒。大马士革帕夏死后,他击败所有残余势力,进一步扩展势力,控制了沿海城市海法、阿克,与在那里已有基础的欧洲商人发生直接经济联系。1768年,趁俄土战争之际,他联合埃及阿里贝伊及俄国舰队,举行起义,建立独立国家,1771年几乎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他击败大马士革总督所部2万余众的进攻,不久占领贝鲁特。俄土休战后,他即遭土耳其陆、海军围攻,被迫退守阿克城。后因奥斯曼帝国收买了

他的雇佣军,札希尔为叛军谋杀。苏丹军队占领阿克。哈麦德帕夏出任西顿地区贝伊,定都阿克,他还统治的黎波里,并曾两度控制大马士革。他组织部队加固阿克城墙,防御措施在阿克遭拿破仑军队围攻时发挥了作用。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把拿破仑看作同盟军,没想到他会进攻埃及。1799年初,拿破仑向巴勒斯坦进军,他想收买哈麦德投降,但遭拒绝。法国军队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加沙、赖姆莱、利达和加法。由于他意在打开通往奥斯曼帝国中心的大门,故没有进攻耶路撒冷。法国军队征服海法后围攻阿克。奥斯曼帝国得到英国海军和土耳其军队的援助,但仍被法军打败。虽然这次胜利为法军打开了通往萨费德的通道,但拿破仑由于缺乏重炮,无法摧毁阿克城的防御工事;同时,法军中爆发瘟疫,而不得不撤回欧洲。尽管拿破仑出征巴勒斯坦最终失利,但拿破仑却意识到巴勒斯坦具有防卫和进攻的双重意义。以巴勒斯坦为屏障,他就可以防止盎格鲁—土耳其人的进攻,直接出征安纳托利亚和伊斯坦布尔、伊拉克、波斯湾和印度。拿破仑入侵期间,巴黎讨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主张。据传拿破仑围攻阿克时曾对犹太人宣布,称他们是“巴勒斯坦合法继承人”,号召他们夺回被占领的土地。由于奥斯曼帝国衰弱,赋税增长,人民无法承担只好离开乡村去城市。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多为农民。各地情况有所差别。耶路撒冷和贝特谢安之间的良田和荒地形成鲜明对照。农田的荒芜与人烟稀少关系极大。札希尔·欧麦尔极力恢复加利利地区的农业生产。他鼓励农耕,向农民贷款,并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对犹太人也友善。与之相比,哈麦德对农业生产漠不关心。

1700—1800年间的犹太人社团 这一时期犹太人社团重建起来。17世纪末,巴勒斯坦以外各地的犹太人期待救世主的热情高涨,移居巴勒斯坦的人随之不断增多。18世纪初,欧洲犹太人犹大·哈希德和哈伊姆·马拉克被护送到耶路撒冷。他们抵达以前,耶路撒冷有1200名犹太人,其中200名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债务沉重。护送队伍分两路前进,大约有500多人死于路上,仅1000人抵达圣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他们的到来是不欢迎的,甚至出现了纠纷。因为穆斯林借钱给护送队的犹太人,却宣布要耶路撒冷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偿还。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只好到各地寻求援助。由于一些与他们无关的政治因素,援助没有到达。穆斯林放火焚毁他们的会堂,占领他们的居住区。由于害怕被逼旧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圣地,留下的把自己伪装成东方犹太人。来自欧洲的移民居住在希伯伦、萨费德和太巴列。犹大·哈希德到达不久便死了。当时犹太人主要靠国外捐赠维持生活,如果捐赠出现了一点意外,或者捐赠到迟了一些,穷犹太人便无法生存。面对这种情况,曾有学者指出耶路撒冷只能接受能够自立的犹太移民。为了监督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偿还犹太人社团所承受的大笔债务,住

在伊斯坦布尔的耶路撒冷长官则派人管理犹太人社团和犹太人朝圣者。圣地还住有不少著名学者,他们在犹太教法典研究院中研究犹太教义。由于希伯伦的穆斯林发生内战,该地犹太人生活极为困窘。为了社团的安危,有两位特使先后去欧洲和北美寻求资助。18世纪80年代,希伯伦城中犹太人口达300人。加沙的犹太人社团比希伯伦的小,并频繁遭到各种军队的侵袭。拿破仑占领该城后(1799年),犹太人几乎绝迹,到1811年已无一人。许多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人定居在萨费德和太巴列,它们是18世纪中叶虔敬派(犹太教神秘主义派别之一)的中心,与当时国外最大的犹太人社团建立起新的联系。加利利和太巴列在17世纪已消失的犹太人社团被来自东欧的移民重建起来。太巴列是在札希尔·欧麦尔帮助下重建的。

1800—1882年间的奥斯曼帝国 19世纪初期,原有的行政管理制度已经不适应形势需要,巴勒斯坦呈现分裂的局面。1840年后有所好转。国家统治制度发生了变化,西方列强的影响增强,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使巴勒斯坦地区成为“东方问题”的焦点。1800—1831年,巴勒斯坦分属两位奥斯曼帝国帕夏统治,疆界不时发生变化。一般而言,从纳布卢斯北部到希伯伦南部(包括耶路撒冷)的东部中心山区属大马士革帕夏管辖。从海岸平原到汗尤尼斯属阿克帕夏管辖。海岸平原又分为三个区:加沙、赖姆莱和雅法。内盖夫的大部分不受奥斯曼帝国控制。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极盛时期,统治者也没有试图使被征服领土的非土耳其人奥斯曼化。统治阶层的子孙经常与当地姑娘通婚,为当地人所同化。所以,巴勒斯坦地区的传统保持不变,帝国臣民首先要效忠的是自己所属的宗教阶层和社团,而不是帝国统治者。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土耳其非穆斯林的宗教自治团体,与统治者的关系极其有限。帕夏哈麦德与埃及苏丹的松懈关系一直持续到他的后继者:苏莱曼、伊斯麦尔和阿贝道拉,他们比哈麦德更无建树,更加残暴。苏丹和大马士革、加沙的帕夏都强收赋税,压榨人民。19世纪80年代初,赖姆莱和阿克的居民靠卖棉花和棉布给勒旺的法国商人为生,并从法国商人手中购买衣服、染料、糖和咖啡。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商人不复出现,代之而来的是英国勒旺公司,他们对棉花不感兴趣。1815年后法国商人回到东方,但没有建立起以前的贸易联系。1821年,长纤维棉花引入埃及后,巴勒斯坦地区的棉花生产几乎丧失了重要地位。1832—1840年间是地方自治最厉害的9年。穆罕默德·阿里吞并了其他帕夏的领土并强迫苏丹承认其合法地位。他派遣自己的儿子易卜拉欣出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易卜拉欣征服成功,定都大马士革,建立起正常的法律秩序和经济秩序。欧洲列强这一时期极力争夺这块土地,土耳其人也多次试图重新征服它。这一时期,传教士获准传教布道,建立教会学校。英法都意识到控制它就可以修筑跨洋

运河和跨洋铁路。在争夺过程中,欧洲列强发生利益冲突。1840—1841年间英国采取武力迫使易卜拉欣放弃巴勒斯坦,使其重新处于土耳其控制之下。在严格的中央集权基础上一套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建立起来,这种变化最终在1864年的土耳其省法律中反映出来。大部分巴勒斯坦都属纳布卢斯地区,阿克是贝鲁特省的一部分,地区和行政当局独立的耶路撒冷(不久成为大马士革省的一部分),处于伊斯坦布尔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各级官员均由土耳其人担任,等级分明。每位官员从属于他所在区的瓦利,而瓦利必须服从伊斯坦布尔的内务大臣。每一个等级的土耳其官员都在代表全体臣民利益的议会协助下行使统治权。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完全消除腐化犯罪,但它大大减少了各地统治者的粗暴行为,甚至使各派宗教团体能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一部分作用。1838年,埃及政府允许英国在耶路撒冷开设领事馆。20年后,所有重要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都在耶路撒冷委派领事代理人。他们通过领事代理人争夺保护权,以削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最终瓜分其国土。俄、法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1860—1890年,英法加强了对该地区的交通要道苏伊士运河的争夺,他们互不让步,扩张自己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势力。此外,英、德、美等国教区纷纷建立起教管区,如德国人划占教区达500多个。这一时期,随着邮船在中东地区的出现,巴勒斯坦和欧洲的正常通讯联系首先建立起来。1837年澳大利亚和法国获准在奥斯曼帝国的亚洲省份开办邮政服务。到了19世纪中叶,土耳其人的邮政服务取而代之。1865年,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其他重要城市建立起与帝国首都和欧洲的电报电讯联系,3年后耶路撒冷和雅法之间出现了第一条可供四轮马车行使的道路。道路和通讯的改进使朝圣和旅游人数增多,带来了新的经济收入。耶路撒冷的范围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大大扩展,成为巴勒斯坦最大的城市。

1800—1882年间的犹太人社团 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800—1840年和1841—1880年,前后情况有显著差别。前30年中,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腐朽黑暗达到顶峰。1840年后犹太人卷入与中东问题相联系的国际冲突中,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保护。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和文化影响也不断地扩大,这样就为巴勒斯坦犹太人政治复兴铺平了道路。哈伊姆·萨列姆·法希是一个古代的犹太人家庭的后代,他在巴勒斯坦的影响持续了20年。法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犹太人及穆斯林、基督教的负担。1820年他被阿贝道拉帕夏谋杀。这一时期,大部分犹太人居住在四个圣城——耶路撒冷、萨费德、太巴列和希伯伦。他们处在土耳其官员沉重赋税压榨下,受到海外犹太人募捐基金的资助。由于欧洲犹太人的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继续增长。随着敖德萨到雅法的轮船交通开辟及其他一些路线建成,迁徙浪潮呈上升趋势。巴勒斯坦对

东欧犹太人最富有吸引力。他们定期用轮船运载虔敬派信徒到耶路撒冷和其他圣城。1820年希伯伦建立起第一个东欧犹太人社团。该犹太人社团的发展被1837年的地震中断,1839年重新恢复,1841年拉比教派的社团建立以后迅速发展起来。雅法的犹太人大多来自北非,东欧犹太人从1857年的3户增至1874年的20户,该地犹太人总数达到500人。曾与耶路撒冷争夺精神霸权的萨费德在1837年地震时受到严重打击,2000名犹太人丧生,再也没有恢复以前的领袖地位。在争夺巴勒斯坦霸权的过程中,西欧列强都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产生很大兴趣。英国和俄国成为该地区犹太人的保护国。1849年圣地的俄国犹太人首领请求该地英国领事给予俄国歧视法造成的无国籍犹太人以保护。30年代后,俄国领事的态度有所好转,甚至在俄国国内迫害犹太人时给他们一定保护。当时,犹太人社团的讨论热点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至少是一个犹太人独立城邦。1839年摩西·蒙特菲奥访问巴勒斯坦与穆罕默德·阿里商谈,希望犹太人所欠埃及政府的大笔债务能获得豁免。虽然商谈毫无结果,但由于阿里在埃、土冲突中失败,于两国间建立一个犹太人缓冲国的主张得到支持。发起人是威尔逊·菲尔逊马什。阿伯拉罕·贝尼沙制定了详细计划,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被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威廉·杨格采用,获得蒙特菲奥和一些英国犹太人首领的支持。这一时期,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欧洲列强内部及犹太人内部矛盾严重,特别是内部冲突危害到正式巡回筹款员的工作。东欧犹太人数目逐渐超过西欧犹太人,新老社团都繁荣壮大起来。耶路撒冷的老城无法容纳众多移民,1861年犹太人在城外建起第一个新区,25年后新区数目达9个。经济状况基本保持不变。一些犹太人打算建立犹太人农业区,蒙特菲奥响应他们的要求,制定了关于这方面的具有长远意义的规划。他还与其他人合作,在圣地建立犹太人医院,并支持弗朗克1856年创办的拉梅尔学校。拉梅尔学校采取新型教学方法,由于教授欧洲语言,遭到许多东正教犹太人和世界各地学者的激烈反对,弗朗克只好把学校交给西欧犹太人管理。犹太人转向从事农业生产的步伐并没有放慢。1867年他们首次在莫察(耶路撒冷)购买了一块土地。1870年法国犹太人与当地犹太人合作创办了农业学校。1873年和1878年先后在莫察和佩塔提克瓦建起犹太人农业区。1881年时巴勒斯坦有1000名犹太人从事农业劳动,大部分人不再讨饭行乞;这种谋生方式还为更多的移民到来打开了大门,在犹太人历史上具有较为重要意义。

1880—1917年间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最后50年中,衰弱的王国继续抵制西欧列强在该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采取各种措施来巩固自己的地位。1902年贝尔谢巴重建起来,成为政府驻地和政治堡垒。1908年尼察

纳也成为一个政治中心。促使奥斯曼帝国加强法律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路的兴建。从耶路撒冷到雅法、纳布卢斯、希伯伦的公路于80年代时建成。从耶路撒冷到雅法的铁路干线以及与汉志铁路(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麦地那)相联系的海法—德拉干线分别由法国人和德国人建成。1878年,根据巴尔干战争的决议,制定了一项特殊法令鼓励穆斯林移民定居在苏丹的土地上。其中摩洛哥人住在加利利,切尔克斯人住在君士坦丁堡和加利利,波斯尼亚人住在凯撒里亚。同时,就外国购买土地问题作了严厉限制。而欧洲列强也利用屈服的政权增加他们在各地区的立足点。英国1882年占领埃及以后,奥斯曼帝国主要同德国缔结友好关系,并随着德皇凯撒·威廉二世和皇后凯瑟琳访问而得到加强。他们在耶路撒冷受到热烈欢迎。这次访问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影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欧洲人大量涌入,迫使土耳其政府采取措施加强统治秩序,以防止欧洲列强找到借口干涉它的国际事务。

1880—1917年间的犹太人社团 1880年国内犹太人达2万多名,其中2/3的人住在耶路撒冷。另外几个圣城也有些小的犹太人社团:萨费德4000人,太巴列2500人,希伯伦800人,雅法102人,海法300人。西欧犹太人是社会中原有组成部分,又吸收了来自北非、布哈拉和波斯等地的移民。东欧犹太人分为两派,他们都靠国外犹太人募捐的基金维持生活,基金一年可达10万英镑。西欧犹太人中,钱由首领分配,受济者主要是研究犹太教法典的学者和遗孀孤儿。东欧犹太人中,资金由犹太人移民会众管理。也有相当多人过着贫困生活。尽管犹太人是一个被承认的团体,他们的首领拥有一定的职位,但他们地位低下。特别在东欧犹太人中,很多人寻找外国领事的保护。大多数犹太人是正统的东正教徒,接受领袖拉比的统治。拉比反对所有现代化趋势,抵制欧洲的变革的风气。国外犹太人慈善家的帮助只有在在不使传统生活方式卷入任何变化时才会被接受。人们可以自由的筹建房屋、创办医院和犹太教学校,但如果要建现代化学校或培训农业和手工艺方面生产人员,就会遭到犹太人慈善基金会首领的强烈反对。不过,也有些人是自力更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发行的第一份报纸的编辑和萨费德、佩塔提瓦克附近第一个犹太人居住区的创建者。巴尔干战争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建议被重新提出。劳伦斯·奥立芬特的计划是其中的代表。他于1879年访问巴勒斯坦,还曾就自己的计划与苏丹进行谈判。1881年起由于沙俄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出现了犹太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浪潮(参见“阿利亚”)。土耳其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限制,但未能阻挡大规模的迁徙。这次阿利亚中出现了移民和传统犹太人的矛盾,最终得到解决。第一次阿利亚及其以后,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了一系列进步,但依然面临着巨大精神危机。他们意识到要

迅速发展就必须取得政治地位。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召集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成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俄国和欧洲的代表共同参加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创建,赫茨尔任主席,通过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纲领,明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由公法保障的犹太人家”。赫茨尔进行各种政治活动,试图说服土耳其政府同意。经过几年谈判,赫茨尔对土耳其政府不再抱任何信心。英国政府向赫茨尔提议在东非的一块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的安置地。赫茨尔和西方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倾向于接受这个提议,但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表示强烈反对,造成运动分裂的危险。最后,1905年、即赫茨尔死后不久召开的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拒绝了在东非建国的提议,重新肯定非在巴勒斯坦建国不可。1904—1914年掀起了第二次犹太人迁徙高潮。巴勒斯坦呈现出复兴景象。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在马其顿发动革命,结束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尽管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运动没有能完全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首领和成员的愿望,但从此可以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勒斯坦公开活动以获得公众舆论的支持。阿拉伯人采取各种措施阻止犹太人移民定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努力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达成某些协议。这些协议引起土耳其人的怀疑,他们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是分裂运动,1913—1914年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反而有所改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勒斯坦处于一片混乱和灾难之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是遭遇悲惨。大战结束了奥斯曼帝国401年的统治,巴勒斯坦自此又沦为英国的保护区(参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巴勒斯坦战场”),与武力征服相配合。1917年11月2日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宣言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协约国主要国家的赞成。巴勒斯坦在国际事务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奥德茨 (Clifford Odets, 1906—1963) 美国犹太剧作家。出生于美国费城,父母均是来自立陶宛的犹太居民,家境贫困。6岁时,全家来到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落脚定居。奥德茨中学只念了两年便中途辍学。起先在父亲开办的印刷厂做工,后因对戏剧的兴趣,进剧团当演员,并开始学写剧本。1930年加入著名“同仁剧社”既当演员又从事创作。一度加入过美国共产党。1934年写出了独幕剧《等待老左》,1935年该剧搬上舞台获得成功,奥德茨一举成名。1939年,受好莱坞聘请,从事电影剧本写作,并在那里定居,直至病逝。

奥德茨一生贡献主要在剧本创作方面。除《等待老左》外,还写下了《醒来歌唱》(1935)、《快乐园》(1935)、《天之骄子》(1937)、《发向月球的火箭》(1938)、《大刀》(1949)、《乡村姑娘》(1950)、《盛开的桃花》(1954)等剧本。

《醒来歌唱》和《天之骄子》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1939年,兰登书屋的“现代文库”将他的6部剧作汇编成《奥德茨剧作六种》出版。

奥德茨的剧本以表现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现实为主,具有明显的左的倾向,因而作者本人被尊为30年代左倾戏剧运动的杰出代表。作为犹太人,他十分关心30年代犹太人的生活,不少剧作都以反映犹太移民生活为题材,特别是以普通犹太市民日常生活为主的《醒来歌唱》,以深切的同情,再现了犹太人与命运抗争的生活和具有的伦理道德。1961年,奥德茨获得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奖。

奥默 犹太历上一段时期的名称。来源于希伯来语,最初的含义指:在逾越节第二天带到耶路撒冷圣殿作为献祭的一捆新麦。一奥默的重量只相当于2.2市斤,因此是很低微薄的一种献祭。然而,在奥默带给圣殿中的祭司以前,新麦是不能吃的。《圣经》上规定献上这一收获的献祭日期是“安息日”的次日。这曾在法利赛拉比和撒都该派之间引起一场争论。法利赛拉比把规定中提到的安息日解释为逾越节的第一天,即尼散月16日;而撒都该派则认为指的是每周正常的安息日。由于《圣经》中接着又规定:“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利未记》第23章第15节),也就是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为七七节,因此撒都该派坚持认为七七节应该落在某一个星期日,即从逾越节后那个星期日算起的整整7周。由于这一不同的解释,后来的拉比强调即便尼散月16日正好是安息日,也必须开始收割新麦。收割日到来时人们常常要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发表一系列公告。这一活动目前在以色列国的乡村得到恢复。

圣殿被毁以及所有献祭活动停止后,在逾越节和七七节之间计数日期的事归拉比掌管。从尼散月16日傍晚开始到7个星期结束期间,每一天都要单独计数,在这些称之为奥默期的日子里,每天都要提及天数和周数。计数在晚仪式中进行。后来这一习俗在犹太会堂中发展成一种新的礼仪形式,即在会堂的墙上挂出标有计数奥默日期的日历。

尽管这一计数习俗源于《圣经》中的规定,但不同时期的拉比在解释其含义时往往强调它与圣殿后时代犹太人的关联。迈蒙尼德的解释是:犹太人在逾越节和七七节期间每日计数的做法表达了人们希望庆祝七七节的迫切心情,因为七七节是庆祝上帝显现,将《托拉》交给犹太人的纪念日。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它的意义在于:犹太人认为在庆祝犹太人获得《托拉》的七七节到来之前,逾越节所象征的自由就不是完全的自由,因为没有律法的自由是靠不住的。奥默计数是把自由与律法联系起来的一座象征性桥梁。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默时期的七周为悲痛和悼念气

氛所笼罩。一些与此有关的习俗发展起来,例如在此期间不能穿新装,不能理发等。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众说纷纭。《塔木德》暗示这与著名拉比阿吉巴的2万4千名学生在这期间因瘟疫死亡事件有关。由于这正好发生在巴尔·科赫巴反对罗马统治起义期间,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犹太人起义被镇压一事的纪念,所谓瘟疫之事只是一种托辞,以便能在罗马人统治情况下公开表示悼念。

根据拉比法,在奥默时期,虔诚的犹太人不得理发、剃须,不举办隆重的婚礼,不举行公众庆祝活动。早年不受这些限制的日子有新月节,拉·巴—奥默节(即奥默的第33天),20世纪40年代增加的日子有以色列独立日(以珥月初五)和耶路撒冷节(以珥月28日)。

逾越节 犹太教三大朝圣节期之一。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该节日可以一直追溯到希伯来人的游牧时代,很可能还是闪族牧民共有的节日,但它今天所具有的特别宗教意义却是来源于《圣经·出埃及记》。据《圣经》记载,因饥荒逃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后人口增长很快,势力也随之扩大,为此引起埃及统治者法老的恐慌,遂下令将埃及境内的以色列男婴统统杀尽,以免其繁衍后代。同时,对以色列成人进行强制性奴役,罚其终身苦役,致使以色列人处境十分悲惨。上帝得知他的选民竟遭受如此之苦难,命令摩西率领以色列人举族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迦南定居生活。谁知,法老不愿失去为其服务的奴隶,有意刁难,不让以色列人离去。在上帝的授意下,摩西和亚伦先用魔杖威力变蛇、变水为血和蛙灾,后用虱子、苍蝇、兽疫、烂疮、雹子、蝗虫和黑暗等灾难威胁法老。尽管灾难降临时法老同意让以色列人离开,但灾难一消除,法老又出尔反尔。上帝大怒,决定用第十灾,即杀死埃及地所有长子和一切头生牲畜的办法迫使法老屈服。为了防止错杀以色列人,上帝命令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事先在自家的门楣和门框上涂抹上羊血,上帝见有羊血的人家就“逾越”过去。果然,上帝在尼散月(公历4月前后)14日晓击杀埃及境内头生人畜时,以色列人全都安然无恙。法老慑于上帝的威力,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色列人为感恩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把每年尼散月14日起的七天定为逾越节。

今天逾越节是整个犹太民族不忘历史,缅怀祖先,倾诉苦难,庆祝在上帝恩眷下摆脱苦难,获得自由的日子。节日最隆重的活动是举行逾越节家宴,席间食用有象征意义的各种食品,并通过诵读《哈加达》讲述和回顾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

逾越节不仅是犹太人最古老的节日,也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以色列国内和改革派犹太人中间为期七天,其他犹太人则庆祝八天。在节日期间,人们不吃面包,只吃无酵饼。有的人还穿上白色亚麻布衣服,表示喜庆、欢乐、神圣、宽容。以色列人还利用这一节日去耶路撒冷圣

殿山和西墙朝圣。

逾越节的羔羊

以色列人出埃及前第一次过逾越节时所宰的羔羊。据《圣经·出埃及记》载，摩西召集以色列的众长老，对他们说：快回自己家中，把羔羊宰了，再拿一把牛膝草蘸上盆里的羊血涂在门楣和两边门框上，天不亮人不要走出门外，上帝将到埃及各地去打击埃及人，他看见门楣和门框上的羊血，就会越过这门，不让杀戮者进你们的屋子杀害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子孙都要时刻恪守这一诫律。这样上帝以羔羊的被杀保证了以色列人的平安。为了感恩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每年尼散月14日起的七天为逾越节。现代犹太人在过逾越节时已用烤羊胫骨代替宰杀羔羊。

逾越节家宴

犹太人在庆祝逾越节时吃的第一顿晚餐。家宴于犹太历尼散月15日(公历4月前后)举行。正统犹太人家要使用一套专供逾越节使用的餐具。晚餐上每人喝四杯酒，开始和结束各一杯，席间两杯。四杯酒纪念祖先在埃及受的苦难以及在上帝的指引下，摆脱奴役，回到迦南地的历史事件。家宴开始时，家长着白袍，举杯为节日祝福，这是要喝的第一杯酒。全家人洗手，家主把生苦菜或其他生菜蘸醋或盐水分给每一位用餐人。然后，将象征古代逾越节供品羔羊的羊胫骨和煮鸡蛋自特殊的逾越节家宴盘中取出，人人诵祷文。斟满第二杯酒，家中最年幼者就此节日礼仪分别提出四个问题：今晚为什么不同于其他夜晚？为什么只吃无酵饼？为什么吃生菜时要蘸盐水？为什么今晚倚着椅背吃？全家人依次诵读《哈加达》，复述《出埃及记》中有关犹太人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的故事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回答完毕后，喝第二杯酒。随后，全家人再次洗手，分食无酵饼和蘸有酒酿果酱的苦菜，然后开始上主菜。主菜用毕，家中年幼者要找出事先藏起来的半块无酵饼，作为甜食全家人分食。这半块无酵饼象征古代在家宴时所食的逾越节羔羊肉。接下来，斟第三杯酒表示对上帝的恩惠的感谢。全家人在齐诵《颂赞诗篇》声中，将这杯酒一饮而尽。接下来，斟第四杯酒，同时将桌上的以利亚杯斟满。打开家门，诵读一段欢迎先知以利亚光临的祷词，据说以利亚很可能会突然出现在逾越节的家宴上，预报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家宴在饮完第四杯酒后，在“明年相聚在耶路撒冷”的祝词中结束。

鲁宾 (Arthur Ruppin, 1876—1943) 巴勒斯坦安置委员会主任，犹太社会学家。生于普鲁士一个犹太人之家。青年时代学习法律。1903年，在法庭当记录官，同时兼任由阿尔弗雷德·诺西格创立的犹太数据及人口统计局主任职务。1904年，他利用收集到的资料数据，出版了一部论述当时犹太人状况的著作。这是有史以来发表的第一部研究犹太人的社会学书籍。对犹太人状况的

研究使他开始接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08年，他被委任为设在雅法市的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在那里，他创建了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PLDC)。在随后的6年中，他积极参与了在巴勒斯坦发展起来的各项犹太人事业，其中包括伊休夫的创立、对第二次进入圣地运动移民的安置、第一个基布兹的建立、新兴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的建设等。

1916年，他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人士一道遭到土耳其军事当局的驱赶，被迫离开巴勒斯坦。他来到君士坦丁堡，在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在土耳其设法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筹措资金。1920年，加入魏兹曼设立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1921年至1935年间，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农业定居、城市住房开发、工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他还将许多亚热带水果引进伊休夫。

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以后，他主要负责安置从中欧涌入的大批犹太难民。30年代后期，他重新操起自己早年进行的研究和写作，成为希伯来大学犹太社会学系教授。

从1925年起，他一直是巴勒斯坦著名团体——保障和平组织的重要人士，致力于犹太—阿拉伯合作运动。

为了纪念他对犹太人事业所作的贡献，以色列贝特谢安山的一块谷地、沿海地区的一所农业学校，以及德加尼亚一座植物园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主要著作有《犹太命运与犹太前途》(1904)和《巴勒斯坦30年》(1936)。三卷本自传《我的一生与工作》在他身后出版。

鲁宾斯坦 (Arthur Rubinstein, 1887—1982)

波兰犹太钢琴演奏家。生于波兰。3岁开始弹钢琴，从师多人，曾在华沙学习钢琴弹奏技法。1895年，在著名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建议下去柏林学习。11岁时在柏林举行首场个人演奏会，获得成功，被人们誉为音乐神童。1906年，首次到美国旅行演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协约国演出过。2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名声。1937年移居美国。1946年取得美国国籍。晚年除了在数部影片中参加演出外，还去各地巡回演出。90岁时，美国电视台为庆祝他的生日，特别为他安排了一场专题演奏会。1976年，荣获美国自由勋章。

鲁宾斯坦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钢琴演奏家之一，艺术生命也最长。他对钢琴曲目的独特和精深理解使他闻名遐迩，而他对肖邦钢琴曲和西班牙作品的解释和技法处理更是无人可以与之媲美。他的演奏以线条异常清晰、充满睿智和热情著称。他曾多次去以色列演出，所得收入全部捐赠希伯来大学音乐系。他著有自传《我的年轻时代》和《我的许多岁月》。

普利策 (Joseph Pulitzer, 1847—1911) 美国犹太报人，报业界巨头。生于匈牙利，在布达佩斯长大。

17岁移居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曾在联盟军中服役。复员后学习法律,21岁获得开业许可。但他不满足这一职业,而转向报业。起先在圣路易斯一家报馆当记者,后成为该报编辑、拥有人。1819年,当选为密苏里州议会议员。1871—1872年筹组密苏里州自由共和党。1878年买下一家濒临歇业的报馆,改办成《圣路易斯邮报快讯报》。5年后,该报在他的经营下一跃成为全美最成功的报纸。一年为他带来收入达15万美元。此后他又买下《纽约世界报》,并把该报办成全美国最有影响和赢利最丰的报纸,终于使其成为美国报业巨头和权威人士。他的成功秘诀在于锐意创新,努力改进办报方针,把报纸办成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读物。由于操劳过度,晚年双目失明,但他从未放下自己的事业。

事业上成功的普利策十分慷慨,生前向哥伦比亚大学赠款2百万美元创办新闻学院和设立普利策奖金。自1917年起,该奖每年5月颁布,授予新闻界和文学界中为众服务成绩突出和成就卓著者,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奖金之一。普利策作为这一奖金的捐赠人也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普珥节 犹太节日。为纪念以色列人由于以斯帖王后的勇敢和机智,挫败哈曼企图把波斯全境的犹太人斩尽杀绝的阴谋而设。时间为亚达月14、15日两天。普珥节的故事出自《圣经·以斯帖记》:波斯宰相哈曼为人生性残暴,立意灭除全波斯犹太人,并用抽签方式确定屠杀日期为亚达月13日,但由于犹太女子以斯帖以其智勇说服国王,不仅及时粉碎了哈曼的阴谋,而且将哈曼及其同党、家人一举斩尽杀绝,从而解除了犹太人面临的灭顶之灾。为庆祝胜利,定亚达月14、15日为普珥节(“普珥”在波斯语中意为“抽签”)。

普珥节前一天,正统犹太教徒要禁食一天。在普珥节这天,犹太会堂要举行特别仪式,宣读《以斯帖记》。每当哈曼的名字被提及,参加宗教仪式的孩子都要用竹条,或棘轮发出“唯啪”声,以示对他的谴责。

《圣经》规定:“在这两日设筵欢乐。”为此,每逢普珥节来临,人们都要设宴,开怀畅饮。同时,家家还要点起灯火,举行各种各样庆祝活动,其中最常见的是篝火晚会,年轻人带上面具,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尽情狂欢。故亦有人称之为犹太人的“狂欢节”。

《尊崇道经寺记》碑 记载开封犹太人历史石碑。又称《正德碑》和《第二通碑》。石碑立于明朝正德七年(公元1512)。碑文共有字28行,每行44字。今存开封博物馆。碑文全文如下:

赐进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参议江都左唐撰文

赐进士出身徵士郎户科给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

高书丹

赐进士出身徵士郎前吏科给事中维扬徐昂篆额

尝谓经以载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纲五常,小而事物细微,无物不有,无时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经无以存,经匪道无以行,使其无经,则道无载,人将贸贸焉莫知所之,卒至于狂淡而窃冥行矣。故圣贤之道,垂六经以诏后世,迄于今而及千万世矣。至于一赐乐业教,始祖阿耽,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经传焉。道经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之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无罗汉,为之教祖;于是七撮传经,为之师法。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刹也,以为尊崇是经之所。业是教者不止于汴。凡在天下,业是教者,靡不尊是经而崇是道也。

然教(按照碑上原文)是经文字,虽与儒书字异,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于父子,父慈子孝;道行于君臣,君仁臣敬;道行于兄弟,兄友弟恭;道行于夫妇,夫和妇顺;道行于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于仁义,行之自有惻隐羞恶之心;道莫大于礼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于斋戒,必严必敬;道行于祭祖,必孝必诚;道行于礼拜,祝赞上天,生育万物。动容周旋之际,一本乎诚敬也。至于鳏寡孤独,痲瘖残疾者,莫不周恤赈给,俾不至于失所。贫而娶妻不得娶,与葬理不能葬者,莫不极力相助,凡婚资丧具,无不举焉。及至居丧,禁忌荤酒,殓殮不尚繁文,循由礼制,一不信于邪术。下至权度斗斛,轻重长短,一无所欺欺于人。

求观今日,若进取科目而显亲扬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乡者亦有之矣。逮夫农耕于野,而公税以给;工精于艺,而公用不乏;商勤于远,而名著於江湖;贾志于守,而获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畏天命,守王法,重五伦,遵五常,敬祖风,孝父母,恭长上,和乡里,亲师友,教子孙,务本业,积阴德,忍小忿,戒饬勉之意,皆寓于斯焉。呜呼!是经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是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义礼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态,绘之以形色者,徒事虚文,惊眩耳目,此则异端之说,彼固不足尚也。然而尊崇于经者,其知所本欤!

道经相传,有自来矣。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传之女媧(挪亚),女媧传之阿无罗汉,罗汉传之以思哈威(以撒),哈威传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传之十二宗派,宗派传之七撮,七撮传之阿呵联(亚伦),呵联传之月来窝(约书亚),来窝传之孺子喇。于是祖师之教,灿焉而复明。故凡业是教者,其惟以善为师,以恶为戒,朝夕警惕,诚意修身,斋戒节日,饮食可匡,于经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则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称,家家遂俯育之乐。如此,则庶于祖教之意无所负,而尊崇之礼无少忒

矣。刻石于寺,垂示永久,咸知所自,俾我后人其慎念之哉。

大明正德七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俺、李、高、维扬金涛请道经一部,立二门一座,宁夏金润立碑亭一座,金钟修撰碑亭。镌字张鸾、张玺。

道经 中国犹太人对犹太教经典《托拉》的称呼。本称《正经》,取“正而无邪”之义。明正德七年(1512年),中国犹太人在《尊崇道经寺记》碑上,借用儒家“经以载道”之义,便称为《道经》,并且把清真寺的名字也改作“尊崇道经寺”。有人亦称为《天经》,或《圣经》。古代中国犹太人的《道经》以希伯来文,用特别的笔和墨,写在经过特别鞣制的羊皮上,故又俗称“羊皮写经”。

一赐乐业教开封清真寺旧存《道经》13部。其中一部,寄念“圣祖”摩西;其他12部,寄念12支派。每部《道经》为53卷。明天顺年间(1457—1464)取自东海之滨的宁波(现在浙江宁波市)。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开封遭受历史上的第二次毁灭性水灾,中国犹太人一赐乐业教清真寺连同13部《道经》,全部沉沦泥沙。清顺治十年(1653年),中国犹太人重建清真寺,并把从泥沙中捞获的残经加以考订补缀,重新修复13部《道经》的旧观。这就是著名的现在仍然存世的“一赐乐业教的《圣经》”。其中3部下落不明,其余10部,分别保藏在英国、美国以及奥地利等国家。

割礼 犹太教重要仪式之一。行割礼就是用刀子割损犹太男孩阴茎包皮。关于割礼的原始意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但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割礼是男子最初进入成年的标志。有关希伯来民族割礼的记载最早见于《创世记》。在亚伯拉罕中年以后,上帝为之易名,并与他立约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紧接着就出现了有关割礼的记载:“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这段材料概括了早期以色列民族有关割礼的基本规定和基本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即割礼是上帝与亚伯拉罕和其后裔所立的约,所以是非常严格,不可违背的。其次,割礼是上帝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立约的证据,是在男人的肉体上为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作证。既然割礼是同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的“立约”相联系,这“约”的中心是:“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对未来犹太教

的发展来说,对割礼影响最深刻的就是“祝福”的观念。上帝因亚伯拉罕而祝福其子民与世上万族万国。因此,犹太教规定犹太男子必须行割礼。族长时代以色列民就已行割礼。这一点《创世记》就有记载:当雅各家族从哈兰回到迦南定居后,他们暂时在示剑城支搭帐棚。哈抹的儿子示剑玷污了雅各与利亚所生的女儿底拿。雅各和众子把这件事引为奇耻大辱。但示剑非常贪恋底拿,他向雅各求婚。雅各众子对他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事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于是全城的人都听从示剑和他的父亲哈抹受了割礼。到了第三天,正当示剑全城男丁疼痛难忍的时候,雅各众子就杀了他们并掳掠全城。这个故事虽然说的是雅各众子以诡计诱杀示剑人,但它也反映了这样一个观念,即雅各家族把割礼看成反映家族身份的标志,所以只要行了割礼,就会成为“一样的民”,这一观念对于未来犹太教和未来的希伯来民族史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正在进行中的割礼

在埃及期间,希伯来人大部分仍然继续行割礼,但摩西生下来后,就被匿在法老的王宫里,所以他未行割礼。后来摩西的妻子西坡拉赶紧为摩西补行割礼。这个记载说明希伯来人在埃及数百年间基本上遵循了行割礼这一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出埃及在旷野期间,人们一度放弃这种风俗,进入迦南后,又恢复行割礼。其后此种仪式愈来愈严格化、规范化、制度化。到了公元前后已成为犹太教和犹太人最显著的标志。割礼因此是犹太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举行割礼时,通常要邀请亲朋好友到场,以示欢庆。割礼手术最初由婴儿的父亲来施行,后来,逐渐由受过专门训练的行割礼者代替。现在,在以色列,由官方指定的专职行割礼医生来做。仪式进行时,婴儿由教父抱住,婴儿的父亲吟诵一段特别的祈祷

词：“赞美你，我们的上帝，宇宙的主宰。你用圣谕使我们圣洁，你命令我们的孩子入我先人亚伯拉罕的约。”手术后，行割礼人拿着一杯酒吟诵祈祷词，并当众第一次宣布孩子的名字。在场的亲朋好友以祷词“他立了约，因此进入了《托拉》，进行婚姻的许可范围”表示祝贺。

此外，皈依犹太教的男子也要在入教时施割礼，以示与上帝立约，同时，标志犹太人身份的获得。

富华 (Arrigo Foa, 1900—1983) 意大利犹太小提琴家、指挥家。生于意大利的都灵与米兰之间的小城韦尔切利，卒于香港。12岁时入米兰音乐院，1918年在该院毕业时获得首奖。1979年组成三重奏组，到意大利各大城市巡回演出。1921年受聘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该乐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早在1879年已成立，原名上海公共乐队，是中国最早建立的交响乐队专业演奏团体。富华在这支当时已有“远东第一”之称的交响乐队的经历达30余年，从乐队首席、独奏演员、副指挥至1942年担任指挥，再至1952年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对乐队规模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起过相当的作用。当时乐队每星期举行音乐会。由此推算，以他担任乐团首席或指挥而举行的音乐会场次，当以千计，而曲目的广泛，从巴赫、亨德尔到斯特拉文斯基、理查·施特劳斯，从穆索尔斯基到法利亚，更不知凡几。他具有一个优秀指挥家的必备条件，如敏锐的绝对音高、节奏和平衡感，精湛的指挥技巧和对乐曲的深邃理解。除在乐队工作外，他还担任“雅乐社”的指挥。这是一个拥有30年历史和120名社员的合唱团体。

富华在音乐教学上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最早独立建制的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创办不久，他就参加了该院的教师队伍。当该院在1929—1930年间分设小提琴等五个组时，他担任了小提琴组主任。长期以来，他凭其精湛的技艺和严格的要求，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小提琴学生，最早期的如戴粹伦、陈又新、徐锡绵。富华的演奏，曾由上海的高亭公司灌制过几套78转唱片，如上海工部局乐队演奏、梅百器指挥、富华小提琴独奏的法利亚之《爱情——魔法师组曲》，和富华独奏、钢琴伴奏的短曲选萃，内容有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和克莱斯勒的《美丽的罗丝玛琳》等。

谢克特 (Solomon Schechter, 1847—1915) 《塔木德》经典考证家，美国犹太教保守派领袖。生于罗马尼亚。早年在维也纳拉比经学院学习犹太经典，后在柏林研究《塔木德》文献。1882年前往英国，先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讲授《塔木德》和拉比犹太教。在侨居英国期间，他在研究从埃及开罗送来的希伯来文残稿时发现这些文稿是失传的希伯来文本《传道书》的部分章节内容。他于1896年前往埃及作实地考察，终于在开罗古以斯拉

犹太大会堂的秘库发现了近14余万页古代和中世纪希伯来文手稿，其内容包括犹太礼仪、律法、商业、文学和犹太经典片断。这些手稿的发现大大地促进了对中世纪巴勒斯坦历史和古代犹太人历史的研究，为犹太教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谢克特本人因此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

1902年，他前往美国，担任设在纽约市的美国犹太教神学院院长一职。在任期间，他成功地吸引了大批著名学者来神学院任职从教。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犹太教神学院一直发挥着双重作用，在为美国犹太人培养神职人员的同时为科学研究犹太教开辟道路，很快成为国际著名犹太学研究学者。1913年，谢克特负责创建美国协和犹太会堂，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犹太教保守派运动的发展和壮大。

谢克特的第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发表于1887年，是一部评论纳旦父辈观的评注作品。该作品现已成为现代拉比犹太教的一部经典。1909年，他根据当年在剑桥大学讲课的讲义撰写了一部名为《拉比神学若干方面》一书，以犹太人的历史为依据，对历史上的法利赛派进行了重新评价。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论述犹太教、拉比神学，以及与犹太人日常生活有关的文章。谢克特一贯坚持捍卫犹太传统价值的立场，尽管他赞成对犹太教实行改革，以适应现代犹太民众的社会需要，但他反对在改革过程中抛弃犹太传统和犹太教的精髓。作为一名犹太教保守派领袖，他积极支持以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为目标的犹太复国主义，他认为一个复活了的犹太人国家只会使犹太民族的历史愿望得到实现，而不会影响犹太教的救世信念。

谢斯托夫 (Lev Shestov, 1866—1938) 20世纪犹太哲学家。原名为莱夫·伊萨科维奇·施瓦茨曼。生于乌克兰的基辅。其父是位殷实的犹太商人，虔信犹太教，爱好希伯来文学。谢斯托夫在父亲影响下从小接受犹太教育，学习希伯来语。青年时代在基辅大学预科班学习，因卷入学潮，被当局开除学籍。后去莫斯科读完大学预科，进入莫斯科大学。最初学习数学，后改学法律。由于再次卷入学潮活动。中途退学。1889年在基辅一地方大学毕业，获法学博士候选人资格。从大学时代开始，便对社会、经济问题发生兴趣，其博士论文主要论述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尽管论文通过学位评审委员会组织的答辩，建议授予博士学位，但莫斯科的学位审查委员会认为其论文内容过于激进，否决了评审委员会授予博士学位的建议。谢斯托夫终未获得博士学位，只获开业证书，准许在圣彼得堡开设法律事务所，但此时他对法律完全失去兴趣。离开学校后，进入父亲的纺织公司，协助父亲管理公司事务。夜晚阅读文学作品，撰写评论文章。其中不少发表在当地报刊上。1895年，在为父亲的公司奠定了坚实

财政基础后,去意大利游历、学习。1898年,在瑞士定居,从事文学批评方面的写作。同年第一本论著出版。到1914年,出版的专著达六部之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俄国生活,与俄国思想家、哲学家交往甚密,并开始撰写哲学方面著作。1918年在基辅人民大学讲授希腊哲学。一年后移居巴黎,在当地一学院任哲学教授。在这期间埋头于哲学研究。1923年,他的第一部哲学专著出版。这是一部论述宗教和哲学的论文集。1929年,他的另一部哲学著作《约伯的天平》发表,重点评论欧洲著名思想家的哲学观点。1937年,他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雅典与耶路撒冷》发表。这是作者经过20余年的思考后完成的一部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被认为是20世纪犹太哲学的经典。谢斯托夫在对自古希腊以来伟大哲学家的著作进行系统考察后,提出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使人重新获得上帝在造人时所赋予的自由。

谢斯托夫的著作主要由俄文写成。生前,他曾亲自主持部分作品德文和法文本的翻译工作。由于他在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他与罗森茨维格和布伯一道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

隔都 城市中的一条街或一个街区,分出来作为强迫犹太人居住的法定地区。这一称呼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意大利。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以法律手段在威尼斯市铸造枪炮工厂周围划出一个街区,强行迫使该市的犹太人居住其中。居住区四周筑有大墙以将其与城市其他部分隔开,出入口派有基督徒看守。对这种隔离区,人们冠之以“犹太隔都”。随后,人们便习惯上将所有政府当局开辟的犹太人居住区称为“犹太隔都”。

犹太隔都(ghetto)一词尽管与意大利语中的铸造厂geto有关,但一般认为它来源于希伯来语ghet(隔离)一词。它形象地表明了犹太人在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生活诸方面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与非犹太社会的交流渠道遭到堵塞的历史现实。

在基督教统治的国家 严格来说,设立犹太隔都的想法来源于基督教会希望孤立、羞辱、隔绝犹太人的思想。当4世纪罗马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来,一个漫长的,排斥异己的基督教会时代便已经开始;强迫犹太人受洗,或加以孤立迫害便是基督教会对付犹太人的一贯方针。从中世纪以来,教会就一直设法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居住、生活在一起。

另一方面,为了保持自己的习俗和信仰,犹太人常常愿意与信仰其他宗教的居民分居。当时欧洲较大城市中几乎都有主要为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这些地区习惯上称为犹太区、犹太巷、犹太街等。犹太人对于分配给他们的单独居住区当做一种恩惠,因而常常是欢迎的。然而,这时的犹太区绝不同于后来教会当局和地方政府用法律手段强迫犹太人在其中居住的隔都,它是在自愿基础上组

成的,犹太人既可选择住在其中,也可以选择不住在其中。实际上,在隔都强行设立以前,总是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生活在犹太区外,另外,也有一些非犹太人住在犹太区内。用法律强迫隔离犹太人的事发生在12世纪末。1179年召开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上,基督教会第一次用法律条文的形式禁止犹太人与基督教信徒居住在一起。这一禁令最初只在一部分地区得到执行,如1276年后的伦敦。但到了14、15世纪,对犹太人强行隔离的做法已遍布欧洲。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和布拉格的犹太隔都在历史上都很有名。在波兰和立陶宛,由于犹太人口众多,许多城镇的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占据了全部街区,这样的城镇往往被叫作犹太人居住区。在俄国,犹太人定居区则是在西部若干省中的特定区域。

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发布命令,在罗马和罗马教皇统治的国家内限制犹太人居住范围,强令犹太人永远佩带犹太人标志,严禁他们与天主教徒交往。根据这一命令,这一年的7月26日,正逢犹太历阿布月初九,罗马城的犹太人被强迫迁入在台伯河左岸设立的犹太隔都,该地区随后被大墙围住,与城市其他地区隔开。不久,这一做法便为罗马教皇统治下的所有地区所采用。“隔都”一词也为众人所知晓。

一般说来,当局不允许犹太隔都扩大范围,即使碰上人口激增也是如此。因此,犹太隔都中常常人满为患,住房异常狭窄,卫生条件极差,住房越盖越高,致使犹太隔都成为一个城市中建筑物最高的一个地区。火灾危险越来越大,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损失惨重的重大火灾。

根据罗马教廷的法令,隔都只允许有一个大门。但实际上往往有2—3个供进出的大门。看守大门的人必须由基督徒担任,其工资由犹太人支付。每天夜间或每逢安息日、犹太节日、基督教节日,隔都的门都得锁上。按规定犹太人在夜晚和基督教节日期间是不允许跨出隔都一步的。

18世纪末,对犹太隔都的严格管制开始放松。当1796年,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开进意大利时,所有犹太隔都的大墙都被法国士兵推倒,隔都制也同时遭废止。尽管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意大利又一度恢复隔都制,但规定已不象先前那样严格,只有罗马等少数地区在隔都四周筑起大墙。随着意大利自由派地位的加强,隔都制再次被废止。1848年,罗马城的犹太隔都大门被捣毁。当1870年法国再次占领罗马时,西欧地区的犹太隔都被彻底废除。东欧尽管还存在着犹太居住区,但那里的犹太居住区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与西欧的,特别是意大利的犹太隔都,有着极大的差别。

在穆斯林统治的国家 早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这一地区的各民族就常常按各自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分开居住。在城市中便形成了不同民族生活栖身的居民区。在穆斯林占据统治地位后,许多其他民族纷纷改信伊斯兰教,

原先的居住区也渐渐消失,唯有犹太人例外,因此,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便显得格外突出,同时也一直保留下来。在穆斯林国家的犹太区与基督教国家的犹太隔都在形式上几乎很少有相同之处。既没有大墙围绕,也没有门楼,故从不在夜间、安息日、节日关闭。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除了也门以外,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并没有被强制与其他居民隔离。即使在有犹太区的城市中,犹太人也可以或是单独,或是几户一群在其他地区居住。中世纪以来,有许多巴格达的犹太人一直居住在城市中两个犹太区以外的地方,并拥有自己的住房。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犹太人主要是与其他居民混居,只是在基督教化后,西班牙才开始推行建立犹太隔都的做法。

然而,在其他时期和其他地区,情况有所不同。11世纪的埃及,就曾发生过强迫开罗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区居住的事件。在穆斯林世界东部,犹太人被迫住进类似欧洲犹太隔都的地区。在波斯、阿富汗以及毗邻地区,专供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不仅由大墙包围,而且不允许犹太人在居住区以外的地方开设商店做生意。摩洛哥是穆斯林国家中最早,也是最严格执行隔离制度的国家。那里的犹太人早在1280年就被强行送到非斯城南的犹太隔离区居住,隔离区既有大墙围着,又有士兵把守,与后来在意大利出现的犹太隔都毫无二致,只是名称不同,被叫做“米拉赫”。摩洛哥的“米拉赫”历史漫长,直至20世纪初才渐渐废止。1679年起,生活在也门的犹太人被迫从他们生活了若干世纪的城镇逐出,集中到郊外的特别区域居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此外,穆斯林的圣地麦

加、麦地那也一直禁止非穆斯林居住。

犹太隔都和特别犹太区的建立与强制实行佩带犹太标志的做法如出一辙,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社会接触、往来,是非犹太人社会对犹太民族的一种歧视和羞辱。然而,在另一方面,犹太隔都的出现却在促进犹太人的集体生活,维系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文化和团结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很早以前,犹太拉比曾告诫犹太人要“修建保护《托拉》的栅栏”,隔都中的犹太人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不仅实现了自治,而且基本上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方式和法律生活,《塔木德》在管理隔都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犹太教律法和伦理准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遵守。犹太隔都犹如一个训练自治的场所,一代代犹太人在这里学习管理错综复杂的平民事务和熟悉管理自身的各种准则,对于犹太人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疏割 古犹太地名。位于约旦河东,邻近撒拉但。雅各携带家人与财产从舅舅拉班家返回迦南途中,渡过稚博渡口,与哥哥以扫相认尽弃前嫌后,首先到达的地方就是疏割。雅各在此地建造房屋,为牲畜支搭帐棚,疏割由此得名(“疏割”的希伯来文意为“牲畜棚”)。约书亚率以色列人进占迦南后,将此地分给迦得支派。士师基甸打败米甸人胜利返回时因疏割人没有参战,便用荆棘鞭抽打他们,以示惩罚。由于疏割与撒拉但的胶泥适于铸模,所罗门王曾在两地之间铸造圣殿铜器。

十三画

蒙特斐奥雷 (Sir Moses [Hain] Montefiore, 1784—1885) 英国犹太著名人士, 犹太慈善家。生于意大利里窝那, 当时父母正在那里访问自己的祖籍所在地。随后由家人带回英国, 在伦敦长大。他的家庭属于一个犹太商人世家, 从小便受到精于理财家风的影响。青年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从事证券买卖, 后由于与罗思柴尔德家族一女结婚, 以及在证券买卖上的成功, 成为当时一位巨富。1824年便退休, 在随后的60年中主要从事公共服务事业。一生无数次在欧洲、中东、北非等地旅行, 为犹太人事业奔波。

1827年, 他首次访问耶路撒冷, 同埃及苏丹穆罕默德·阿里·巴沙结为好友。1840年, 一天天主教的圣方济教派的托钵僧和他的穆斯林仆人突然失踪, 另外一些天主教僧侣诬告是犹太人为了获得庆祝逾越节礼仪的血水将其谋杀, 导致相当一批犹太人被捕、关押、拷打, 其中两人因拷打身亡。这件事不仅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被称之为“大马士革事件”, 而且与埃及和叙利亚当权者之间的权力斗争联系到了一起。蒙特斐奥雷得知这一事件后, 积极进行斡旋, 终于使被关押的犹太人全部获释。随后, 他率领的斡旋代表团还与君士坦丁堡苏丹王进行接触, 以争取犹太人的权利。在他的努力下, 土耳其的苏丹王不仅颁布命令禁止以血祭诽谤罪控告犹太人, 还允许居住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享有同等权利。

他还两次代表俄国犹太人去圣彼得堡访问, 与沙皇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三世进行会谈, 要求放宽对俄国犹太人的限制。1844年, 在他的建议下, 尼古拉一世宣布废除不许犹太人居住在西部边境的法令。

蒙特斐奥雷一生先后七次去巴勒斯坦, 最后一次是在他92岁高龄时进行的。他捐出许多财产在巴勒斯坦兴办犹太人事业: 在加利利和雅法附近建立了一批犹太农业定居点, 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帮助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人居住区, 此外, 还开设医院和其他慈善机构。

作为一位著名的犹太人士, 他是第二位担任伦敦行政司法长官的犹太人, 第一位被封为爵士的犹太人。他曾担任了40年英国犹太代表董事会董事长的职务。

他是个正统的犹太教教徒, 坚决反对犹太教改革运动。他在属于他私人拥有的拉姆斯盖特庄园中建有自己的犹太会堂。旅行时, 总是带上自己的礼仪屠宰师。一生保持着犹太人的文化传统。1973年, 他与妻子的遗骸运至以色列, 在那里重新安葬。

献殿节 见“哈努卡节”。

禁果 《圣经》典故。喻指因被禁止反而更想得到的东西, 也暗示被禁之物诱惑力之大。出自《创世记》第三章。据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后, 又用地上的尘土造了第一个人, 名叫亚当。上帝还建了一个园子, 叫伊甸园, 园内郁郁葱葱, 果树茂盛。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 叫他修理果树, 看守园林。上帝嘱咐他说, 园里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 只是不许吃园中那棵分别善恶的智慧树上的果子, 因为吃了就会死。后来, 上帝看亚当一个人太寂寞, 决意给他造一个配偶。于是上帝使亚当沉睡, 随即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给亚当作妻子。亚当给她起名叫夏娃, 两人快乐地生活在伊甸园内。有一天, 魔鬼变成蛇的样子诱惑夏娃说, 你们吃智慧树的果子未必会死, 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了那果子眼睛就会明亮, 你们就和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了。夏娃听蛇这样说, 又看见那果子十分可爱, 想到吃了还能使人有智慧, 她便摘下果子吃了, 又拿给他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果真明亮起来,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 于是就拿无花果树叶编做裙子。由于这个罪过, 他们遭到上帝的惩罚。蛇被罚用肚子走路, 终生吃土。又罚女人生育儿女多受痛苦。亚当被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最后上帝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

禁食 犹太教的一种宗教仪式, 即斋戒, 表示向上帝忏悔或认罪, 或向死者致哀, 或因灾祸而致哀。此习俗在《圣经》中有多处记载, 主要如: (1)摩西为以色列人的罪祷告, 禁食40昼夜。(2)大卫曾3次禁食; 第一次为扫罗的死而悲哀和禁食, 第二次为押尼珥的死而悲哀和禁食, 第三次为拔示巴所生的孩子生病而禁食祈祷。以上事件均载于《撒母耳记下》。(3)先知以利亚从耶洗别手中逃出来后, 禁食40昼夜。(4)亚哈王因遭到耶和华诅咒而禁食。(5)波斯大利乌王因担心但以理的命运而终夜禁食。(6)但以理也两次禁食, 第一次当他从耶利米先知的书中得知耶路撒冷必荒芜70年时, 便为犹太人的罪恶而禁食祷告; 第二次在他看见上帝的异像后, 为此祷告并禁食3个星期。(7)波斯亚哈随鲁的王后以斯帖因哈曼要杀犹太人而禁食3昼夜。(8)以斯拉为被掳回归之人所犯的罪悲伤而禁食。(9)尼希米为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而悲哀、禁食。(10)尼尼微人听了约拿先知的劝告, 便悔改禁食。以上是《旧约》中关于禁食的记载。基督教继承犹太教此项斋戒之礼。《新约》中亦多有记载, 耶稣与使徒保罗都有过禁食的记录。

禁食日 犹太习俗中为了某种目的暂时停止进食

的日子。犹太历书上的禁食日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来源不同,目的不同,具体做法亦有不同。一般说来,禁食日只禁食品和饮料,如酒之类,但有的场合下也禁洗滌(指以欢快为目的的)、禁穿鞋(指以舒适为目的的)、禁涂油(指以宗教为目的的)、禁办喜事、禁同房等。禁食的目的有下列几种:为纪念某一不幸事件;为了忏悔反省;为了实现自我净化;为了抑制人对物质的欲望和弘扬精神力量。尽管《圣经》时代就已出现了一些禁食日,但当时唯一需要禁食的是赎罪日。现在犹太历书上注明的禁食日大多产生于以后的时代。这些禁食日按类型分有三类:(1)与圣殿被毁有关的禁食日,主要有阿布月初九赎罪日,搭模斯月17日纪念耶路撒冷城被罗马人攻破导致圣殿被毁日,从搭模斯月17日到阿布月初九的三周禁食日。(2)与其他犹太历史事件有关的禁食日,主要有提斯利月初三的基大利斋日,亚达月初七的摩西诞辰和逝世纪念日,亚达月13日的以斯帖禁食日和西弯月20日纪念一系列欧洲犹太人社团被捣毁、消灭事件。(3)与忏悔有关的禁食日,主要有每个新月节前夕,统称为小赎罪日,忏悔十日开始的前一天,介于哈努卡节和普珥节之间的一些日子,如每逢星期二的日子。正统犹太教徒在这些禁食日中往往要禁食、禁酒,有的还禁浴、禁办婚事等。同时,根据不同禁食日在家或去犹太会堂诵读有关《圣经》章节和祈祷词。

此外,禁食日还分为个人禁食日,如新郎、新娘在婚礼当天的禁食日和团体禁食日,如整个犹太社团为某位犹太圣贤的逝世进行集体禁食的日子。

赖夫勒 (Erwin Reifler, 1904—1965) 奥地利犹太汉学家、比较语言学家。汉名罗逸民。生于维也纳,卒于西雅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1931年获博士学位,是著名的奥地利汉学家罗斯托恩(汉名纳色恩)的得意门生。罗斯托恩又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先后在中国任职30年,从清朝到民国(1911—1917)任驻华公使。回国后任维也纳大学汉学教授,撰有研究中国的专著多种。罗逸民同他的老师一样,也是由研究比较语言而感到需要学习中文,并进而成为汉学家的。他于1932年到上海,相继在交通大学、震旦大学(原址现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原址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比较语言学。除此之外,他还为交通大学搜集和加工整理了所有有关奥地利铁路的资料,并译成中文。二次大战结束后,他去香港,1947年到美国,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教授中文,并成为比较语言学的国际权威。他在电脑语言翻译方面也作出了开拓性的成就。他又是美国东方学会和美国考古学会的会员,对古代度量衡制的研究也颇有造诣。在上海期间,他还参加了《德华标准大字典》的编纂工作,担任名誉编辑。这是一部1300余页的辞书。参加编辑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他们留学德语国家,各

各学有专长,对德语也有一定造诣。然而,这些编写人员几乎全部是攻读理、工、法、医,没有读文科,更没有读比较语言学的。而罗逸民的比较语言学专业,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相辅相成,使编写者的阵容配搭更为整齐。这部字典于1943年7月组班编纂,历时7年,至1950年7月出版,在德语界几乎人手一册,经30年而不衰,曾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多次。

赖希施泰因 (Tadens Reichstein, 1897—)

瑞士籍波兰犹太化学家,1950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生于波兰符沃次瓦维克城,少年随父母移居瑞士苏黎世,1914年入瑞士籍。1920年,获苏黎世技术学院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22年获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在毕业后的最初几年中,他主要从事工业设计,获得可观财产。1930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职,受到瑞士著名化学家鲁齐卡的指导,并与之开展合作研究。1933年,他成功地合成维生素C,对医药工业和临床治疗作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起,他开始对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提取液进行深入研究。在类固醇,特别是在肾上腺皮质研究方面取得杰出成就,他不仅成功地从中分离、纯化出20多种物质,而且确定了它们的结构和功能。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在阐明一些激素生理功能和机制的同时,还弄清了阿狄森氏病的病因,为临床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1936年,又分离出被命名为“可的松”的皮质激素。1950年,他因在肾上腺皮质激素方面的研究成果,与美国生化学家亨奇和肯德尔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1938年,应聘在巴塞尔大学任教,并于1946年担任该校药学研究所所长。

赖森 (Abraham Reisen, 1875—1953) 意第绪语诗人,作家。生于俄国明斯克附近一小镇。父亲是个经营小麦和亚麻的商人。早年受传统的犹太文化教育,并学会了俄语和德语。他聪明过人,14岁就当起了家庭教师,并开始学习写诗。1890年,他15岁,却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的作品给已享有盛名的佩雷茨寄去。而第二年发表的意第绪诗选就包括了他写的一首诗。这一事件使他大受鼓舞,从此,诗作不断。1893年,他去明斯克谋生。尽管谋生十分艰难,他从未搁笔。不断发表的作品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声誉,一些诗还被谱成曲在群众中流行。21岁时,他被强征入伍,在沙俄军队中服役4年。服役期满后,他离开俄国,来到华沙,受到聚集在那里的意第绪语作家的欢迎,主要从事创作和编辑工作。1902年,他发表了一本长达42页的诗歌《当前的歌》,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诗歌同时在美国出版,卡汉也在报上亲自撰文表示赞赏。1904年,他前往克拉科夫,负责《意第绪语》编辑工作。他曾在杂志上撰文鼓吹应宣布意第绪语为犹太人的民族语言,从而引发了一场意第绪语与希伯来语关系的

大辩论。1908年,他首次访问美国,大力宣传意第绪语在犹太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访美回来后,先后担任欧洲数家意第绪语报刊编辑。与此同时,他本人的诗歌和短篇小说也不断在欧美意第绪语报刊上刊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去纽约定居,成为当地意第绪语报刊固定撰稿人。他的诗集一本接一本出版。晚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对青年意第绪语作家的扶植上。

赖森是个善于抒情的诗人,常以素描的手法表达广大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人的心声。他的作品(包括诗歌和短篇小说)常以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爱情和对生活的希望为主题,人物也大多是受到折磨的犹太人、挨饿的市民、街头的妓女、化妆商店售货的女子。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心灵和情感的发掘,展现他们美的一面和做人的价值,他因此被誉为“穷人的诗人”。

雷霍沃特 以色列中部城市。位于特拉维夫—雅法以南约30公里的沿海平原上。其名称来自《圣经·创世记》:“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给那井取名叫利河伯(雷霍沃特),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此地昌盛。”希伯来语中雷霍沃特意为“宽阔”。

现代雷霍沃特于1890年由第一批阿利亚中来自华沙的犹太人建立。由于此地极适宜柑桔种植,很快发展起了大片柑桔种植园,经济上也很快能够自足,并吸引了大批移民前来定居开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土耳其奥斯曼人统治时期,雷霍沃特是第一个由犹太警察取代阿拉伯警察维持治安的城镇。

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兹曼早年来到雷霍沃特定居。他的故居和有他坟墓的花园现在是一个国家纪念馆。魏兹曼本人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1934年他与朋友们在雷霍沃特建立了一个科学研究院(丹尼尔·西夫研究院)。这个研究院1944年改名为魏兹曼科学研究院,现在是以色列著名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之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农学院也在雷霍沃特。

雷霍沃特1950年建为市。它处于以色列盛产柑桔地带的中心,其工业除柑桔加工(挤汁、提油、浓缩)外,还有塑料、医药、金属制品等。1986年人口为68000。

摇祭 犹太教献祭礼仪之一。献祭时摇动祭物,以求上帝垂顾。这一礼仪主要在五种场合中实行:(1)逾越节的第二天向上帝献刚成熟的谷子时,要摇动祭物;(2)五旬节时,要用新麦做的两个饼及两只羔羊作平安祭的摇祭;(3)献平安祭时,献祭者要举起祭物的右腿或右肩,摇其前胸,祭物献后归祭司;(4)麻疯病患者行赎愆祭时也要行摇祭。届时,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献为赎愆祭,并和那一罗革油,一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5)丈夫因怀疑妻子不贞而行疑惑的素祭时,也要行摇祭。

《路得记》 《希伯来圣经》第三部分《圣文集》中的一卷,列于《雅歌》之后。本书记载犹太史士师时期中一个摩押女子名叫路得的故事。故事简单情节为: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巴勒斯坦以色列士师秉政的时代,伯利恒地发生饥荒,有一家人名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俄米带了两个儿子避荒于东方摩押地,以后两个儿子都娶了当地摩押女子为妻,经过十年的动荡变迁,这个家庭中三个男子先后去世,留下一个三寡妇之家。历尽人世辛酸的婆婆拿俄米于灾荒过后,要归回伯利恒故乡,两个摩押媳妇之一的路得却坚持要随婆母拿俄米回她的故里。路得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于是相依为命的婆媳两人一同回到巴勒斯坦。那时正是伯利恒的收割季节,在收捡麦穗的收割场上,路得遇到了宽宏、善良又富有的亲族波阿斯。按摩西的律法,兄弟或亲族对于没有儿子的家庭,他们有义务娶死人之妻而为其生子立后。在婆母拿俄米精心的安排下,波阿斯尽了亲属本份娶路得为妻。之后,路得与波阿斯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俄备得,这俄备得就是以后著名大卫王的祖父。

《路得记》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12世纪的士师时期,但成书应晚在士师时期之后,因本书的结尾部分提到大卫王的家谱,所以可以肯定,本书最早也只能写于大卫王时代之后。近代学者有的把本书的成书时期推迟到犹太国灭亡被掳归回的时期之后,大约在公元前6—前5世纪。主要的原因是本书的故事非常强调路得是一个外邦的摩押女子,在全书短短的四章里竟接连出现七次“摩押女子路得”这个词语,有一次没有提“摩押”,但指明路得是“外邦人”。本书一再强调贤慧的路得是“摩押女子”,这决非偶然的重复。因为在《希伯来圣经》中,摩押人是亚伯拉罕侄子罗得与自己的女儿所生的、并遭到诅咒的后代,因此“摩押人”与“私生子”同一个意思,故不得加入耶和华的会。据历史记载,历代摩押人也是与以色列人为敌。希伯来的三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的书中也不乏谴责摩押的词语。摩押人是如此的遭到贬斥,如此的不受欢迎,而《路得记》中如此贤慧、如此受人赞誉的主角路得,恰恰是出身于这个“外邦族类”的摩押,这就说明虔诚的外邦人也是上帝祝福的对象。

公元前6世纪之后,被掳归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重修被毁的圣殿,为保证民族的纯洁,犹太省长尼希米禁止犹太人与外族人通婚,要他们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文士以斯拉进一步坚持“要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他们采取的这类措施造成部分犹太人极大的痛苦,并受到一些人的强烈不满。这时《路得记》的出现却以一位贤慧的“摩押女子路得”为例,记述她两次与犹太人结婚,蒙受上帝祝福,至终成为光辉大卫王的曾祖母,目的

是要告诉人们不应歧视、排斥外邦人，摩押人虽属被贬斥的异族，但以色列民族史上显赫的大卫王身上却也含有此异族摩押人的血统。

暗利 (Omri) 古希伯来人物名。以色列国的第六位王，暗利—亚哈王朝的创建者。当以色列王国第四位王以拉在位时，分管王国战车的权臣心利发动政变，刺杀以拉，在得撒登上王位。此时，以色列人正在与非利士人作战，以色列元帅暗利正率军围困非利士的重镇基比顿。心利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前线，以色列军队即拥立暗利为以色列王。暗利迅速回军围困得撒。就在心利作王的第七天城破，心利进王宫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以后以色列民众分成两半，一半拥护基纳的儿子提比尼，一半追随暗利王。暗利的拥护者在势力上逐渐压倒前者。为追逐王位，暗利与提比尼之间进行过长达四年的战争。最后，暗利取得了胜利，成为以色列的王。

暗利的首都起初在得撒，但得撒经过战争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暗利围城之战和随后的心利焚烧宫殿）。暗利最后挑选了撒玛利亚山。他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并按原主的名字把所造新城命名为撒玛利亚。美国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在撒玛利亚山发掘出了暗利皇宫的基址，但找不到任何比暗利时代更早的东西。这说明暗利的确是撒玛利亚城的创建者。暗利建都于撒玛利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撒玛利亚山地有丰盛的自然资源。将撒玛利亚构筑成为北国的一个重镇，恰好与伯特利城构成一线，足以牵制耶路撒冷，这是暗利王迁都的重要原因。

暗利王统治期间，北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取得一些重要的成就。著名的摩押石碑上就刻有暗利的名字。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暗利的名字还在亚述王撒缦以色的黑色方尖石柱上出现，称北国以色列为“暗利之家”。

从暗利王儿子亚哈与犹大王约沙法南北合作的历史事实看，暗利王对犹大国采取了和平的外交策略，但这一策略是建立在北国的强大的武力基础上的。因此在南北联盟中，约沙法始终处在次要的地位，这从两国联合攻击亚兰的事实可以看出。暗利时代北国以色列曾与亚兰之间发生过战争，暗利未能取得胜利，亚兰从以色列夺走了一些城邑，但暗利在以色列建立了强大的实力基础，这是暗利王朝第二代能够多次击败亚兰人的重要原因。他所建筑的撒玛利亚城在未来对抗亚兰人入侵方面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

暗利王朝政治、外交上的成功，使得他在宗教上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政策。北国宗教自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一世开始，就有浓厚的偶像崇拜的特征，到了暗利王朝，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与当地迦南人、亚兰人、亚述人、西顿人、摩押人等相互混合的现象更加突出。亚哈王朝终于引发巴力先知与亚卫先知之间的流血冲突。暗利灵活的宗

教政策适应了北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却使以色列宗教失去其纯洁性，所以它遭到后世先知的猛烈批评。如《列王纪上》给他的评语是：“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睚珥 (Jair) 古希伯来人名。古代以色列一士师。以色列占领迦南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未能将剩余的迦南人驱赶或消灭，而是与他们混杂居住，因而常受到外族的骚扰。但这个时期的以色列 12 支派各自为政，不能团结合作以对付周围异族势力的入侵。各支派部落有自己的领袖，称为“士师”。士师集民事审判官与战事军事领袖的职责于一身。《士师记》记载了著名的 12 个士师的事迹，根据记载的详简，又可分为 6 个大士师和 6 个小士师。6 个小士师分别是：珊迦、陀拉、睚珥、以比赞、押顿和以伦。睚珥是其中之一，继陀拉后作士师 22 年，为基列人，有子 30 人，都骑驴驹；有城 30 座，又名哈倭特睚珥。睚珥死后葬在加们。

蛾摩拉 《旧约》迦南一地名。《创世记》第 10 章记：“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耳的路上、直到迦萨，又向所多玛、蛾摩拉、押玛、洗扁的路上，直到拉沙。这就是含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土地。”《圣经》的记载，往往把所多玛、蛾摩拉并称，二城均为亚伯拉罕时代迦南人的主要居住点。当亚伯拉罕与侄子罗得从埃及地归来之后，二人曾在伯特利与艾之间支搭帐棚，因两族家人发生冲突。亚伯兰就对罗得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后来，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得住在约旦河平原，并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据此，这二城很可能位于约旦河平原地带，其地富庶。亚伯拉罕时代，示拿王暗拉非，以拦王基大老玛等曾进攻约旦河平原地带的五王，五王之中就有所多玛王比拉和蛾摩拉王比沙。这就是四王与五王交战。结果五王失败，所多玛王和蛾摩拉王都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胜利的四王就把所多玛和蛾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根据有关此战役的材料可以推论所多玛与蛾摩拉是在死海附近地带。至于有关所多玛和蛾摩拉被消灭的故事在《圣经》中最为著名，也最为神秘。《创世记》把耶和华毁灭二城的理由归结为二城的罪恶。“耶和华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亚伯拉罕试图劝说耶和华放弃对二城的毁灭。亚伯拉罕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么？假若那城里有 50 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么？不为城里这 50 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么？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么？”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

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最后亚伯拉罕说:“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耶和华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圣经》最后记载了二城毁灭的情形。当时耶和华将硫磺和火从天上降与所罗玛和蛾摩拉,把城市和整个平原,连城里所有的居民和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所多玛、蛾摩拉与平原观看,只见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

从这些材料来看,所多玛、蛾摩拉极有可能毁于盐海(即死海)的一次地震或火山爆发。今考古学一直未能确定二城之遗址,可能这二城已被死海所淹没。

锡安 《圣经》中对古代耶路撒冷的一种称呼。耶路撒冷原址本是古耶布斯人之城,亦称为耶布斯。约公元前1000年时,被大卫王攻取,建为统一王国的都城。“锡安”一名可能源于大卫攻下的“锡安的堡垒”——一个拱卫耶路撒冷城的城堡。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就建于该城北边的山上。公元1世纪的犹太史家约瑟福斯认为锡安是耶路撒冷西边的山,在此地区城市的大部分在约瑟福斯的时代仍然存在。但“锡安”一名所对应的地区不断在改变。

《希伯来圣经》中“锡安”一词经常出现作为耶路撒冷的代称。特别在《以赛亚书》和《诗篇》中。总的来说,“锡安”一词是希伯来先知和诗人对耶路撒冷的感情用语,在《圣经》散文体的著作中较少出现。先知和诗人笔下的“锡安”、“锡安的居民”、“锡安的女儿们”即代表该城所有的居民,甚至有时候代表整个犹太人。“锡安”此名称的宗教和感情特性来源于耶路撒冷是王国的首都和圣殿的所在地,耶路撒冷作为圣城蕴含了犹太人的信仰要素。《圣经》指明“锡安山”是耶和华居住的地方和耶和华膏大卫为王的圣山。“锡安山”也是人朝见上帝的所在地。《圣经》各卷中以“锡安”指耶路撒冷城达160多处。到近代“锡安”已泛指犹太人的故土,它象征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愿望。“犹太复国主义”直译应为“锡安主义”,即由此而来。

锡安工人党 近代最早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自认为是“无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只有在犹太工人阶级领导下,在巴勒斯坦建立社会主义犹太国,犹太复国主义才能取得成功。该党内部思想倾向十分复杂,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务实派犹太复国主义、领土主义等不同倾向在该党内部都有追随者。一些成员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部分成员则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思潮有三种:一是“塞尔金主义”,主张犹太复国主义一开始就应当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垦殖,资本主义道路在巴勒斯坦应当避免,社会主义者在从事垦殖事业的同时就

应当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社会基础。二是“包罗霍夫主义”,认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锡安工人党的任务不是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而应是建立犹太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开展阶级斗争,为巴勒斯坦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阶级基础。三是以大卫·戈登为代表的倾向,它对上述两种思潮都持拒绝态度,而只强调犹太移民通过艰苦的、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把自己改造为扎根于巴勒斯坦土地的劳动者阶级。

锡安工人党并不是一个有着统一组织的政党,而只是欧洲、北美和巴勒斯坦的众多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集合。第一个定名为“锡安工人党”的组织于1897年出现在俄国的明斯克,同类性质的组织随后几年陆续在俄国各地和波兰、德国、奥匈帝国、英国、美国及巴勒斯坦出现,这些组织彼此间只有松散的联系,并采用各种不同的正式名称。俄国锡安工人党组织是各地区组织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组织,1905年时俄国各锡安工人党的成员共有56000人。20世纪初,各国各地区的锡安工人党成立了一个松散的、协调性的国际组织“锡安工人党国际”,各个锡安工人党的代表不定期地出席锡安工人党国际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锡安工人党的犹太复国主义使之与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崩德处于对立状态,并使其参加第二国际的多次努力都归于失败。锡安工人党代表参加了历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美国锡安工人党领导人纳赫曼·塞尔金和俄国波尔塔瓦锡安工人党领导人包罗霍夫是锡安工人党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各国锡安工人党的成员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阿利亚(1905—1913,1919—1923)中大批移居巴勒斯坦,成立了各种组织,成为巴勒斯坦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20年代,各国各地区的锡安工人党逐渐瓦解。

锡安主义 见“犹太复国主义”。

锡安热爱运动 近代最早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它作为对反犹迫害的一种反应,首先在俄国犹太人中产生,然后扩展到欧美各国。19世纪80年代初期,在俄国各大城市,包括莫斯科和彼得堡,已经组成了若干锡安山热爱者小组。敖德萨在锡安热爱运动的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产生了领导该运动的两个主要人物:利林布卢姆和平斯克。利林布卢姆的论文《在先辈的圣地上复兴犹太民族》对犹太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平斯克在1882年9月出版了小册子《自我解放》,该书的题目本身反映了它的主导思想:自我解放,而不是作为当局的一种恩赐的解放。平斯克对同化持极端否定态度,提出必须使犹太人成为民族的论题。他的小册子和利林布卢姆的论文很快成为锡安热爱运动的政治思想宣言。

在锡安热爱者小组中,许多人认为,必须召开全体代

表会议,以把各个分散的协会联合和团结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并形成中央领导。1884年11月6日在德国卡托维兹(现为波兰城市)召开了这样的会议(原来拟在著名犹太社会活动家摩西·蒙特斐奥雷诞辰100周年时召开,后因故延期),会议以德语进行。根据会议记录,有36名代表与会,其中绝大部分为俄国代表。其他国家的代表有:德国6名,罗马尼亚1名,英国2名、法国1名,在西方国家代表中,有4名出生于俄国。代表们来自各个阶层:拉比,报刊编辑,作家,医生,律师和商人。他们老少咸集,既有极端虔诚的宗教人士,又有思想解放的启蒙主义者。会议选举平斯克任主席。与《自我解放》一书相比,平斯克开幕词中的新观点在于,他明确指出犹太人要在圣地、而不是仅仅在任何一个国家定居。《自我解放》出版两年后,平斯克已经确信,犹太人民渴望返回自己祖先生活过的历史家园。在闭幕词中他强调,两种因素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的出身和共同的命运。会议还决定,锡安热爱运动总部设在敖德萨。该运动的成员被称作为锡安热爱者。

锡安热爱运动第二次代表会议于1887年6月16—19日举行。除了运动领导人和卡托维兹会议参加者以外,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很多青年人。俄国南部的代表几乎全是年轻人。在会议的年轻代表中,有三人非常活跃:V·贝尔曼,他是来自彼得堡的社会活动家,忠实于移居巴勒斯坦的思想,1890年34岁时死于结核病;M·乌色什金,他是莫斯科的大学生,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自1923年直至去世,一直居住在耶路撒冷,1941年任犹太国民基金会主席;M·迪津戈夫,他来自基什尼奥夫,后来担任特拉维夫市长,1936年去世。

锡安热爱运动主要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普及希伯来语,宣传犹太史和犹太复国主义,寻求西欧犹太财阀资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垦殖,组织第一次阿利亚(1882—1903)等活动。1890年,俄国锡安热爱运动在雅法设立了办事机构,专门从事购买阿拉伯人土地的工作。锡安热爱运动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出席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90%是锡安热爱运动的成员。曾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的大卫·沃尔夫佐恩、哈伊姆·魏兹曼和索科洛夫等都曾是锡安热爱运动的成员。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的几个主要派别,如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务实派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都是从锡安热爱运动内部的不同政治倾向发展而来的。

锡安热爱者 见“锡安热爱运动”。

新月节 犹太教次要节日。按犹太教规定犹太历每月之首为新月节。新月的出现,表示又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因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对以色列人来说,它象征

新生活的开始、改过自新后日子的开始和与上帝重新和好的开始。它既是个庄严的日子,更是个喜庆的日子,故在这一日不得禁食或哀悼。现代礼仪主要是在此日之前的安息日诵读祝词,歌唱或诵读颂赞诗篇中有关新月节的部分。(参见“月朔”)

意大利犹太人 据史料记载,犹太人在公元前161年来到意大利,他们是犹大·玛喀比(马塔蒂亚·哈斯蒙尼的第三个儿子)的使者。出使意大利的目的是与罗马元老院缔结友好条约。2世纪初期,罗马帝国的犹太人数约为5万,他们中大多数人住在罗马(主要是贫民区)及其郊区。犹太社区生活的中心是犹太会堂,这段时期中罗马一地有12座犹太会堂。除了罗马,犹太人还住在一些港口城市和其他地区。11世纪末期,少数犹太人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而大部分犹太人生活在罗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犹太人主要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还有人从事农耕生产。13世纪意大利南部的犹太人处境艰难,1294年半数犹太人被迫放弃了犹太教,许多犹太社区被消灭。没有接受基督教的大部分犹太人逃亡到其他地区。1240年法国发生的教会反对对《塔木德》的研究,很快也流传到意大利。中世纪早期意大利南部和中部使用的犹太—意大利语,于14—16世纪在整个意大利的犹太人中间流传开来。

14—15世纪是犹太人的贷款银行繁荣的时期。同时,意大利犹太人的精神活动也达到空前的繁荣,出现了一系列著名的诗人、哲学家、翻译家。1492年把犹太人赶出西班牙的勒令也传到它在意大利的领地——萨丁岛和西西里岛。被驱逐的犹太人大部分来到意大利大陆,少部分去了北非、希腊和土耳其。1516年,在威尼斯建立了意大利的第一个隔都。尽管隔都里的生活窘迫,但是,犹太人的文化活动和精神活动没有停止。在每个较大的城市中,都有犹太宗教学校耶希瓦。帕多瓦的耶希瓦特别有名。

16世纪中期的反宗教改革伴随着对犹太人的迫害。1553年,教皇尤里Ⅲ世下令焚烧意大利所有的《塔木德》。18世纪末期,意大利约有3万犹太人(4—7千人住在罗马)。当时,只允许他们住在隔都。在隔都之外,犹太人必须在衣服上佩戴标志。除医学外,犹太人禁止从事所有的自由职业。就是在医学领域内,也有许多严格限制。许多犹太人不堪迫害,逃亡到土耳其。犹太人在城市之间旅行,必须得到特别允许。罗马犹太社区的状况特别严峻。不过,教皇统治的其他城市,例如昂科纳和菲腊腊,情况要好一些。在一些小社区中,犹太人还能受到当局的帮助。利伏诺的犹太人甚至可以完全自由地从事商业活动。

1796—1798年,法国占领意大利后,隔都的围墙被拆除,犹太人获得平等。但是,1799年又失去了它,因为法国军队被俄奥联军赶出了意大利。1800年犹太人又从

攻入意大利的拿破仑那里获得了平等。在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犹太人的这种平等又丧失殆尽。

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犹太人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和画家。俄国民粹主义者安娜·库利舍娃(1853—1925,自1878年起生活在意大利)是1892年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L·卢扎蒂担任了差不多20年的财政部长,并于1910年出任意大利总理。奥托良格(1859—1932)于1902—1903年任军事部长,L·沃列姆波尔格(1859—1932)于1901年任财政部长,L·莫尔塔拉(1855—1937)于1919年任司法部长,然后任参议员。帕多瓦犹太社区的首领L·罗马宁—雅库尔(1847—1929)自1882年任众议员,自1920年任参议员。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龙勃罗梭、画家莫迪利亚尼、作家斯韦沃在世界上享有声誉。

19世纪末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意大利有所发展。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1898)之前,一些意大利拉比和青年知识分子就已经在犹太报纸上宣传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很快,在罗马、昂科纳、利伏诺、佛罗伦萨和那卜勒斯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小组。1899年9月在昂科纳召开了意大利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1901年10月20日在莫德纳成立了意大利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联盟创办的月刊关注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后来,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中心,那里的意大利拉比学院的师生积极从事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活动。1916年佛罗伦萨开始出版犹太复国主义周刊。《贝尔福宣言》的发表极大地推动了意大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意大利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表现出兴趣。1918年以Ch·魏兹曼为首的访问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也包括意大利犹太人的代表。1924年召开了意大利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大会。1927年建立的意大利—巴勒斯坦委员会促进了意大利和巴勒斯坦的联系,改善了政府成员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

1922年墨索里尼执政,法西斯政府表面上没有破坏犹太人的平等权利(许多犹太人甚至成为法西斯党的成员)。虽然某些党魁(包括墨索里尼)确认,异己的犹太人威胁着民族统一,但是,为了获得国际犹太人的支持,意大利政府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4年,它允许意大利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首领开办海军学校,以培训贝塔尔成员,意大利海军军官领导学校的教务。在意大利也创办了一些农场,培训从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来的犹太青年,以便向巴勒斯坦移居。然而在同德国确立了密切关系后(1936年年底),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转移到反犹太主义的立场上来。1937—1938年颁布的反犹太法令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禁止犹太人在部队、国家和社会机关任职,犹太财产必须登记。后来,这些限制越来越严格。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及其出版物进入地下,为加速意大利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而斗争。

1940年6月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在一开始并没有导致意大利大部分犹太人的状况急剧恶化。虽然数千名外国犹太人和200名意大利犹太人被拘禁,然而他们在集中营中的生活条件还差强人意。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意大利南部被盟军占领,中部和北部落入德国人手中。意大利的大部分犹太人和数千名在战争初期从法国和南斯拉夫逃亡到意大利的犹太人,开始遭到纳粹的“最终解决”。德国当局有组织地、系统地强制犹太人迁出。在1943年9—11月的3个月中,梅拉诺、马焦雷湖地区、罗马、的里亚斯特、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菲腊腊和其他许多大城市的犹太人,被监禁在主要建于福索利和博尔扎诺的集中营。然后被递解到死亡集中营,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少数犹太人逃到瑞士,约2千人参加了反法西斯游击队,有些人参加了意大利抵抗运动。尽管德国人对隐匿犹太人的人要给予严厉惩罚,许多犹太人仍在意大利人中间找到了庇护所。

纳粹屠犹期间,意大利犹太人减少到40%。在战争结束时,意大利剩下约2.9万意大利犹太人和2.6万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犹太难民。意大利成为合法地或者非法地向巴勒斯坦移居的犹太难民的主要集合点。意大利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和其他犹太组织恢复了合法活动。犹太人重新参加意大利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著名画家A·莫迪利亚尼的哥哥V·莫迪利亚尼(1872—1947)1945年从侨居地返回,领导意大利社会党,1947年当选为议员,特拉奇尼当时任议会议长。E·塞伦尼是非法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府中任部长。C·莱维和A·莫拉维亚在发展意大利文学方面占有显赫地位。实验物理学家E·塞格雷于1959年获得诺贝尔奖。

1982年,意大利居住着约3.2万犹太人,主要居住地为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和的里亚斯特。在意大利的大城市中有较大的犹太社区,大部分犹太人维系着同犹太文化和犹太传统的联系,具有较强的民族自我意识。同时,在犹太人中也发生着强烈的同化现象。意大利小城市和小犹太社区中犹太人同化特别迅速。罗马犹太人与异族的通婚率已超过40%,而在其他城市中则更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意大利基督教徒改信犹太教的现象。例如,1949年一组改信犹太教的意大利居民移居以色列。

大部分意大利犹太人的经济状况令人满意。意大利的经济困难几乎未对犹太人产生影响。他们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也有很多人从事自由职业。犹太人的文化生活和社区生活十分活跃。出版了许多有关犹太题材的书籍,这表明广大读者对它们的兴趣没有减弱。犹太题材也在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中得到反映。意大利犹太人的中心组织是犹太社区联盟。在纳入国家教育系统中的犹太学校中,除了普通教育课程外,还学习专门的犹太课程。

在现代意大利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犹太人的作用比20世纪初期减少。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意大利犹太人中积极开展活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意大利犹太青年中颇有市场。在以色列建国后的25年中,有2770名意大利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在1973—1984年期间又有916名加入了移居的行列中。

意第绪文学 用意第绪语创作的文学。意第绪文学是犹太民族在流散期间创造的一种最具特色、影响最大的文学,也是犹太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中世纪的中欧,后扩大到东欧,随着东欧、中欧犹太人的迁徙,又传播到南北美洲和西亚地区。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与希伯来文学并肩发展,共存共荣,在保存、传播、繁荣犹太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19世纪后半叶,意第绪文学开始繁荣,现代欧洲文学的各种形式都可在其中找到。

意第绪文学最早出现于13世纪。最初是为无法阅读希伯来语作品的女子而作。根据当时的犹太传统,被视为“圣语”的希伯来语只教授给犹太男子,从而使犹太女子从小就失去学习希伯来语的机会,长大后也无法接触希伯来文学。与其他语言文学一样,意第绪文学最初也是以口头形式相传,后逐渐用文字固定下来。鉴于最初的动机主要是为犹太女子提供一些可欣赏和愉悦的文学作品,作品的主题也就自然集中在能使女子愉悦或能给女子以道德教诲的一类题材上。意第绪文学的这一特征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才开始有所改变。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犹太启蒙运动的兴起,这也是意第绪文学两个不同阶段的分期。在这以后,意第绪文学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表达智慧和美感的艺术样式。这一变化除了表现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还体现在语言本身。18世纪末,意第绪语已经相当概念化,口头用语和文学用语严重脱节。口语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而文学用语脱离生活,用程式化的方式联系着操意第绪语的东、西欧犹太人。犹太启蒙运动的展开使意第绪语在西欧犹太人中渐渐失去原先的地位,人们开始接受欧洲人的语言,并以此作为日常表达用语。然而,在东欧,意第绪语却得到了新生,开始与东欧犹太人所使用的口语结合,形成一种全新的表达形式。它不再仅仅是人们的口语,而成了人们同时使用的读写语言。意第绪文学也不再仅仅服务于犹太女子,而成为一种满足全体犹太人共同文化需要的文化活动。其结果是文学开始迅速发展并最终走向繁荣。然而,由于19世纪末东欧出现的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和20世纪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毁灭性大屠杀,一度十分繁荣的意第绪文学突然迅速走向衰落。

有近600年历史的意第绪文学按照不同的发展阶段可划分为以下4个时期:

1. 兴起时期(13世纪—18世纪中叶) 意第绪文学最早出现于13世纪的德国。最早一批作品基本上是对犹太经典《圣经》、《塔木德》、《米德拉西》中有关故事的转述。14世纪开始出现以《圣经》人物亚伯拉罕、以撒、约瑟、摩西为中心人物的诗歌。其中关于以撒被缚献祭的诗似乎十分流行,出现过若干不同的版本。随后出现的作品大多是在一些节日、喜庆、宗教仪式上朗读的诗歌,以及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流传的民间故事和传奇。为了适合女子的欣赏口味,那些以欧洲民间故事和传奇为写作素材的作品往往对故事内容作适当修改。严格说来,16世纪前的作品几乎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只不过是翻译、编译或改写作品。不过,还是有少数非翻译作品出现,如1478年间写成的书信集、1542年刊印的强调女子宗教义务和道德规范的论文集《论行为规范》等都是这方面的作品。17世纪初,意第绪语的《托拉》和《圣经》译本的出现,从语言的角度有力地推动了意第绪文学的发展。1602年,以散文体写成的《意第绪故事集》出版。这是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小说集,反映了日尔曼封建主义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犹太人的生活。写于1691—1719年的《回忆录》一书,是一位居住在德国哈默而恩名叫格卢克尔的犹太女子所著。《回忆录》以个人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犹太女子的生活和情操。以骑士为主要人物的传奇作品也纷纷出现,其主题和内容反映了德国民间文学对意第绪文学产生的明显影响。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意第绪戏剧也在德国出现,尽管故事内容大多来自犹太经典,但从场景到人物的动作都受到非犹太戏剧,特别是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神迹剧的影响。

在意大利,意第绪文学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就已出现,尤其是在聚集着大量从德国来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北部地经常可以见到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象威尼斯、克雷莫纳、曼图亚这类文化事业发达的城市都曾印刷过不少意第绪文学书籍。这些文学作品尽管植根于当时的意大利文学,都不是转述或翻译性质的作品,而是属于一种有独创性的创作。在一系列作家中,以利亚·巴赫·莱维塔最负盛名,是意大利意第绪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流传下来的意第绪语作品有翻译、诗歌、传奇和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无论在选材上,还是风格上都反映着意大利文学的影响。

2. 发展时期(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 在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下,以德国哲学家门德尔松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在犹太人中间开始了一场被称之为“哈斯卡拉”的犹太启蒙运动。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传播,犹太人解放时代终于到来。在这一形势下,意第绪文学进入了发展时期。到19世纪中叶,已出现了一批有才华、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已不再象前一时以翻译、改写为主,而是以独立创作为主。作品的主题也逐渐由宗教转向世俗,开始出现了直接反映当时社会

生活的作品。文学刊物第一次出现,作家有了相对固定的发展作品的园地。写作手法也有了一定提高和发展,文学呈现出多样化。不过,大部分作品仍以故事和传奇为主,尚未出现有影响的大部头作品。

这一时期意第绪文学得到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意第绪语的重视和日益增多的使用。当犹太启蒙运动在东欧展开时,广大的犹太群众掌握的唯一语言是意第绪语。启蒙运动者要达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目的,就必须使用意第绪语为工具。而使用的结果不仅普及了启蒙思想,也为意第绪语和意第绪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的犹太作家都在创作中使用意第绪语,如果说不是全部作品,起码有部分作品是用意第绪语写成的。

这一时期意第绪文学的中心已从西欧移至东欧。艾萨克·尤切尔和阿伦·沃尔夫森在18世纪90年代写下的两出反映犹太启蒙运动的喜剧,标志着意第绪文学在西欧发展时期的结束。剧中公开蔑视意第绪语,操这一语言的都是些遭人痛恨和嘲笑的人物,而正面人物都说“纯正”的德语,从而间接表明西欧犹太人的同化进程至此已成为时尚。可是,东欧意第绪文学却是随着喜剧开始的。尽管19世纪初在东欧出现的意第绪喜剧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启蒙运动思想和使那里的犹太社团走向现代化,然而,却在无形之中使意第绪文学从民间文学过渡到现代文学。在这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有S·埃廷杰、I·亚历山菲尔德、门德勒和A·戈尔德法邓。

东欧意第绪文学是在不同思想的斗争和犹太社会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中发展起来的。文学中表现的社会、民族意识反映了自19世纪初发生在犹太社会内部的根本性变化;对歧视、迫害和屠杀的描写反映了外部世界对犹太民族的敌视;而作品中涉及到的对意第绪语、希伯来语、希伯来文学,以及整个犹太文化的态度则反映了人们对民族前途的思考。在表现不同思想的斗争中,东欧的意第绪文学还是哈西德思想和启蒙运动思想激烈冲突的一个领域。尽管这种冲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然而,时至今日,意第绪文学中所反映的仍然是这两种思想冲突所代表的根本性问题。从广义上讲,哈西德主义代表生活中神秘、浪漫的一面,而启蒙思想代表的是生活中理性的一面,并最终导致文学活动中“现实主义”的倾向。哈西德主义自18世纪出现以来,就试图在神秘主义和感情基础上恢复犹太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并用意第绪语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文学。与哈西德的希伯来文学相比,哈西德的意第绪文学在视野和表现形式上较为狭窄,然而,由于现代意第绪文学的所有风格都直接来源于它,其重要性则显然要大得多。现代意第绪文学无论是精神上、观念上,还是叙事主题上都受到哈西德思想的影响。哈西德作家笔下的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两种:反映哈西德创始人和领袖光辉的圣徒传记和神秘的宗教故事,这一时期

相当一部分意第绪语作品都是以此为题材。启蒙主义作家由于是在批判哈西德思想基础上开创其文学道路的,因此,嘲弄和讽刺哈西德所主张的观点就成为它的一大特征。这一时期,大多数赞成启蒙主义思想的意第绪作家的作品则主要是公开的说教和散发着火药味的讨伐性文章。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意第绪作家有莱文·艾萨克(1740—1809)、纳赫曼(1772—1810)、Z·B·莱文森(1788—1860)、以色列·阿克森菲尔德(1787—1866)、施洛姆·埃廷杰(1800—1886)、A·B·戈特洛伯(1811—1899)、I·M·迪克(1807—1893)等。

3. 黄金时期(19世纪中叶—20世纪20年代)

这是意第绪文学的繁荣、鼎盛时期。起源于德国的犹太启蒙运动已在全体犹太人中展开,并冲破了传统犹太教对人的长期束缚。犹太人的创造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犹太民族的世俗化过程开始加快。与此同时,反犹主义思潮在欧洲重新抬头,特别是在东欧俄国出现了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面对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开始纷纷外逃,形成了现代史上的最大迁徙运动。然而,在犹太人的大规模迁徙过程中,意第绪文学范围开始扩大到美洲大陆和中东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意第绪文学同时在欧洲、美洲和亚洲产生和传播的局面。

这一时期意第绪文学的特点是一大批有才华、有个性的作家涌现,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职业作家。由于他们的努力,意第绪文学的文学性得到了极大提高,步入了现代文学之行列。门代尔·莫海尔·塞法里姆是第一位具有如此才华的意第绪语作家。他以无可争辩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处于大变革时期犹太人的生活,作品呈现出一种史诗风格。他还在创作中将意第绪语南北方言统一成文学语言,为文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他的文学活动使一向不为人重视的意第绪文学地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并对以后的作家产生很大影响,为意第绪文学日后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肖洛姆·阿莱赫姆和艾萨克·雷伯·佩雷茨是这一时期意第绪文学的两位巨人。19世纪最后25年,东欧犹太人掀起了一场旨在把意第绪语从口头用语改造成文学语言的运动,他俩都是这场运动中的主将。在他们的带领下,意第绪语不仅成为文学语言,而且造成了意第绪文学的繁荣,使意第绪文学第一次为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所接受。肖洛姆·阿莱赫姆是位多产作家,发表过长篇和剧作40余部和短篇小说300多篇。他的作品文字优美,情节生动、风格幽默,享有“犹太马克·吐温”之美誉。佩雷茨作为第一个使用严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犹太作家,开创了意第绪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新纪元。其他著名意第绪作家还有肖洛姆·阿施(1880—1957)、别尔李切夫斯基(1865—1921)、诗人莫里斯·罗森菲尔德(1862—1923)、耶胡阿西(1870—1927)、剧作家雅各·戈丁(1853—1909)、大卫·平斯基(1872—1959)等。他们的优秀作

品都对意第绪文学的繁荣、为意第绪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许多著名希伯来文学家也在这一时期写下了部分意第绪作品,进一步丰富了意第绪文学的内容。这些作家中包括比亚利克、斯坦伯格、阿格农等。

这一时期还是意第绪文学刊物、意第绪文学社团大量涌现的时期。意第绪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意第绪文学无论是在作品质量上、形式上,还是在作品数量上都超过同时代希伯来文学的局面。

4. 繁荣后及衰退时期(1920年—迄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第绪文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繁荣后景象的出现,以及衰退时期的到来。造成这一系列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欧洲政治形势。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意第绪文学带来了希望,特别是在革命成功和粉碎白匪反攻后,限制犹太人权利的各种法律被取消,意第绪文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参见“意第绪文学在苏联”)。其次是欧洲大陆的政治动荡造成犹太人持续外迁。随移民潮前往美国和巴勒斯坦,意第绪作家进一步充实了这些国家原有的意第绪文学家队伍。意第绪文学开始在这两个地区,尤其是美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美国开始成为意第绪文学的新的中心。20年代到50年代初是美国意第绪文学繁荣时期,许多前面提到的作家都在美国意第绪文坛上发挥过作用。一些以难民、移民身份来到的意第绪文学家开始崭露头角,进一步扩大了意第绪文学在美国的影响。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意第绪语作家辛格及其兄长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美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位作家(参见“意第绪文学在美国”)。再次是希特勒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治权力,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迫害犹太人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使6百万犹太人丧生,并使存在已近一千年的东欧犹太社团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战前十分活跃、人才辈出的波兰意第绪文坛一下子沉寂下去,意第绪文学遭到查禁,大批作家被屠杀,幸存者除了逃亡他乡已别无选择(参见“意第绪文学在波兰”)。战争和纳粹大屠杀对意第绪文学造成的最大打击是毁灭了整个操意第绪语的犹太社会,使意第绪文学一下子失去了语言的根基,从而导致这一极有生气的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1948年以来,苏联国内对意第绪文学的取缔,以及对意第绪作家的秘密逮捕和杀害,彻底扼杀了那里的意第绪文学活动。直至1959年才有零星作品恢复出版;美国的意第绪文坛由于缺少新的人员补充和犹太人美国化进程的加快,意第绪文学只能依靠日益减少的作家支撑,其影响也自然日渐缩小。这一时期意第绪文学得到发展的唯一地区是在巴勒斯坦。现代以色列国的成立,以及大量犹太难民、移民的到来,使意第绪文学在那里得到了发展。目前,以色列已成为世界上唯一活跃的意第绪文学中心(参见“意第绪文学在以色列”)。

意第绪文学在以色列 意第绪文学在犹太人的故乡——巴勒斯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由于犹太人对圣地一直怀有执着的追求,历史上不断有犹太人从散居地返回巴勒斯坦居住。16世纪一些从中欧和东欧返回的犹太人开始把意第绪语和文学带入巴勒斯坦。开罗博物馆中保存有16世纪由居住耶路撒冷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团用意第绪语写的信函。17、18世纪出现了第一批使用意第绪语描写巴勒斯坦的作品。然而,真正为居住在巴勒斯坦犹太人而作的意第绪作品出现在1877年。当时一份名为《玫瑰》的意第绪语刊物首次在巴勒斯坦出版。随后,又有其他一些意第绪语刊物和书籍在巴勒斯坦问世。尽管如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意第绪文学作品在巴勒斯坦还只是零星之作。真正使用意第绪语进行创作的作家群体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在巴勒斯坦。当时,绝大多数犹太移民在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决心以自己的移民行动振兴犹太民族。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希伯来语才是犹太民族的真正语言,而意第绪语只是一种流亡语言,是耻辱的象征,因而拒绝加以使用,使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对意第绪语的偏见,意第绪文学因此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和影响。然而仍有一批意第绪语作家不顾大多数人的偏见,他们坚持用意第绪语写作,积极创办意第绪语刊物和出版居住在巴勒斯坦意第绪语作家的作品。1934年,意第绪语日报开始在巴勒斯坦发行,该报的文学专栏为意第绪文学提供了发表园地。1941年,意第绪作家联盟成立,标志着意第绪文学在巴勒斯坦已扎下根来。当然,这类活动在以色列建国以前,无论是规模还是成就均微乎其微,最大的作用是与东欧和美国意第绪文学中心保持文学上的联系。

巴勒斯坦意第绪文学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以色列国成立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东欧意第绪文学中心由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灭绝种族式大屠杀而被摧毁,苏联境内的意第绪文学也因当时领导人的反对遭到查禁。战后涌向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潮不仅带来了大批意第绪文学的读者,而且还带来了一批有才华的意第绪作家。这些作家来到巴勒斯坦后,继续进行意第绪文学创作,为丰富巴勒斯坦意第绪文学作出了贡献。此外,东欧犹太人社团遭毁灭一事使得巴勒斯坦犹太人改变了对意第绪语和文化的看法。人们开始认识到包括文学在内的意第绪文化是犹太文化发展历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偏见的消除引起人们对意第绪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相当一批著名的希伯来文学家,如伯克维茨、格林伯格、费克曼等也发表意第绪语作品。意第绪文学终于开始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得到发展。1949年,重要的文学季刊《金链》在以色列创刊。在随后的年月里,该刊一直是全世界意第绪语作家的一个文学阵地。它所刊登的高质量作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意第绪文学的

认识和尊重。意第绪语的其他刊物、日报、书籍也开始不断增多。60年代,以色列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版意第绪书籍最多的国家。

以色列的意第绪文学在主题上更多地与东欧犹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描写东欧犹太人的生活、经历、命运、精神、心灵是许多作品的共同主题,其中对在纳粹德国暴政下生活和被毁灭了的东欧犹太社团的描写尤为感人肺腑。与此同时,在以色列现实生活的哺育下,意第绪文学也越来越多地重视反映居住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生活,出现了一大批以巴勒斯坦风土人情为背景或主题的优秀作品。

活跃在以色列意第绪文坛上的作家除了那些间或发表意第绪语作品的希伯来作家外(这些人包括比亚利克、哈姆等人),早期的有:Z·布洛赫斯、穆谢·斯塔夫斯基、亚可夫·施托尔、奥劳伊基、阿亚·沙姆瑞等人。40年代以来的有:巴斯曼、伯斯坦、比利亚明、伯林斯基、埃斯曼、戈林、霍夫、海勒、江曼、奥利兹基、波塔希、富克斯、卡一赞尼克曼、玛斯特鲍姆、罗克曼等人。1971年,几位来自苏联的著名意第绪诗人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是鲍伊姆沃尔、克勒和特奈辛。目前,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具有活力的意第绪文学中心。

意第绪文学在苏联 20世纪最初的20年是俄国犹太人遭受残酷打击的20年。沙俄当局不仅公开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而且明里暗里对犹太人施加集体迫害,造成大批犹太人外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犹太人就又被从战区的家园赶出,被抢被杀的犹太人不计其数。1917年的革命给犹太人既带来了新的打击,又带来了新的希望。革命后出现的内战,使犹太人再次成为替罪羊,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反动势力杀害。在这期间俄国的意第绪文学也遭到了重大损失。老一代的作家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纷纷逃往其他国家避难。1914年,俄国当局下令禁止出版所有的意第绪语刊物、书籍。留在俄国的意第绪作家除了能在国外出版发表部分作品外,几乎没有任何作品问世。不少青年作家还被强行征召入伍,再也无法写作。

这一局面终于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得到了改善。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废除所有对犹太人的限制,并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意第绪语被看作是犹太人的“母语”而受到尊重。意第绪语刊物和书籍开始重新得到出版。苏联政府的这一政策不仅得到国内犹太人的积极拥护和支持,而且得到国外犹太人的赞许和支持。他们把苏联革命看作是解决社会和民族问题的最佳途径。除了许多在革命前逃亡在国外的意第绪作家纷纷返回,不少居住在波兰、罗马尼亚和美国等地的作家也开始移居苏联。在这一情况下,意第绪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特别是盛赞苏联革命的作品。犹太人在获得

自由出版的权利后,办起了一系列刊物,如《自我拥有》、《当代》、《红星》、《红色世界》等,发表从诗歌到评论方面的作品。意第绪出版社也一个接一个的出现。20年代,三家意第绪出版社出版的意第绪语书籍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出版意第绪语书籍的总和还多。所有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都建起了意第绪语学校。1930年在校犹太学生数达16万人。不少大城市还相继成立意第绪语剧团,上演意第绪语戏剧。然而,30年代苏联国内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极大地影响了意第绪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少有才华的意第绪作家受到批评,写作主题受到限制,一些优秀作品遭到书刊检查制度的扼杀。1935年以前,这一批评和限制的规模还不算大,每年尚有一定数量作品发表,约有326位意第绪文学家在这期间发表过一本或一本以上的作品。但1935年以后,情况越来越糟,出版的书籍一年比一年少,许多刊物不是遭到关闭就是无法再办下去。一些意第绪语学校和研究机构也被迫关闭。1941年,德国入侵后,上述情况突然暂时好转,针对犹太人的各种限制被束之高阁,意第绪文学又开始活跃起来。作家以对法西斯暴行的仇恨和对苏联反法西斯力量的热爱投入创作,写下了一批反对侵略战争,描写战争给人们带来苦难的作品。然而,战后苏联国内出现的对犹太人不信任和怀疑使意第绪文学再次遭到扼杀。1948年11月20日苏联当局借口犹太人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强大的自治区,而关闭和取缔了所有的犹太人机构和组织,只有米都尔斯剧院除外。许多意第绪文学家遭到秘密逮捕,1950年8月12日,24名意第绪作家被秘密处决。斯大林去世后,许多被关押的意第绪作家被陆续释放。但1948年到1959年的11年间,苏联没有出版过任何意第绪语著作,也无任何意第绪刊物发行。1959年后,情况有所改变,4本意第绪作品在莫斯科出版。它们分别是门代尔·莫海尔·塞法里姆、肖洛姆·阿莱赫姆、佩雷茨的作品,以及一部小说选。1961年,意第绪语刊物《故乡苏联》发行。该刊物主要刊载小说、诗歌、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为总数大约100人左右的意第绪语作家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然而,由于先前的打击过大,意第绪文学在苏联已不可避免走向衰落,再也没有产生出任何有影响的作家和有影响的作品。

意第绪文学在波兰 波兰作为意第绪文学发源地之一,有着丰富的意第绪文学遗产。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南面是罗马尼亚、北面是立陶宛、东面是俄国)使它在19世纪末成为意第绪文学的一个主要中心。波兰意第绪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生活的犹太社团文化的自然发展,表现出鲜明的犹太人特征。即使在那些放弃先辈宗教传统的波兰犹太社交界,宣布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文化界,也还存在着希望成为“新犹太人”的真诚愿望。对于波兰犹太作家而言,现代意第绪文学的存在恰

恰体现在对新形式犹太传统的执着追求上,以及对这一追求的精彩描写上。前几代人中流行的文学形式,包括宗教的和传统的,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不断有新的作品产生。与此同时,新的文学样式开始出现,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尽管波兰犹太社团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父与子的冲突,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对文学的态度各有不同,人们还是能够到处看到父子一道阅读、欣赏意第绪文学的现象。

20世纪以来,波兰的意第绪文坛成为各种思想、各种流派并存共荣的一个场所,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有影响的作家。活跃在美国、以色列的许多意第绪语作家都来自波兰,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美国意第绪语作家辛格。然而,由于波兰犹太社团在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毁灭性打击,要全面评价波兰意第绪文学的成就已十分困难。除了有幸逃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作家外,绝大多数的意第绪作家不是在其文学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就成为纳粹大屠杀的牺牲品,便是在最优秀的作品还没有来得及发表之前遭到灭顶之灾。尽管如此,波兰的意第绪文学仍在若干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色。而这一特色主要体现在那些著名的文学家身上。伊茨克·曼杰是20世纪波兰最著名的意第绪抒情诗人。他的作品体现了自《圣经》文学以来犹太文学的传统,是对古典文学的一个自然继承。在他的代表作中,古典人物被恰到好处地转化成表现东欧犹太社会、习俗、风情、观念的现代人。E·斯泰因伯格则在发展意第绪寓言文学方面有独到之处。他那些植根于犹太文化传统、来源于犹太生活的寓言故事极富鉴赏性,把这一传统文学样式提高到了一个水平。A·蔡特林从犹太神秘主义中找到了适合自己创作的灵感和主题,给自己的作品染上一层迷人的神秘色彩。I·施特恩则在创作中使用印象派手法,作品具有较多的伤感主义成分。C·格莱德通过自己的创作使犹太经学院的学生开始对意第绪文学感到兴趣,提高了意第绪文学在正统犹太人中的地位。

波兰的意第绪文学中还包括大量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集中营生活的作品。其作者都是身陷囹圄的作家。然而,他们都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囚禁期间奋力创作,从不同的角度勾勒出犹太民族史上最残酷的一页。尽管这类作品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大战结束时被保存下来,却足以使人们了解到生活在纳粹集中营中犹太人的悲惨生活。这些被称为“隔都文学”的作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犹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对纳粹暴行的有力控诉,其价值是无法用文学标准衡量的。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卡特泽奈尔森于1944年在集中营关押期间所作的《被屠杀了的犹太民族之歌》。作品以详实、令人震惊的手法描写了波兰犹太社团的毁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波兰犹太社团已基本不复存在,意第绪文学也自然随之终结。

意第绪文学在美国

意第绪文学在美国出现的确切年代尚未得到证实。不过,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在财力上支持美国独立的犹太人来自波兰,很可能意第绪文学在这期间就已进入美国。1848年,大批德国人来到美国,其中有相当一批是操意第绪语的德籍犹太人,无疑也会带来意第绪文学。此外,一些从沙俄军队中逃出的犹太人也先后设法来到美国。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时的美国已有了相当规模的操意第绪语的社团。当然,意第绪文学在美国的正式出现是19世纪80年代。当时由于东欧出现的大规模迫害犹太人事件,大批犹太人开始外逃,仅80年代就有40万犹太人涌入美国,随后又有一百多万犹太人到达美洲大陆。这些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大多操意第绪语,并集中居住在纽约东区。他们不仅在那里做生意经商,同时也建造犹太会堂、设立犹太人学校和进行各种文化活动。包括意第绪文学在内的意第绪文化开始在美国出现。1870年,第一份意第绪刊物《邮报》在美国发行。随后,不断有意第绪刊物问世,其中包括《犹太信息》、《意第绪时报》、《意第绪民众》等。1881年6月18日,第一份意第绪语日报《每日新闻》开始发行。1897年,由著名犹太发行人亚伯拉罕·卡汉主编的《犹太每日前进报》出版。卡汉坚持使用最常用的词汇和句式,使该报成为美国众多意第绪报刊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份报纸。

S·Z·索贝尔的诗集是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单行本意第绪文学作品,1877年正式发行。在这以前,大多数作品都在欧洲印刷出版。19世纪80年代,约有70名意第绪作家在美国发表了作品。早期较有名声的作家是诗人莫里斯·温克维斯基。他是位出生在俄国的作家,后在欧洲从事创作,1894年移居美国。他的诗歌表达了对受压迫穷人的同情和关怀,作品中充满了抒情色彩。美国第一代著名意第绪诗人还有罗森菲尔德,埃德尔斯塔特和波夫肖弗等。

最早在美国流行的是意第绪戏剧。80年代以来,意第绪戏剧一直是移民文化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戏剧的流行造就了一批剧作家。在这些剧作家中,雅各·戈丁是最著名的一位。尽管他的不少作品是根据其他作家的作品改编而来,然而他的艺术才华和成就还是最高的。当时,他的剧作《犹太李尔王》等拥有大量观众。其他有杰出贡献的剧作家还有列奥·科布林、以色列·列宾、B·戈林等。他们的剧作对丰富意第绪戏剧舞台起到了巨大作用。随后,著名意第绪文学家如肖洛姆·阿莱赫姆、大卫·平斯基、肖洛姆·阿施、佩雷茨·希尔施本、H·利维克也创作了许多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剧作,把美国的意第绪戏剧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美国意第绪戏剧的繁荣一直持续了近50年。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新移民的减少,老一代犹太人的去世,以及新一代犹太人的

美国化,意第绪戏剧与其他形式的文学一道开始急剧衰退。到60年代,只有一些业余剧团在周末举行演出。今天,除了节日期间或有个别业余剧团演出外,意第绪戏剧基本上完全从美国舞台消失。

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01—1944年间,约有150万犹太移民在美国落户。美国的意第绪文学开始得到迅速发展。纽约市一跃成为除东欧以外最主要的意第绪文学中心。四大意第绪报刊《每日新闻》、《犹太每日前进报》、《犹太摩肯日报》和《真理》以较大的版面开辟文学专栏,成为发表意第绪小说、诗歌、故事、文学评论的主要固定阵地。这些报刊的存在和流行极大地促进了意第绪文学在美国的发展。许多名作都首先在上面刊登,然后再印成书籍发行。

第一个文学团体“青年作家社”于1917年在美国出现,由青年作家大卫·伊格纳托夫、玛尼·莱伯、泽沙·兰多、罗本·爱斯兰德、I·J·施瓦茨等人组成。青年作家社的成员在使意第绪文学现代化,充满活力,和扩大影响方面贡献良多,并使意第绪文学在美国扎下根来。在这之后,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文学团体,这些团体都在一定程度上或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意第绪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出现的意第绪作家的数量是空前的,数以百计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活跃在各个文学领域。其中诗人的队伍尤为庞大,象E·格林伯格、A·卡兹、A·利爱辛、H·罗森布拉特、I·泰勒、W·耶胡阿西都有优秀作品发表。他们的作品或是表达个人的情感,或是表达民族的愿望,或是描写在旧世界的传统,或是反映在新大陆的生活,都很有特色。在小说创作方面,美国的意第绪作家也成绩斐然。著名的作家有历史小说家约瑟夫·奥帕托舒、擅长撰写各种主题长篇小说的肖洛姆·阿施、以描写著称的I·施纽和I·J·辛格、散文家L·夏皮洛,以及罗森菲尔德、S·米勒、B·戴姆布林、J·格拉斯坦等人。所有这些作家都以其个人风格、描写主题对意第绪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意第绪文学相比,美国意第绪文学的最大特点是较多地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影响。美国的自然风貌、大都市的经历、美国化的移民是这一时期美国意第绪文学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美国的意第绪文学仍受到东欧文学传统风格的影响,因为美国所有的意第绪文学家都由移民组成,都是在欧洲传统教育下长大的。尽管不少人作出了很大努力,但终究未能在美国培养出本土土长的意第绪语作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美国意第绪文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这一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东欧犹太社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美国,从事意第绪文学的作家队伍在失去新的移民情况下,几乎是后继无人。战后意第绪文学的主题也在较大程度上集

中在对不复存在的东欧犹太社团生活的回忆、纪念、缅怀上,使不少作品带上自传的色彩。不过,意第绪文学在总体上呈衰落趋势的同时,仍有个别作家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艾萨克·巴什维·辛格。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大奖的意第绪文学家,为正在萎谢的意第绪文学抹上了很可能是最后一抹绚丽光彩。

意第绪语 犹太人在流散期间创作出的一种语言,主要为中欧、东欧以及后来美洲犹太人所使用。意第绪语属于一种混合语言,采用希伯来字母拼写,语法结构由日耳曼方言演变而来。

意第绪语出现于10世纪,由当时居住在法国北部,后迁徙至莱茵河畔德国城镇的犹太人依照当地的日耳曼方言首先创造出来,后逐步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接受和使用。它的基本句法与日尔曼语相似,拼写采用希伯来字母,书写形式与希伯来语一样,从右到左。它的词汇有15%到20%来源于希伯来语,70%到75%来源于德语、波兰语、俄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以及其他斯拉夫语,5%来源于其他语言,如法语、拉丁语等,19世纪开始出现来自英语的词汇。

意第绪语的历史可分为:(1)意第绪语形成时期(公元1000—1250年),主要在日耳曼地区犹太人中口头使用。(2)古意第绪语时期(公元1250—1500年),开始向周围地区扩散,在犹太人进入“隔都”犹太人居住区后得到较多使用,形式基本固定下来。(3)中古意第绪语时期(公元1500—1750年),语言中心移向东欧,并在东欧犹太人中迅速普及,成为许多犹太人的母语。意第绪语文学开始出现,第一份意第绪语报纸出版,语言词汇开始丰富。(4)现代意第绪语时期(公元1750—现在),意第绪语继续发展丰富,在18世纪启蒙运动后成为“生活语言”、“大众语言”,并在19世纪造成意第绪文学繁荣景象,同时开始在美国犹太社团中使用。1910年第一所意第绪语学院在美国建立,在欧洲和美洲出现了许多意第绪语剧团。据估计,20世纪20年代,全世界犹太人中的2/3懂意第绪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约有1100万人使用过这一语言。

意第绪语主要有三种方言:立陶宛方言、波兰方言和乌克兰方言。其中立陶宛方言占主导地位,影响最大。美国出版的意第绪语报刊、书籍均以此为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大批犹太人遭希特勒纳粹屠杀,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加快,以及以色列国官方对意第绪语的人为排斥,因而使用该语言的人数锐减,使用范围也逐渐缩小。目前,年纪越大的犹太人中懂意第绪语的人越多,听懂的人多于会说的人,会说的人多于会阅读的人,会阅读的人多于会写的人。

意第绪语科学研究所 原名为意第绪语科学组织,研究意第绪语和这种语言的文学、民间创作以及犹太历史和文化的国际犹太组织。1925年根据意第绪语专家和文学史家巴尔·季米容(1879—1933)的倡议建立,中心设在维尔诺(维尔纽斯),分部设在柏林、华沙和纽约。意第绪语科学研究所之友协会在奥地利、阿根廷、巴西、英国、拉脱维亚、罗马尼亚、法国、智利、巴勒斯坦和爱沙尼亚进行活动。意第绪语科学研究所作为意第绪语研究中心开始自己的工作,它的成员在东欧城市中搜集语言和民间创作材料。随着该组织兴趣范围的逐渐拓展,它设了四个部:哲学和文学部,领导人为M·瓦因拉依赫(1894—1969)、副手有A·加尔卡维(1863—1939)、尼格尔、普利卢茨基和雷津等;历史部,领导人为切利科维尔、副手有杜勃洛夫、金兹堡等;经济统计部,领导人为列辛斯基(1876—1966)、副手有本·阿季尔(1878—1942)、P·格尔什(1882—1955)等;心理学教育部,领导人为L·列列尔(1887—1965)。该组织的论文集成为意第绪语研究的重要路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第绪语科学研究所的美国分部肩负起中心所的职能(1940)。该所在维尔诺的图书馆藏有10万册图书和大量档案资料,其中一部分被纳粹销毁,其余的被运到德国,战后归还给该所的纽约中心。运往纽约中心的还有隔都囚徒抢救出来的5千份珍贵档案资料和图书珍本。在纽约,在瓦因拉依赫的领导下,培训了一代新学者,并重新建立了图书馆,藏有30多万册图书和档案。1968年建立了M·瓦因拉依赫高级研究中心,设有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文学和民间创作讨论班。从1953年起,在意第绪语科学研究所的关心下,开始编辑出版12卷本的《意第绪语大辞典》(1—4卷,1961—1980)。自1971年起,这项工作在耶路撒冷进行。

数字 被认为具有特殊含义的数目字。《圣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字是7,因而7在犹太人心目中一直是个吉祥的数字。安息日在一周的第七天;每第七个年头为安息年;七个安息年之后是50年节;逾越节和住棚节的节期都是7天。10是另一个常在《圣经》中出现的数字。亚伯拉罕曾向上帝祈求只要所罗玛城中有10个义人就不毁灭该城;上帝在西奈山上授予摩西的诫命共有10条;《圣经》规定地上万物的十分之一必须留给利未族和穷苦人。上述两个数字还经常与犹太教礼仪活动联系在一起;在安息日仪式上被请到圣坛上诵读圣书人的数目为7;住棚节结束日和西姆哈斯《托拉》节人们要在犹太会堂中绕10圈以示庆祝;要组成一个独立教会进行集体祈祷必须有10位成年男子;只有当10位成年男子在场的情况下方可在饭后做感恩祷告。另一个有特殊含义的数字是12。一年被分成12个月;雅各有12个儿子;以色列人分成12个支派;黄道的符号也是12。40也是一个为

犹太人所喜爱的数字。大洪水持续的天数是40;摩西在西奈山上呆的天数也是40;摩西两次登山之间的间隔天数是另一个40;各士师治国的太平年也常是40。

希伯来字母所具有的数值以及字母组合所代表的数目对《圣经》评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犹太评注家常常把词或词组字母所代表的数值加起来,然后再根据数值的总和对词语作出解释。这一作法在喀巴拉派中尤为流行。

《圣经》在计算犹太人数时不采用直接计算法也给数字增添了某种神秘色彩。例如,在进行人口普查时,每人投下半个舍客勒币,然后再从钱币的数量中得出人口数,从而避免直接计数人头。当大卫采用直接法统计人数时,大灾难便降临,使七万犹太人丧生。故直到今日,虔诚的犹太教徒在统计是否达到法定教徒人数时,仍不用直接点人头的办法,而是选一行有10个词的诗句,每人诵读其中一个词,以确认在场的人是否达到法定教徒人数。

希伯来字母最初同时兼有表达数字的功能,它们与数字对应关系为:第一个字母到第十个字母分别代表1到10十个数。第十一个字母到第十八个字母分别代表20到90逢10的数。第19个字母到第22个字母分别代表100到400逢100的数。

塞多姆 又译塞杜姆,以色列西南部位于死海南端的工业基地。是以色列议会1961年批准建立的死海工厂所在地。据说《圣经》中的所多玛(即塞多姆)和蛾摩拉两个城镇原址就在附近。这两个城镇被“硫磺与火”毁灭,后来所多玛即成为邪恶和灾难的同义语。现代塞多姆即来自希伯来语的所多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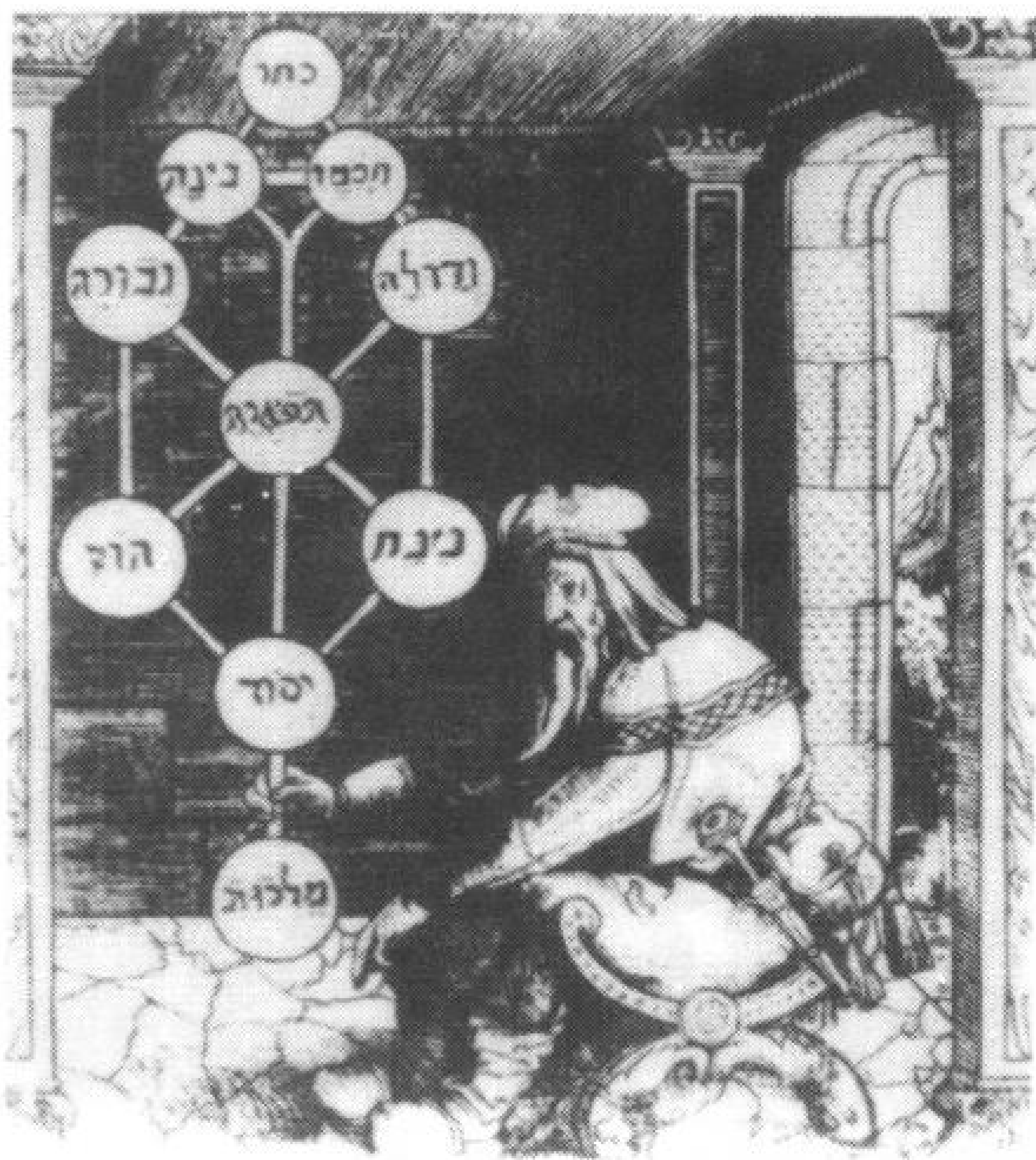
塞多姆建立于1934年,是在死海北端卡利亚的巴勒斯坦钾碱公司建立的一个分厂。当时塞多姆与外界没有陆上道路连通,运输靠死海上的小船。1948—1949年巴勒斯坦战争初期,卡利亚被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夺取,塞多姆的对外联系被切断,靠空运维持了6个多月。后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部队从比尔谢巴穿过内盖夫抵达塞多姆,才建立了该地与外界的联系。

1952年塞多姆与比尔谢巴之间的全天候公路建成通车。1954年塞多姆死海工厂恢复生产。死海西南角大部分浅水区被用堤坝圈起,海水被用泵抽到晒盐池,经过日晒蒸发后便可得到不纯的光卤石。工厂利用光卤石可提取纯度为97%的钾碱,进一步加工还可生产溴和溴化乙烯。除俄罗斯远东外,塞多姆是整个亚洲和非洲唯一生产钾肥的地方。70年代后期,年生产能力已超过120万吨。由于气候潮湿加上夏季高温(8月份平均气温34.3℃),工人们都不在当地居住,而是每天从西面的阿德拉和迪莫纳乘车到此工作。

塞特 (Seth) 古希伯来人名。亚当与夏娃的第三

个儿子。亚当的长子该隐因嫉妒弟弟亚伯，便在田间将亚伯杀了，由此受到上帝的诅咒，流落到挪得之地。之后，亚当与夏娃又生一子，因其酷似其父亚当，得名“塞特”。据《创世记》记载，塞特是挪亚的祖先，挪亚是上帝洪水灭世后，所存留下来的家族。《圣经》记载塞特的家谱为：塞特—以挪士—该南—玛勒列—雅列—以诺—玛土撒拉—拉麦—挪亚。挪亚有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由这三个儿子繁衍出世界的各种族。塞特 105 岁时生子以挪士，912 岁时去世。

塞菲洛 犹太教喀巴拉神秘主义用语，指不可知的上帝借以彰显自己是造物主的 10 个溢出阶段或 10 种大能。该术语来源于早期神秘主义思想，原指造物主上帝的 10 种表征之一。在喀巴拉文献中，特别是在 12 世纪出现的《光明之书》以及普罗旺斯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盲人艾萨克的评注中，此语的意义逐步演变，终于成为喀巴拉神秘主义者所使用象征的中心系统。



“塞菲洛”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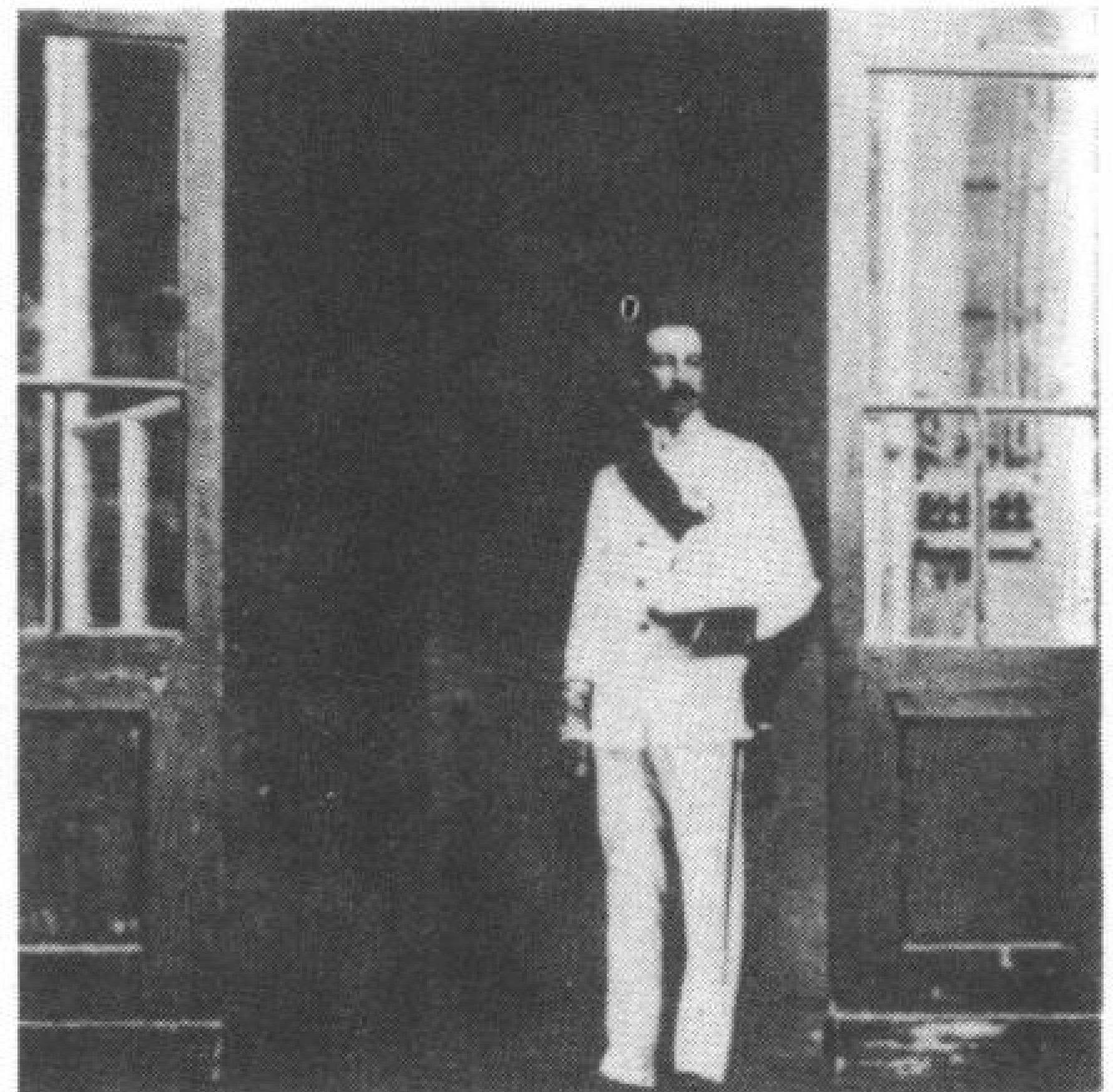
塞菲洛有不同的表征，每种表征都有自己的名称。它们的名称和含义分别是：(1)至尊冠冕，指上帝头脑中的至圣力、圣愿和至圣思想；(2)慧，指上帝造物之计划；(3)智，指世间万物之来源或源泉，以上三种在喀巴拉神秘主义象征体系中指造物主的头部；(4)爱，指造物主的右臂，系圣爱之源泉；(5)大能（亦称法），指造物主的左臂，系公正和惩罚之来源；(6)美，代表圣体或心，是圣慈之来源；(7)恒在，指造物主右腿；(8)威，指造物主的左侧，恒在和威都是爱和大能的低一级具体化形式；(9)根本，指造物主的阳具，系造物主的力量在宇宙中流溢不息的表现；

(10)王权，是一种分离的阴性体态。上述九种表征的因素都包含在其中。王权在反映这些表征的同时，掌握着整个创造出的现实世界。

盲人艾萨克认为塞菲洛是一种已知的、由神创造的一种隐秘、无形的东西。世界上万物都是塞菲洛在现实世界里的具体化，而神秘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一种媒介，以达到与上帝的思想的统一。

塞缪尔 (Herbert Louis Samuel, 1870—1963)

英国政治家，首任驻巴勒斯坦总督。生于利物浦一著名英国籍犹太人之家。早年在伦敦东区犹太人居住区从事社会福利工作。1902 年当选为下院议员。1906 年，他所属的政党执政，他开始进入政府，两度担任邮政大臣，是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犹太身份进入英国内阁的犹太人。1915 年，向内阁同僚散发了巴勒斯坦问题备忘录。他提出在土耳其被打败后，应该在巴勒斯坦鼓励犹太人在该地建立定居点，逐步实现一个由 300 万犹太人组成的多数自治体。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引起了劳合·乔治的极大兴趣，而且对劳合·乔治担任首相后最终发表《贝尔福宣言》起到了重要影响。他还在内阁中大胆为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辩护，大力协助魏兹曼游说英国政界要员，争取支持的各种活动。



塞缪尔

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他积极支持国联将巴勒斯坦交由英国政治托管的主张，并多次访问该地区了解建立地方政府的种种可能。次年，当劳合·乔治任命他为英国驻巴勒斯坦总督时，他欣然接受。他的任职一事使他在事实上成为自 2000 年前罗马帝国驱逐犹太人，统治巴勒斯坦以来第一位重新管理圣地的犹太人。在他任巴勒斯坦总督的 5 年期间，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犹太人口增加一倍。然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也开始加剧。他企图不偏不倚管理这一地区,却不成功。他任命一个犹太人为耶路撒冷行政长官,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对;任命候赛尼为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大穆夫提以及宣布“将停止迁入犹太人”的声明,使犹太人大为恼火。

1925年,他离开巴勒斯坦,仍支持犹太人的事业,为犹太民族的最大利益奔走。去职后,他担任过巴勒斯坦电力公司总裁和希伯来大学董事会董事长。1939年,英国政府发表了不利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发展事业的白皮书,他对此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又反对英国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1937年,英国女王封他为子爵称号。

塞缪尔不仅是位著名的政治家,还是位有建树的哲学家。1931年至1959年一直担任英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发表的哲学著作包括《自由主义》(1902)、《实用伦理学》(1935)、《信仰与行动:日常哲学》(1937)、《创造性的人》

(1949)、《现实的探索》(1957)等。

辟拉 (Bilhah) 古希伯来人名。雅各的妾,拉结的婢女。雅各在舅舅拉班家做工20年,娶拉班的两个女儿利亚、拉结为妻。雅各喜爱拉结,因为拉结生得漂亮,但拉结不会生育,利亚却生了流便、西缅、利未和犹大4子。拉结很嫉妒姐姐利亚,便让自己的使女辟拉作雅各的妾。辟拉为雅各生子但和拿弗他利。“但”在希伯来语的含义为“伸冤”。意指自己不生育,但是我的使女却代替我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上帝听了我的声音,为我伸了冤。拉结的使女生了但之后,接着又生了一个,拉结给这第二个儿子起名拿弗他利。“拿弗他利”的意思就是“相争”,用拉结的话说,就是我与我姐姐(利亚)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以后,但与拿弗他利也成为以色列12支派中的两个支派。

十四画

墙上的字 《希伯来圣经》典故。喻指凶兆或灭亡前的预兆。源出于《但以理书》第5章。据载，巴比伦国王伯沙撒在雄伟华丽的王宫里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大臣、皇后、嫔妃们寻欢作乐。席间，他叫人把从耶路撒冷圣殿掠夺来的金银器皿拿来作酒器，大家一边喝酒一边称赞金银木石制作的雕像。当宴会正达到欢乐的高潮时，忽然一只神秘的手显现出来，在宴会厅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下三个神秘的字：“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伯沙撒王一见这只神秘的手，吓得面如土色，心慌意乱，四肢瘫软，浑身颤抖。稍一定神，他吩咐人把全国最高明的哲士和法术师请来，叫他们解释墙上的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应许给能讲清楚的人重赏。这些哲士、术士看着墙上的字，个个面面相觑，无人能解释这三个字的意思。伯沙撒王及众大臣更加惊恐。这时，巴比伦国的老太后来了，她劝慰国王说，有一个希伯来族的哲士但以理，其人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又聪明，能圆梦、释谜语，他必能解释墙上的字。于是，但以理被召到国王面前。但以理毫无惧色，指责伯沙撒说：上帝曾把王位、权柄、荣誉、威严赐给你的父亲，但他孤高自傲，狂妄专横，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誉。你作为他的儿子，虽明知这一切，却仍不自重，竟敢拿上帝圣殿里的金银器皿来饮酒，还赞美那些金银木石的偶像。因此，上帝显出手来在墙上写字警告你。墙上的三个字说的是：“弥尼”是“数算”、“提客勒”是“用秤称”、“乌法珥新”是“分开”。总的意思是：上帝已经数算你国家的年日到此结束；你被放在天秤上称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家要分裂为玛代和波斯。就在那天夜里，伯沙撒王被杀，波斯大利乌王夺取了巴比伦王国。

嘉道理家族 (the Kadoorie Family) (一译卡杜里家族) 19世纪末至20世纪远东著名犹太家族。自犹太民族大流散以来，祖籍为巴格达的嘉道理家族一直是当地主要犹太家族之一。历史上，由于连姻，嘉道理家族与另一著名犹太家族——沙逊家族有亲属关系。在巴格达，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和放债。1880年，该家族部分成员来远东谋生，开创了嘉道理在远东的创业活动。

埃利·嘉道理(Sir Elly Kadoorie, 1867—1944) 远东嘉道理家族创始人。1880年5月20日经印度孟买抵达香港，在那里的沙逊公司供职。在这期间，他曾先后被派往上海、威海卫、天津、芜湖、宁波等通商港口城市短期

工作。后因对问题处理意见不和，被沙逊公司解职而独立门户，开始了自己的事业。1897年，与英国一著名犹太慈善家莫卡塔之女结婚。在随后10年中，与合作人开设公司。1910年，去英国定居，但一年后又回到香港亲手处理公司事务，并在上海开辟业务。1914年前，已将公司总部迁至上海，在上海经营建筑、公用、地产、金融等业。20年代，成为上海塞法迪犹太社团中一位有影响人物，从事多项慈善、公益事业，特别在建立学校和医院方面贡献良多。1926年，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的善举，被英王授予爵士封号。30年代，埃利·嘉道理爵士父子公司成为上海主要犹太财团之一。他是上海的巴勒斯坦基金会主席，在巴勒斯坦兴办了几所农业学校，并捐赠巨款建造希伯来大学。他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基尔库克办过眼科医院、盲人学校和多所缝纫学校及男、女学校。在上海，他捐款建立了一所结核病疗养院和中山医院的皮肤科。他耗费巨资建造的住宅“大理石大厦”是一所美轮美奂的宫殿式建筑，现为上海市少年宫。1941年12月，随着日军占领香港，埃利·嘉道理因其拥有的英国国籍被日军囚禁，1944年，在日本人的囚禁中死亡。

劳伦斯·嘉道理(Lord Lawrence Kadoorie, 1899—1993) 埃利·嘉道理之子。生于香港。少年时代曾在上海就读，后在英国获法学博士和专业律师资格。1944年其父逝世后与其弟霍瑞斯·嘉道理共掌嘉道理财团事务。1938年以后，有17000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逃避纳粹迫害陆续到上海时，霍瑞斯和维克多·沙逊等犹太富商为救济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霍瑞斯在其嘉道理洋行安排会议，邀请了国际救济组织以及塞法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两个社区的所有宗教团体和救济组织的代表参加，协调一致了行动。霍瑞斯并担任了教育和文化小组领导，为难民儿童和成人提供教育，建立了上海犹太青年协会和上海犹太青年学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劳伦斯先后被日军关在香港和上海闸北的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伦斯回到香港，后被封为勋爵。目前他仍任埃利·嘉道理爵士继承公司、圣乔治建筑公司、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施罗德和渣打公司、香港地毯制造商公司、南洋棉纺厂公司的董事长以及香港大学董事会董事。以他为主席的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参与了1984年兴建的广东省大亚湾大型核电站发展计划。1992年3月12日，在中外合作开发南海油气销往香港的协议在北京签署时，他的儿子麦克·嘉道理(1941—)以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的身份出席了签字仪式。

赫尔佐克, C. (Chaim Herzog, 1918—)

以色列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以色列第六任总统。生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其父是以色列首任阿什肯纳兹大拉比。在北爱尔兰长大。1935年随家人移居巴

勒斯坦。先后在都柏林的韦斯列学院、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法律学校、伦敦大学以及剑桥大学学习。曾获伦敦大学法学学士学位，是英国最有声望的法律协会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英军，曾在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后备军官学校受训，后成为英国一支侦察部队的首领，率部在德国北部活动。1947—1948年任犹太代办处安全部门负责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他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军官。1949年和1959—1962年期间，领导以色列军事谍报工作。1950—1954年先后任以色列驻美国和加拿大大使馆武官。1954—1957年领导耶路撒冷军区。1957—1959年任南方军区司令。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随后的年代里，他担任过各种商业机构的经理。六日战争期间，他作为以色列电台军事评论员撰写的评论在以色列广为人知。在六日战争以后，他任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首任军事长官。1975—1978年任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任期中积极为以色列所采取的立场辩护，回敬各种各样对以色列的攻击，是一位善于雄辩的外交家。1981年以来一直是议会议员。1983年当选以色列总统，1988年当选后连任。

赫尔佐克一生总是挤时间写作，已发表的主要著作有：《伟大的日子》(1967)、《赎罪日战争》(1975)。他在联合国的部分发言结集成书《谁是被告?》(1978,英文版)、《圣经之战》(1978),以及《阿拉伯以色列战争》(1982)等。

赫尔佐克, I. (Isaac Halevi Herzog, 1888—1959) 犹太学者,以色列国的首任阿什肯纳兹大拉比。生于波兰沃姆扎,曾随父先后在英国利兹和法国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自幼自学犹太教经典,16岁便学完了全部《塔木德》经典。在学习犹太经典的同时,注意学习世俗学科,获伦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16—1919年任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拉比。1919年后在都柏林出任地方拉比,1925年起又被任命为爱尔兰自由邦大拉比。1936年,被选为巴勒斯坦阿什肯纳兹大拉比亚伯拉罕·以撒·库克的继承人。1937年,定居耶路撒冷。任职期间,多次率领犹太人代表团参加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冲突的会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多次前往欧洲设法营救受到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和重新安排由基督教机构和人士抚养的犹太儿童。1948年以色列成立后,成为首任阿什肯纳兹大拉比一职,致力于在现代犹太人国家恢复犹太教的地位和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婚姻和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上持传统观念,使守安息日的规定和犹太饮食法在以色列国得到认可和遵守。

作为一名著名犹太学者,赫尔佐克生前发表了两卷本《犹太法律要义》,去世后又出版了三卷本的《答问》。这些作品现已成为解决当代犹太人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他的儿子哈依姆·赫尔佐克于1983年当选为以色列第六届总统。

赫尔辛基纲领 1906年11月21—27日和12月4—10日在赫尔辛基召开的第三届全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汇编。赫尔辛基纲领制定了1905年革命后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计划。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俄国犹太人的状况,以及在赫茨尔去世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和俄国犹太复国主义的任务。大会上的辩论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部由于乌干达计划所发生的斗争,以及1905年革命后沙皇俄国的变化。大会阐明了“综合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也就是把政治活动同在巴勒斯坦的实践工作(主要是移民)结合起来。关于在散居各地的犹太群众中的“当前工作”——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决议,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中的转折点。这对俄国犹太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在1905年革命期间被吸引到全俄的政治活动中,除了犹太复国主义以外,还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大会担忧,拒绝政治活动在俄国会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犹太群众影响的衰落。I·格林鲍姆就这个问题作了基本报告。辩论的参加者有V·雅布庭斯基、L·莫茨金等人。关于格林鲍姆报告的决议成为巴塞尔纲领第二节的基础,第二节呼吁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各国犹太群众,并孜孜不倦地以犹太复国主义精神领导他们。大会强调,这种活动能够促使犹太人为在巴勒斯坦建立健康的民族生活而斗争。

大会的参加者希望俄罗斯自由化和民主化,这将赋予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包括犹太人以广泛的自治权。赫尔辛基纲领的实施能够使犹太复国主义变成一种不仅仅局限于外交领域和少数先锋人士的运动;因此,这种运动更充分地反映了犹太群众、特别是俄国犹太群众的固有需要。

赫尔辛基纲领的精神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新形式,其中包括文化领域中的新形式。创立了新型宗教小学和以希伯来语授课的世俗学校的网络。决定利用各种可能性以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国家杜马选举等),直至出现独立的犹太复国主义党。第二届杜马解散后,俄国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实践中完全实施赫尔辛基纲领的思想。

赫茨尔 (Theodor Herzl, 1860—1904) 奥地利记者和作家,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缔造者。1860年5月2日生于布达佩斯。他的父亲雅各·赫茨尔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曾任匈牙利银行总经理。母亲耶安尼特天资聪慧,性格温柔。父母都很宠爱自己的独生子赫茨尔。

赫茨尔生长在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家庭中,不过,这个家庭对犹太传统并不陌生。从童年起,赫茨尔就爱好文学,他写诗,组织文学小组。中学时代,他曾在布达佩斯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书评和剧评。他对反犹表现十分敏感,由于老师的反犹言论使他感受到侮辱,他离开了中学。1878

年全家从布达佩斯移居维也纳，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学习，1881年成为大学生联合会的成员。1883年他退出该会，以抗议该会表现出来的排犹倾向。在大学时代，赫茨尔对犹太问题很少感兴趣。象那个时代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他是同化的支持者，认为进步思想将迫使人类弃绝反犹主义。然而，严酷的现实摧毁了他对于解放和进步的拯救力量的信仰。奥根·杜林撰写的《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问题》一书(1881)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和极端恐惧，给他留下了沉重的印象。1884年赫茨尔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和萨尔斯堡的法院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在自传性笔记(1889)中写道：“作为犹太人，我永远不可能获得法官的职务。因此，我同时与萨尔斯堡和法学告别。”自1885年，赫茨尔全力投入文学活动。他写了许多剧本、小品文和哲理性小说。他的某些剧本在奥地利一些剧院的演出中获得成功。1889年与尤丽娅·娜绍耶尔(1868—1907)结婚。由于妻子不理解、不支持他的观点，致使婚姻并不成功。

自1891年10月至1895年7月，赫茨尔担任有影响的维也纳自由主义报纸《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作为大报记者，他有机会在巴黎参加一切重要活动和采访各阶层人士。正是在这里，犹太人的困难情景才有可能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屡次听到反犹言论，促使他关于通过同化来解决犹太问题的观点逐步改变。这种变化体现在他的剧本《隔都》(1894，后又改名为《新隔都》)中。

赫茨尔的观点和生活中的根本转折，是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下形成的。响彻巴黎街头的“杀死犹太人”的吼叫声，使他彻底相信，解决犹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把散居在笼罩着反犹情绪国家的犹太人，移居到自己的国家中去。1895年6月，他拜访了著名的慈善家莫里茨·希尔施男爵，希望他能够支持自己的计划。这次拜会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他没有灰心，开始写日记，并给这本日记起名为《犹太问题》。1896年2月14日，他阐明自己纲领的著作《犹太国：犹太问题的现代解决尝试》出版。同年，还出版了该书的英、法、俄、希伯来和罗马尼亚语译本。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犹太问题不应该通过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移居或者同化来解决，而要通过创立独立的犹太国家来解决。这个国家的建立应该遵循预先深思熟虑的计划，并利用一切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犹太国家应该充满社会进步(例如，确定7小时工作制)、自由(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不信教)和博爱(其他民族与犹太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精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赫茨尔认为必须建立两个机构——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前者为犹太协会，作为犹太人民的正式代表；后者为犹太公司，负责财政和具体建设。他建议通过犹太金融家的资助获得必要的经费，只有在遭到他们的拒绝后，才向广大犹太群众吁求帮助。

各个犹太阶层以不同的态度对待赫茨尔关于建立犹

太国的思想。大部分西欧犹太人拒绝赫茨尔的计划，西欧犹太人中只有少数著名的活动家(M·诺尔道，I·赞格威尔)支持它。然而，东欧锡安热爱运动的许多成员和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奥德和其他国家的大学生(大部分为东欧移民)，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赫茨尔的思想，希望他领导准备献身这个计划的众多团体。同这些人的交往使赫茨尔深信，犹太人关于犹太国家的概念，同曾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存在过的犹太故国不可分离。因此，这种运动必然要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赫茨尔成为这个运动的领导后，积极地开展了政治活动。他努力争取有影响的贵族、巴登大公爵、罗马教皇的使节以及土耳其政府的支持。然而，他未能使英国犹太人的领导人、锡安热爱运动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和犹太垦殖协会支持他的计划。法国埃特蒙·德·洛希尔男爵也拒绝支持他，认为不可能组织犹太群众实现复国主义计划。这种拒绝、特别是拒绝的理由激起赫茨尔着手筹建全体犹太人民的代表机构。1897年3月，德国、奥地利和加利西亚锡安热爱者运动的大部分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通过了他关于召开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建议。为了传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他自己出资创办了德文周报《世界》，第一期于1897年6月4日问世。

1897年8月29—31日，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它通过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纲领(即《巴塞尔纲领》)，创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任主席，他任这个职务直至去世。在那些日子里，赫茨尔写道：“如果须要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总结巴塞尔会议的话，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在巴塞尔我缔造了一个犹太国家！”在大会上，俄国犹太代表团的力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俄国犹太人。我们不曾料到他们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平……约有70位俄国犹太代表出席了大会。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代表了500万俄国犹太人的意志和感情。”

大会以后，赫茨尔立即着手筹建犹太复国主义银行，以保障同土耳其政府谈判的经济基础。1898年8月28—31日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银行的决议，并在次年3月付诸实施。银行办事处设在伦敦，雅法设有分行(1903)。第二届大会以后，在巴登大公爵的帮助下，赫茨尔取得土耳其在欧洲的唯一盟友德皇威廉二世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同情。1898年11月2日他同威廉二世在耶路撒冷正式会晤，然而会晤没有取得结果。在这期间，他第一次访问了巴勒斯坦。在土耳其秘密警察监视下他来到米克维以色列、里顺济温、奈斯郁纳和雷霍沃特。犹太移民唱着希伯来歌曲，高呼“赫茨尔万岁！”等口号欢迎他。1901年5月17日，由A·万别利(1823—1913，匈牙利东方学家，土耳其外交部长秘书)作中介，赫茨尔同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会晤，1902年2月和7月，又同土耳其政府代表

会晤,可是均无结果。对土耳其所需要的财政援助,赫茨尔无法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而土耳其人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不同意作出任何让步。这一切迫使赫茨尔把目光转向英国以寻求支持。他从自己的政治活动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英国对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意义。1902年,他应邀去伦敦参加关于外国人(主要是犹太人)移居英国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他宣称,为了立即解决犹太人走投无路的状况,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不放弃自己的纲领(在巴勒斯坦创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同时,也可以考虑其他方案。他建议在置于英国保护的、离巴勒斯坦很近的西奈半岛艾尔·阿里什建立独立的犹太居民点。这个计划未被接受。在谈判过程中(1903),英国政府建议在它管辖的东非(乌干达)建立自治的犹太居民点。考虑到罗马尼亚犹太人遇到的灾难和俄国基什尼奥夫发生的反犹暴行,赫茨尔认为,即使和英国政府就乌干达问题进行谈判也是可行的,同时继续为争取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而斗争。1903年8月5日,他启程去俄国,试图改善俄国犹太人的处境,并在同土耳其关于巴勒斯坦的谈判中力求得到俄国的支持。他先后同俄国内务部长和财政部长会晤,俄国方面允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同土耳其苏丹的谈判中支持他们,并同意犹太垦殖银行在俄国活动(该银行后来逐渐地形成了英国—巴勒斯坦公司,从1950年起成为以色列国家银行)。

1903年8月14日,当赫茨尔还在俄国的时候,英国政府宣布支持在乌干达建立独立的犹太移民区的计划(移民区由犹太人任总督,归英国最高政府管辖)。征得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执委会同意,赫茨尔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巴塞尔,1903年8月23日—28日),提出乌干达方案供代表们审查。尽管他坚决宣称,这个方案不替代犹太复国主义的最终目的,但还是引起了部分代表、特别是俄国代表的狂怒,他们甚至谩骂赫茨尔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基本思想的叛徒。当向乌干达派遣“领土考察团”的计划以多数票(298票对178票)通过时,俄国代表挑衅地退出了会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面临分裂和瓦解的危险。大会以后的几个月中,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报刊和群众集会上,就乌干达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1904年4月11日—12日,赫茨尔召开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执委会扩大会议。经过尖锐的争辩,他成功地反驳了对他的背叛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指控,并协调了同反对派的关系。不过,他还是遭到主要来自俄国的青年犹太复国主义者(Ch·魏兹曼,J·伯恩斯坦—柯冈,L·莫茨京)的反对,他们指责他轻视文化活动,对巴勒斯坦当前的移民工作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赫茨尔最尖锐的批评者阿哈德·哈姆也批评他没有努力复兴犹太文化,他的犹太国家没有犹太民族风貌。

由于紧张的争论和无休止的工作,赫茨尔早已患有心脏病恶化。会议一结束,人们立即把他送到兰森(捷

克)去治疗。后来他又并发肺炎,终于在1904年7月3日去世,时年44岁。根据他的遗嘱,在把他的遗骸运往未来的犹太国家之前,把他安葬在维也纳他父亲的墓旁。1949年8月14日,他的遗骸运往以色列,安葬在耶路撒冷的高山,即今天的赫茨尔山上。在他的墓地不远处,建有赫茨尔博物馆。他去世的日子被以色列定为全国纪念日。

赫茨尔子女的命运悲惨。大女儿葆莉娜(1890—1930)自杀身亡,儿子汉斯(1891—1930)1906年信了基督教,姐姐去世后,他在姐姐的墓旁(法国波尔多)自尽。小女儿玛加列特(1893—1943)死在纳粹集中营中。

赫茨尔在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预言,大家也许在5年内,无论如何,在50年内将会看到一个犹太国家。这个预言发表51年后,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宣告成立。

赫茨利亚 亦译海尔兹利耶,以色列中西部城市。在特拉维夫—雅法以南。1924年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资助下建立,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赫茨尔的名字命名。最初的移民定居区距地中海4公里,经济以种植柑桔的农业为主。后随着特拉维夫的发展,赫茨利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为特拉维夫市的城郊居住区,赫茨利亚则向西面的海滨发展。海滨新建部分被称为赫茨利亚—比图,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这里有许多豪华的旅游饭店和私人住宅。

城北就是古代迦南的里谢夫城旧址,公元前2世纪成为犹太人统治的地方,曾被数度摧毁。公元3世纪时希腊人在这里建成阿波罗尼亚城。7世纪阿拉伯征服后改称阿苏夫。1191年十字军在这里取得一次大胜。1986年人口52000人。

赫兹 (Gustav Ludwig Hertz, 1887—1975)

德国犹太物理学家,19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生于德国汉堡,是19世纪世界著名电磁学家H·R·赫兹的侄子。幼年曾受到叔叔的指点。青年时代先后在哥丁根、慕尼黑和柏林等大学学习。1911年获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13年,与同乡物理学家夫克兰共事。1914年,被应召入伍,两度受伤,险些丢掉性命。1920年,在荷兰一物理实验室找到工作,重新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后来,他与夫克兰合作从事电子和原子碰撞规律的研究。由于他证明了原子只能定量吸收能量的理论,与夫克兰共获19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1925年成为哈雷大学教授,并担任哈雷大学理学院院长。1928年,去柏林的夏洛滕堡技术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32年,创造出一种分离氘同位素的方法。希特勒上台后,他因不满纳粹暴政,于1934年辞去了教授职务,并离开德国。1935年应美国西门子工业研究所的邀请,担任该所第二研究实验室主任。1945—1954年,在苏联从事科学研究。1954年回到德国,

在莱比锡物理研究所任教授兼所长,直至1961年退休。

赫维西 (George Charles de Hevesy, 1885—1966) 匈牙利犹太化学家,194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父亲是个农场主。1903年,进入布达佩斯大学。两年后,转入德国弗赖堡大学,1908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苏黎世高等技术学校教书。1911年,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从事研究,在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卢瑟福指导下从事镭的化学分离研究。尽管研究未获任何进展,却启发他开展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法研究。1912年,他在维也纳镭研究所与帕内特合作,在示迹研究上取得进展。1920年,受哥本哈根大学邀请,任化学教授,于1923年与同事发现了钷元素。1926年,弗赖堡大学请他回母校主持化学研究,在以后的10年中,他在一系列示踪剂实验方面取得成就,后来又把示踪技术应用到生物学领域,用追踪“作了标记”的放射性磷在体内的行踪研究各种生理过程,他的这一成就为人类认识生命现象的奥秘开辟了道路。他因此而获得1943年诺贝尔化学奖金。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推行反犹主义政策,在弗赖堡大学任教授的赫维西因犹太人身份遭到排挤,于1934年辞职。他离开德国后,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从事研究。1943年,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他乘摇船从纳粹魔爪下逃往瑞典,在斯德哥尔摩有机化学研究所任教授。他一生因学术研究成果卓著,获许多国家荣誉学位称号。1959年,获第二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奖。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放射性同位素探索》等。

赫斯 (Moses Hess, 1812—1875) 犹太复国主义早期预言者和德国首批社会主义者之一。1817—1826年随祖父——一位犹太拉比生活。在祖父的帮助下,他初通《圣经》和《塔木德》。从1830年起在波恩大学学习。在他最初的两本著作《人类神圣的历史……》(1837年)和《欧洲三强》(1841年)中,赫斯论述了犹太人的命运。他认为自己是德国人,猛烈抨击犹太教,主张通过犹太人的解放和鼓励与异族通婚等手段来实现犹太人的完全同化。甚至迫害犹太人的大马士革事件(1840)也未能动摇他的立场。

从1841年底,赫斯成为科隆激进的《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也曾任该报编辑,1843年3月该报被政府禁止),在1842年底,他成为该报驻巴黎的记者。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德国理想主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伦理学的综合)的首领,他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实践伦理学的体现。由此他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评。不过,赫斯仍然是伦理社会主义者,当1846—1851年他追随马克思后,他承认了政治经济因素对于建立共产主义的重要性。1852年后,赫斯住在巴黎,主要从事政论工作。1863年后,他成

为拉萨尔的支持者。

1862年,赫斯在德国出版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著作《罗马和耶路撒冷》。在书中他提出一种思想:人类历史的第一推动力是种族斗争,第二推动力是阶级斗争。两个“世界性的历史种族”——雅利安人和闪米族人在文化领域里共同努力,创造了现代社会。雅利安人力图解释和美化生活,闪米族人则使生活神圣化,并赋予它道德因素。种族差异并不意味着他们有高低之分,因此,没有理由歧视或者压迫某个种族。各民族和谐合作应该成为历史发展的归宿,各民族的独立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前提。犹太民族的独立只有在巴勒斯坦复兴的民族家园中才可能实现。他认为宗教是维系犹太民族独立自存的最好手段。因此,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政治和社会机构之前,不应该使犹太宗教有什么变化。在犹太民族家园中,应该使宗教规则与新社会的需要相适应。按照赫斯的观点,犹太国家结构的基础是:土地公有制,保障劳动繁荣的法规,工业、农业和贸易的社会化。这本书引起了尖锐的争论,并引起赫斯从事工人运动的同道们对他的攻击。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后,这本书就被淡忘了。只是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出现,赫斯和他的《罗马和耶路撒冷》受到应有的评价。《罗马和耶路撒冷》开始被再版,并从德语译成其他语言。赫斯的两卷本文选由马丁·布伯作序,以希伯来语于1954—1956年出版。

赫斯的遗体按照本人意愿被安葬在科隆附近的犹太公墓中,1961年被运往以色列,安葬在太巴列湖畔的公墓中。在以色列纳塔尼亚东南13公里,一家建于1933年的莫沙夫克法尔—赫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赫歇尔 (Abraham Joshua Heschel, 1907—1972) 美籍波兰犹太神学家、哲学家。生于波兰一著名哈西德拉比世家。从小受到系统的犹太教教育,对哈西德主义和喀巴拉思想有精深的研究。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毕业后开始从教,讲授《塔木德》学。著名犹太哲学家布伯曾指定他为继承人,在德国的成年犹太教育中心讲课。1938年,纳粹把他递解至波兰。在华沙犹太学学院从事教学,约在一年后前往伦敦。1940年,移居美国,起先在希伯来协和学院执教,讲授哲学和拉比犹太教。1945年起成为纽约犹太神学院犹太伦理学和神秘主义学教授,直至逝世。

赫歇尔在教学中并不将犹太教单纯视为一种宗教,或一般认识上的哲学现象,而是作为一种将哲学与人的社会经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现象来对待。他认为犹太教首先是一种试图在上帝和人之间建立一种充满活力关系的学说。对于上帝而言,存在着一种对其造物关心和爱的神圣情感,对人来说,则存在着一种迫切希望对人与上帝关系作出响应的欲望。因此,当人以爱和奉献对这种关系作出响应时,人们便看到了犹太教教规的本质。他还指

出当人通过对上帝意志的接受而上升到能与上帝见面、交流的程度时,他便取得了真正的自由。他认为犹太人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记录着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召唤是顺从还是违背的历史,而《圣经》则是一部保存这一历史的书。

赫歇尔还试图通过对犹太教古典来源的探索揭示它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他坚持认为犹太伦理应该成为指导犹太人社会活动的准则。正是这一信念不仅使他在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使他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对话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他参加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高级会谈,直接导致了梵蒂冈二世呼吁改善天主教与犹太教和犹太人之间关系声明的发表。

作为一名学者,赫歇尔一生著述甚丰。《人并非孤独》(1951)和《寻找人的上帝》(1956)是两部反映他神学观点的重要著作。其他著作还有《安息日》(1951)、《人对上帝的追求》(1954)、《人是谁》(1962)、《以色列、一种永恒的回音》(1969)。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讲演。

歌利亚 (Goliath) 古代非利士一巨人将帅。希伯来统一王国扫罗王时代,非利士人入侵,扫罗率以色列士兵在以拉谷安营,迎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站在这边的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歌利亚是非利士人中的迦特人,他身高三公尺,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7公斤,腿上有铜护膝,肩上背着铜戟,他的矛粗如织布的机轴,铁矛头重7公斤。他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口出狂言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作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么?你们不是扫罗的什人么?可以从你们中间选出一人,要他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作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作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扫罗王和以色列士兵听到歌利亚的话,都很惊惶、害怕。扫罗王悬下重赏,若有以色列战士能上去杀死歌利亚,王必赏赐他重金,并把王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并且免去他父亲家纳粮当差。但是,过了40天,歌利亚每天出来骂阵,以色列士兵没有哪一个感到自己有战胜歌利亚的把握。正在这时候,大卫奉父命到前线探望几位在军中的哥哥,他听到了这件事,就主动向扫罗王要求出战,扫罗王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大卫向扫罗王表示:“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羊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去打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来。它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将它打死。你的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也必象狮子和熊一般。”于是扫罗王允许大卫去迎战,大卫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击歌利亚。

歌利亚看到对手年轻俊美,非常藐视他,他嘲笑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大声地诅咒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

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歌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上帝的名。……今日上帝必将你交在我手中,我必杀你,斩你的头。”歌利亚迎着大卫冲过来,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歌利亚的头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在地,这位不可一世的非利士巨人就这样死去了。大卫从他的鞘中拔出他的刀,砍下他的头。于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后来,“歌利亚”一词在西方用来表示“巨人”或“徒有巨人外表的人”。

豪 (Irving Howe, 1920—) 美国犹太文学评论家、教育家。生于纽约。父母均是犹太移民。自幼在纽约布鲁克林犹太居住区长。大萧条使其父的商店倒闭,全家生活在贫困之中。青年时代发奋读书,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军服役。战后开始发表文学评论文章,是当时一些著名文学刊物的自由撰稿人。1953年起先后在数所大学讲授文学,其中包括布兰代斯大学(1953—1961)、斯坦福大学(1961—1963)、纽约市立大学等。

豪的主要成就集中在文艺批评方面。1951年发表的论述美国著名作家安德森的长篇论文引起人们重视,随后发表的这方面论著还有论述福克纳·哈代等人的论文。1957年起,作家开始发表政治文艺论集,较有影响的有《政治与小说》、《一个更动人的世界:现代文学与政治概述》、《新的衰落》等。《我们的父辈世界》是论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人的社会文化专著。《庆贺与攻击》(1979)是一部评论集。《希望之缘:一个知识分子的自传》(1982)对自己一生在文化、政治方面的卷入活动进行了总结性的评论。

精神中心工人党 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正统派犹太教徒组成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1922年,精神中心党巴勒斯坦支部的多数成员退出精神中心党,成立了该党。该党同其母党精神中心党一样,对犹太复国主义作了符合正统派教义的解释,要求用正统教派的信条改造伊休夫和以色列国。它同其母党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成员和支持者多是犹太工人中的正统派教徒,它的宗旨是根据《摩西五经》和劳工利益建设犹太国,发展和加强犹太工人的宗教感情,维护他们的世俗利益和宗教权益。在政治、经济领域,该党基本上追随工党。该党拥有本党的新闻、出版工具和教育、银行机构,建立了维护本党成员和支持者利益的精神中心犹太工总,领导着“宗教基布兹运动”。在以色列建国前的多次犹太民族议会的选举和建国后历届议会选举中,它都和精神中心党联合竞选,并参加了1948—1955年期间的历届政府。以色列建国后它的力量超过了其母党,成为最大的宗教政党。1956年,它和精神中心党合并为全国宗教党。精神中心工人党争取

了大批正统派犹太工人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伊休夫的成长和以色列国的诞生做出了贡献。

精神中心党 由正统派犹太教徒组成的以色列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

精神中心党所代表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主要从犹太教教义出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植根于犹太教中。精神中心党主张：(1)流散中的犹太人容易受非犹太文化的影响，只有居住在圣地，他们才能摆脱这种影响，完全理解犹太教。(2)犹太复国主义为耶和华的特选子民犹太人重返神应允之地，实现世界末日时的拯救提供了条件。(3)巴勒斯坦应最大限度地向犹太人开放，为此，巴勒斯坦应该最大限度地开发农业，以吸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4)在犹太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一切领域都应当严格实行犹太教教义和律法。

1893年，俄国拉比塞缪尔·摩哈利弗发起成立了名为“精神中心”的团体，团体致力于宣传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的互补性联系。该团体的许多成员后来参加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1902年，为了有效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世俗多数派在伊休夫建立世俗教育制度的企图，俄国拉比伊茨哈克·雅可夫·雷恩斯将精神中心改组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的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改组后的精神中心在欧美许多国家和巴勒斯坦都有分支。1918年，精神中心正式成为政党。1921年，该党巴勒斯坦分支的部分成员退党，成立了精神中心工人党。为了同精神中心工人党争夺巴勒斯坦工人中的正统派犹太教徒，1922年，精神中心党将党总部从维尔诺（即今维尔纽斯）迁到耶路撒冷。1949年，以色列精神中心党和另外三个正统派犹太教政党组成“统一宗教阵线”，参加了以色列第一届议会选举。精神中心党在大选中获得全部选票的3.1%。1951年，精神中心党在第二届议会选举中获得两个议席，在1955年的第三届议会选举中，精神中心党和精神中心工人党组成“全国宗教阵线”联合竞选，共得到9.1%的选票，共拥有11个议席。1956年，精神中心

党和精神中心工人党合并为全国宗教党。

精神中心党的成员及拥护者，就经济地位而言多是城镇的中产阶级，就种族而言多是西方犹太人。该党出版有希伯来语日报和期刊，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定居组织和合作性的企业。精神中心党致力于创办一个宗教学校网，1955年，它在美国精神中心运动的资助下，在特拉维夫创办了一所有宗教色彩的大学——巴尔·伊兰大学。在非宗教领域，它基本追随巴勒斯坦工人党，以此换取该党在宗教领域对它的让步。由于以色列实行单一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第一大党巴勒斯坦工人党始终无力单独组织政府。工党的这一弱点使精神中心党得以参加1948—1955年的历届联合政府。精神中心党还迫使议会和政府通过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在公共事务中实行犹太教律法的法律。精神中心党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曾数次挑起政府危机。1951年2月，精神中心党要求对移民安置营中的来自也门的全部儿童进行宗教教育，政府没有完全满足这一要求，该党便退出政府，致使以色列第一届政府垮台。

寡妇的油瓶 《希伯来圣经》典故，喻指取之不尽的财源。出自《列王纪下》第4章。据载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先知说：“我丈夫死了，他敬畏上帝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把我的两个儿子作他的奴仆。”以利沙问她说：“我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她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什么都没有。”以利沙说：“你去，向你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这寡妇离开以利沙，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她就倒油，器皿都满了。她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出来告诉先知以利沙，先知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寡妇的油瓶”于是喻指看似有限而实际是无限的财源。

十五画

慧智知派 犹太教哈西德派的一个运动支派。其名称是以希伯来语中智慧(Hokhmah)、智能(Binab)和知识(Da'at)三词首字母组合而成。该运动支派由利亚德的西纽尔·扎尔曼于1777年创立。该派遵奉哈西德派三条基本教义,即依附、热心、专诚,但特别强调理智在灵性奋斗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被看成是“哲学”方式派。慧智知派理论集中反映在西纽尔·扎尔曼的《警语集》以及其长子所著的《入迷导论》和门徒的一些著作中。慧智知派认为,智慧、智能和知识是上帝头部的塞菲洛,代表圣灵的计划,与代表上帝在创世过程的情感塞菲洛部分相比是属于较高一级的塞菲洛。该派还认为鉴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所具有的塞菲洛成分的顺序也应与上帝所拥有的一样。在塞菲洛溢出(或释放)过程中,情感部分总是出现在智力部分之后。因此,人的宗教感情应该产生于对上帝的入迷沉思。如果一个人试图颠倒这一过程,把宗教感情放在第一位,那么,他就不会具有真正的信仰。扎尔曼之子在他的《入迷导论》中对这一点作了详细的论述,并向人们讲授如何才能到达真正的入迷状态。

对于慧智知派而言,哈西德派所主张的“否定存在”的观念指的是这样两件事:(1)物质世界在人类看来似乎是有形的、确实实存的存在,而在上帝看来,却不代表任何东西,可以说不存在的。慧智知派由此认为世界上除了充满了上帝的光辉外一无所有。(2)否定存在指的是在对上帝沉思过程中忘却自我,超越自我,只有这样,真正的自我(灵魂中神的火花)才会显现。

该派提倡在生活中遵守神的律法,但反对过度禁欲。

聪茨 (Leopold Zunz, 1794—1886) 著名犹太学者,犹太教学科奠基人,犹太文学史家。生于德国德特莫尔德。1821年获哈雷大学博士学位,后又进入柏林大学研究古典文学和历史。从阿伦·乔林处获得拉比称号。1820年,成为柏林新犹太会堂布道师。两年后,辞去这一职务,在柏林一家日报任编辑,同时担任新成立的犹太公共学校校长一职。然而,他的主要兴趣仍集中在对犹太文献的研究上。为了写作,他曾先后到过世界著名图书馆查阅资料,其中包括伦敦大英博物馆、牛津图书馆、巴黎图书馆和意大利巴马图书馆。由于他的犹太身份,梵蒂冈图书馆拒绝允许他进入和使用该馆的图书资料。

1818年,他的第一部论述犹太文献的著作《论犹太教文献》发表。在书中,他以详实的文献资料向人们揭示:

《圣经》以后的犹太文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广博和优美的文学。同时,他创造出了“犹太学”这一概念,提倡科学地研究犹太教、犹太史和犹太文化。1819年,他与其他犹太学者共同创办犹太文化及科学协会。1823年,担任该协会刊物的编辑。在这份刊物上,他发表过3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关于中世纪著名犹太学者拉什的传记作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篇以科学方法撰写的有关一位犹太学者的传记。1832年,他发表了《犹太礼拜布道的历史沿革》一书,通过对犹太布道仪式的系统分析揭示了中世纪犹太文明的深度,驳斥了那种认为犹太文化已随着《圣经》时代的结束而结束的观点。在另一本名为《论历史与文学》的著作中,他把全部犹太文学活动纳入欧洲文学和政治的范畴内加以考察,以事实纠正了当时学术界对犹太文学的偏见。1836年,德国王室颁布一项法令,禁止犹太人使用德语人名作为犹太人的名字,聪茨受德国犹太社团的委托,写了《犹太人名》一文,用大量事实证明犹太人在历史上就已有使用外国姓名的传统,借以揭示这一法令的荒谬。他还担任过《圣经》译本的主编。他所撰写的一系列评注《圣经》的论文均收入了他的《文集》(3卷本,1875—1876)。

聪茨是犹太历史上第一位主张通过认识自身,即以犹太历史和文学的研究来实现犹太人权利平等的犹太学者。他提出的“犹太学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犹太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

撒兰特 (Israel ben Ze'er Wolf Salanter, 1810—1883) 犹太拉比,伦理运动创始人。后改姓利普金(Lipkin)。生于立陶宛赞盖尔。青年时代在撒兰特犹太经学院学习。深受学院中聪德尔拉比影响。他把聪德尔拉比形容为指引他一生前进的光辉。30岁时,成为维尔纽斯一犹太经学院院长,但不久辞去这一职位,创办自己的经学院。他还开设“伦理堂”,为犹太人提供一个修心养身的场所,一个讨论犹太教的宗教伦理思想的场所。后来这种讨论成为撒兰特学校的正规学习内容。1848年,沙俄政府在维尔纽斯开设犹太经学院,邀请他担任学院院长。撒兰特对此婉言谢绝。为了免遭当局可能施加的压力,他前往科伍洛,创立伦理经学院。1857年,他去德国,在那里创办希伯来刊物。晚年,曾在巴黎居住了两年,为加强那里的犹太研究作出了贡献。后来,他迁居德国柯尼斯堡,直至谢世。

1848年,撒兰特在维尔纽斯发生霍乱大流行期间所起的领导作用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对后世产生影响。他担心禁食会使犹太人抵抗疾病的能力下降,造成犹太人数锐减,遂下令他所领导的犹太会众在赎罪日进食。他本人带头作出榜样,在晨祷最庄严的时刻,一边诵读祈祷词,一边吃着东西。为了增进人们对犹太教的了解,他还建议将《塔木德》译成欧洲语言,在大学中讲授。他建立的

伦理学为立陶宛所有犹太经学院所接受。他还是学习犹太经典高级场所的科来尔的创立人。他利用所得款项为已婚犹太男子提供学习场所和生活费用,以推动犹太经典的深入研究。反映他伦理思想的讲演稿和书信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

撒母耳 (Samuel) 古希伯来人物名。古犹太人最后的一位士师,也是最早的先知之一。其确切的生卒年月已无从考证,与以色列国第一位国王扫罗(约公元前1028—前1013)为同时代的人。他是古代希伯来历史上在摩西与大卫王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宗教领袖。据《圣经》记载,他不但是祭司、士师、先知和军事首脑,而且他还能见异象、具有超凡神力的神人。实际上,他集当时犹太人领袖所能发挥的作用于一身。他为犹太人作出的最大贡献是扶持以色列的开国元首扫罗和大卫王,促进了王国政体的建立。《撒母耳记上》主要记载了他的事业。他的父亲以利加拿,母亲哈拿,属以法莲支派,居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琐非。以利加拿的另一位妻子毗尼拿能生儿育女,哈拿却不能生育。哈拿祈求上帝赐子,上帝顾念她,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起名为“撒母耳”(希伯来文意为“上帝听见”)。哈拿为感谢上帝的恩典,按照自己在老祭司以利面前许下的诺言,在撒母耳断奶后将他带到上帝的殿里,让他终身在殿里侍奉亚卫,作拿细耳人(参见“拿细耳人”)。那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也作祭司,但他们品行不端,老百姓怨声载道。有一天晚上,撒母耳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以为是老祭司以利在叫他,可跑过去的时候以利却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这样一连3次,以利就明白是上帝在呼唤撒母耳。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请说,仆人敬听!’”亚卫向撒母耳说了以利家族的罪恶及日后将要受到的惩罚。第2天早晨,老以利问撒母耳上帝向他说了什么,撒母耳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以利预感到:由于他的两个儿子为非作歹,不务正业,他家必败落,撒母耳将接替他的地位。从此,上帝立撒母耳为先知的事,很快在希伯来人中间传开。不久,希伯来人与非利士人发生战争,希伯来人被打败,以色列长老们为挽救败局,将亚卫的约柜抬到战场前沿,想借上帝的神威使他们得胜。结果还是被非利士人打败,非利士人还掳走了约柜,以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打死。老以利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倒地气绝身亡。撒母耳接替以利作了士师,在撒母耳的率领下,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大败非利士人,并收复了沿海城市。撒母耳年老的时候曾立他的两个儿子做了士师,但他们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百姓很不满意,要求选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撒母耳不高兴他们的要求,认为这样做背弃了上帝的意愿。后来他又根据上帝的旨意膏立扫罗为王,宣布他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率领以色列人大败亚扪人,博得臣民的拥护。但因他宽待敌酋亚甲和亚

玛力人、擅自献祭和贪图财利而失去了撒母耳的信任。撒母耳告诉扫罗王:神已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王,将罢黜他。撒母耳根据亚卫的旨意来到伯利恒耶西家里,挑选了他最小的儿子大卫为王,为他秘密举行了膏油礼,使他日后取代扫罗为王。在以色列王国的建立过程中,撒母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撒母耳·哈—纳吉德 (Samuel ha—Nagid, 993—1056) 西班牙犹太政治家、学者。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早年从商,经营香料店。1013年因战事迁居格拉纳达。他知识渊博,文采照人,特别擅长撰写书信文稿,且写一手好字,在开店营业的同时常为顾客代书信件,其常客之一是当时王室格拉纳达大臣。该大臣十分赏识他的语言和书法才能,聘他为私人秘书,并临终前把他推荐给哈里发哈布斯。因深受哈布斯的器重,不久被任命为大臣,总揽外交和军事事务。1037年哈布斯死后其长子继位,国事主要掌握在他的手中,从此一跃成为仅次于哈里发的人物。

撒母耳在职期间十分关心犹太人的事务。1027年即被推选为格拉纳达犹太社区的领袖,百姓称其为纳吉德(即亲王)。他还是西班牙犹太社团公认的领袖之一。为官后的撒母耳十分富有,但他为人慷慨,热心赞助西班牙和海外《塔木德》学院的教学研究活动,并为希望求学的穷苦学生提供学习生活费用。他的捐赠遍及北非、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长期为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会堂提供礼仪活动所需橄榄油。

撒母耳作为一名学者精通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一生撰写了大量诗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表达了渴望能有一天看到犹太民族结束散居生活,重返锡安的愿望。

《撒母耳记》 《希伯来圣经》第二部分《前先知书》中一卷。卷名称《撒母耳记》,因撒母耳是本书前一部分中的主要角色,也就是他膏立了本书中所记述的另外两个主要人物:扫罗与大卫,为希伯来统一王国时期的头两个王。

希腊文《七十子译本》将《撒母耳记》、《列王纪》合在一起,统称《王国记》,并按两书的上下卷分为《王国记一》、《王国记二》、《王国记三》、《王国记四》,表明这两卷书是连续性的,分别记录以色列民族建立统一王国和以后分裂王国的全部历史。如从撒母耳时代算到统一王国分裂以至南北两国的先后灭亡,《王国记》记录了希伯来这个民族长达500年的历史(约公元前1100—前586)。

《撒母耳记上》始于撒母耳的出生、童年与蒙召为先知,止于扫罗王的阵亡。《撒母耳记下》起于大卫登基为王,止于大卫清点人数和接近老迈的时期。《撒母耳记上下》作为一卷可分为三大部分与最末的附录。

《撒母耳记》的结构特点,首先是书的文体笔法颇不

一致,有的简洁明了,有的繁细冗长,故事与历史事件的叙述,前后的联系不太紧密连贯。其次,更为突出的是不少的事件是重复记载并出现互有出入与若干差异,重复的例证较多,按书的前后次序,主要的例子有:

1. 扫罗受感说话。人们问:“扫罗也列在先知中么?”这件事有两次很有差异的记载:《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10—13节记扫罗在被撒母耳膏油之后,得了一个新心,在山上遇见一班先知时,就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人们于是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么?”另一次是《撒母耳记上》第19章第18—24节,这次扫罗已经做王,在大卫战胜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之后,扫罗寻索迫害大卫,大卫与撒母耳逃避于拉玛的拿约,扫罗也赶到那里,一路受感说话,甚至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就有了同样的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么?”。

2. 撒母耳立扫罗为王也有两次有差异的记载:《撒母耳记上》第9章第1—10节和第16节记载撒母耳立扫罗为王是耶和華為拯救以色列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采取的主动行为: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華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華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所你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但《撒母耳记上》第8章第4—22节;第10章第17—24节;第12章第19—23节等处,却记载立王是众民的无知要求,意味着不依靠上帝,是罪上加罪的事。“你们今日都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上帝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華你的上帝,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

3. 扫罗王违命,撒母耳两次宣布扫罗将被另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取代。《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8—15节记扫罗没有等撒母耳来到,擅自献上燔祭,撒母耳责备扫罗说:“你作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華你上帝所吩咐你们的命令……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華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同书第15章第10—28节另记扫罗违命没有灭尽亚玛力人一切所有的,保留亚玛力王亚甲的性命,于是“撒母耳对扫罗说……因为你厌弃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今日耶和華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与比你更好的人”(《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26—28节)。

4. 大卫被推荐给扫罗王是在两次不同的场合。《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14—23节记扫罗因受到恶魔扰乱,臣仆推荐耶西的儿子大卫进宫侍候扫罗,“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但《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55—58节另记扫罗原不认识大卫,当大卫击毙非利士大将歌利亚后,元帅押尼珥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

问他说:“少年人哪,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

5. 非利士大将歌利亚被谁所杀,也有不同的记载,《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51节:“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撒母耳记下》第21章第18—19节则记:“以色列人……在歌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雅雷俄珥金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迦特人歌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

6. 大卫避难于迦特王亚吉处,记载了两次:《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0—15节记大卫为躲避扫罗的寻索,逃到迦特王亚吉那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王大卫么,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么?”,于是大卫就假装疯癫以掩人耳目。另一次记于《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1—12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迦特王玛俄的儿子亚吉去了”。这里大卫同是投奔非利士亚吉,似乎是头一次,因第一次据《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0—15节的记载,大卫已装疯离开,逃到亚杜兰洞,不可能又有第二次的逃奔亚吉。

7. 大卫不加害扫罗之事发生两次,报信人都是相同的“西弗人”。据《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9节—第24章第22节记西弗人向扫罗报告大卫的行踪,扫罗追索到隐基底的山洞,在遭遇中大卫只割下扫罗的衣襟而不加害扫罗,扫罗大受感动,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另一次类似事件记于《撒母耳记上》第26章1—第25节,仍是西弗人报告扫罗说大卫在旷野的哈基拉山,扫罗同样是以3000精兵追索大卫。这次是夜间扫罗与追兵都睡在宿营地,大卫与手下的人偷走扫罗头旁的枪和水瓶,并没有加害沉睡中的扫罗。之后扫罗大受感动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这两次的故事,很有其相似之处。

8. 扫罗与非利士人打仗阵亡的两个记载。据《撒母耳记上》第31章第4节记战争中“势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为他拿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但在《撒母耳记下》第1章第9—10节却记扫罗在败退奔跑时,呼叫一个亚玛力人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仆倒必不能活,我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这两处的记载有出入。

9. 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有没有儿子,《撒母耳记》中有两处不同的记载。《撒母耳记下》第14章第27节记:

“押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他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另一处记押沙龙还活着时曾在王谷立一根石柱时的自白，经上如此说：“因他（押沙龙）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押沙龙柱，直至今日。”

10. 非利士人何时被制伏，《撒母耳记》有不同的记载。《撒母耳记上》第7章第12—14节记：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華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伏，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这说明在撒母耳时代，非利士人已被制伏了。但《撒母耳记下》第8章第1节却表明非利士人的侵扰一直延续到大卫统一王国建立之后，据记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治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

从上述《撒母耳记》的特点，一般分析《撒母耳记》的编集至少包含两种不同的资料来源，即早期资料与晚期资料，这两种资料组合交织在一起，于是出现同一事件或类似事件的重复记载。两种资料有时结合紧密，不易分开，但在神的称谓上也出现两种，如《撒母耳记上》第4章第1节—第7章第1节记载约柜的被掳异地，其中有“耶和華的约柜”，也有称“上帝的约柜”（《撒母耳记上》第4章第11节）；感动扫罗的灵有用“耶和華的灵”，也有用“上帝的灵”。

《撒母耳记》中的早期资料中，撒母耳只是地区性的先知，而不是全族的首知，其形象不高，他膏立扫罗为王是遵从耶和華的意旨而行的；大卫和扫罗的见面是扫罗臣仆的推荐，大卫作为一个弹琴者来到宫中为扫罗弹琴驱魔；后来扫罗由于嫉妒，要杀害大卫，迫使大卫出逃。《撒母耳记》中的晚期资料中，撒母耳的形象拔高。见于下列事件中：撒母耳的出生与祭司以利的事情；撒母耳应众民立王，是背弃神的行为；撒母耳另立大卫，大卫战胜非利士人歌利亚；扫罗嫉妒大卫，要置大卫于死地；大卫逃亡；撒母耳死；扫罗求问于女巫；扫罗战死等。

希腊文《七十子译本》缺少《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12—31节与第17章第55节—第18章第5节，这是关于大卫战胜非利士人歌利亚的两个段落，因此更肯定是晚期后加的资料。

《撒母耳记》中除早期与晚期两种资料外，另有一些可以分离的独立段落，亦被认为是后来加入的。如哈拿的诗、以利家灾难的预言、先知拿单的预言与大卫的祈祷，大卫的颂歌（此颂歌亦见于《诗篇》第18篇）等。

撒玛利亚

1. 古犹太城市名，现名撒巴斯提亚。位于耶路撒冷以北，示剑西北约11公里处。分国时期，北国以色列暗利王用二他连得银子（约70公斤）从撒玛手中购得此山，并在山上建城，以原主人的名字给这座新城命名为撒玛，即撒玛利亚，同时将首都从得撒迁到撒玛利

亚。直到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为亚述帝国所灭，该城一直是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城地理条件优越，地位适中，地势险要，周围群山环抱，中间是肥沃的盆地，从耶路撒冷去以斯德伦、加利利和腓尼基的这条要道经过该城，使撒玛利亚的交通十分便利。暗利作以色列王时，迫于北方强敌亚兰便哈达一世的压力，不得不准许亚兰人在撒玛利亚城开设集市。暗利王死后，其子亚哈王继位。亚哈统治期间，北国以色列国势兴盛，两次挫败便哈达二世对撒玛利亚城的围攻，使得便哈达二世求和，由此，以色列人在亚兰首都大马士革也开设了集市。亚哈王为了加强与西顿的防御合作与发展贸易的友好联盟关系，娶西顿王谒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耶洗别是虔敬的西顿异神的崇拜者，她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异族的神，导致以色列人崇拜西顿的神明。亚哈王在撒玛利亚为西顿神的主神——太阳神巴力造庙、筑坛，还跟随耶洗别一同去敬拜巴力邪神。据说，当时事奉巴力的先知有450人，事奉亚舍拉的先知有400人。著名的先知以利亚不但严厉谴责了这种崇拜异神的行为，还与巴力先知在迦密山斗法，450名巴力先知在求告巴力神时自割、自刺而死。以利亚虽然取胜，但迫于王后耶洗别的淫威不得不逃到西奈山。亚哈王还在撒玛利亚城兴建城邑，并为自己修建了用象牙艺术品装饰的王宫，一道环绕山顶的城墙将这座庞大的豪华王宫及庭院围在里边。在稍低一点的台地上及山脚，还有两道城墙。砌墙用的石块，都经过工匠的雕琢，非常精细别致。在亚哈王联合南国犹大攻打亚兰的战斗中，亚哈王死于乱箭之中，尸体被拉回撒玛利亚，血染的车在城北的一个池旁清洗。耶户背叛亚哈的继承人建立耶户王朝，暗利—亚哈王朝就此覆灭。耶户对撒玛利亚城内巴力神崇拜进行了清算。他命人将王后耶洗别从窗口扔下来，活活摔死，尸体被野狗吃尽。接着，他又命令撒玛利亚的长老将在撒玛利亚的70多个亚哈族人全部杀死。并用计将拜巴力的人和祭司诱至巴力庙，一举歼灭了他们。他还毁坏了巴力柱像，拆毁了巴力神庙，改为厕所。以利沙时代，亚兰军队再次围攻撒玛利亚城，为以利沙所阻。其后，亚兰王便哈达三世又来攻打撒玛利亚城，致使城中发生饥荒，百姓缺衣少食，到后来甚至易子而食，悲惨至极。最后，由于亚兰军队突然连夜撤走，撒玛利亚城及城中百姓才得以死里逃生。何细亚王在位时，亚述王撒幔以色列五世率军围困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居民艰苦抗御达三年之久，直至撒幔以色列五世死去。继任者撒珥根二世一举攻陷撒玛利亚城，大批以色列百姓被掳至亚述各地。这一年，即公元前722年撒玛利亚城的陷落标志着北国以色列的灭亡。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设、哈玛和法西瓦因迁来大批的异族百姓居住于撒玛利亚，用以补充该城被掳的犹太人。以后那些没有被掳走，仍然留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与这些外族人杂居通婚，产生众多混血的后代，再加之异族的宗教、文化、习俗的影响，渐渐被同化成新的

民族,称为“撒玛利亚人”。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彻底击败了大利乌三世的波斯残军,波斯帝国灭亡。撒玛利亚城为他所占,他将撒玛利亚城作为马其顿殖民地的行政中心。由于亚历山大大帝推行希腊化运动,再加之他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宗教宽容政策,赢得了犹太人的拥护,使得撒玛利亚城很快被希腊化。城中的犹太人逐渐讲希腊语,穿希腊服装,采用希腊式建筑,加入希腊军队,欣赏希腊的艺术,研究希腊哲学等等。公元前107年玛喀比王朝独立时期,约翰·胡肯奴攻陷了撒玛利亚,基于过去数世纪以来的民族仇恨,犹太人将此城破坏无余,使之成为荒无人烟之地达数十年之久。公元前63年,罗马帝国的将军庞培横扫巴勒斯坦地区,撒玛利亚城被划归叙利亚行省。虽然经过公元前57—前55年的整修,但毕竟是元气大伤,撒玛利亚城始终未能恢复从前的宏伟与繁华。公元前37年,大希律王与他的宠妃马利亚米在撒玛利亚城结婚。7年后,罗马恺撒奥古斯都正式将此城赐给大希律。大希律王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大兴土木,重修撒玛利亚城,并将城名改为瑟巴斯特,用以讨好恺撒。此外,在当年耶洗别王后所住的王宫废墟上,大希律王还为恺撒奥古斯都建了一座辉煌壮观的罗马神寺庙,庙前有约70平方米的大院,有数十级台阶引到庙门口,庙东是一个四方形的广场,有商店,十分繁华。此时的撒玛利亚已成为异教之城。在城中北部山谷边缘,大希律建了竞技场,是多利克式建筑,四周有石墙围绕,有柱子擎着屋顶,观众可站或坐在阴凉处。场地长达95米,宽58米,为古奥林匹克标准跑道。新城的城墙建在山坡下,围绕了很大一圈,呈不规则的椭圆形,最宽处竟厚达一公里。

2. 现代地名。指约旦河以西、耶路撒冷以北,以纳布卢斯城为中心的丘陵地区,面积近4000平方公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撒玛利亚及其以南的犹地亚一起被广泛地称为约旦河西岸,共5900平方公里。

1947年11月通过的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中,约旦河西岸被划归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在1948—1949年的阿以战争中,这一地区被约旦占领。现在约旦河西岸(即撒玛利亚和犹地亚)与以色列的分界线就是1949年约旦与以色列的停火线。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至今一直控制着这个地区。自1967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始终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一个焦点。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多数国家都认为以色列的军事占领是非法的,要求以色列撤出这个地区,让当地人民实行民族自决并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虽然以色列至今没有正式兼并约旦河西岸,但只同意当地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控制下实行自治,而不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也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阿拉伯人的代表,认为“巴解”是一个旨在消灭以色列的恐怖组织。

以色列坚持长期占领约旦河西岸主要出于两方面的

原因。一方面是以色列认为这个地区对它的安全和战略极为重要,必须保持对这个地区的控制。与约旦河西岸相邻的以色列国土是一条狭长的地带,宽度为18—28公里,这里人口稠密,并有特拉维夫、海法、耶路撒冷等主要城市。以色列担心约旦河西岸如果在持敌视态度的阿拉伯人的控制下,就会对以色列构成致命的威胁。另一方面是以色列政治上的右翼势力(如利库德集团等)和犹太教正统派坚持认为撒玛利亚和犹地亚是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宗教上,这里是耶和华赐给犹太人的土地;在历史上,这些地区曾经是古以色列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声称今天以色列仍然对这里具有历史和宗教的权利。以色列国内这一部分人一直要求政府正式兼并撒玛利亚和犹地亚。但持温和态度和世俗观点的人认为,在以色列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应当考虑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

自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执政以后,以色列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加强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历史上,约旦河西岸(即犹太人所称的撒玛利亚和犹地亚)一直有少量犹太人居住,1948—1967年约旦占领期间,犹太人全部被赶出这一地区。1967年以色列夺取约旦河西岸以后,逐渐有犹太人来定居。1975年共有15个犹太人定居点,犹太人1800人。这些定居者中很多是由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正统犹太教徒组成的“信仰者集团”的成员,他们的定居点大多建立在原来荒凉贫瘠的约旦河谷地区。1977年后,在政府的鼓励下,到约旦河西岸定居的犹太人数增加很快。到1988年,犹太人定居点已达130个,定居者人数达62000人。以色列计划到1990年使定居者达到11万人。由于利库德政府取消了关于禁止犹太人私人在占领地区获得土地的限制,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大片土地和水资源。到1988年,犹太人已获得约旦河西岸40%的土地。大量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定居,引起了当地阿拉伯人的不安和紧张,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对此表示反对。

自1987年底开始,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起义,与犹太定居者之间的冲突明显增加。以色列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加强了对占领地区的控制。1988年8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宣布断绝与约旦河西岸的一切联系,这是自1967年以来约旦首次表示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要求。同年11月11日,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其领土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首都为东耶路撒冷。这些事件使这个地区的局势和前景更加复杂,使以色列的占领也更加困难。以色列国内在对占领地区的态度上的分歧也在不断加大。

约旦河西岸属丘陵地区,海拔高度600—900米。由于气候温和,雨量适宜,传统上这里的经济以农业为主,

辅以畜牧业。现在也有一定的加工业和制造业。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约旦河西岸有阿拉伯人口84万5千人,战争中很多人越过约旦河逃到约旦,到1967年9月人口下降到59万6千人。由于出生率较高,到80年代末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口回升到85万,分布在450多个城镇和村庄里。在1987年底以前,当地大批的阿拉伯人进入以色列做工,在建筑、农业等行业为以色列提供廉价的非技术性劳动力。1988年以来,由于阿拉伯人发动反以起义,他们开展抵制与以色列进行商业贸易的活动和拒绝为以色列提供劳动力,使当地的经济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自1991年初海湾战争以后,与约旦河西岸保持商业往来的约旦受到削弱,这使约旦河西岸的经济进一步受到打击,人民的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

撒玛利亚人 古代巴勒斯坦种族名,也代表一教派名。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王国暗利建都撒玛利亚。公元前722年亚述王撒珥根灭亡以色列王国,占领撒玛利亚城,将以色列王国居民掳去亚述各地,并从巴比伦等外地迁来异族居民,用以补充撒玛利亚城被掳的居民,这些外地异族人逐渐与仍然留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杂居通婚,产生了众多的混血后代,再加之异族宗教、文化、习俗的影响,渐渐形成一个新的种族,即“撒玛利亚人”。为此,撒玛利亚人为以后正统的犹太人所鄙视,亚述撒珥根王自称他从撒玛利亚城共掳走以色列居民27000多人,这些人大多都是民众领袖、祭司和富人,留居原地的都为贫民。撒玛利亚人认为自己是公元前722年失散的12个以色列支派的后裔,他们还保持了一些本民族的习俗。犹大王希西家王于公元前720年即位时曾召集北方以法莲、玛拿西、以萨迦、亚设、西布伦等族人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约西亚王于公元前621年进行宗教革新运动时,也有这些支派的人参与。公元前538年之后,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时,撒玛利亚人仇视回归的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则认为他们不是纯洁的种族。两派犹太人之间彼此对立。撒玛利亚人认为重返故里的犹太人伪善、骄傲。撒玛利亚人特别反对以斯拉和尼希米一再坚持的不得与外族人通婚的禁令。于是他们千方百计破坏和阻挠重修城墙和圣殿的工作。这时也有人故意违反律法,例如大祭司的弟弟玛拿西,就娶撒玛利亚城波斯总督参巴拉的女儿为妻。一般认为,撒玛利亚人有利可图时,就承认自己与犹太人有血缘联系,遇到困难时就予以否认,并与犹太人反目为仇。他们有的还在上帝圣殿中祭奉异神。在宗教方面,撒玛利亚人只接受《希伯来圣经》中的前五卷书,即《律法书》部分,他们的《撒玛利亚五经》与现存的《摩西五经》有若干差异之处。

撒但 《希伯来圣经》中通指“魔鬼”。由希伯来文“敌手”,“对头”翻译而来。《约伯记》对撒但的形象有生动和

典型的描写。在整部《希伯来圣经》中,“撒但”还没有成为反对上帝和世人的众恶之首,远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魔鬼”,它是“上帝之子”,他的职责就是在地上来来往往,专门找人的缺点,向上帝汇报。据《约伯记》载,撒但和神的众子一同侍立在上帝的面前,对义人约伯进行毁谤、控告,并在上帝的许可下,对约伯实行苦难的试验。撒但还是人的敌对者,常常故意寻衅捣乱。《撒迦利亚书》记载大祭司耶书亚站在上帝使者面前,撒但则寻机站在耶书亚的右边,和耶书亚作对,因此遭到上帝的责备和训斥。他还是教人做错事的教唆者,据《历代志上》记载,大卫为王以后,撒但教唆他做了一件神、人都不喜悦的数点人数的事,招致一场全国性的灾祸。在《希伯来圣经》其它书卷中,“撒但”也用作普通名词,常译作“敌人”、“仇敌”和“对头”等。如《列王纪上》第11章第14节:“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作所罗门的敌人”,其中“敌人”一词的原文为“撒但”;《列王纪上》第5章第4节:“现在耶和华我的上帝使我们四周平安,没有仇敌”,其中“仇敌”一词的原文也是“撒但”;《诗篇》第109篇第6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对头”一词的原文亦是“撒但”。“撒但”词义的变化始于公元前331年之后希腊时期的犹太文学作品里,这时它是一个特指对象,指世人和上帝的敌对者、遭到贬斥的“堕落的天使”。在《伪经》的《十二族长遗训》和《以诺书》中,它已成为教唆人们犯罪的元凶,如约瑟的兄弟但起恶意谋害约瑟,以及埃及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约瑟,都是受了撒但的蛊惑。《以诺书》第31章第3节则把伊甸园中的蛇称为“撒但”的化身。

撒拉弗 《希伯来圣经》中一种天使的名称。仅见于《以赛亚书》第6章第1—7节。此处记载,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垂下的衣裳遮满圣殿。旁边有撒拉弗侍立,他们“各有6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与众天使合唱,颂扬上帝的尊贵与威严,并呼喊道:“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撒拉弗的声音,震动了门槛的根基。殿内充满烟云,以赛亚先知顿然感悟到“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时,有一撒拉弗手拿火剪从祭坛上取下来的红炭飞到以赛亚眼前,用炭沾他的嘴,并对他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接着,以赛亚又听到上帝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答道:“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此,以赛亚就蒙召作了先知40年之久。

《撒迦利亚书》 《希伯来圣经》《十二小先知书》中的一卷,以先知的名字定名。“撒迦利亚”一词希伯来文的含义为“耶和华纪念”。《圣经》中与撒迦利亚同名的人多

达 30 人,但多数人不重要也不出名,如《历代志下》中犹大国约阿施王时,祭司耶何耶大的儿子名撒迦利亚;乌西雅王的顾问也叫撒迦利亚,他通晓上帝的默示;此外还有约西亚王修理圣殿的督工名叫撒迦利亚。

《撒迦利亚书》的历史背景是在公元前 6 世纪 30 年代,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重新建殿的时期。全书共 14 章,前面的第 1 章至第 8 章构成了一个单元,记载先知撒迦利亚和同一时代的先知哈该,约公元前 520 年。据该书载,撒迦利亚是“易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易多是与所罗巴伯、耶书亚一同从巴比伦归回的一位祭司,先知既是易多的孙子,可以推想撒迦利亚作先知时还应是风华正茂的少年。《以斯拉记》第 5 章第 1 节和第 6 章第 14 节记载,撒迦利亚和哈该两位先知同心协力,劝勉并鼓励被掳归回的民众重新修建被毁的圣殿。哈该这时虽然年纪老迈,他们一老一少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并最后完成了修建“第二圣殿”的宏伟事业。

《撒迦利亚》书前 8 章记载撒迦利亚先知最初的预言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即公元前 520 年 8 月),最晚的预言是在“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即公元前 518 年 9 月),前后持续不过两年,而第二圣殿的修建是完成于两年之后的公元前 516 年。

《撒迦利亚书》前 8 章的时代背景与《哈该书》完全相同,中心的主题是修建公元前 586 年被巴比伦人毁灭的圣殿。哈该先知言简意明,直截了当提出了他的责备与期待:“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么?”只要大家协力修造,“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先知撒迦利亚则借助所见的八个异象,以及每个异象背后的含义来传达他的预言。如,乘马者的异象,表明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全地都安息平静”,反映波斯大利乌王(即大流士)执政后,社会安定,不再动荡不安,这时是重新修造圣殿的良好时机;人手持准绳的异象更是表明动工前的准备,等等。撒迦利亚先知以这些异象的寓意来劝勉、鼓励众民同心协力建造圣殿,并预言耶路撒冷复兴的日子的来临,那时“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華的山必称为圣山”。

《撒迦利亚书》9—14 章构成另一单元,内容已不再涉及修建圣殿之事,不再出现耶书亚与所罗巴伯的名字,而主要论及审判之事,预告耶路撒冷、异邦、列国都将受到惩罚。所以这一部分被认为属于不同的时期与作者,原来可能单独成卷,并不归属于《撒迦利亚书》。

从时代背景来看,这两部分也有很大的差异:

(1)第一撒迦利亚时代的社会背景是“全地安息平静”,没有战争;第二撒迦利亚时代却是社会动荡,战祸连绵,耶路撒冷被围困,受攻击。

(2)第一撒迦利亚书中的弥赛亚是大卫的苗裔,他将全地的君王,中心人物是所罗巴伯和耶书亚;第二撒迦利亚书中的弥赛亚是行公义、施拯救的,表现柔和谦

卑。

(3)第一撒迦利亚书清楚注明发生事件的年代和日期;第二撒迦利亚书没有任何年代和日期。

(4)第一撒迦利亚书有异象的表述;第二撒迦利亚书不再出现异象与启示的格式。

(5)第一撒迦利亚书的文字是叙述体散文的体裁,文字平庸;第二撒迦利亚书的文字是较优美通畅的诗文体裁。

关于第二撒迦利亚的作者和年代问题,研究《圣经》的学者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第二撒迦利亚书本身又可分为第 9—11 章和第 12—14 章两部分。这两部分文字与体裁各有特点,显然出自两位不同的作者。

第二撒迦利亚书的年代问题,由于书中出现了埃及、亚述、以法莲等属于犹太被掳前常见的名称,很象公元前 8、7 世纪的先知书;第 10 章第 6—7 节还提到犹大家和以法莲人,似乎还是南北分国的时期,因此有人认为第二撒迦利亚书写于犹太被掳之前。但是,第 9 章第 13 节却提出要以犹大的弓、以法莲的箭,攻击“希腊的众子”,既然出现了“希腊”,就不可能属于被掳之前的时期。所以书中的“亚述”、“埃及”等拟可看作是一种“以古喻今”的启示笔法。亚述可代表希腊时期的塞琉古王朝,埃及则代表希腊时期的托勒密王朝。本书第 9 章起,首先反映希腊亚历山大帝多方征伐的情况。公元前 323 年,希腊亚历山大帝猝死,帝国分裂,本书第 9 章第 11—17 节反映先知萌发复兴犹太的希望,号召锡安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第 10 章第 3—12 节描述社会动荡、战事绵延的情况,则反映亚历山大帝死后,大帝国分裂和持续数十年战争的局面。第 10 章第 11 节中“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指的就是分裂后的几个王朝的分崩离析,至终走向灭亡的结局。因此,第二撒迦利亚书的主要部分的年代现在一般归在希腊时期,即公元前 350 年之后。

撒都该派 古代后期犹太教的一个派别。该派约在公元前 200 年形成,源自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以后逐渐形成的祭司贵族集团,由圣殿当权的祭司、贵族和富商组成,代表了犹太教中最富裕的元老当权派。

“撒都该”一词可能源于大卫王时代的大祭司撒督,撒督的子孙世代代为祭司,后来就称为撒都该派。事实上一直到公元前 2 世纪撒督家族一直是圣殿中的领导阶层。并非所有的祭司都是祭司撒督后裔,所以“撒都该”一词意指任何对于祭司撒督后裔抱有同情的人。

撒都该派主张,只需尊奉摩西律法,不接受后来发展的“口传律法”;不信灵魂与复活,不信天使与魔鬼,对宗教比较淡漠,热衷于政治权势,追求个人利益,最关心圣殿的金银财富,认为只要罗马人不侵犯圣殿,就应该服从罗马人的统治。在如何解释犹太教的礼仪和律法、如何理

解上帝对犹太人的启示等问题上,该派与法利赛派各执一词,互相攻击。

撒都该派在其发展的整个历史上,都代表着保守的观点。他们与法利赛派的主要不同之处表现在他们对待《托拉》的态度上。撒都该派信仰《托拉》的绝对权威性,一切观点如果不能直接出自《托拉》或者直接从《托拉》引伸而出,那都将受到怀疑,撒都该派由此绝对肯定了成文律法《摩西五经》的权威性,而排斥一切口传律法。两派在神学观念上也大有差异。撒都该派试图把上帝降到人的水平上,他们的上帝是拟人化的,他们向上帝奉献的礼拜正如敬贺一个人间的国王或者统治者一样。法利赛派则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力图使人升到一个神圣的高度,使他接近一个精神性超越的上帝。撒都该派拒绝了身体复活的教义,拒绝了灵魂不死的信条,他们也抛弃了法利赛派有关天使存在的观念。撒都该派由于非常严格遵守成文律法,故在涉及到死刑的案件中常常表现得十分严厉,他们常常对摩西律法只作纯粹字面意义上的解释。又由于对古老教条坚定不移,因而也就特别看重牺牲祭拜的仪式。

撒都该贵族阶层一直是圣殿的中坚,仅仅到了圣殿存在的最后 20 年中,法利赛派才最后掌握控制权。正因为撒都该派的权利和作用都同圣殿息息相关,所以第二圣殿不复存在以后,该派也就不再有生存的机会了。公元 70 年后,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从此这依附于圣殿为生的特权教派,终于逐渐销声匿迹。

撒督 (Zadok) 古希伯来人名。亚希突的儿子,但非亚希米勒的祖先。大卫王执政时与亚希米勒同为大祭司。大卫王因儿子押沙龙叛乱逃离耶路撒冷时,他与亚比亚他(也是大祭司)及利未族人抬约柜相随。大卫晚年,王后哈及所生的儿子亚多尼雅想作以色列全族的王,便与将军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密谋登基。但撒督、耶合耶大之子比拿雅和先知拿单则全力帮助拔示巴与大卫所生之子所罗门。撒督且遵照大卫之命去基训膏所罗门为王。所罗门登基后立即命令撒督兼任亚比亚他的职务而独为大祭司,亚比亚他只存其名。

《撒督残篇》 犹太《伪经》中的一卷,属于撒督党人的文稿,共 20 章。撒督党约形成于公元前 196—前 176 年之间,本来属于撒都该派,后来由于信仰、伦理主张和对于圣殿规例的不同看法,引起了矛盾,便从撒都该派中分裂出来,离开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另立新派。他们自称是祭司长撒督的真正后代,是纯正的祭司。新派建立之后,他们又陆续回到各地进行他们的宣传工作,宣扬他们的信仰和主张。

撒督党重视《圣经》中先知的伦理教训,认为先知书和律法书具有同等的地位,全书引用律法书 10 次,先知书 11 次,圣文集 1 次。作者引用《以西结书》第 44 章第 15

节中所说的:“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用以提高撒督党人的地位和威信。撒督党不同于撒都该派的是:他们相信永生,主张离俗,反对撒都该派的世俗纵欲生活;反对多妻和休妻,认为按律法所记,上帝创造的最初基本原则是造一男与一女。因此他们谴责大卫没有遵行律法。撒督党人相信弥赛亚要来临,但这位弥赛亚必须出自“亚伦和以色列”的后代。

本书并不代表所有撒督党的文稿,因此称为残篇。关于书的写成时间,由于第 20 章第 1 节提到《禧年书》,所以是在该书之后,第 10 章第 1 节的“外邦人规定的条例”被认为指的是罗马人的条例。所以本书应写在公元前 63 年之后。至于弥赛亚来自“亚伦和以色列”的后代,也被认为作者心目中指的是希律王和玛喀比王朝系统的后代马利亚米所生的二个儿子中的一个,这两位王子在公元前 18 年从罗马回国,公元前 8 年被大希律王处死。如果上面的设想属实,本书写作时期可确定在公元前 18—前 8 年之间。

黎巴嫩犹太人 公元前 4 世纪末期犹太人开始定居黎巴嫩,黎巴嫩当局奖励忠顺的移民,并奉行宗教自由的政策。黎巴嫩与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犹太民族文化中心的接近,对犹太人也很有吸引力,使黎巴嫩的犹太人数迅速增加。在阿拉伯人掌权的最初几个世纪,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的黎巴嫩不多的犹太人在物质和文化上都十分繁荣。11 世纪时,提尔(现在的苏尔)的犹太社区是中东最繁荣的社区之一,许多来自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南部的犹太人在这找到了避难所。12 世纪初期,在统治黎巴嫩的十字军政权下,犹太社区继续存在。提尔有 400 名犹太人(商人和玻璃工人),贝鲁特有 500 个犹太家庭,西顿(现在的赛达)有 20 个犹太家庭,在德鲁兹农村还有为数不多的犹太人(手艺人 and 商人)。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从西班牙及其领地上被驱逐的一些犹太人定居贝鲁特和特黎波里。1516 年黎巴嫩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由于奥斯曼帝国庇护犹太人,致使犹太社区逐渐得到恢复。16 世纪西顿的犹太社区增长,它的许多成员由于外贸和包税制而致富,但是 17 世纪初期该城市丧失了贸易的意义,犹太社区走向没落。贝鲁特犹太社区的发展在 19 世纪中期受到阻滞,当时这里集中了黎巴嫩的大部分犹太人。

1832—1840 年,在黎巴嫩成为埃及的附属国时期,犹太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土耳其恢复了对黎巴嫩的统治后,土耳其和希腊的犹太移民开始来到黎巴嫩,他们主要定居在贝鲁特,很快在该市的贸易活动中占据显要地位。

犹太人和黎巴嫩最大的基督教社区的马龙派教徒之间的关系常常处于紧张状态。1862 年和 1892 年,贝鲁特

的犹太社区受到袭击,在土耳其当局的坚决干预下,袭击被制止。1878—1879年联合分配委员会在贝鲁特开办了男校和女校,1897年开办了女子手工艺学校。19世纪末,贝鲁特有一座犹太会堂和12所学习之家。

1918年黎巴嫩由法国管理(1922年托管得到确认)。在随后的年代里,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领导的贝鲁特犹太社区(1929年超过5000人),是黎巴嫩和叙利亚组织得最好的犹太社区。大部分属于社会中层的犹太人,居住在富裕的贝鲁特郊区,在过去的犹太社区中只剩下贫困的家庭。1943年11月黎巴嫩获得独立后,犹太人的状况没有改变。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1949)中,黎巴嫩恪守1949年3月23日签署的和谈条件。它和以色列在和谈条件中标定的边界线,在差不多20年中显得平静。在黎巴嫩,犹太人实际上受到政府的保护。1949年5月有人想在贝鲁特犹太区挑起事端的企图,被当局制止。第一次中东战争初期居住在黎巴嫩和被监禁在集中营中的以色列人,土耳其当局允许他们返回以色列。战争初期被驱逐的西顿犹太人(约200人)也获准返回西顿,他们的财产也得以归还。

黎巴嫩是唯一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犹太人口获得增长的阿拉伯国家(1948年5200人,1951年9000人)。约2000名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犹太难民获准在黎巴嫩居住,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获得了黎巴嫩国籍。1950年黎巴嫩政府允许愿意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越过边境。它不限制犹太人的往来和出国自由。犹太人可以出卖自己的财产,携带出境的硬通货不受限制。犹太会堂和犹太学校在贝鲁特(1965年在3所联合分配委员会的学校中有950名学生,在塔木德—托拉学校中有250名学生,在宗教学校中有80名学生)和西顿(有1所学校)继续活动。大部分犹太人从事贸易,某些人是手艺人、银行职员等。

六月战争(黎巴嫩没有参加)以后,对没有黎巴嫩国籍的犹太人的工作有所限制,这迫使他们离开了黎巴嫩。1967年,2500名犹太人离开了贝鲁特,1970年该市的犹太社区有1500名犹太人。1970年9月巴解组织武装力量被迫从约旦撤出后,即转移至黎巴嫩,以黎巴嫩南部为主要基地,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70年代至80年代初,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黎巴嫩自1975年4月爆发内战以来,各教派之间、教派内部以及黎巴嫩教派和外国驻军之间的武装冲突此起彼伏,连年不断。为了打击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以色列军队于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造成巴勒斯坦武装力量重大伤亡。1985年6月以色列军队撤至黎、以边界地区。

据估计,80年代初期黎巴嫩有250名犹太人。以色列军队从贝鲁特撤走后,许多犹太人也离开了黎巴嫩。1987年黎巴嫩的犹太人约为100名,几乎全都住在东贝鲁特市的基督教区。

黎巴嫩战争 以色列国防军和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黎巴嫩南部发生的战争。战争从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实施以“加利利行动”为代号的行动计划、入侵黎巴嫩开始,到1985年6月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到黎、以边界地区结束。

战争的前奏 巴解组织自1968年起在贝鲁特建立基地。1970年9月约旦内战之后,约15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约旦,逃往黎巴嫩安家,其中5万名巴勒斯坦人和大部分巴解组织骨干成员在贝鲁特安营扎寨。居住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高达50万人。黎巴嫩由此成为巴解组织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基地。

以回击恐怖主义活动为借口,以色列针对巴解组织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利塔尼行动”。这次行动的直接导火线是:1978年3月11日恐怖主义者袭击了从海法到特拉维夫公路上的一辆旅游汽车,造成36名以色列人死亡,76名以色列人受伤。

1978年3月15日凌晨,以色列出动25000人,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分三路入侵黎巴嫩南部地区,对巴解组织发动全面进攻。经过一周战斗,以军深入黎巴嫩纵深10—15公里,控制了利塔尼河以南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以色列称这次行动为“利塔尼行动”。3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425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并决定成立“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进驻黎巴嫩南部地区,以监督停火。6月13日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全部撤出,但将黎、以边境沿线地区交给黎巴嫩哈达德少校指挥的基督教警察局控制,哈达德得到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支持。

联合国临时部队进驻黎巴嫩南部后,巴解组织失去了突袭以色列的前哨基地。因此,巴解组织设法恢复它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它与联合国部队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协定:联合国部队不阻拦巴解组织部队向以色列出击。1980年6—10月,巴解部队曾从联合国部队防区向以色列发动了60多次军事行动。自1981年5月起,巴解武装对以色列的攻击升级,不断炮击以色列北部城镇。5—7月,以色列北部26座城镇相继遭到巴解炮火的猛烈轰击。1981年7月至1982年6月,巴解组织共向以色列发动了290次攻击,打死29人,伤271人。于是,以色列贝京政府决心要消灭这支巴解武装。

1982年6月3日傍晚,以色列驻英国大使什洛莫·阿尔戈夫被阿拉伯恐怖主义者袭击,受重伤。次日,以色列政府下令空军袭击设在黎巴嫩纵深的巴解游击队基地,包括贝鲁特的军火库、总部大楼和难民营在内的作战阵地、训练营地等22个目标。阿拉法特遂于当日下令对黎南部“安全区”和以色列北部边境全线进行连续24小时的炮击,仅在以色列境内,就有23个居民点遭到30次炮火袭击。

第一阶段 6月5日晚以色列内阁召开非常会议,作出入侵黎巴嫩的决定。当夜,以色列武装力量就越过以黎边境。6月6日11时,以色列出动约两个师的兵力,在空、海军的支援下分三路向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巴解组织武装力量发起突然进攻。西路军平均每日推进30公里,中路军为20公里。在向北推进的过程中,三路大军又各以部分兵力实施穿插迂回,将巴解武装分割包围,然后进行反复清剿。至9日,西路军已进抵贝鲁特以南4公里处的国际机场,中路军和东路军进抵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后就沿贝卡谷地西侧部署。

以色列在摧毁黎南部大部分巴解组织基地后,便腾出手来对付驻在黎巴嫩南部的叙利亚军队。为了保卫在贝卡谷地的萨姆—6型导弹基地,叙利亚向黎增派1.6万名军人,使叙军在黎部队增至4万人,同时,向贝卡谷地增调了3个萨姆—6型防空导弹连,使叙在该地的防空导弹连达19个。6月9日凌晨,以色列总理贝京批准了国防部长沙龙提出的彻底摧毁叙利亚在贝卡谷地导弹群的要求。6月9日下午,以色列对叙利亚导弹基地实施大规模空袭,摧毁了叙军的17个导弹连,在空战中击落了23架叙利亚飞机。第二天在空战中又击落了25架叙利亚飞机,摧毁了叙军2个导弹连。同一天双方还发生了坦克战。黎巴嫩战争第一阶段于6月11日深夜结束,这一天叙利亚和以色列分别宣布停火。

6月11日以色列军队占领了黎巴嫩4500平方公里的领土,摧毁了巴解在黎南部的全部军事基地,抓走了6000多名巴解战士,缴获了1320辆军车,其中包括数百辆坦克,215门远射炮,1300多枚反坦克导弹。以色列部队死亡130人,受伤约600人。以军的入侵使1万名阿拉伯人死亡,1.5万人伤残,50万和平居民失去家园。

第二阶段 开始于6月11日在贝鲁特地区爆发的军事行动。贝鲁特地区的以色列武装力量接到命令,要对贝鲁特实施包围,并与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建立直接联系。6月14日,以色列调集了35000人,300多辆坦克和100多门大炮开始围攻巴解总部所在地贝鲁特西区。以军先进入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武装控制的贝鲁特东区,从东向西包围。接着,又从贝鲁特以南突破巴游击队在哈勒迪地区的防线,占领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大学理工学院。6月21日,又向贝鲁特东南重镇布哈姆敦的叙军阵地发起进攻,于24日下午占领该镇。以色列军队控制了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的22公里线段,从而切断了叙利亚与贝鲁特之间的交通联系。与此同时,以色列海军封锁了贝鲁特市北面和西面的海面,与陆军一起完成了对贝鲁特市西区的包围。黎巴嫩战争的第二阶段至此结束。

在第二阶段期间,美国总统特使哈比卜在耶路撒冷、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之间进行穿梭外交,力图控制局势。以色列建议建立多国部队,进驻以色列边境北部45公里的

安全区。同时,以色列国内产生了反对情绪,原因是政府所宣告的战争目的已经达到,然而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变得更加激烈。

第三阶段 以色列包围贝鲁特,目的是迫使巴解组织和叙利亚从该市撤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一阶段持续了约2个月。6月23日以色列总理贝京访美归来,在美国他表示,只要巴解组织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国防军就将留在黎巴嫩。6月29日在以色列议会会议上,贝京建议被围困在贝鲁特的巴解武装力量在红十字会的保护下撤到叙利亚。拉宾代表工党联盟在辩论中发言,表示支持战争最初的目的——在以色列北部建立安全区,反对达到“补充”目的的任何企图,诸如消灭巴解组织,摧毁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在贝鲁特建立亲以色列的政府。议会以60票赞成、47票反对确认了贝京的意见。

同时,以色列加强了对贝鲁特的封锁。7月4—12日,以色列连续不断地对贝鲁特西区进行狂轰滥炸,还多次对贝鲁特西区60万居民实施断水、断电。以色列政府再次声明,要求巴解组织离开黎巴嫩。然而在以色列国内举行了反对政府政策的大规模示威(第一次于6月26日举行)。7月21日,巴解战士在以军防线后面发动了三次袭击。以色列以此为理由对贝鲁特发起进攻。8月4日,以军分三路向贝鲁特西部推进。在巷战中,以军损失惨重。仅8月4日一天,以军就有18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巴解组织声明,如果一切顺利,巴解武装力量可于8月中旬撤出贝鲁特。从8月21日至9月1日,1.45万巴解组织和叙利亚士兵撤出贝鲁特,其中8千人撤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西部的贝卡地区,其余的通过海路撤离贝鲁特,被8个阿拉伯国家所接受。撤军在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组成的多国部队监护下进行,多国部队8月21日开进贝鲁特。至9月1日,战争第三阶段结束。止此,以军345人死亡,约2100人受伤,5人失踪,3人成为叙军俘虏。以色列两架战斗机和两架直升机被击毁。叙军约300名战士成为俘虏,损失90多架飞机,约400辆坦克和19个地对空导弹连。巴解组织约1000人死亡,在黎南部经营10多年的军事基地和军火库全部丢失。

夏蒂拉和萨卜拉难民营大屠杀 除了夏蒂拉和萨卜拉两个难民营外,以色列国防军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西贝鲁特。9月14日下午,亲以的黎巴嫩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在爆炸事件中遇难。9月15日凌晨,以色列军队以此为借口重新开进西贝鲁特,包围了夏蒂拉和萨卜拉难民营。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亲自批准黎巴嫩长枪党民兵进入西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搜索与清剿。9月16日下午6时许,长枪党1000多民兵开进夏蒂拉和萨卜拉两个难民营,对无辜平民进行了近40个小时的大屠杀,约有1000名难民(包括儿童、妇女)被杀害。

贝鲁特大屠杀事件遭到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9月24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据估计,

参加者有 20—40 万人),要求总理贝京和国防部长沙龙下台。以色列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首先是当时的总统纳翁,要求对大屠杀事件进行正式调查。在反对派的压力下,以色列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在 9 月 27 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根据以色列法律,这种调查委员会的首领应当是法官。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卡汉(1914—1985)同意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1983 年 2 月调查工作结束,并发表了正式报告。报告确认,难民营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黎巴嫩武装力量”。同时,委员会得出结论说,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政府一系列负责人没有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止屠杀事件的发生。调查委员会批评总理贝京和外交部长沙米尔的行为,认为国防部长沙龙对屠杀事件负有责任,并建议解除他的职务。由于这个建议,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留在内阁改任不管部长。

以色列分阶段撤军 1982 年 12 月 28 日,在美国的撮合下,黎巴嫩和以色列就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问题开始谈判。经过 5 个月的艰苦谈判,于 1983 年 5 月 17 日签署了以黎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在叙利亚和巴解组织撤军的条件下,以色列军队将在协议生效后 8—12 周内撤出黎巴嫩,双方结束战争状态。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纵深 40—45 公里的安全区,由黎巴嫩政府军两个旅维持治安,由亲以色列的哈达德少校(“自由黎巴嫩军”司令)任安全区副司令。

黎以撤军协议的签订在阿拉伯世界中引起不同的反响。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摩洛哥等国表示不同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叙利亚、利比亚、也门、民主也门等国和巴解组织表示反对。叙利亚一再声明,叙军是应黎巴嫩政府的邀请进驻黎巴嫩的,与以色列撤军无关;叙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即使黎巴嫩政府现在提出要求,叙军也不撤。5 月下旬到 6 月中旬,叙利亚在黎巴嫩贝卡谷地加强兵力,并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显示其留驻黎巴嫩的决心。

黎以协议的签订使黎巴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进一步对立。1983 年 7 月 23 日,黎巴嫩反对派各组织正式宣布成立“民族拯救阵线”,要求现政府辞职和废除黎以协议。“民族拯救阵线”得到叙利亚的大力支持。为了解决黎巴嫩的危机,黎巴嫩新任总统、已故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的哥哥阿明·杰马耶勒于 1984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1 日,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讨论了解决黎巴嫩危机的途径。3 月 2 日,黎巴嫩各反对派领导人 also 到大马士革同叙利亚外长沙雷举行会谈。在各方压力下,黎巴嫩政府于 3 月 5 日正式宣布废除黎以协议。

从 1983 年 5 月下旬起,以色列政府就酝酿单方面部分撤军问题。7 月 20 日,以色列内阁就此作出决定。9 月 3 日,以色列军队开始从阿莱山区和舒夫山区往南撤至阿瓦利河,共撤出 600 平方公里的地区。迄至 1983 年年底,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战争中共死亡 560 人,伤 3000 多人。

以色列部分撤军遭到黎巴嫩政府的坚决反对,黎巴嫩要求以色列把部分撤军作为全面撤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以色列提出一个全面撤军的时间表,但是遭到以色列政府的拒绝。8 月初,美国特使麦克法兰与以色列总理贝京会谈时,也明确要求以色列制定一项全面撤军的时间表,遭到贝京拒绝。

1984 年 9 月 13 日,以色列组成了工党与利库德集团轮流执政的联合政府。面对内外压力,以色列不得不考虑尽快从黎巴嫩撤军问题。1985 年 1 月 14 日,以色列内阁通过了于 1985 年 9 月 15 日前分三个阶段从黎巴嫩撤军的计划。该计划的具体内容是:第一阶段(1 月 20 日至 2 月 16 日),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阿瓦利河以南,包括西顿及其周围地区撤至利塔尼河一线;第二阶段(4 月 24 日完成),从与叙利亚军队对峙的贝卡谷地撤至哈斯巴亚周围;第三阶段(6 月 10 日完成),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回以色列境内。根据以色列的撤军计划,以色列将撤出约 28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至 6 月上旬,历时三年的黎巴嫩战争宣告结束。但是,以色列实际上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边境约 8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以黎边境地区的黎巴嫩地方警察局继续得到以色列的直接支持,哈达德去世后,拉赫德将军任警察局局长。

在以色列占领黎巴嫩期间,黎巴嫩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员死亡总数达 1.78 万人,受伤人数约为 3 万人。

《箴言》 《希伯来圣经》第三部分《圣文集》中的第二卷。希伯来文“箴言”一词读作“玛沙尔”,除译作“箴言”外,在其它书卷中也译作“俗语”、“比喻”、“笑谈”、“诗歌”等。

《箴言》的内容分为七个部分:

1.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第 1—9 章)。本部分内容是歌颂智慧的珍贵,劝人服膺智慧,远离罪恶。文体不同于占《箴言》主要部分的平行体(同义或反义)格式,而是华丽流畅的论述文,带有被掳以后文体的特色。前 7 章采用父教子的格式,屡屡出现“我儿”或“众子啊”的短句。第 8—9 章,“智慧”以拟人的形象出现,用第三人称“他”或第一人称“我”来代表“智慧”。这种智慧人格化的表达方式来自希腊的影响。因此这部分内容被认为是起源并收集于所罗门时代,而在被掳之后,甚至到希腊时代才增补修订完成。

2. 所罗门的箴言(第 10—22 章 16 节)。本部分是《箴言》的核心。内容包括题材丰富、范围广泛的教诲箴言共 375 条,每一章节是一条箴言,除个别章节外,绝大部分采用上下两句的平行体箴言。其中从 10 到 15 章,共有箴言 184 条,全属反义平行体箴言;16—22 章共有箴言 191 条,其中 33 条是反义平行体箴言。本部分箴言的内容,具有所罗门王时代的特色,反映了王国时期的政治、经济、人际关系与社会情况,可归属于所罗门王所撰作的

箴言集。正如《列王纪上》所记：所罗门王“作箴言三千句，诗歌 1005 首”，此仅为其中的一部分。但这部分中有些箴言被认为与所罗门的身份不合，如以至尊王的身份来议论“君王”，以拥有众多妃嫔的王的身份来议论什么是“贤妻”。此外，这部分的箴言共 375 条，而“所罗门”名字的希伯来字母的代表数值的总和也恰巧是 375，这也被认为是后人有意安排的结果，目的是让这部分箴言的条数暗合所罗门王名字的数值，以便把这部分箴言归在所罗门的名下。

3. 智慧人的言语(第 22 章 17 节—24 章 34 节)。这是根据《箴言》第 22 章第 17 节首句：“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而来。本部分的第一段的内容和一组写于公元前 800—前 600 年间的“埃及箴言集”的内容很相似，约三分之一也出现在该集文本之中，所以该段显然属于被掳前较古的材料。第二段以“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为插入语，内容为告诫人要为人正直，不可诬陷邻舍，要殷勤不可懒惰，以免落入贫穷境地等，属于另外加入的部分。

4. 第 25 章至 29 章 27 节。这部分题首注明“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希西家的人所誊录的”。说明这些箴言原属于所罗门王，经历代转诵流传，到了犹大王希西家(公元前 720—前 692)时，才加以收集誊录，成为以下的箴言集。从所罗门时代到犹大王希西家时代，至少已过 250 年之久。这部分的第一段(25—27 章)是一般教诲劝世的箴言；第二段(28—29 章)则属于宗教伦理色彩较浓厚的箴言，告诫人们要“谨守律法”，“倚靠耶和华”。这个特点(特别关于谨守律法)被认为属于以斯拉时期以后的特色，不能早于公元前 400 年。

5. 第 30 章。这部分题首为“雅基的儿子亚古珥的言语”。雅基和亚古珥不是以色列族，原文有“玛撒的雅基”，玛撒为以实玛利的后代，因此本段属于外族来源的箴言、俗语，具有不同的色彩与情调。

6. 第 31 章前 9 节。这部分题首为“利慕伊勒王的言语”。原文有玛撒的利慕伊勒王，所以同属外来的箴言。内容为王的母亲告诫为王的儿子，不要沉溺于酒色，要凭公正辨别是非，为孤独者伸冤，为穷困者辨屈。

7. 第 31 章 10 至 31 节。本段没有标题，但根据结构与内容，本段显然不属于“利慕伊勒王的言语”部分。其内容是论一个才德的妇人，既能勤俭持家，又乐于施舍，配称贤妻良母。指出艳丽美容本属虚浮，唯敬畏耶和华必得称赞。本段共 22 节，是结构细致严谨的 22 行字母序诗，在《箴言》中是独有的一首。

德加尼亚 来源于希伯来语“禾木科植物”，以色列的两个定居点的名称——德加尼亚·阿列符和德加尼亚·贝特。位于太巴列湖南岸。德加尼亚·阿列符于 1909 年在犹太国民基金会购买的第一批土地上建立起来。发

起者为七个哈鲁茨成员，他们在第二次阿利亚中来到巴勒斯坦，在邻近的太巴列农场当雇工。虽然这个新的定居点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发展，但是，小组在一年以后就瓦解了。1911 年从俄国来的哈鲁茨成员创立了“哈德勒公社”替代了这个小组。在公社里，制定了平等的劳动分工，以及由集体保障公社成员的物质需要的原则，从而使德加尼亚成为“所有克武察和基布兹之母”。在它的创始人中，有两个是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派别的首领：约瑟夫·巴拉茨(1890—1968，1906 年从乌克兰来到巴勒斯坦)，约瑟夫·布谢尔(1891—1919，1908 年从白俄罗斯来到巴勒斯坦)。他们两人于 1910 年在德加尼亚定居。

在德加尼亚最初的岁月里，周围贝都因人的四次袭击造成了它巨大的经济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的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劳动力开始匮乏。为了保持密切的“家庭”公社的框架，它的成员于 1920 年把他们所占有的部分土地提供给一个新的公社，取名为德加尼亚·贝特。后来，两个德加尼亚大量用水的生产不断精细化(种植香蕉和早播蔬菜、渔业、畜牧业、栽培花卉)，必须接收新的成员。1932 年，在德加尼亚为了生产精细化而腾出来的土地上，建立了基布兹阿菲吉姆。德加尼亚·阿列符有钻石加工企业，农业学校和戈登地方志博物馆。德加尼亚·贝特有金属加工厂，生产农作物喷洒器械的企业。1981 年德加尼亚·阿列符成立 70 周年之际，它被授予以色列国家奖金，以表彰它对发展以色列农业的贡献。1979 年年底，德加尼亚·阿列符有 497 人，而德加尼亚·贝特有 660 人。

德国犹太人 犹太人最早随同罗马军团来到德国。他们从事贸易，住在罗马人兴建的莱茵河畔的一些城市中。公元 4 世纪的文献中，提到科隆的犹太社区。10 世纪的文献中提到犹太人的定居点。犹太人主要住在莱茵河西岸、洛林和一些古老的贸易中心。11 世纪，德国南部出现了犹太社区。12—14 世纪，犹太人由于受迫害而迁往德国东部和北部。13 世纪初，犹太人来到慕尼黑和弗劳兹莱夫，13 世纪末来到柏林。犹太人在许多城市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 1096 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前，德国犹太人除了 1012 年暂时被逐出美因兹外，未曾遭到迫害。美因兹和沃尔姆斯的伊希瓦曾是中欧所有犹太人的精神中心。在耶希瓦学习和任教的有犹太世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十字军东征时期残酷的迫害和大规模屠杀，使莱茵河畔一些繁华的犹太社区凋蔽衰颓，某些犹太人被迫接受洗礼。

12—13 世纪，德国犹太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严重恶化。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成长起来的德国商人把犹太人从贸易领域中排挤出去。城市行会阻挠犹太人从事手工业，不允许他们进入自己的领地。经济活动中的限制迫使犹太人从事贷款业务。由于基督教徒禁止放高利贷，所

以,放贷成为犹太人的主要职业之一,这造成了社会上很多人对犹太人的憎厌。14世纪,300个犹太社区被摧毁,犹太人从德国大部分城市中被赶走或者被消灭。

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国王和市政当局很快邀请犹太人重返先前他们被驱逐的地方。15世纪,德国许多犹太社区恢复了。犹太人重操贸易和金融行业,掌握了新的经济活动领域(德国南部的葡萄酒贸易,以及经营农业品、皮毛和亚麻)。15世纪虽然没有发生以前对犹太人的那种迫害和屠杀,但德国人的经济竞争以及摆脱犹太人高利盘剥的愿望,往往成为把犹太人从某些地区和城市逐出去的原因。

艰难的外部条件妨碍了中世纪德国犹太人文化生活的。在驱逐和迫害的年代里,许多犹太书面文献资料毁灭了。不过,文学创作、主要是宗教文学创作没有停止。十字军东征时期犹太人的苦难在文学作品里得到反映。15世纪最终确立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祈祷规则。杰出的《塔木德》研究者力图使《塔木德》教规适应基督教欧洲的生活条件。16世纪的人道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未能改善犹太人的处境。宗教改革巩固了国王的权力。在以后数百年期间,犹太人的命运同德意志各个公国的历史相联系。

专制主义时代给犹太人的状况带来影响深远的变化。德国当权者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对犹太人、特别是拥有资本和丰富的商业经验和银行经验的犹太人的经济活动感兴趣。他们邀请犹太人进入自己的领地,以发展工业和内外贸易。同时,建立了监察系统,调节犹太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犹太人规定了居住地、从事职业的范围、开设银行的数量,甚至确定了他们必须购买的商品。违反这些规定,会处以很重的罚款和其他严厉的处罚。社区的自治和拉比的权威逐渐失去了意义。随着犹太人享有平等公民权,拉比失去了履行司法职能的可能性。

18世纪末期,犹太人密集的波兰领土并入普鲁士,波兰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阻滞了这段时期中的犹太人、特别是殷实的犹太人中明显加强的同化过程。启蒙运动促进了同化,M·门德尔松和柏林启蒙运动家的活动拉开了这场运动的帷幕。在法国革命(1789)和拿破仑战争(1806—1812)的影响下,犹太人与德国领土上的其他民族一律平等。不过,在复辟之后,这种权利丧失殆尽。许多犹太人、主要是富裕阶层的代表和知识分子(包括门德尔松的子女,以及著名作家L·伯尔尼和海涅)改信基督教。部分犹太人号召犹太人同周围其他民族相接近。在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犹太人,产生了犹太教改革运动。它的活动家们企图淡化犹太教规的严格性,使祈祷仪式接近于基督教的仪式,同时强调犹太教的精神方面和伦理方面。为了使德国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汉斯(1798—1839)、莫泽尔(1796—1838)和琼茨于1819年成立了犹太人文化科学协会,海涅参加了协会的工作。

犹太教改革派遭到传统犹太教领袖们的猛烈抨击。在许多地方产生了平行的犹太社区:改革社区、正统社区和一般社区(包括两派的代表)。德国犹太人生活中的社会派别和宗教派别引起对犹太问题的兴趣,促进了犹太宗教、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新流派——犹太教科学的出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成为以欧洲科学制定的方法研究犹太教的中心。

19世纪,德国犹太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获得长足的发展,也为解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世纪末期,大部分犹太人住在大城市,属于富裕阶层。除了从事商业和银行业以外,犹太人对德国工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自由职业对犹太人敞开大门。除了上面提到的伯尔尼、海涅以外,还有许多犹太人在19—20世纪初的德国文化生活、文学和科学的发展中起到显著作用。其中有哲学家科亨和胡塞尔,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1858—1918),数学家坎托尔(1845—1918)和闵科夫斯基(1864—1909),医生和细菌学家P·欧利希(1854—1915,1908年获诺贝尔奖),化学家F·哈伯(1868—1934,1918年获诺贝尔奖),画家M·李卜曼,作家A·茨韦格、路德维希、L·福伊希特万格(1884—1958),导演和戏剧活动家M·赖因哈特(1873—1943)。1869年通过了不分民族和宗教的公民平等法。不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社会、政治和科学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实际上保留着对犹太人的歧视。19世纪70年代末期,德国出现了反犹党派,在德国社会的广泛范围内,传播着反犹意识形态,出版反犹书刊。1871年德国犹太人为512158名(占全国人口的1.25%),1890年为567884名(占1.15%),1910年为615021名(占0.95%)。

20世纪初期,同化波及到越来越广泛的犹太阶层。反犹主义和东欧犹太人的涌入妨碍了同化。1912年德国建立了第一个犹太青年组织——布劳·瓦依斯,它力图复兴和巩固犹太传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于1897年,虽然没有成为群众性的,但它组织良好,并产生了一系列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像D·沃尔夫佐恩、O·瓦尔堡(1883—1970)、A·鲁宾、K·布留闵尔德(1884—1963)。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犹太人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8—1933年,犹太人的文化和经济繁荣;第二阶段从1933年开始,这是西欧最大的犹太社区遭到破坏和消灭的时期。1919年魏玛宪法取消了对犹太人的任何歧视,犹太社区的地位受到法律承认,社区活动得到巩固,产生了许多犹太文化机构和科学机构。与此同时,同化也加强了。与异族通婚的比例非常高(1921—1927年为44.8%)。皈依基督教的情况经常发生(每年约500起)。一切社会活动领域向犹太人敞开。某些犹太人如伯恩斯坦、哈泽等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许多犹太人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如W·拉特瑙(1867—

1922, 1922年任外交部长), G·朗道埃尔(1870—1919, 曾任巴伐利亚政府人民教育部长)。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 以及战后的经济崩溃和失业, 为民族主义情绪和反犹主义培育了土壤。德国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增长, 他们的政治和社会事业的成就也促进了反犹主义的增强。纳粹执政(1933年1月30日)导致了德国犹太生活整个结构的瓦解。犹太人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中被驱逐出去。1933年4月1日, 纳粹宣布了犹太贸易机构和工业机构的限额。一周以后, “非雅利安人”的术语被合法化, 犹太人开始从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大学和研究所中被清洗出去。

1935年9月通过的纽伦堡法令标志着第三帝国反犹政策的新阶段。犹太人迁居国外变成大规模逃亡, 他们逃到邻国, 然后去美国、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根据国联的官方统计, 1933年—1939年, 32.9万犹太人离开德国。1939年5月, 德国剩下21.4万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主要在1941—1942年, 德国成为被占领的西欧国家犹太人转运到东欧死亡集中营的中心。成千上万的德国犹太人还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被关在集中营中。1941年3月, 希特勒下令通过肉体消灭“最终解决”犹太问题。1941年9月犹太人获得命令, 必须在衣服上佩带黄色标志。1941年10月, 在帝国保安总局犹太事务处头目埃希曼的监督下, 犹太人被大规模地押解到东欧的隔都、强制劳动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中, 德国仅剩下16.4万犹太人。被押解出境或者自杀身亡的犹太人的财产, 被政府作为“人民和国家敌人的财产”而没收。1943年9月, 德国宣告成为“净化于犹太人”的国家。1944年9月1日, 德国还剩下14574名犹太人没有被关入集中营中, 他们中大部分(97.8%)是非犹太人的妻子或者是根据纽伦堡法令确定的半犹太人。被纳粹在德国屠杀或者由于驱逐而致死的犹太人为16—18万。

纳粹垮台后, 许多人认为, 纳粹屠犹导致德国犹太人历史的终结, 犹太人再也不会返回德国。战争结束时, 德国集中营中有数十万来自东欧各国的犹太人。战后, 约20万犹太人作为流动移民来到德国。他们中大部分人认为自己不是德国犹太人的一部分, 不参加残留的或者返回的原本德国犹太人着手的犹太社区的重建。他们建立了“幸存者”组织, 旨在移居以色列。当50年代初期出现大规模阿利亚浪潮时, 德国的犹太流动移民仅剩下1.2万人左右。

在战后最初几年, 许多犹太人确认, 他们居住在这个“该死的国家”具有临时性, 他们很快就会离去。50年代初期, 可以听到另一种意见, 有人呼吁在犹太人民之间“架设桥梁”。这种观点得到西德政府的广泛支持。西德第一任首相阿登纳认为, 在德国建立新的犹太社区, 以及确立犹太社区同德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有助于德国在

世界舆论面前恢复道德和政治名誉。

西德大部分犹太居民不是原来的德国犹太人。西德犹太人数相对稳定, 同时有某种增长趋势。1950年, 作为西德犹太社区成员登记的人数为22431人。1964年增加到25064人, 1980年1月增加到27768人。不是社区成员的犹太人约1—1.5万人。1980年1月, 大部分犹太人集中在5个大城市: 西柏林(6145人), 法兰克福(4931人), 慕尼黑(3920人), 汉堡(1375人)和科隆(1248人)。西德犹太人、特别是西德出生的犹太人与异族通婚的比例最高(除了奥地利): 1951—1958年男性为72.5%, 女性为23.6%; 而1901—1930年分别为19.6%和12.2%。关于犹太社区的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 没有准确的资料。许多犹太人属于中产阶级; 不少人靠退休金、纳粹造成的损失赔偿或者社会保障机构的津贴生活。许多犹太人由于在各个城市买卖不动产而致富。

总的说来, 犹太社区组织良好。它们中大部分属于犹太教中的自由主义流派。犹太社区的最高机构是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1950年成立)。犹太教育显得薄弱。在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建立了犹太小学。1962年在某些犹太社区建立了犹太成人学校, 上学的也有非犹太人。1973年夜校共有4千名学生。在西柏林、慕尼黑和科隆, 有犹太星期日学校。出版两种德文犹太周刊和一种意第绪语周刊。法兰克福有一所犹太剧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于1954年恢复。科隆建立了德国犹太学图书馆——德国犹太史方面最为完备的图书馆。1966年在汉堡大学建立了德国犹太人历史研究所。

在前东德, 作为犹太社区成员登记的犹太人在1980年为900人, 其中东柏林400人。许多犹太出生的人不是社区成员。他们中某些人在社会领域里出类拔萃, 曾分别担任艺术科学院院长、副院长、作曲家和音乐家协会第一书记、作家协会主席、美术家协会主席等。从1970年起, 前东德没有拉比。节日时拉比从匈牙利来到前东德。

德雷福斯事件 1894年12月法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Dreyfus, 1859—1935)因受诬告叛国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事件。德雷福斯出生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一个富有的工厂主家庭, 普法战争(1870)后举家迁到巴黎。他毕业于综合技术学校(军事学校), 尔后入伍任工程师。1889年获上尉军衔, 1892年在总参谋部供职, 是总参谋部中唯一的犹太人。德雷福斯的罪名是向德国人出售军事秘密。其证据就是那封著名的、没有署名的、致德国驻巴黎武官的信。1894年秋, 这封信落到法国特工部门手里。根据笔迹的某些相似, 但主要是因为特工部门领导人、特别是亨利的反犹倾向, 决定向德雷福斯提出起诉。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被捕, 受控叛国, 提交军事法庭审讯。尽管证据漏洞百出, 但是一些教会报纸每天都公布德雷福斯仿佛证据确凿的罪行材料, 并放出风声, 他

早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894年12月22日,法庭一致判处德雷福斯犯有间谍罪,剥夺了他的军衔,然后押往位于南美东北沿海的鬼岛。

在德雷福斯的弟弟马蒂厄的请求下,犹太作家和社会活动家B·拉扎尔(1865—1903)进行了反对这项判决的斗争。1896年11月,他发表了《德雷福斯事件真相》的文章,并把它分送给一些议员和社会活动家。还是在此之前,法国特工部门新领导皮卡尔审阅了有关材料,认为对德雷福斯的指控和审讯依据的证据十分可疑。1896年3月,法国特工部门截获了德国驻巴黎武官给法军少校埃斯泰尔阿齐的信,这封信清楚地表明,埃斯泰尔阿齐是德国间谍。皮卡尔认定,据以判处德雷福斯罪行的那封信,原来系埃斯泰尔阿齐所写。但是,皮卡尔的助手亨利不同意复查德雷福斯案件,并伪造了德雷福斯罪行的材料。皮卡尔恼羞成怒,前往非洲工作。但是在离开巴黎之前,他把自己所发现的事实告诉了朋友们。通过他们,法国参议院自由党副主席斯社雷·居斯特知道了这些情况。他在议会中宣称,德雷福斯无罪,并且公开指控埃斯泰尔阿齐。然而,法国总理F·梅林拒绝接受他的申诉,企图掩盖事实,以免军队权威受损。在社会中笼罩着反犹情绪也日益激烈。反犹主义者组织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军队万岁!”“打倒犹太佬!”等口号。1898年1月11日法庭宣布埃斯泰尔阿齐无罪。而皮卡尔被迫辞职,并被指控犯有诽谤罪而遭监禁两个月。这件新闻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1898年1月13日《震旦报》发表了著名作家埃米尔·左拉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左拉控告部长、总参谋部、许多高级军官和军事法庭为了陷害无辜的人和包庇罪犯明目张胆地伪造证据。这份报纸仅在巴黎就出售了20万份。因为这件事,左拉被指控犯了诽谤罪,被判处一年徒刑,罚款3千法郎。为了躲避逮捕,他只好亡命英国。德雷福斯事件成为当时法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不仅在法国、而且远在它的境外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很多党派、社会团体甚至家庭都在支持或者反对德雷福斯无罪这个问题上分成两派。前者组成了“人权联盟”,后者则组成了“法兰西国家联盟”。

在皮卡尔的抗议和其他人士的压力下,新任作战部长卡韦尼亚克根据有关控告埃斯泰尔阿齐的材料决心清查德雷福斯案件。这时,他发现了亨利笨拙地炮制的伪证。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捕入狱,次日在狱中自杀身亡。埃斯泰尔阿齐逃往伦敦,在那里他公开承认,他是据以判处德雷福斯有罪的那封信的作者。社会舆论变得对德雷福斯有利,法国政府决定废除对他的原判,并在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此案。这个决定引起了政府的一系列危机,在危机中产生了以瓦尔德克·卢梭(1846—1904)为首的内阁。新政府着手审理德雷福斯案件,这导致了大规模的反犹示威。

1899年6月德雷福斯被押回法国受审。年仅39岁

的他已呈老态、驼背、头发几乎脱光。虽然德国驻巴黎武官已经在报刊上宣称,他是通过埃斯泰尔阿齐获得材料的,德国政府也正式确认,它从未与德雷福斯打过交道,但是,在勒恩的重新审判中,指控的证人们(军官)仍然咬定原先关于德雷福斯有罪的证词。结果,1899年9月9日德雷福斯再度被宣判有罪,只是由于“宽大政策”,他才被改判10年徒刑,当时他已经服刑5年。反犹主义者欢呼这项判决。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则坚持要上诉。然而,德雷福斯本人及其家属只对尽快出狱感兴趣。因此,当法国新任总统埃米尔·卢贝(自由党人)代表政府赦免了他(1899年9月19日)以后,他拒绝上诉。1903年,他才递交了要求重新审理的上诉状。1906年审理结束,他被宣判无罪。他回到部队,获得少校军衔,但很快又离任了。1908年,在把左拉的骨灰运往巴黎名人公墓时,他遭反犹记者的枪击而受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军中服役,退伍时为中校。在他得到平反之前,撰写了《无辜者的书信》(1898)和回忆录《我的一生中的五年》(1901)。

世界犹太人感到震惊的是,德雷福斯事件竟然能够发生在自由民主的法国,而对犹太人的仇恨制约了法国大部分人的行为。德雷福斯是一个完全被法国同化的犹太人,他的案件表明,同化不是免受反犹主义迫害的保护伞。德雷福斯案件曾是导致赫茨尔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个事件也成为法国政治力量两极分化的催化剂。作为这个事件的结果,法国通过了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律。

对德雷福斯案件有很多著作曾加以记述。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文献和资料总汇为法语7卷本的《德雷福斯事件史》(1901—1911)。

摩尔科 (Solomon Molcho, 约1500—1532)

假弥赛亚。原名迪奥戈·皮尔斯。生于葡萄牙的里斯本。父母是改信基督教的葡萄牙犹太人。从小学习希伯来语、拉比文学和犹太教神秘哲学。稍后,在葡萄牙高级法院任书记官。当1525年,犹太冒险家流便尼来到葡萄牙时,他深为流便尼的气度所吸引,确信流便尼就是预报弥赛亚即将复临的先行官。他补行了割礼,宣布自己是犹太人,并用希伯来语中国王一词——摩尔科作为自己的名字。他以炽热的言语激发葡萄牙犹太人期望弥赛亚降临之心。由于言行过于激烈,遭到流便尼斥责,两人分手。由于担心受到异端裁判所迫害,他离开葡萄牙,前往穆斯林的土耳其,在萨洛尼卡住下。在那里,他宣传救世主义,赢得不少支持者。他宣称救世主弥赛亚将于犹太历5300年,即公元1540年出现。1529年,他在萨洛尼卡犹太会堂讲道,预报1530年罗马将发生洪水,1531年葡萄牙将出现地震。根据《塔木德》传说,救世主弥赛亚将在罗马城门口的病残者和平民中被发现,于是,他穿上破衣烂衫,混在聚集在台伯河桥上的乞丐中生活了30天。在这期间,他